

躁動的 新疆

Nick
Holdstock

尼克·霍史達克——著
許庫爾——譯

不安的 維吾爾

رۇغىيۇى

China's Forgotten People:

XINJIANG

Terror and the Chinese State

中國如何親手製造極端主義份子？

「新疆」，意即「新的疆域」。
從此，「他們」被迫成為中國人。

自新中國成立後，
維吾爾人已經不只是在人權方面受到威脅，
維吾爾的文化，維吾爾的語言與文字，維吾爾的人口構成，
都是中國希望「同化」的對象。



蔡偉傑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專業審訂

作者——

Nick Holdstock

尼克·霍史達克

尼克·霍史達克是一位記者兼作家，曾經在中國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斷斷續續地居住與遊歷十五年之久。他定期為《倫敦書評》撰文，其作品也刊登在《Vice》、《洛杉磯書評》、《n+1》、《獨立報》、《都柏林評論》、《愛丁堡評論》、《異議》及「Salon.com」網站上。尼克曾經與伊莎貝爾·希爾頓一起在《衛報》聯播網的《中外對話》中共事多年，他的第一本小說《傷亡》在二〇一五年時出版；而他的第一本著作《流血的樹》則談論他在新疆的生活，第二本《躁動的新疆，不安的維吾爾》探究維吾爾族與中國政府的對抗，第三本《追逐中國夢》是談論中國轉型為城市社會的報導文學。

躁動的
新疆

不安的 رۇغىيۇى
維吾爾

China's
Forgotten People:
Xinjiang

Terror and the Chinese State

Nick Holdstock

尼克·霍史達克——著

許庫爾——譯

「即使是在最好的境況下，少數民族的立場仍然很不容易。」

阿爾伯特·侯拉尼《阿拉伯人民的歷史》——書作者

各界評論 8

關於地名 14

導讀 當代新疆與維吾爾問題的大眾入門指南 蔡偉傑 15

引言 22

第一章 新疆——或「東突厥斯坦」？ 035

「新疆」？或「東突厥斯坦」？

如何「取得」西方／帝國的擴張

加入叛亂／「獨立」的思考

第二章 「解放」：共產主義時代來臨 079

文化大革命的混亂旋渦

第三章

「開放」時代 103

「開放」新疆／發生在農村的「戰爭」

「全世界最困難的工作」

連抗議都不公平

「巴仁事件」之後／新疆有「宗教極端主義」嗎？

第四章

嚴打與九〇年代 155

被砸掉的鐵飯碗／不同的世界

另一個出口／逃避的方法

兩張面孔／「政府什麼都不給我們」

第五章 流亡在外 217

卡德爾的領導／卡德爾的政治生涯
政府留下的傷害

第六章 孔雀向西飛 259

「雙語」教育的「需求」？
中國加入「反恐戰爭」
開放西部、關閉西部／「聖陵之旅」？
「分離主義」藝術／不再「衝突」？
孔雀向北飛

第七章

學到錯誤的教訓——烏魯木齊事件及後續

323

事件之後／「殺死王樂泉！」

王樂泉「被下台」／老喀什噶爾之死
不只是在喀什噶爾／期盼

第八章

「一個好炸彈」

375

新的暴力循環？／昆明事件及事件之後

「他的態度極為惡劣」

中國會犯相同的錯誤嗎？

新疆：主要的反恐戰場

唱反調的理由

各界評論

「作為一位在該地區廣泛遊歷十五年之久的記者，霍史達克的書自一個罕見的角度為我們介紹這塊土地與人民的風貌，使我們了解中國政府的政策是如何在維吾爾人間製造出極度的疏離感，及部分維吾爾人為何轉而採取激進手段及暴力。」

《海灣新聞》

「中國政府對其伊斯蘭邊境民族的壓制政策已經帶來嚴重惡果——在尼克·霍史達克對新疆維吾爾族歷史做了重要的介紹後，我們了解北京政策是如何無意間催化出中國的伊斯蘭極端主義。」

《新政治家》

「在《躁動的新疆，不安的維吾爾》一書中，居於愛丁堡的作者尼克·霍史達克開始為我們——套句中國共產黨的口頭禪——揭露新疆的『事實真相』，霍史達克的中心論點是：幾乎沒有證據可以證明他所生活過的新疆有組織性的伊斯蘭恐怖行動或是廣泛的分離主義煽動，相反地，在過去幾年不斷增長的暴力事件其實是對政府用以控制『恐怖行動』的壓迫性政策的反動——也就是說，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悲劇性地激起現在發生的一切……作者非常不偏不倚……這本以一絲不苟的調查為基礎的作品絕對不只是要耍嘴皮地抨擊中國而已。」

《十億民工進城來》唐米勒寫於《新政治家》

「清楚透徹及最新的資訊……尼克·霍史達克使我們更深入了解新疆……中國官方的防禦性及將這些外部議題政治化，雙管齊下的手段使得這個議題的對話幾乎遭到消音，希望尼克·霍史達克的作品和其他相似的作品能夠激起這種對話，如果沒有這樣的對話，那麼對新疆和中國的人民，及對該地區及更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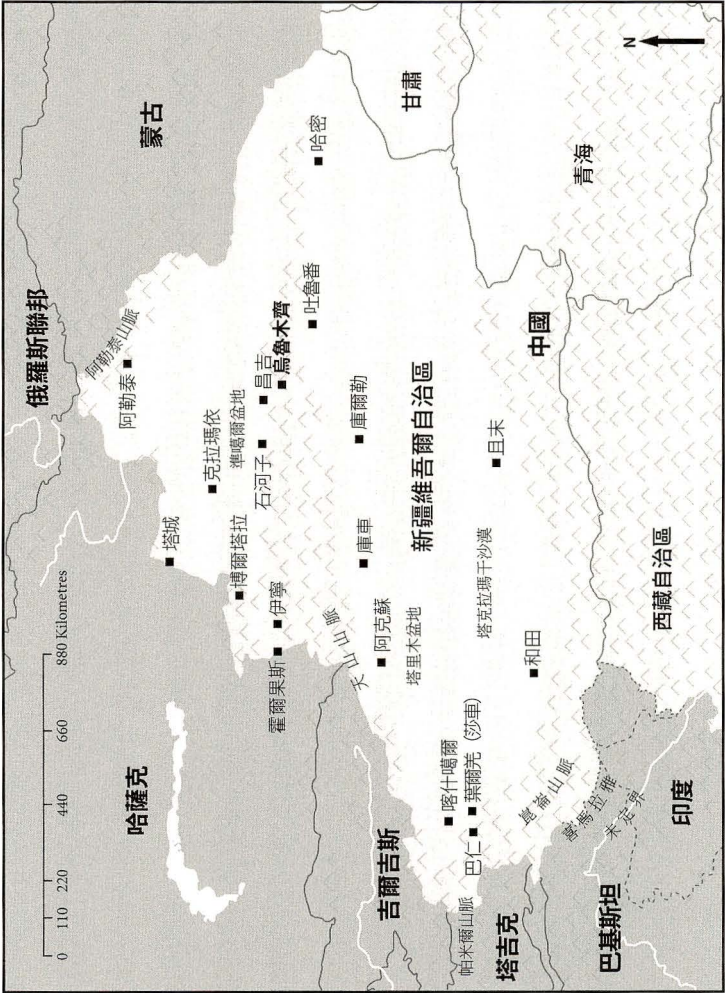
闊的世界來說，一個真實而持續的悲劇將會繼續上演。」

凱利·布朗《開放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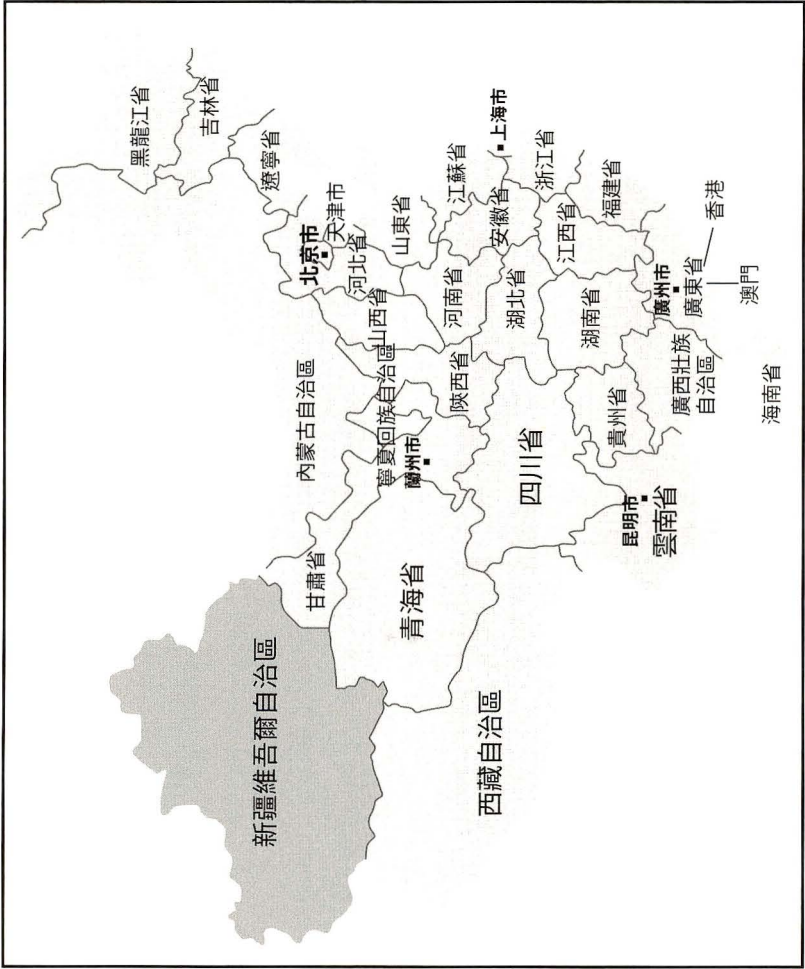
「本書帶來許多深刻見解及豐富資訊……記者霍史達克自二〇〇一年以來一直在新疆斷斷續續地旅遊及生活，他的文章會使任何為該地區撰文的人更加深入思考這個議題。」

喬納森·米爾斯基寫於《文學評論》

地圖二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地圖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政區（省份及自治區）



關於地名

本書的主題是一個充滿爭議性的地區，因此如何稱呼這個地方也成為一種政治議題。對某些人來說，使用「新疆」這個名稱即是認同中國對該區域的主權；正如支持該地區為獨立國家的人們經常使用「東突厥斯坦」（East Turkestan，又譯為東土耳其斯坦）一詞。也許最為中立的稱呼是使用該地區目前的法定名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XUAR），然而為了避免本書中塞滿各種雜亂的縮寫，或不得不在每一頁中多次重複這一長串法定名稱，我選擇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簡稱為新疆。而我選用的其他地名僅反映出學術界及媒體論述中的慣例用法，不應將之視為用「正確的」名稱來表現任何特定的政治立場。我在某些情況下會使用漢語名稱來指稱一個地點（例如使用漢語的「伊寧」而非維吾爾語稱呼的「固勒扎」），反之，在其他情況下則選用維吾爾語稱呼（例如使用「喀什噶爾」而非「喀什」）。

當代新疆與維吾爾問題的大眾入門指南

蔡偉傑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過去在臺灣市面上有關當代新疆問題的書籍並不算太多。自二〇〇七年王力雄的《我的西域，你的東土》出版後，就沉寂了一陣子。¹近四年來數量開始有所增加。例如二〇一四年出版劉學銔的《正視紛爭下的新疆問題》、《新疆暴恐活動真相》二書，²以及二〇一六年出版的霍爾·唐日塔格的《東突厥斯坦：維吾爾人的真實世界》等。³如今本書《躁動的新疆，不安的維吾爾》

1 王力雄，《我的西域，你的東土》（臺北：大塊，2007）。

2 劉學銔，《正視紛爭下的新疆問題》（新北：致知學術出版，2014）；《新疆暴恐活動真相》（新北：致知學術出版，2014）。

3 霍爾·唐日塔格，《東突厥斯坦：維吾爾人的真實世界》（臺北：前衛，2016）。

面世，臺灣讀者又多了一個新的選擇。

本書作者尼克·霍史塔克為記者兼作家，曾經在新疆居住與採訪長達十餘年。在本書中，他利用了自己採訪許多新疆人所得的第一手材料。作者剖析了由於國際地緣政治的情勢改變（主要是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外交政策的轉向），加上中國政府的宣傳，使得維吾爾族在中國與國際間的公眾形象在過去二十年內，從一個能歌善舞的民族或是受壓迫的少數民族，變成了一個追求新疆分離主義的恐怖份子形象。而這樣的討論使得維吾爾族生活與文化發展條件不斷惡化的情況，被國際媒體鋪天蓋地的恐怖主義論述與報導所掩蓋。作者強調我們必須將維族人出於維權與社會經濟不平等的抗議，跟所謂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暴力行為做區分。維吾爾族並非天生就是憎恨中國政府的少數民族。

作者在書中對新疆與維吾爾族的背景進行概述，並且探索了形塑維吾爾族歷史與民族認同的主要因素。但他對於古代新疆與維吾爾歷史並未著墨太多，自準噶爾汗國與清朝統治才開始談得比較細緻。作者指出從八世紀維吾爾（當時稱回紇、回鶻、後來又稱畏兀兒）作為人群或國家的稱呼起，這些人就缺

乏統一的族群起源與文化認同。他們信奉摩尼教、佛教、甚至薩滿教，使用粟特文字母，這些都與今日信奉伊斯蘭教與由突厥民族為主所構成的維吾爾人大不相同。這些因素直到十五世紀初才存在於新疆地區。然而後來控制今日新疆地區的準噶爾蒙古自十七世紀起開始興起，並在十七世紀後期征服了塔里木盆地與吐魯番地區。他們將一部分居住在塔里木盆地西部的人群遷往伊犁河谷開墾，這些人被稱為塔蘭奇（Taranchi），意為農夫。後來這些人的後代也認為自己是維吾爾族。後來在十八世紀中葉，準噶爾汗國被清朝所滅，清朝控制了天山南北路。後來在十九世紀六〇年代，所謂「阿勒提沙爾」（Alishahr，意為六城，至於是哪六城則尚有爭議，基本上是南疆的綠洲城市）的稱呼也開始興起。一八六五年來自浩罕汗國的阿古柏佔領了新疆，清朝派左宗棠率領湘軍於一八七八年收復新疆，後來清朝才建立新疆省。但是此時維吾爾仍舊未成為當地人民的自稱。一直到一九二一年才成為蘇聯境內新疆突厥穆斯林的自稱，並且在後來盛世才主政下採用蘇聯的民族分類，於一九三〇年代中期維吾爾作為一個現代民族才被廣泛接受。而東突厥斯坦作為新疆的另一個稱呼

而廣為人知，則是要拜一九三三年與一九四四年兩度成立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所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於一九五五年成立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自此維吾爾族與整個新疆連結在一起，成為「自古以來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共在新疆建立了生產建設兵團，招募了許多漢族人前往開墾新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許多漢人遭受衝擊而逐漸離開新疆。維族人的不滿在改革開放後才爆發出來。一九九〇年的巴仁事件、一九九七年的伊寧二五事件、二〇〇九年的烏魯木齊七五事件，然後是二〇一三年與二〇一四年在北京、昆明與烏魯木齊所發生的暴力事件。然而這些事件是否都能夠視為暴力恐怖主義分子滋事，意圖分離新疆，或是如世維會所言是爭取新疆獨立，反抗中共的統治，作者其實是持保留態度的。他強調應該從改革開放後區域開發不平衡，以及城鄉與貧富差距的加劇等社會經濟因素，以及政府對維吾爾宗教文化的壓制等角度去理解這些事件。而且目前我們對於這些事件真相的了解還是相當破碎，其中的內容可能遠比我們想像的還要複雜許多。

書中還介紹了兩個挑戰中國政府新疆政策的維族人：一位是恩維爾·土赫

提，他揭露了中國政府在新疆維族聚居地進行核武測試造成維族人罹癌比例高漲的情況；另一位是熱比婭·卡德爾，曾經是中國最富有的女性企業家，後來流亡海外，當選為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並且曾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這兩位都被迫離開故土，流亡海外，付出了不小的代價。特別是第一位恩維爾的經歷，作者的第一手採訪讓我們得以對他的背景與心境有更細緻的了解。

本書也運用了許多海外新疆研究者的新近成果，這點也讓我印象深刻。在本書出版後，海外新疆學界也陸續有新的成果問世，例如本書中引用過的澳洲國立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布戴維（David Brophy），他的新書《維吾爾民族：俄中邊疆的改革與革命》已經問世。⁴該書的特點在於透過對中、蒙、俄、土四方材料的廣泛使用，把當時的跨國突厥系穆斯林社群網路，以及這個網路在形塑維吾爾民族過程中的作用加以說明，有助吾人從跨國的綜合角度對這段歷史有整體認識。

⁴ David Brophy, *Uyghur Natio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n the Russia-China Fronti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另一本值得注意的是美利堅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鄭智明（Justin M. Jacobs）的新書《新疆與現代中國》。⁵該書從民國時期治理新疆之漢人官員的角度來探討現代中國政治史。從早期楊增新治理新疆不考慮民族因素，而僅著重於政治忠誠與文化認同，到後來盛世才受蘇聯影響引入少數民族識別政策，試圖拉攏境內突厥穆斯林，再到後來國民政府統治時期提出支持民族自決的進步立場，說明這些統治新疆的漢人官員如何回應突厥穆斯林的民族主義主張。但是作者指出這些中國官員也是受到蘇聯援助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即中共所稱的三區革命）所影響。由於蘇聯支持民族自決，刺激國民政府提出更加激進之支持民族自決主張，作者稱這種情況為當時全球族群政治的軍備競賽（global ethno-political arms race）。另外作者還討論了流亡臺灣的新疆省政府，也是一大亮點。本書有助於我們理解民國時期新疆民族政策的演變及其國際背景。

綜上所述，本書為新近討論當代新疆問題的佳作，試圖在充滿極端政治立場中的討論，尋求第三條路。作者以親身採訪為主，配合最新學術成果，來敘

述新疆與維吾爾族的歷史背景與問題癥結，對於當代新疆少數民族歷史人權與政治議題感興趣的讀者而言，本書會是個很好的入門指南，千萬別錯過了。

5 Justin M. Jacobs, *Xinjiang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6).

引言

昆明市位於中國雲南省西南部，這個雲南首府因其怡人的氣候、風景及當地文化而受到中外遊客所喜愛。二〇一四年三月一日，一個乾爽的週六夜晚，這個四季如春的城市的的主要火車站——昆明火車站裡有數千名旅客川流不息，其中有拜訪這個城市的旅客，還有一些是在農曆新年後要回到遙遠城市工作或求學的移工與學生。考慮到中國車站需要處理的旅客人潮有多麼巨大，因此毫不出奇地，中國大多數車站沒有太多用於接待旅客及提供休憩的設施：售票廳、候車室和入口大廳等場地非常巨大、地上鋪設石磚地板，懸在上頭的天花板幾乎和教堂的天花板一樣遙遠；車站裡面沒什麼自然光，紅色的霓虹看板顯示出列車資訊；鈴聲響起，閘門開啟，隧道和天橋上迅速擠滿大量旅客。要進入月台的旅客必須通過驗票及安全檢查，但任何人都可以在車站前的廣場及售票大廳自由通行，無論白天黑夜都有洶湧人潮在車站進進出出，也就是說，車

站隨時都是有些混亂的。

昆明火車站也不例外，由於車站裡有這麼多人來來去去，因此不意外地，當天沒什麼人留意到車站外的某些人。剛過晚上九點後，車站外出現八名黑衣蒙面人（譯註：多數中外新聞及維基百科資訊提到直接參與襲擊的人數並不相同，英文維基條目稱八人直接參與，中文維基條目則同中國官方聲明，表示有五名直接參與者）即使有什麼人注意到這些黑衣人，他們也不太可能覺得需要擔心這些人：在中國，抗議和暴動不算什麼罕見的事，但暴力犯罪還是相對少見的。

因此，當這些蒙面人從黑衣下取出長刀並開始攻擊車站外的人們時，這件事肯定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一位在附近店鋪中工作的男子回憶道：「有兩個女人告訴我：『外面有人打起來了，他們殺人啦。』我回她們：『別胡說八道，這裡安全得很。』但真的有人被殺了。」

當人們意識到發生什麼事情後，他們試圖逃命。超過一百人擠入一家重慶餐館避難，有些人甚至不得不站在桌子上。事後店主回憶：「他們嚇壞了而且

哭個不停，有些人甚至根本說不出話。」

還有些人試圖在車站裡面逃生，一位在售票大廳的學生回憶說：「當時還有很多人在排隊買票，而那些湧進來的人大喊著『殺人啦！』」

王季和她的老朋友曹先生當時人也在售票大廳，襲擊者進入大廳時他們才剛拿到車票，曹先生首先看到的是一個手持長刀的黑衣蒙面人，他說：「他進來後立刻往一個人的脖子上劈了一刀（……）這個人一倒下，他就繼續上前砍殺其他人。」

曹王兩人想逃，但出口只有一個；王女士試圖跑出去時被那個男人往頭上砍了一刀，他們去了最近的一所醫院，當他們抵達醫院時，醫院裡面已經擠滿了傷者。

不是每個人都成功脫逃，一個來自遠方城市哈爾濱的男性敘述他的母親是如何遭到襲擊。「她絆倒在一張椅子上，我沒能成功把她拉起來，一個襲擊者用刀子刺入我媽媽的喉嚨，他沒拔出那把插在喉嚨上的刀，而是抽出身上的另一把刀繼續砍她。」

另一名受害者是當時五十九歲的熊文光，他和妻子陳貴珍是來自雲南農村的移工，他們為了過年而回家鄉一趟，要搭火車前往東邊的浙江，但火車在隔天早上才發車，考慮到旅館費是一筆不小的負擔，這對夫妻認為他們最好還是在車站等候發車。當熊先生看到一個手持長刀的兇徒朝他們走來時，他一把將陳女士推開，犧牲自己而拯救了妻子的生命。

襲擊者在車站裡面移動，無差別砍殺一個又一個的受害者。劉桂林是一間小店的店主，他的店鋪很窄小、沒有窗戶，金屬貨架上堆滿了泡麵和零食，他事後這麼描述這場混亂：「有兩個人就在我面前被殺，一個被割了喉嚨，另一個胸口被刺了一刀，到處都是血。」

有一小群人用金屬傘具、鐵棒和滅火器設法自衛，劉先生是其中之一；另一個因為身材高大而有「大牛」綽號的男子也成功擊退了襲擊者。

警方花了近二十分鐘才抵達車站，當時已經有二十九人死亡、一百四十多人受傷。警察進入車站後開槍射殺四名襲擊者，但其他四人逃走了。傷者被送往醫院，而政府當局迅速封鎖了車站，人們可以從發佈到網路上的照片中看見

散落的行李、血泊、悲痛及死亡。

隔天，有數百人在車站外點起蠟燭，旁邊擺著白色菊花。在中國，白菊花是傳統上用來表示哀悼的花卉，當時充斥著各種關於襲擊事件發起者的推測，而已經有許多人將之歸咎於維吾爾人——這是一個集中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以穆斯林為主的族群，而新疆位於中國最西部，遼闊但人口稀少。一位網民在微博（中國版的推特）上這麼寫：「新疆人不是人。」另一個微博使用者則這樣寫：「所以這真的是維吾爾人幹的好事！我實在想不通，眼前我們中國有著優良的經濟及很好的發展環境，你們在這樣的條件下還在搗亂？（中略）你們是天生的壞蛋嗎？」

雖然這些言論不代表廣大公眾的意見——許多網友都在呼籲要謹慎及克制——但這些言論都在先前就建立起的維吾爾族暴力敘事上穿鑿附會。在昆明火車站襲擊事件發生的五個月前，二〇一三年十月，一輛汽車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邊緣撞上了一堵牆並且爆炸，造成五人死亡（包括三名乘客）及四十多人受傷，北京警方形容這個事件是「來自新疆的嫌犯所進行的恐怖主義行動」，儘

管他們沒有挑明肇事者的族裔，然而其言外之意就是——嫌犯是維吾爾人。

中國政府將發生在昆明的攻擊事件和天安門的爆炸案，歸咎於那些志在推動政府所稱的「三股勢力」——暴力恐怖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的激進派伊斯蘭組織。中國政府聲稱是敵對外國勢力和基地組織、蓋達組織聯手指揮這些恐怖份子的行動，其目的是為了促使新疆自中國分裂出去成為一個獨立的伊斯蘭國家。中國政府對於任何新疆脫離中國的可能，向來採取一貫回應方式，也就是主張該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新疆人民沒有理由對此表示不滿。政府當局極力強調不存在民族衝突：二〇一四年三月，新疆地區的高級官員努爾·白克力聲稱「恐怖主義活動代表不了任何一個民族。」

儘管白克力如此聲稱，但在很多人（無論是中國境內或境外）心目中維吾爾族和暴力行為間的連結比以往要來得更加牢固，然而這是一個相當新的觀點，一個由被媒體報導、自命為安全專家的人所發表的意見、已知發生在新疆的實際事件的事實所塑造而成的認知。二〇〇一年秋天我第一次前往該區域

時，中國以外的人們沒多少人聽說過新疆或是維吾爾族，那兒是偏僻的，是中國一個帶著點異國風情的地方，曉得新疆的人主要是中亞的學者及參與絲路套裝行程的旅客。當我告訴人們：我要去中國某個人口組成以穆斯林為主的地方時，他們通常是無法置信地看著我，即使是現在，這樣的表情還是有機會在我面前出現的。在那個年代，當新疆發生重大事件——比方說一九九七年在伊寧（位於近哈薩克邊界的一個小城市）發生一場針對抗議活動的殘酷鎮壓行動——這些大事通常在國際上沒什麼能見度，只出現在人權觀察組織或國際特赦組織等機構的報告之中。

即使是在中國境內，大多數中國公民對新疆所知甚少，而且他們通常從來沒有去過新疆，這個地區距離北京非常遠，遠到位於不同的時區；過去人們要花上三天的時間搭火車才能到達新疆。然而這並沒有阻止人們產生成見，在一九九〇年末期，那些我聽人說起關於對新疆的見解，即使是有些居高臨下的施恩態度，但大多數還是正面的看法。我在湖南的一所大學任教，同事和學生不但認為新疆有美麗的女孩兒，也相信那兒的生活是多采多姿的，還有最重要

的是——維吾爾人有多麼能歌善舞。

本書要探討的是維吾爾族在中國及國際間的公眾形象，在過去二十年中的轉變——從親切的吟遊詩人（或者被壓迫的少數民族）轉變為意圖將新疆自中國分離出去的伊斯蘭恐怖份子，我們將談到的內容是中國為了因應地緣政治背景的變化（尤其是針對美國的外交政策）而改變了官方對新疆異議事件的描述，及這樣的改變對維吾爾人的生活造成的影響。逮捕、處決及加強監視新疆的維吾爾人並未使當地變得更加安全，而只是產生更大的怨恨。

與此同時，西方媒體描述新疆（並擴及維吾爾人）的角度也發生了變化，雖然這些西方媒體有著不同的考量點——也就是說，他們考慮的是新聞價值，而非政治權宜——但中國官方論述和許多西方新聞媒體的報導已經開始有逐漸匯流的趨勢，這個趨勢在二〇一四年三月時發展到極點，當時福斯新聞、《泰晤士報》、《每日鏡報》（這是一家英國的小報）認為維吾爾人可能是馬來西亞航空MH370失蹤事件的起因。《每日鏡報》的文章將維吾爾人描述為「中國的伊斯蘭武裝份子」並談到他們「與恐怖主義的聯繫已廣為人知」；而福斯

新聞重述這一指控，並說新疆是一個「激進派伊斯蘭主義的飛地（enclave，飛地，一種人文地理概念，意指在某個地理區劃境內有一塊隸屬於他地的區域）」。

我們可以輕易地將福斯新聞跟《每日鏡報》的報導，當作怠惰的新聞業產物而拋在一旁（沒有證據可以證明新疆、維吾爾人和那架飛機的命運有關），但這樣的報導暗示了該地區給予人的一般印象，雖然有記者對新疆所發生的事情提供了平衡而謹慎的報導，但現在的主流趨勢是透過強調該區聳人聽聞的民族衝突來作為新疆及其人民的寫照，強調到幾乎將該地區其他所有事物都排除在外。為了這個目的，許多新聞媒體將新疆形容為一個「極不穩定」、「躁動不安」的區域，寫出的報導幾乎都是跟暴力相關的內容。

當然，這樣的聳動式報導並不只侷限於中國：在外國報導中或多或少也可以見到這樣的聳動式報導，無論是針對中東地區、巴爾幹地區或非洲。在新疆及其他地方，這樣的報導就某種程度上而言已經對這些地區及人民造成有害的影響，並且掩蓋了事實的複雜性，包括引發衝突的真正原因（而且這類原因

通常是各式各樣的）。

就新疆的情況而言，傳媒日益聚焦在暴力及「恐怖主義」，已經掩蓋了該地區維吾爾人生存條件不斷惡化的討論，雖然許多新聞報導都提到了維吾爾族面臨的社會和經濟方面的弱勢——很少有維族人受僱於新疆的主要產業，而這些產業多半是國營產業——以及眾多施加於維吾爾族的宗教限制，但這些問題和其他人權議題在西方媒體報導中無疑是次要的內容。

本書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糾正這些報導的偏差，在概述新疆獨特的社會和文化因素後，我將探索塑造起「新疆」及現代維吾爾民族認同的歷史及政治力量。接下來的章節會關注於幾個重大事件，主要是過去二十五年在新疆發生、或是與新疆有關的和平與暴力的事件：一九九〇年的巴仁事件、一九九七年的伊寧事件、二〇〇九年的烏魯木齊事件、然後是二〇一三年及二〇一四年在北京、昆明和烏魯木齊的事件。唯有從各種猜測與誇大的說法（有時甚至純粹是虛構的內容）中篩選出事實，我們才有機會了解這些事件及其原因，即使這意味著我們得承認：我們根本沒有任何把握去確定新疆事件的來龍去脈及其

成因。

我也主張應當在更廣大的中國背景中來討論發生在新疆的事件，以了解針對該地區（及與之相關的維吾爾族）特有的不平等現象達到什麼樣的程度，維吾爾族和中國中部的漢族農民可能都是同一個政策下的受害者，但這個事實並不能減輕他們各自所經受的不公正待遇；但這樣的思考方式能使我們不至於貿然將新疆發生的每一個問題都歸咎於民族歧視。

在更廣泛的層面上，本書所拋出的問題是我們現在談論及思考中國發生的人權、抗議及民族議題的方式。我認為將新疆維吾爾人想成一個受專制（及主體民族）國家壓迫的少數民族有著相當的危險性（或者有些危險），這樣的敘事可能會使我們在探究普通人適應（以及抵抗）當權者施加在他們身上的限制時冒著迷失方向的風險。而我也認為人們不夠重視維吾爾族的大眾文化，與其去研究一群持刀行兇的暴徒與他們的行為，也許更好的方式是去了解維族大眾文化以幫助我們了解更多維族人的想法。本書探究當代維吾爾族文化的某些面向，其目的也是為了提醒人們：維吾爾族並不像許多人所暗示，是天生就憎

恨中國政府的少數民族。

我在本書中會談到兩個人的故事，他們因為挑戰中國政府在新疆政策而付出沉重代價，這兩個例子有著鮮明對比：一位是恩維爾·土赫提，他協助揭露中國政府在新疆進行核武測試造成當地癌症流行的事實；另一位是熱比婭·卡德爾，她是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是目前從事維護維吾爾族權利活動的主要組織之一，這個組織認為「中共的統治（中略）可說是維吾爾歷史上最為黑暗的篇章，維吾爾族的存續在目前的情勢下正受到威脅。」

整體而言，新疆問題被視為一種伊斯蘭恐怖主義敘事，這段歷程是非常令人沮喪的，我花了十五年關注新疆的事件，從二〇〇一年開始（當時我在伊寧待了一年）直到最近一次我在二〇一三年秋天的造訪為止，這段時間可說沒有什麼好消息，最好的情況也只是有些時期沒有事件被報導出來。我們可以天真地把這種情況看成事態正在以一種漸進而平淡的方式改善中，而媒體的雷達自然會放過新疆；但接下來又會發生持刀攻擊、槍擊事件，或——這取決於你相

信誰——警察對和平抗議活動開火，在接下來的幾星期裡你會看到各種不同立場的聲明敘述事件的經過及其意義，而我們唯一能夠肯定的事情只有新疆的維吾爾族情勢演變得更為惡劣了。

因此，當我循例在本書結語中預測新疆維吾爾族的未來時，我會說他們的情況是不容樂觀的，至少大多數使得新疆維吾爾人生活困頓（有時甚至活在危機之中）的力量在不遠的將來是不太可能大幅度減少的。但我也認為（或者說我希望）當我們釐清一些源於人們口說或手寫的新疆見聞中的虛假之處，以及「維吾爾人」的希望與想法，也許我們就能得知部分新疆維吾爾人（特別是年輕世代）如何適應其社會的壓力與制約，並同時創造出讓他們延續下去的可能性（也許也包括某種身分認同）。

第一章

新疆 —— 或「東突厥斯坦」？

為什麼，

一個有著這樣不同傳統的地方會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呢？

中午時分的市場擠滿了人潮，攤販賣著緊身褲、一袋袋指甲花、冰糖、葡萄乾，用橡膠塞封口的藥瓶裡面裝著看來像是血液的內容物；然後我看見了麥殼和壁龕，那使我想起了石榴；女人頭上包著色彩鮮麗的絲巾，男人則戴著各式各樣的帽子：小禮帽、短沿紳士帽、闊邊帽、硬瓜皮帽；那些臉孔看起來像是土耳其人、俄羅斯人、伊朗人，但他們看來絕對不像漢人；他們說的話也是如此：他們口吐的可能是各種語言，但絕非普通話（Mandarin）。在市場攤位的盡頭賣著阿拉伯文書籍的是有一只渾濁眼珠的男人。

市場中有個擺滿了桌椅的空間是供人們享用羊肉料理的地方，一個男孩正在用紙板給烤羊肉串搗風，煤炭燒得赤紅；那兒飄著煙霧和人們的叫喊，有成堆的公羊頭顱，黃色的肺被切成大塊放在一個個碗裡。

此外，我看到人們三三兩兩地走進清真寺，綠色和橙色的磁磚裝飾著清真寺的大門，門邊有位老婦人跪在地上，她的頭包著布巾，伸出一隻瘦骨嶙峋的手。再往下走就沒有攤位了，只有一些矮房子，這些低矮的房舍有著青色的牆壁、松石綠的門和粉刷過的百葉窗，黏土製的烤爐裡面正烘焙著麵包；老人正

在棋盤上廝殺，一群羊兒走過。我們可能在許多國家看到這樣的街坊，例如烏茲別克、吉爾吉斯甚至土耳其，但我清楚明白自己身在何處，我不會忘記自己正身處在一個名為喀什噶爾的城鎮，它位於新疆西南部，而且最重要的是——這是在中國。我知道這件事，但是——這看起來真的不太對勁。

「新疆」？或「東突厥斯坦」？

我在二〇〇〇年時第一次造訪新疆，當時我居住在湖南省的一個小鎮，而這兩地是迥然不同的。湖南的邵陽市周邊鄉村是一大片稻田，春天的景致綠意盎然，而喀什噶爾位於新疆，那兒是廣闊無垠的荒涼沙漠，零散分佈著綠洲城鎮；湖南人口組成幾乎都是漢人（這是佔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二的主體民族），而我在當地所見所聞的文字語言是漢語，但在喀什噶爾有著更大的民族多樣性，依據二〇一〇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除了新疆的主體民族維吾爾族（佔

百分之四十四）以外，還有烏茲別克族、柯爾克孜族（柯爾克孜又譯為吉爾吉斯，現代漢語為表區分多對居於中國境內的這一民族常稱「柯爾克孜族」，對居於中亞的群體稱為「吉爾吉斯族」）、塔吉克族、哈薩克族和回族。維吾爾語和漢語完全不同，但考量到維吾爾語來自不同的語群，這就不是讓人太吃驚的事情了：維吾爾語屬於突厥語言群的一部分，而突厥語群還包括哈薩克語、烏茲別克語和吉爾吉斯語。

維吾爾人的食物也跟在南中國吃到的蒸煮米飯或在鍋裡炒出來的菜餚不同，他們喝濃湯、吃羊肉塊配上米和胡蘿蔔，還有麥製的長麵條、美味的餡餅和最讚的——新鮮出爐的饅（nan，又稱為南餅，作為中亞和南亞人主食之一的發酵麵餅）。

當他們邀請我進入用磚頭和泥磚造的小庭院住宅作客時，他們熱情待客的習俗也跟我所認識的中國人不一樣。我們不是坐在硬椅子上喝綠茶，而是斜倚著地上的靠墊喝紅茶，並從一張矮桌上吃乾果和堅果。而款待我的東道主也穿著不同的服飾，許多女性穿著寬鬆而顏色鮮麗的連衣裙，並用頭巾包覆住她們

的髮絲，有些男人戴著飾有精美刺繡圖案的硬挺帽子（在維吾爾語中，這樣的精美帽子被稱為多帕〔doppa〕）。

那趟旅途是個令我感到困惑的經驗，它挑戰了我對於在中國生活的許多想法，其中最令人驚訝的是伊斯蘭教在維吾爾社群中顯而易見的中心地位——有鑑於馬克思主義反對宗教的歷史，大多數人都不預期宗教在共產主義社會中能這麼顯眼。我們可以從清真寺、墓地和市場出售宗教出版品的攤位看見日常的虔誠痕跡。清真寺的規模大小不一，小到僅能容納五十人的祈禱室，大的則可以容納幾千人，而其中最大的是艾提尕爾清真寺（Id Kah mosque）。

聖陵（shrines，維吾爾語中稱之為mazar，音譯為麻札）以當地聖人的墳墓為基礎而設置，這是維吾爾族另一個較不顯眼的信仰表達形式，新疆各地都有聖陵，但大多數位於南方。人們一年到頭都可能前往聖陵朝聖，無論是在宗教節日時，或是當人們為了解決個人問題（可能是宗教方面、身體方面或精神疾病方面）或影響社群的問題（例如乾旱）時，人們都能為這些問題向聖人祈求。這些麻札有各種不同的形式，最簡單的麻札是在地面上插入樹枝，

並用布條穿過樹枝之間；而最精緻的麻札通常有一個真正的墳墓，數百根竿子及彩色的旗幟圍繞著墳墓矗立在沙漠中（彩色的旗幟源自於佛教習俗）；也有圍繞著自然地貌而設的麻札，通常是一棵樹。在伊寧，曾有棵位於主要道路中心的樹木，它的枝條上滿是紅色的小布條——那一樹紅布條是希望能夠懷孕的婦女綁上去的。

這些聖陵和伊斯蘭教什葉派的關聯性大於遜尼派，尤其與蘇菲派的宗教習俗頗有淵源（譯者註：遜尼派是伊斯蘭教的最大教派；什葉派為第二大伊斯蘭教派；而蘇菲派偏向神秘主義，中亞被視為蘇菲主義的中心）。薩滿教（分布於北美洲和北亞、中亞的巫覡宗教）的影響也顯現在這些麻札上：這些聖陵經常被祭品所包圍，祭品包括山羊角、馬尾到金屬製的新月及磚塊不等；還有一些布製的手製小人偶或迷你嬰兒床，那些是向聖人祈求幫助她們受孕的婦女所留下的。有些穆斯林反對這些其他信仰體系所帶來的影響，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是在鼓勵崇拜阿拉以外的對象。

新聞報導和文章在介紹維吾爾族時所提到的重要事實是：維吾爾族是遜

尼派穆斯林。這麼說雖然沒錯，但這個陳述是需要加以說明的，維吾爾人之間在宗教信仰及參與程度上有非常大的差異。這樣的差異巨大到對部分維吾爾人來說，「穆斯林」身份與其說是信仰，不如說是一種文化印記。這樣說並非淡化伊斯蘭教對維吾爾人身份認同的重要性，而是承認維吾爾族表達宗教信仰的多樣性：部分維吾爾人的宗教儀式少到僅限於食用清真食品；但有些維吾爾人會參與星期五的拜禱儀式並在齋月時禁食；而有些人一天之中會去清真寺做五次禱告，完全不抽煙喝酒，到麥加朝覲並且捐款給伊斯蘭慈善機構——這些人都認為自己是穆斯林（儘管他們不一定互相承認對方是穆斯林）。

有些人甚至認為「維吾爾人是『穆斯林』」這樣的說法不能真的說明什麼，這樣的敘述無法使人理解維吾爾人實際的宗教信仰及習俗，大多數維吾爾族都遵循伊斯蘭教法的哈納菲學派（Hanafi school，伊斯蘭教法的一大派別，屬於遜尼派，這個教派允許祈禱時使用阿拉伯語以外的語言），但新疆歷史上經歷過各種宗教影響的複雜交互作用，這也意味著許多維吾爾人的信仰和習俗（例如前面提到的麻札）受到蘇菲派、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

又稱為拜火教、祆教）、佛教和薩滿教的影響，而這些影響對於不同維吾爾社群的相對重要性往往會因地而異：新疆西部受到來自中亞的薩滿教的強大影響，而來自印度的佛教習俗對南疆有更多的影響力；儘管這些前伊斯蘭（pre-Islamic）的影響力先來到新疆，但許多維吾爾族人（特別是在農村）實際採用的是一種介於正統伊斯蘭習俗及這些古老傳統之間的混合形式。

鑒於新疆維吾爾人普遍信仰伊斯蘭教、維吾爾語和許多中亞語言在語言上的相似性，及該地區和鄰近後蘇聯（post-Soviet）共和國之間在飲食、社會習俗及文化上的重疊性，許多遊客最後都會跟我一樣產生這個疑問：為什麼一個有著這樣不同傳統的地方會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呢？

地理位置也加強了新疆的文化獨特性。新疆遠在西方，所處的時區與中國其他地區不一樣，「新疆時間」比中國其他地方的時區（即所謂的「北京時間」）晚了兩個小時。我們可以在新疆大多數公共場所看到北京時間，而火車時刻、班機起飛所使用的時間也是北京時間，所有學校、醫院和政府辦公室也都使用北京時間；大部分維吾爾族採用新疆時間，而大部分漢族採用北京時

間，然而在某些地方還是會因應時差而進行調整。在中國其他地方，大學和學校課程通常在早上八點開始，但是在新疆，最早的課程是從早上十點（新疆時區的早上八點）才開始。

光是新疆龐大的面積，就足以使它看起來像是緊鄰著中國其餘疆域的獨立區域。新疆的面積約略等於西歐，它是中國面積最大的行政區且有著相當重要的邊界線，大多數邊界是以山脈劃分，在東北方，阿爾泰山脈成為新疆和俄羅斯、蒙古的邊界，而西北部的天山山脈將之與哈薩克共和國和吉爾吉斯共和國區隔開來，而天山同時也將新疆水平分割為南疆與北疆。

無論是歷史上或在近代，這個天然分界線使得新疆至少被視為兩個不同的區域，位於北部的準噶爾盆地是乾草原及半沙漠地區，在過去主要被用於放牧或種植穀物；而目前新疆大多數製造業及首府烏魯木齊則位於準噶爾盆地，北疆的居民以漢人佔多數，但這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漢族從中國本土大規模移居至新疆的結果。

在天山以南的區域，塔克拉瑪干沙漠佔據塔里木盆地的大部分面積，

喜馬拉雅山脈及帕米爾高原的圍繞使這塊遼闊的區域成為「雨影區」(rain shadow，指沉降幅度較小的區域，例如山脈背風坡的乾燥區域)，這些山脈構成南疆並且奪走來自印度洋熱帶氣流中的水氣。當地只有一系列零散分佈的綠洲，山頂積雪融化後提供了水源使人們在該地得以定居及進行農墾，而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維吾爾人生活在這個區域。

還有兩個在新疆其他地區被山脈所分割出來的小區域也很重要。在東方的吐魯番窪地是中國最炎熱乾旱的區域之一，當地的少數綠洲專門出產高品質、高甜度的水果，特別是甜瓜和葡萄；而在新疆最西邊，博羅科努山將伊犁河谷自準噶爾盆地分開來，該地區最大的城市是伊寧（維吾爾語中稱之為固勒扎）。

新疆的地理因此可以劃分為四個不同的區域，同時也成為新疆（或新疆各地區間）和西方其他突厥民族（Turkic peoples）之間的天然屏障，但這些

物理屏障並非不可逾越的，在過去千百年來，商品、思想和民族已經跨越了這些山脈，有時還以大規模遷移的形式出現：在一九二〇年代及一九三〇年代，許多人為了逃避蘇聯農業集體化政策（Soviet collectivisation）而遷入新疆；在一九六二年，六萬人因為饑荒而逃離伊犁地區，結果造成相當大一群維吾爾人散居於中亞各地，主要位於哈薩克共和國（二十二萬人）、烏茲別克共和國（五萬五千人）、和吉爾吉斯共和國（四萬九千人）。

「維吾爾族如何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這不僅僅是個學術問題而已，若要了解那些蒙面客為何在昆明殺了二十九人，或是二〇一三年時那三名維吾爾人為何要在天安門廣場引爆他們的車輛，這個問題將是理解其中原因的關鍵，說到底，這是個關於合法性（legitimacy，一種政治概念，通常指民眾認可一個政府的程度，又譯為正當性）的問題。本書將會繼續記述許多中國政府的政策轉變及這些變化給新疆人民帶來的影響，然而衝突的核心關鍵是：維吾爾人是否應是中國的一部分，而非擁有自己的國家（或者至少能在維族自己的事務中擁有更大的發言權）？現今有許多因素造成維吾爾族對中國政府的

不滿——文化及宗教上的壓迫、經濟上的歧視、強迫實施家庭計劃（family-planning）條例——但在這些原因背後是一個每個人都該拿來問問他們的政府的問題：政府有什麼權利主張有權代表他們？即使是像中國共產黨這樣的專制、非選舉產生的政權都需要證明自己擁有掌權的正當性。中國政府的整體戰略是訴諸民族主義意識及流傳數千年的共同「中國」文化和歷史，也就是所謂「中華民族」。也就是說，中國政府告訴它的人民的，是其他大多數國家所使用的的一套論述。

這套統一民族主義論述（unifying nationalism）對那些擁有高度民族多樣性的國家——例如美國，或是中國（除了漢族以外還有其他五十五個民族）——來說尤其重要，這樣的論述結合另一個承諾：「國家關心的是確保所有公民的共同福祉，無論其民族出身。」對於中國政府來說，他們用以主張新疆（及藉此延伸出去的，維吾爾族）是中國一部分的理由是「新疆」（維吾爾）一直是中國的一部分，而根據這個說法，中國共產黨是最新的中國政權，在其領土上行使其合法的權力，以達成改善新疆各族人民生活的目標。

但今日的維吾爾人對於身分認同和起源有著非常不同的看法，他們不覺得自己是「中國人」，也就是說，中國政府或代表所做的不受歡迎的決定都可能被維吾爾族視為外來者（佔領政權）的壓迫行為，若我們不去了解那些塑造出現新的新疆疆界及維吾爾人身分認同的歷史力量，那麼我們不可能理解現在的維吾爾人為何會有這樣的感受。這些講述新疆地區及維吾爾族歷史的另一面故事對於當前進行中的抗爭——新疆的地位，及維吾爾人的境況——都是至關重要的。

而該地區的邊界及該地區是單一實體（single entity）的概念，都是近代的事態發展，理解這一點也十分重要。新疆，在漢語中的意思是「新的疆土」，這個名字的歷史淵源只能追溯到一八八四年為止；直到十八世紀中葉、清朝統治時期才將這個區域納為一個行政區，在此之前，該地區的民族和權力分配受到由天山山脈所劃分的南北分界的重大影響，而且在這些區域裡面通常有多個不同的統治政權。

這些不同的王國和帝國各自有不同的稱呼，其中大部分稱呼反映了其政

治立場。在中國，這片土地被稱為西域，直到清朝重新命名後才稱為新疆，而對於生活在該區域的不同民族來說，並沒有一個對應詞彙可以稱呼這一整個區域——只有南北分界能作為區別，從十七世紀起，北部區域被稱為準噶爾（Zhungaria），這個稱呼出自於在那段期間控制該地區的準噶爾蒙古人；而南部通常被稱為阿勒提沙爾（Alrishahr），這個維吾爾詞彙的意思是「六城」，但可能並不代表其字面上的意義——關於六城是哪六個城市，迄今也並無共識，更大的可能性是：這個詞彙顯示了生活在塔里木盆地的許多民族間大致上的相似性，然而部分民族也用其他地名來稱呼阿勒提沙爾的某些區域，如西南部綠洲城鎮喀什噶爾周邊區域經常被稱為喀什噶里亞（Kashgaria），這個事實表明了當地民族間（不同城市的民族或是不同宗教的民族）的感知差異往往也有相同的重要性。

而對外國人來說，阿勒提沙爾被稱為東突厥斯坦（East Turkestan），十九世紀的突厥學者（Turkologists）為了主張塔里木盆地的民族與所謂「西突厥斯坦」（位於中亞地區，大致相當於後蘇聯時期的烏茲別克、哈薩克、

塔吉克、吉爾吉斯和土庫曼等國家）的民族有著更廣泛的相似性而創造這個詞彙，如今那些相信「新疆」（或者至少天山以南的區域）不應被視為中國一部分的人們普遍使用「東突厥斯坦」這個名稱。

現代「新疆」的誕生與現代維吾爾族身分認同的產生是無法分開看待的，所謂「維吾爾族」並不是一群我們可以透過時間來追蹤其命運及動向的人們：那樣想就是把種族（race，以生物學上的特徵作為區分）與族群（ethnicity，以歷史、語言、區域等文化上的差異作為區分）混為一談了，形塑維吾爾族（及其他族群）是一種基於宗教信仰、社會傳統、共同的語言和文化及某種程度生理上的相似性而形成的社群認同感，「維吾爾族」的歷史悠久，久到使一些維吾爾學者主張維吾爾族在這個地區生活的歷史已經超過一千年。然而維吾爾這個詞彙最初所指的族群與現代維吾爾族僅有很少的共通之處（甚至根本沒有共通之處），在過去數百年中根本沒有這樣的身分存在，當我們提到「維吾爾族」的歷史時，我們所講述的並非是一個民族的故事——而是在闡述構成現代維吾爾族特性的不同元素是怎樣匯集成現在這個形式，因此我們在談論的

也是一個更大範疇的故事：王國與帝國的興衰起落，及信仰的衝突。

如何「取得」西方

在二十世紀初之前，「維吾爾」（審訂注：即唐代回紇、宋代回鶻、與元代畏兀兒）通常被用於指稱在八世紀中葉到九世紀期間統治約略今日蒙古地區的突厥聯盟，該國的國教是摩尼教（Manichaeism），核心教義是兩個世界之間的衝突：良善光明的精神世界與邪惡黑暗的物質世界。在這個王國的極盛期，它的疆域往西延伸至裡海、東至太平洋，但這個王國在西元八四〇年時，因為饑荒及內戰後另一支部落聯盟的入侵而滅亡，這支部落聯盟是葉尼塞黠戛斯人（Yenisei Kyrgyz）。

那些逃到南方的人建立了兩個不同的王國，一個在今日中國的甘肅省（這個王國在被另一個王國兼併之前延續了三世紀之久），另一個則位於今日新

疆東部的吐魯番地區，當時吐魯番地區已經有印歐民族生活，他們的傳統影響了維吾爾人，隨著時間推移，許多維吾爾人改信佛教，他們放棄了原本的字母系統而改用粟特字母（Sogdian alphabet，當時粟特語是絲路的通用語言）。在十三世紀初，吐魯番的維吾爾人心甘情願地臣屬於成吉思汗蒙古帝國，但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汗的獨立軍隊攻陷這個王國並結束了該政權。十四世紀中葉，這些民族分裂成許多獨立的王國。

歷經這麼多語言、宗教及文化上的轉變，到了十五世紀初時維吾爾族身分認同本身是否已經存在仍是值得商榷的——沒有什麼跡象顯示這點，我們最多可以說，在吐魯番王國統治期間，部分在未來構成今日維吾爾族身分認同的元素（伊斯蘭教和突厥民族）已經存在於該地區；十世紀時，西南地區（約略今日的喀什噶爾一帶）被一支穆斯林突厥部落聯盟喀喇汗國（Karakhans）征服，他們的領土一直延伸到今日的阿富汗和吉爾吉斯西部；到十一世紀初時，伊斯蘭教已經向東傳播到和田（編註：舊稱和闐，一九五五年改稱「和田」）的佛教王國；十二世紀和十三世紀的數波蒙古侵略者終止了宗教的傳

播，但到了十四世紀中葉時，這些蒙古人中有許多人也轉信伊斯蘭教了。

蘇菲神秘主義者的傳教活動也鼓動了伊斯蘭教在塔里木盆地的傳播，他們透過治療宣傳或是證明自己不會被火燒傷來使人改信伊斯蘭教，這種說服轉信伊斯蘭教的方式之所以生效，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當地既存的薩滿教習俗。正如同歐洲的基督教，在早期的幾個世紀中教會往往仰賴與既存的異教信仰間的相似之處——新的信仰成為一層額外的教義，但往往不會取代舊有的習俗——於是伊斯蘭教建立在既有的信仰體系之上。

儘管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時塔里木盆地盛行伊斯蘭教，但該地區的下一個強權準噶爾蒙古人有著不同的宗教傳統，準噶爾蒙古人是來自蒙古西部的遊牧部落聯盟，他們信仰天神和其他薩滿精靈，然而他們之中也有藏傳佛教徒及景教基督徒。

準噶爾部開始將該區的不同部分整併為最後被稱為「新疆」的地區，在十七世紀初，他們的汗國控制了天山北部，但在這個世紀中，特別是在一六四〇年各部與喇嘛的一場會議之後，藏傳佛教被選定為蒙古人的宗教。宗教成為

結盟的因素，透過與西藏人的聯盟，準噶爾汗國增強實力及正當性，足以使它在一六七八年到一六八〇年奪取塔里木盆地及吐魯番地區，但這些準噶爾人並未像其繼任者清朝、國民政府部隊及之後的共產黨那樣試圖統治南部地區，他們滿足於接受不同形式的進貢——從現金、火藥、礦物（如喀什噶爾的白銀），還包括勞動力。

在他們徵取的勞力進貢之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他們將少數人從塔里木西部地區轉移到伊犁河谷以進行農業計畫，這些人後來被稱為塔蘭奇（Taranchi，在已經絕跡的察合台突厥文中意為「農耕者」），雖然說這些人就是維吾爾族是不合時宜的——當時不存在這樣的身分認同——但部分他們的後代在幾個世紀之後主張自己是維吾爾族。

準噶爾人試圖向東擴張的企圖，使他們和另一支蒙古部族喀爾喀（Khalkas）產生衝突，喀爾喀是清朝的親密盟友（奪取北京的部隊中就有一部分喀爾喀士兵），清朝和準噶爾斷斷續續地作戰，直到十八世紀中葉乾隆皇帝派出一支龐大的軍隊，不但是為了消滅準噶爾這個國家，同時也是為了滅絕大

部分人口。皇帝下定決心要防範未來任何來自準噶爾的威脅，他明確地告訴他的將軍要餓死平民百姓，根據估計大約有一百萬準噶爾人民因而死亡。

種族滅絕也為清朝提供了殖民移居並開墾農業，以解決人口過剩問題的機會，然而儘管清朝皇帝有這樣的計畫，但沒有證據表明清朝有意在未來進一步擴張進入天山以南地區：入侵準噶爾耗費的成本已經高到難以獲得支持，而且在此之後控制該地區的成本對每個政權來說仍然都很昂貴——即使是現在的中國政府也仍需要大規模補貼這個地區，儘管該地區已經有相對較高的國民生產總值。

背叛及隨之而來的復仇渴望推動清朝入侵塔里木盆地，當該地區的盟友屠殺伊寧駐軍並且逃往南方後，清軍追趕過去並且攻克了綠洲，乾隆皇帝儘管遭到反對，但仍主張這個決策會促進國家穩定，因為掌握整個區域也就意味著它可以作為防範未來入侵的緩衝地帶（今日人們依然經常引用這樣的論述）。

中國政府關於「新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官方修辭中仍存在這樣的「思想遺留」，喬治城大學歷史系教授米華健（James Millward）表示：「在

十九世紀之前沒有中國人會主張新疆是中國的一部分。」即使是在二十世紀初的國民政府時期，一些中國歷史學家也質疑中國這個國家可否主張非漢族朝代所征服的周邊地區是合法的疆域。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年後，一九五九年開始中國官方對新疆歷史的看法就定調於這樣的基礎（並且一再重申）：「新疆自古以來就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唯有透過非常選擇性的歷史觀點，才能讓現在的中國政府聲稱該地區一直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樣選擇性的歷史觀點粉飾了八個世紀來新疆不屬於那塊疆域上任何政權的一部分（無論是部分擁有或是完全擁有）。要主張新疆一直屬於中國，就需要將新疆的清代邊界回推到過去，最好讓這段歷史可以被理解為穩步邁向現況的必然情況；在這樣的詮釋下，統治中國的王朝若與該地區的國家有外交關係、貿易關係或軍事協議，這些外交關係都應該被視為這些國家曾經受到中國統治，因此新疆一直是中國的一部分。邏輯上並沒有「中國」政權吞併或征服它，中國政府認為這個逐漸兼併這塊疆域的過程應該被視為一種「大一統」（unification）的過程。

透過這個邏輯所產生的荒謬主張，就像中國信息部門（Ministry of Information）聲明所有在新疆生活過的人都是中國公民：「從古至今，有許多民族生活在新疆境內，每個在新疆勞動、存在及繁衍的民族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員。」這是不對的，首先，所謂中華民族是在現代創造出來的產物，其次是因為統治中國（和現在的定義一樣）的朝代中曾掌控新疆地區的朝代是那麼少；而說到有些中國學者試圖用西王母之類的神話人物加以穿鑿附會的這類企圖，他們可說是有點不顧一切了。

在這裡，我並不是要質疑中國對這塊土地的主權，只是要強調該地區的歷史經常因為政治目的而如何遭到扭曲，而這樣的扭曲所帶來的不幸後果是使得許多維吾爾歷史學者及激進主義份子提倡類似的主張，他們經常宣揚某種版本的歷史以強調維吾爾人在該地區的連續性，例如說在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網站上，「東突厥斯坦」的簡史聲稱「東突厥斯坦維吾爾人的歷史可追溯到四千年以上。維吾爾人的祖先和其他的當地人民曾經建立過許多屬於他們自己的獨立國家，在這塊土地上繁榮昌盛。」

這段簡史循著類似的脈絡詮釋對抗清朝的一連串動蕩事件，並以此號召凝聚力，主張該地區的人民「為了重新獲得獨立地位而起義四十二次以反抗滿洲統治」，這段簡史以一段戲劇性的宣告作結，將這個連續性延續至今：

即使自己的身份和生存權利受到中國慘無人道與毀滅性的威脅下，維吾爾人和其他的原住民共同拒絕屈服於中國的統治，高舉著他們的祖先傳遞給他們的抵抗的火炬，與中國入侵者進行著不屈不撓的反侵略鬥爭。

這種說法是過去幾十年中，中國和維吾爾代表大會之類的組織所進行修辭軍備競賽下的產物，在這場競賽中，一方關於領土主權的主張會和另一方的主張互相對抗，兩方在意識形態的層次上都試圖做同樣的事：建立起民族（nation）的概念。我們可以理解像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這樣的激進組織需要簡單而容易傳達的訊息，並且強調維吾爾人民身為原住民應有權得到更大的自主權，然而結果是他們也在延續和他們所反抗的政府同樣程度的失真描述。

帝國的擴張

清朝原本不打算佔領整個新疆地區，但很快就改變主意。在清朝統治該地區的早期階段，它推動的改革改變了該地區的人口組成和經濟（後來中國共產黨仿效了其中一部分的方式），清朝就像準噶爾一樣主要統治北疆，將軍政機構集中在於西北部伊犁河谷建立的新城鎮，惠遠。清朝也延續了準噶爾的農業改革，讓更多南方的農民加入伊犁河谷附近的塔蘭奇行列，並建立起被稱為屯田制的國營農場網絡，讓士兵在戍守的區域附近進行墾耕。考量到該地區和皇城中心的距離，屯田制是供養軍隊的必要措施，到了一八〇〇年時，伊犁地區約有三萬四千名塔蘭奇，如此一來除了增加棉花和糧食的生產量以外，也鼓勵了南方與北方的突厥語民族間的文化交流。

罪犯與流放的異議者為灌溉及採礦計畫提供了勞動力，最嚴重的罪犯會被送到新疆——殺人犯一般會到位於遙遠西北方的伊寧。直到一九八〇年代為止，新疆基本上被視為罪犯的流放地，小說家馬建將西方這塊土地描述為「住

著政治犯、突厥移民後裔，及湮滅城市亡魂的流放之地。」

然而清朝並不單靠強迫的方式來遷移人口，來自中國本土的商人和其他平民接受稅收優惠而到該地區定居，在某些情況下他們還被補助遷移費用，主要的貿易中心設立在準噶爾盆地的東北邊；乾隆皇帝為這個新城鎮命名為「迪化」，意為「啟迪教化」。到了一七六二年，迪化已經開設了五百多家商鋪，其人口混雜了中國漢族、滿族、回族（漢語穆斯林，最初來自波斯和中亞，現在仍是中國最大的穆斯林族群），及極少量的來自塔里木盆地的民族。在二十世紀，這個新拓居地將成為該地區的首府，並且更名為烏魯木齊（蒙古語中的「優美的牧場」）。

在清朝殖民的初始階段，在某些方面它無疑是雄心勃勃的，但在其他方面則十分謹慎。它把握住原本的目標，將大多數改革計畫維持在北新疆。在一八三〇年之前，只有非常少量的平民從中國本土遷移至塔里木盆地定居，這很可能是因為清朝害怕挑起當地的民怨；在行政層面上，清朝也非常有遠見地招募地方精英階層進入統治體系，以此避免激起當地人破壞清朝的統治，但統

治階層中有許多人不得民心，可能是基於雙方的合作基礎，也可能是因為他們腐敗的統治方式。其中有些人被稱為狗官。

清朝統治的第一個世紀給當地帶來非常必要的穩定，農業計畫提升收成的成效好到當地糧食有時候比中國本土還要便宜，雖然北京仍然需要大力補貼佔領當地所費的成本。農業的進步也帶動手工業的增加，特別是皮革製品、編織地毯及玉石雕刻（這些都是當地的主要產業，只要你在新疆任何紀念品商店待個五分鐘就能搞清楚這件事）。

一八三〇年後，清朝改變了對該地區的方針。鄰近浩罕汗國（Khopand，其中心在今日烏茲別克的費爾干納谷地）的軍隊入侵南疆，情勢的變化使清朝重新評估管理該地區的方式，結果他們允許漢人平民移民到塔里木盆地，基於農業目的及軍事目的在那兒建立起殖民地。

一八六〇年，來自內部及外部的理由致使該地區開始反抗清朝的統治。在東方，清朝由於對抗外國勢力的鴉片戰爭而削弱了經濟和軍事實力，因而使挹注新疆管理機構的資金短缺，而新疆當局的因應方式是提高稅金及拍賣官職，

因此衍生的管理不當及經濟困難引起當地對清朝的不滿。「阿勒提沙爾」一詞似乎從這時候開始為人使用，這個事實顯示了一個共同的敵人可以使這些原住民族團結在一起，促使他們意識到他們的共通點（例如同為突厥民族，或是同為穆斯林）。

但如果沒有某些既存的地域性特徵，這樣的結合是不可能發生的。賴恩·薩姆（Rian Thum）在他最近出版的書籍《維吾爾歷史的聖路》（*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中提出，促成這個結合的原因之一是南疆聖陵之間的朝聖路線網絡，每個聖陵都有一個被埋葬在那裡的聖人的故事，大部分的故事被記錄在由讀者和聽眾形成的社群所共有及修訂的原稿之中（尤其是聽眾，因為伊斯蘭教有著口耳相傳的優良傳統）。這些在綠洲之間傳播的宗教歷史激起對過往的共同認知，而這樣的意識根植於對特定地點的連結，雖然「維吾爾」這個稱號直到二十世紀才重新引入，但若沒有南疆人民之間這種深刻的文化及語言親和力，「維吾爾」是不會這麼富有意義的。

加入叛亂

一些維吾爾民族主義者將一八六四年的起義描述為爭取獨立的奮戰，但幾乎沒有證據可以證實他們的目標是尋求獨立，至少最初的目標不是為了尋求獨立。當時謠傳新疆巡撫為了避免回族叛亂，計畫殺害所有新疆的回族；鑒於清朝對準噶爾的種族滅絕行動，這並非不可能發生，於是他們開始叛亂。起義自庫車開始，然後擴散到北疆和南疆的其他城市，雖然大多數地方的動亂始於回族，但其他突厥民族通常會與他們聯手叛亂。

要解釋突厥民族加入回族叛亂的方式之一是：突厥人支持他們的穆斯林同胞，而就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很可能是真的。但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也有其他穆斯林勢力反抗清朝，然而他們之中沒一個得到突厥民族的支持。他們支持回族的原因並非因為有共同的信仰，而是他們擁有共同的不滿。

叛亂消除了清朝在這裡建立起的行政統一（administrative unity）；這個地區又一次出現一系列由當地突厥菁英統治、互不相關的城市。一八六五年，

吉爾吉斯族軍隊趁著這個相對權力真空的時機從西方入侵，並且迅速佔領喀什噶爾，他們的勝利十分短暫，阿古柏（Ya'qub Beg）——當時的指揮官之一，率領安集延（位於今日烏茲別克地區）部隊——佔領了喀什噶爾，在此之後他征服了該地除了伊犁河谷（當時由俄羅斯控制）以外的其餘地區。由於阿古柏課重稅，並且採行比當時普遍存在塔里木盆地的伊斯蘭教更為嚴格的伊斯蘭教形式，因此他的統治是不得民心的。

鑒於清朝在該地區已經投入的重大投資，人們可能會認為清朝將毫無疑義的決心重新攻克新疆，但事實上有些人認為當地不值得再花費軍餉。清廷的資深政治家李鴻章認為新疆的資源少到可說根本是一無是處，清帝國有限的財力最好花費在海防之上；然而左宗棠反對他的見解，他主張不能讓俄羅斯控制新疆，因為新疆有作為緩衝區的價值。

即使李鴻章的論點佔上風，鞏固海防也無法拯救當時已經過於衰弱的清朝。但如果新疆繼續留在阿古柏和其繼任者手中，至少它今日可能不會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另一個可能的未來是——它可能先變成一個蘇維埃共

和國，然後再變成一個突厥國家。

左宗棠的計畫獲得批准，儘管那要付出非常大的代價——清朝年度預算的六分之一。規劃遠征所耗費的時間比實際的戰鬥更久，左宗棠花了三年來籌備這場戰役，但只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就在一八七八年奪回北疆；儘管在當地不同的民族中，清朝並不總是受到歡迎，但比起阿古柏的政權，還是有些人肯定更偏好清朝的統治。我們可以從這首流行歌看出這點：

北京的中國人來啦，像是天上的繁星；

安集延人起身跑啦，像是森林裡的豬隻，

他們的來去是一場空啊，那些安集延人！

他們嚇到無精打采的逃啦，那些安集延人！

他們每天都要一個處女，

他們到處蒐羅美女，他們玩弄那些跳舞的男孩。

儘管清朝在當地面臨的反對並不大，但要重建先前的制度是不可能的。

「在那場動亂之後，舊制度已經被一掃而空。」一位將領這麼評論。伊犁地區的前首府惠遠已經遭到阿古柏部隊的嚴重破壞，他們只得以烏魯木齊作為新的首府；另一個變化是新政府以漢族成員為主（百分之五十五的成員來自左宗棠的家鄉湖南省），而非滿洲人或當地的突厥菁英。

還有一個超越純粹軍事力量控制的新企圖，這個新企圖主要透過改變教育體系來達成。左宗棠主張，「將欲化彼殊俗同我華風，非分建義塾，令回童讀書識字、通曉語言不可。」（「若想改變穆斯林的特殊習俗並且將他們與華人同化，非得創辦免費學校，讓穆斯林孩子讀書識字、通曉漢語不可。」）學生們還取了漢名，在一九〇八年時，漢語成為主要的教學語言。

增強漢族影響力及新的文化政策，兩者的整體目標都是促進新疆融入中國本土。雖然清帝國沒能延續太久——它在一九一一年被推翻，而後中華民國建國——但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共將會繼續延續這些基本目標及方法。

「獨立」的思考

對該地區的人們來說，清朝的覆亡並未帶來什麼直接的影響。雖然清政權和新政權之間仍有政治暗殺和小規模衝突，但新疆就如同西藏和蒙古一樣，並未起義或要求建立新國家。有個解釋是：當時新疆的突厥民族間還沒有足夠的相似性，再加上清朝和其接替者並未累積足夠的民怨。南疆的居民在描述自己屬於什麼民族時，他們大多數會回答木速蠻（Musliman，阿拉伯語，即 Muslim 穆斯林）、突厥（Turki），或者說他們居住的地名。雖然穆斯林算是一個更大的區域性特徵，但它跟一個民族認同或者說一個民族主義者會連結的地方還是不一樣，但正如賴恩·薩姆所說的那樣，只有從當代的角度來看才會認為沒有一個一致的名稱來稱呼阿勒提沙爾人是個問題：

現代對於穩固的族稱（ethnonyms）的過度迷戀本身就是民族主義思想的產物，當一個非現代、非民族主義的身份認同體系使用較不刻板的詞

彙時，我們不應對此感到驚訝。

也許清朝滅亡的最大影響是損失了來自中央政府的補貼，這意味著新疆必須在財政上自給自足。為了達成目的，新的中華民國省長楊增新（一八六四年——一九二八年，清末即入仕，曾任甘肅中衛知縣，民國後被留任）發展該地區的農業與交通，但更重要的是鼓勵與俄羅斯的貿易。到了一九二〇年代末期，新疆與蘇聯的貿易額是與中國其餘地區的十倍。

雖然說此時的新疆已經是個實質獨立國家是有點太過誇張，但我們可以說，自從其疆界在清朝時期界定以來，這是這個地區最獨立自主的時期。（而且比共產黨接管以後還要來得更加自治，儘管他們在一九五五年後稱這個地方為「自治區」）為了避免讓這聽起來像是某種依據自決原則行使的自決權，我在此必須強調：楊增新與其說是省長，不如說是軍閥——他常常殺害他的政治對手，有時甚至在宴請對方的宴會上殺死對方。他肯定不會想要鼓勵任何可能挑戰其權威的族群民族情感（*ethno-nationalist sentiment*）增長。

跨越新疆和俄羅斯土地前往西方的不只是貨物而已，雪梨大學的布戴維（David Brophy）教授認為，住在阿勒提沙爾地區的塔什干（現今烏茲別克共和國首都）移居族群進行的知識辯論，也在促進現代維吾爾族群身分認同上發揮了重大作用，一些塔蘭奇和喀什噶里知識份子，閱讀歐洲歷史學家關於源自蒙古、定居在土魯番的古代維吾爾人的著作後採用了「維吾爾」之名來描述自己。早在一九一〇年，一位詩人就已經使用「維吾爾之子」作為筆名，雖然這些知識份子可能只是一小撮菁英集團，但到了一九一三年，每年都有超過五萬名季節性遷移的勞動者自南疆前往該區，這個事實顯示了這些想法顯然可能因此而傳播開來。

但是到了一九二〇年代初期，何謂「維吾爾」仍然沒有一個共識（更別說為人接受了），雖然一些歷史學家主張「維吾爾」一詞首先在一九二一年於塔什干一場工人會議中開始重新流行，布戴維認為維吾爾一詞被用來指稱來自新疆的每個人，包括新疆的漢人，而不只是指稱新疆的突厥民族或穆斯林。但這個名稱的適用性在這十年中仍是備受爭議的，有些人完全反對這個看法，

並據理力爭「塔蘭奇」和「喀什噶里」在語言學上是分隔的，因此兩者應當是完全不同的民族。

一個共同身分認同的發展會受到很多因子的影響，然而在這些因子之中，敵對意識——在對抗「他群」時，「我群」就可能隨之形成——往往有著最強的影響力（正如同中國政府在新疆及西藏付出代價後所察覺的那樣）。一九二八年，在楊增新遭到刺殺後，他的接班人金樹仁推出一系列苛刻的稅收制度，因而引起廣大民怨，最終導致一九三一年在哈密的一場叛亂；此外還有一些地方性的緣由：農民被沒收土地，而這些土地給了來自中國其他地區的漢族移民（而在中國共產黨執政時期，這樣的事情將再度上演）。在接下來的兩年，新疆處於混亂狀態，所有勢力——國民政府部隊、地方部隊、甘肅回族軍閥馬仲英（約一九一二年——一九三七年，傳前往蘇聯後下落不明）的部隊——都在爭奪對該地區的控制權，雖然回族和維吾爾族軍隊經常並肩作戰，但他們並非總是同一陣線，這提醒我們不要落入這個迷思——認為是推動衝突的主要力量是宗教差異（而非共有的不公平感）。

金樹仁（一八七九年——一九四一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時期新疆省政治、軍事領導人，後因盛世才叛變而敗走）的統治並不長久，一九三三年四月，他在一場政變中被推翻，取代他的是盛世才（一八九七年——一九七〇年，中華民國陸軍將領，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四年間統領新疆政治、軍事，有「新疆王」之稱），他以礦物和石油資源為代價得到了蘇聯的強力支持，一九三四年一月時盛世才被馬仲英圍困在烏魯木齊，蘇聯派出軍隊和飛機前往該地，蘇聯的飛機對馬仲英的軍隊投下化學武器，使馬仲英的軍隊撤退到新疆西南部並控制喀什噶爾。在某些方面來說，這只是一個在幾個世紀前多次征服然後又丟失的城市再次遭到佔領，但在今日許多維吾爾民族主義者的觀點中，馬仲英佔領喀什噶爾意外打斷了現代維吾爾身分認同第一次真正表現出來的時刻。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Turkic Islamic Republic of East Turkestan，ETR）剛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於喀什噶爾及和田地區建立，超過兩萬人參加了建國慶典，學生在典禮上高歌：「我們的旗幟是藍色的旗幟，我們的部族是金色的部族，突厥斯坦（Turkestan，意為突厥人之地）是我們突厥民族的家

園，現在突厥斯坦已屬於我們。」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鑄造的第一枚錢幣上銘刻著「維吾爾族共和國」，這個事實顯示出「維吾爾」這個民族名稱日益流通的趨勢，然而另一個事實是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領導人是柯爾克孜族，出身自其他突厥民族，這也顯示了「維吾爾」這個詞彙尚未被用於今日所指稱的狹隘意義上。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建立無疑促成了維吾爾身分認同並創造出一個圖像——有著白色新月及星星的藍綠色旗幟——至今仍有許多維吾爾民族主義者仍使用這面旗幟。

雖然現在看起來會覺得短命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運氣真是糟透了——因為一支被迫撤退到喀什噶爾的軍隊而煙消雲散——但事實上這個國家本來就不太可能延續國祚太久，因為它資源短缺，而且沒有外國支持者，如果馬仲英的軍隊沒有終結它，盛世才也肯定不會放過它的。

盛世才不只仰賴蘇聯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在一九三〇年代中期，他還引入蘇聯人分類民族的方式：「維吾爾族」就這樣成為南疆穆斯林突厥民族的正式官方名稱（雖然塔蘭奇這個名稱也保留下來了）。

蘇聯就像之前（及之後）的許多列強那樣，想要用一個簡單的方法來了解他們新領土內的民族，雖然這有時會使他們試著研究這些民族的文化 and 語言，但卻往往衍生出無法反映該民族真實面貌的民族稱號。蘇聯人這麼做的目的之一是為了讓這些人口互相對立，以防止他們團結起來對抗共同的敵人。短期內，他們能達成這個目的，但最終這些民族稱號往往會消逝，然後一個新的共同身份出現在這些意外擁有共同的歷史和文化的民族之間，並取代舊的身分認同，導致他們開始渴望擁有自治權——這可能是導致蘇聯最後解體的原因之一。

雖然我們不能將「維吾爾」族名的官方認可歸功於蘇聯採用這個詞彙，但這件事確實促使這個詞彙為人接受，而遍佈新疆的文化促進協會在傳播維吾爾之名上的影響力也同等重要。蘇聯鼓勵新疆每個被正式承認的民族創立這樣的協會，而這些協會的主要任務是在社群間組織教育。第一個文化促進協會在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建國期間創立，而這個協會和後來由蘇聯支持所創辦的文化促進協會，透過強調這些民族間的語言相似度來培養民族認同感。在進入一九四〇年代初期時，整個地區都已經在使用「維吾爾」這個詞彙，儘管人們

可能還要花上幾十年的時間才能完全接受。

雖然這個詞彙在技術上並不包括伊犁地區的塔蘭奇，但跟一九二〇年代的情況相比，南疆民族和北疆民族之間的連結比當時更加強大，我們可以在一九四四年由伊犁地區開始的起義看出端倪。盛世才在一九三七年開始進行一系列大清洗，將數千人逮捕下獄，尤其知識份子和民族主義者更是遭到清洗的重點對象，這使得盛世才的聲望一落千丈。伊犁起義的原因是由於盛世才試圖徵收一萬匹馬供軍隊使用，那些交不出馬的人會被處以罰款。該地區的遊牧民族受到最嚴重的打擊，於是他們開始發動游擊叛亂，他們成功征服了西北的部分地區（雖然不包括烏魯木齊），並宣布建立東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國（*second East Turkestan Republic*）。東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國採用了和先前的共和國相同的旗幟，旗幟顯示了兩者間的密切關係。現在的維吾爾運動者仍然在示威活動及網站上使用相同的旗幟，並主張這兩個共和國都是維吾爾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實行自治的證據。這個說法雖然包含了部分的事實，但東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國就如同第一個共和國那樣，並不完全符合這些維吾爾運動者的敘

事。雖然維吾爾人在東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國的領導階層中佔據重要地位，但這個共和國是為了代表更廣大的利益而存在，而不僅只是為了維吾爾民族主義而建立。東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國是世俗化與伊斯蘭化的，意欲代表該地區所有的非漢族人民。

另一個使人難以將東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國視為一個完全成熟獨立運動的原因是：它欠了蘇聯人大大的恩情——大部分的軍隊和裝備都來自蘇聯。一九四二年時，盛世文已經撤下蘇聯轉而效忠國民黨（一九二八年後中華民國的執政黨）勢力，並且將蘇聯的軍隊和顧問驅除出該地區。蘇聯透過支持伊犁叛亂，在新疆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勢力。

東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國比前一個共和國幸運的地方是：它不但擁有強大的支持者，國民黨當時正忙著和日本人打仗（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時在跟共產黨人爭鬥），因此東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國得以發展，蘇聯在當地的影響力也得以成長到在伊寧設立了領事館。那棟建築物在今日依然矗立（雖然現在已經變成一家餐廳），那個時代的幾棟建築物也被保留下來，例如一處擁有木地板

的長形兩層樓建築，現在是一所師範大學（我在二〇〇一年時曾在那兒任教）的行政辦公室。

不出人意料的是，國民黨並不信任盛世才（尤其是他試圖再次投向蘇聯陣營之後），國民黨派遣自己的部隊去顛覆盛世才。一九四四年八月，他同意調職，接替盛世才職位的是張治中（一八〇年—一九六九年。國民革命軍二級上將，曾任湖南與新疆省政府主席），他可能是該地區曾有過的中國官員之中最親善的一個。在他的領導下，國民黨於一九四六年與東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國結成聯盟，他諮詢了幾位贊成在中國境內享有自治權的維吾爾知識份子，並將維吾爾語及哈薩克語定為新疆的官方語言（包括教育體制在內），他也想讓百分之七十的官員職位由非漢族的中國人民就職，並以選舉方式選出參議會，張治中甚至提出要讓該地區完全自治。他主張：「我們漢人只佔新疆人口的百分之五，為什麼我們不把政治權力交給維吾爾人和其他民族？」

這個聯盟在媒體上得到廣泛的讚揚，有一家報紙居然還說這表示新疆「比中國本土更加先進」且是「其他省份的典範」。這是從那之後就沒被再次提起

的主張，或者說，一個不太可能的主張。雖然國民黨中有許多人不太熱衷於張治中的進步見解，但這個措施還是實施了，在多數情況下，這些結果並不激勵人心，尤其是選舉的部分。在南疆由國民黨管理的地區有許多的恐嚇事件和選舉上的違規行為，因此沒半個突厥候選人當選。

至於官僚體系的變化，儘管一些漢人官員被替換下來，但替換率並未達到承諾中的百分比，這樣的更替引起漢人官員和許多非漢民族不滿：官員因為遭到撤換而積怨，而非漢族的民族也因為當初的保證沒有完全履行而不悅。儘管是出自善意，但為了取悅每個人而進行的正向差別待遇的企圖並未達成目的，而日後在共產黨時代將會重蹈覆轍——生育計畫方面（及，較小程度上的，教育方面）的優惠政策同樣也不得人心。

張治中推行的其他善意措施——同樣沒什麼好結果——是從新疆派遣非漢族的歌舞表演者到中國本土，以讓更多人欣賞該地區的音樂文化。雖然這個舉動本身應該受到讚揚，但事後看來，中國主流文化中認為這些少數族裔都是色彩繽紛表演者的刻板印象或許就是根源於此。

東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國和國民黨的結盟從不可能持續——他們實在沒什麼共同利益。條約土崩瓦解，張治中遭到撤換，一九四九年夏天時人民解放軍到了鄰近的甘肅省和青海省，根據一個未經證實的說法，史達林告訴烏魯木齊的國民黨指揮官，如果他宣布該地區獨立，那麼他會提供軍事援助。無論真相為何，這個國民黨指揮官選擇讓他的八萬軍隊投降，因此，一九四九年十月，共產黨控制了新疆。

第二章

「解放」： 共產主義時代來臨

赤紅時代是我的驕傲，我的榮耀，
我為歌誦及建設這個年代而感到自豪！

——《頌祖國》

中國政府經常把新疆說成一個需要（社會主義式的）現代化的「落後」地區，這樣的說法隱喻著該地區民族的文化也是同樣落後（尤其是和漢族的文化相比）。就在最近，二〇〇九年時，中共信息部寫道：「漢族在經濟文化水平、科學技術水平和勞力資源方面都較為優秀。」但一九四九年時，該地區顯然是新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最貧窮的地方之一，大片農田閒置、牲畜大量死亡，而先前統治者所建立的灌溉系統荒廢失修，醫院的數量很少（特別在偏遠地區），沒有鐵路，也幾乎沒有重要的工業。適合耕作的土地稀少加上高死亡率所帶來的結果是——儘管新疆的面積佔了中國疆域的六分之一，但它是中國人口密度最低的區域之一。新疆人口數約有四百三十萬人，其中百分之七十住在南疆，該區域是新疆的經濟中心。

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新疆納入版圖的官方說法是：該地區各族人民都喜迎新這個「和平解放」的過程，而這些民族終於成為「國家的主人」。然而新政府的表現顯示了新疆的實際局勢應該是比官方說法更為動盪不安，畢竟這個區域在過去長久以來一直存在著對抗漢族當權者的起義行動與暴力行為。雖然政權

更迭時並未爆發大規模的反抗行動，但中共的「解放」並非全然未遭反對，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先前的國民黨軍隊與盜匪間發生衝突，一九五四年時在和田發生一場短暫的起義運動。

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是組織性抵抗力的主要潛在來源，如今已經遭到瓦解。

在「解放」後，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大部分領導人搭乘飛機前往北京與毛澤東進行談判，但飛機在途中墜毀。飛機事故的成因成謎，但有人猜測毛澤東（或史達林）是否是殺死這些領導人的幕後黑手。倖存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領導人如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和艾沙·玉素甫·阿甫泰肯於一九五〇年初期時逃往土耳其共和國。一九五二年三月，土耳其為流亡至印度及巴基斯坦的兩千名維吾爾人提供政治庇護，在隔年又收容了九百人，阿甫泰肯和布格拉以土耳其為穩固的基地，於當地進行低層級的政治活動，如出版期刊報紙、參加會議。

共產黨與維吾爾民族主義者，以非常不一樣的角度來看待東突厥斯坦共和國遺留給後人的遺產。維吾爾民族主義者認為：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是個主權

獨立的維吾爾國家雛形，而雖然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二年間曾經有幾波對與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相關的突厥領袖的清洗，但在有了幾十年的安全距離後，如今共產黨表揚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在與國民黨的鬥爭中所付出的貢獻（註：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建立加速瓦解國民黨在中國本土的統治基礎，中共稱這段歷史為三區革命運動，而國民政府通常稱之為伊寧事變）。在伊寧，有一條以東突厥斯坦共和國領導人阿合買提江·哈斯木為名的道路，他是當年於空難中逝世的領導人之一；附近的公園裡矗立著一個用來紀念他與其他領導人的紀念碑，石碑上引用了毛澤東的一段話：「願他們的精神長存！」

儘管共產黨在新疆初期並未遭到大力反抗，但仍十分小心謹慎。他們在前十年的主要目標是發展經濟，在這方面（及其他許多方面）他們可說是仿效了清朝時期的戰略。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之間，他們開始建立起國營的農場、工廠及礦山網絡，這個網絡的重點是發展農業與工業，尤其是集中在土地開墾與礦業。這些計畫的人力來自退伍的十萬名解放軍部隊（後來罪犯也加入這個行列）、退伍的國民黨軍及來自中國本土（特別是上海）的十萬名開

拓者，這些開拓者受到「放下戰鬥的武器，拿起生產建設的工具！」的口號所說動而前往新疆。還有一項非常可疑的方案是將四萬名女性「志願者」（主要来自湖南省和山東省）送往新疆，以彌補該地區漢族男性比例高出甚多的問題，其中許多婦女實際上是被迫與這些戰士農民結婚，這些女性並未被賦予軍事地位，而是被貶為「家庭主婦」，她們得不到男性移居者可以獲得的工資與養老金。共產黨同時也封鎖她們能返回家鄉的手段，這個政策使她們的情況危殆到婚姻成為保障安全的唯一選擇。

對她們，以及對其他許多人來說，新疆的實際情況和他們被許諾的內容有著很大的差距——除了工廠的工作及燠熱的天候以外還有其他的艱困條件。「我們住在地窩子（沙漠化地區在地下挖坑形成的簡單住所）裡面，而我們不分日夜從事辛苦勞動。」漢祖學在二〇〇九年時這麼回憶，他離開遙遠的湖南省家鄉時只是一個十幾歲的青少年而已。「一開始我們天天都哭，但隨著時間過去，我們淡忘了自己的悲傷。」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XPCC)

監督這個龐大勞動力的遷移與移居，兵團是一個有著雙重角色的組織，表面上其主要功能是協調農業發展，但它同時也負責維護地方秩序。這個兵團的口號是：「一手拿鋤頭，一手拿槍桿。」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讓移民和退伍軍人一起開墾土地、修建水壩及開鑿溝渠，在十幾年內將新疆的耕種面積增加為三倍，並開始將該省份的經濟中心轉往北疆城市，如烏魯木齊、克拉瑪依、奎屯和石河子，這些城市成為商業、工業及運輸業的中心。

大力發展新疆是中國進行重建整體戰略的一部分；在經過幾十年戰爭後，這是該地區第一次實施與新疆特殊的社會及經濟條件無關的政策。舉例來說，新疆政府於一九五四年時決定對新疆人民的人口遷移採行和中國其他地區相同的管制。一九五〇年時，中國政府已經開始透過法律避免人民遷往城市，以確保有足夠人力耕田。人們不得留在戶口所在地，對很多維吾爾人來說這代表他們必須留在農村。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隨著中國政府日益鼓勵來自中國其他地方的漢族遷往新疆，該地區人口急劇成長，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六年之間大約有四十萬人加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大躍進饑

荒期間還有兩百萬難民前往新疆，雖然並不是所有人都留在新疆，但這些人可以定居在城鎮之中（可能因為他們本來就有城市戶口，也可能他們被授予城市戶口）。

在某些情況下，原本維吾爾人佔多數的城鎮被改造成維吾爾人佔少數的城市，位於塔里木盆地北緣的庫爾勒市原本是個人口不到三萬人的鄉村小鎮，一九四九年時鎮裡的漢族人口不到人口數的百分之二，這個城鎮的人口於一九五五年時增加為三倍，到了一九六五年，漢族人口比例已經超過半數。而在其他地方，非漢族人口仍佔多數，這些移徙者努力學習當地語言並成為社群的一份子。

這個人口遷移的結果是，到了一九八〇年時，城鄉的劃分同時也呈現了民族的分佈，而就如我們將在第三章中談到的，這將帶給維吾爾人嚴重的經濟弱勢。這並非政策預期帶來的結果，而是如中國其他地方施行相同政策所帶來的不幸副產品。這個整體的觀點顯示了，我們不該毫不猶豫地假設新疆非漢族人民承受的不平等境遇乃肇因於民族歧視。

集體化（Collectivisation）是另一個深刻改變新疆社會的國家政策，共產黨將私人土地所有權視為一種封建時代的不公正制度：國家必須沒收這些土地並且將之返還給人民。雖然新疆政府徵收了許多土地——沒收土地的主要對象是宗教團體和富人——但徵收的進度緩慢多了，特別是在有許多遊牧民族的地區（例如伊犁地區），這顯示了很多新疆官員都有小心行事的充分理由，他們大多數人無法直接與擁有不同風俗的當地人溝通，而官員事先就已經得到警告：解放軍在該地區的領導人王震（一九〇八年—一九九三年，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開國上將）於一九五〇年時在《新疆人民日報》上發表一篇文章，出言反對「大漢族主義」（Great Hanism）——僵化地實行為中國其他地區發展出的政策，且推行時幾乎未曾考慮因地制宜或只與少數官員磋商。在共產黨統治初期，這些意見並不只是流於言辭而已。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最初只建立在主要是漢族的北新疆，而直到一九五〇年代中期才允許經堂學校（madrasas）進行伊斯蘭教育。

招募非漢族成員加入新政府的政策也獲得採行並且取得一定成效，維吾

爾族、哈薩克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在下級政府單位都有著很好的代表性，雖然他們在高階職位上通常只是象徵性地聊備一格，真正掌權的通常是漢族代表（直到今日仍是這樣的安排）。該地區的第一任主席賽福鼎·艾則孜是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少數倖存的領導人之一（他當時搭乘火車前往北京），然而艾則孜並沒有什麼實質影響力，新疆直到一九六七年為止的實質管理者是王恩茂及其支持者。王恩茂（一九一三年—二〇〇一年，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六年，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五年間，擔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是該地區的第一任省長，儘管他只有三十六歲，而且沒有任何管理經驗及受過教育，但他擁有卓越的革命資歷：他是「長征」（Long March，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從中央蘇區和南方蘇區開始的長期戰略轉移與逃亡，最終抵達、匯聚於陝甘蘇區）的老將，同時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的政治委員，他從軍隊裡面大量選拔他的幕僚成員——在他的省長任期中，大約百分之四十的高級官員具有軍方背景。

共產黨人除了開墾土地以外，也變更了新疆的行政區域界線。儘管原本的

提案是宣告該地區是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如蘇聯人處理中亞領土的方式），但該區域後來被指定為「自治區」；也就是說，該區域對政策的影響力高於省級單位，但仍然受中央政府統治（中國在西藏、廣西、寧夏和內蒙古也設立了自治區）。雖然賽福鼎在往後漫長的政治生涯中都遵循黨的路線——他一直都是大力反對分離主義和蘇聯勢力的人士——但他的重要貢獻之一是極力要求自治區的名稱要反映出這個區域的民族組成。在一九四〇年代早期，新疆人口不到四百萬人，其中大約百分之七十五是維吾爾族人，那時候漢族甚至不是新疆第二大的族群：三十二萬六千名哈薩克人、十八萬七千名漢人、九萬兩千名回族和六萬五千名柯爾克孜人。賽福鼎告訴毛澤東：「自治不是給山川、河流的，而是給某個民族的。」

於是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於一九五五年成立。採用這個名稱可能進一步促使部分維吾爾人開始主張新疆（而不只是維吾爾人集中的南疆）的主權，而關於少數民族的修辭諸如「各族人民當家作主」也激起許多維吾爾人的期待，他們希望自己可能參與那些會影響他們權益的決定。然而共產黨創造的自治區

和他們效仿的蘇維埃共和國有個決定性差異：蘇維埃共和國有脫離的權利，而「脫離」是新的中國憲法所明令禁止的行為。

「承認民族地位」的邏輯也同樣適用於內部的管理，特定民族高度集中的區域會被稱為「自治州」（autonomous prefectures）——在中國，「州」是「省」之後第二大的行政層級——中國各地都設立了自治州，而新疆有五個：昌吉回族自治州、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及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這些敘述的含義是讓他們「當家作主」來確保這些民族的權利，但政策上的幾個特徵卻使人質疑起他們是否真能「當家作主」，其中一個疑點是這些區域名稱上的民族往往不是該地區最大的族裔，另一個是每個少數族群獲得的土地面積往往超過其人口比例。比方說，新疆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佔新疆面積的三分之一，而蒙古人只佔新疆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研究教授鮑文德（Gardner Bovington）認為，共產黨可能希望促進非漢族民族間的領土爭端以防止他們團結合一，同時也試圖破壞維吾爾族的人口優勢。

王恩茂對新疆的治理受到國家政治氛圍的改變所阻撓，一九五六年，毛澤東發起「百花齊放」運動以鼓勵人們批評黨的領導（或者正如他所說的，用這個運動來「引蛇出洞」），而新疆所散發出的不滿遠遠超過黨所要求的「和風細雨」程度。非漢民族抱怨儘管新疆有所謂的「自治」地位，但實際上他們對政策毫無影響力，並譴責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漢族殖民者」；他們還抨擊地方官員只使用漢語，並抱怨每當他們提出對黨的批評就會被打成「分離主義者」（直到今日我們依然能聽到這樣的控訴）。共產黨用先前指責異議份子的那套手法來回應這些抨擊：一九五八年，超過一千五百人被指為「地方民族主義者」（local nationalists，地方民族主義又被稱非漢族優先主義，指在政治上一切事務以少數民族利益為優先、認為少數民族在中國的優先權高於漢族的民族主義。在中國主要被認為歧視、壓迫、剝削漢族；限制、剝奪漢族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權利；強行改變漢族的風俗、語言、服飾等；武裝鎮壓漢族的反抗），其中有許多人遭到監禁。同年賽福鼎在一場令人痛惜的演說中駁斥關於大漢族主義的質疑，並且爭辯漢族官員在高階層級的優勢

地位來自於他們先進的革命經驗。

一九六〇年，王恩茂在新疆議題上更進一步，他談到他相信「各民族的完全融合」對新疆的持續發展是不可或缺的，這個信念背後的假設是，當少數民族被充分同化時，他們的民族認同就會逐漸消失，只剩下漢族（中國）文化。中國歷史充滿了針對「蠻夷」及其弱勢文化的各種篇章——在一九四九年前，部分用於形容非漢族民族的漢字暗示他們如同禽獸一般（我們可以從漢族認為維吾爾族「野蠻」和「不馴」的普遍刻板印象中看到類似的論調），最近幾年，官方論述中已經開始以某種方式談到少數民族地區的低「素質」民族。

漢族的種族及文化優勢的現代概念，源自於中華民國總統孫中山的思想，孫中山主張真正的中華民族由五個民族——漢、滿、蒙、回、藏——所組成，而終極目標是「天下為公」。有些學者認為孫中山的種族理論在建立「漢族」的概念上發揮了重大影響力，並且一定程度上建立起「中國」是一個國家的概念，孫中山認為這對團結人民以對抗清朝來說是不可或缺的；而在此之前，語言和文化的區域性差異在身分認同上扮演的重要性，可能和感官上的相似性一

樣重要（有點兒像新疆的突厥民族那樣）。但是孫中山並未把「五族共和」視為一種平等的同盟關係，一九二四年時他形容漢族是中華民族的主體並且強調同化其他民族的重要性，他主張，對一個統一國家來說，來說「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不可或缺的一步——即所謂民族團結。

若說中國政府在新疆的政策，都以這個信念為單一目標的話是太過簡化了，然而共產黨時代的中國官員和知識份子經常以不同方式闡述這個論點。一九五七年周恩來總理說「如果同化是各民族自然融合起來走向繁榮，那是進步的。這種同化本身就有推動進步的意義。」

儘管共產黨許多決策背後的動機是晦澀難解的，但涉及一些政策領域（特別是教育與宗教方面，我後面會討論到這部分），我們很難不導向這樣的結論：維吾爾人的部分「融合」是政策蓄意促成的結果之一。而民族團結教育司在以下這個聲明中很明確地表示：「民族的消亡是民族自我發展及自我提升的必然結果，這是一個在世界各地發生的全球性過程，是民族發展到最高階段的最終結果。」

文化大革命的混亂旋渦

中國與蘇聯關係的衰退為新疆帶來重大的影響，部分原因在於蘇聯長期介入該地區而導致的緊張局勢——他們先前獲得該地區三十年的石油和金屬優惠——但在一九五〇年代末期，條約的廢除未能防止裂痕擴大。真正的問題是毛澤東與赫魯雪夫（Khrushchev，蘇聯最高領導人）意識形態上的差異，赫魯雪夫批評史達林的政策——就此延伸的話，也就是說，赫魯雪夫在批評毛澤東的政策，因為毛澤東往往走上他蘇聯對手的老路。

一九六二年時中蘇關係降到最低點，當時毛澤東「大躍進」災難性的農業政策造成的饑荒迫使五萬人從伊犁地區逃到哈薩克共和國，邊境關閉了，解放軍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佔領了該地區，成千上萬人（主要是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為此抗議而聚集在主廣場上，並且很快演變成一場暴動。政府大樓遭到攻擊，漢族官員或少數民族官員都遭到俘虜及毆打，最後軍方開火才得以驅散人群。

這個事件加快了俄羅斯人自該地區外移的速度，一九四九年時新疆有兩萬名俄羅斯人，而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時，該地區只剩下五百名俄羅斯人。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新疆也有針對被認為是親蘇人士的清洗及逮捕行動，中國共產黨非常擔心維吾爾族和蘇聯領土上的民族結盟的可能性，因此他們將維吾爾族的文字書寫形式自當時使用的西里爾字母改為拉丁字母（譯註：蘇聯於一九三〇年代時為境內少數民族進行文字改革，用西里爾字母替代原有的文字字母），任何與蘇聯親戚的聯繫都會招致極大的懷疑，人們可能會因為收到一封信而被警方帶走盤問。

共產黨也不斷致力於提高非漢族民族的愛國心，例如一九六二年開始被維吾爾學校所採用的「頌祖國」一曲，這首歌曲直到八〇年代末期為止都是課程的一部分：

中國是我摯愛的母親，我的出生地，我是中國之子，
我的身心與愛永繫於她。

黨是我的重心，是我的夥伴、我的領導，

我欣喜地投入黨賦予我的每一場戰役。

赤紅時代是我的驕傲，我的榮耀，

我為歌誦及建設這個年代而感到自豪！

雖然中蘇交惡對中國社會造成極大影響，然而一股更大的亂流很快就席捲了這個國家。一九六六年五月，毛澤東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運動的目的據稱是要消除社會上所有傳統的、資本主義的、非革命性的要素，尤其是知識份子。我們可以從一九六六年六月的《新疆人民日報》的公告中看出這個運動的大體趨勢，它指出文化大革命「在這個地區如一場風暴般展開，將那些潛入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揭露出來，消滅所有牛鬼蛇神。」新疆又一次受到來自北京的另一個群眾運動的影響，這再次證明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無論就任何意義來說都無法「自治」。

然而儘管新疆的政治論述和全國其他區域的基調一樣，王恩茂最初仍設

法將混亂控制在限度之內，其結果是高層官員並未受到強烈批鬥並且保留了職位，這對一九六六年八月從北京來到新疆的紅衛兵（進行「革命」的毛派青年）來說不啻是一種背叛；他們主張王恩茂是一位實質的分離主義者（這些青年看不出自己的主張有多麼諷刺），新疆正在轉變為一個獨立王國。

在接下來的三年，來自新疆之外的紅衛兵組織不斷與忠於王恩茂的人馬發生衝突。事態正在脫離王恩茂的控制，其中最戲劇性的徵兆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在石河子發生的事件，石河子是一個人口幾乎全是漢族（無論當時或是現在）的新城鎮，是鄰近烏魯木齊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主要師團總部，若干激進派試圖奪取一家紡織工廠的控制權並拘留了幾名資深的兵團軍官，翌日，載著士兵的十輛卡車開到紡織廠，隨後的戰鬥中有數十人遭到殺害。

新疆的派系鬥爭一直持續到一九六〇年代末期，這之中通常沒怎麼牽扯上非漢族人士，其中最接近非漢族群眾參與事件是一場預計有數萬人參加的反王「大漢族主義」計畫，但由於中國總理周恩來的命令，解放軍和兵團阻止了這個抗議計畫。周恩來擔心這場集會可能促進突厥民族的團結。

儘管非漢民族並未涉入不同派系的紅衛兵之間的衝突，但這並未使他們免於被文革的旋渦所捲入——先前尊重該地區各民族特色的政策被打上「反動」的標籤，一九六八年龍書金取代王恩茂的職位後，他並未試圖消除激進政策帶來的影響力。雖然傳統漢族文化和少數族裔的文化同樣都是文革批鬥的目標，然而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對丈夫的意識形態有著狂熱崇拜，她似乎特別仇恨少數民族，她將這些少數民族描述為「外來的侵略者」。新疆少數民族的習俗和信仰被譴責是「落後」和「封建」的，清真寺遭到破壞，古蘭經被燒毀，農村集市被關閉，音樂、舞蹈和流行的節慶都被禁止。維吾爾知識份子遭到迫害，如語言學家伊卜拉伊木·穆提伊被人用他所寫就的三本厚重字典砸頭。當我參觀禿忽魯·帖木兒汗——最後一位察合台蒙古可汗，大力鼓舞伊斯蘭教在該地區的傳播——的聖陵時，管理人告訴我紅衛兵強迫村民把豬隻養在聖陵裡面，新疆大部分地區都出現這樣的羞辱行為，喀什噶爾有個男人在一位朋友的孩子出世時朗誦古蘭經，他被迫塗黑臉、騎在驢子上遊街示眾，並拿著一個上面寫著「我不該信舊規」的牌子。諷刺的是這個懲罰方式本身就是個「舊規」——

一九三〇年代時，新疆某些地區會以這種方式處罰通姦者，塗黑他們的臉，讓他們赤條條的、面對面坐在兩匹驢子上。

雖然這些非漢族人民無法直接反對這種對宗教和文化的攻擊，但許多人找到其他抵抗的方式，他們藏起宗教書籍，而有些人竟敢在家裡的隱蔽處（至少理論上是）中繼續進行宗教習俗，這些活動除了實際的祈禱以外，還可能有其他不引人注目的儀式，歷史人類學家伊利科·貝勒漢（Ildiko Beller-Hann）在其著作中提到一些和製作食品時相關的宗教習俗，其中有許多與祈求祝福和紀念死者有關，加熱油脂以為烹調所用這種日常行為也能是「隱密的、幾乎無法為人覺察的與精神世界交流的行為。」

在中國壓制維吾爾文化的同時，蘇聯正在推廣維吾爾文化。在文革期間，阿拉木圖（現位於哈薩克）開設了一所維吾爾語劇院，而在塔什干，一支維吾爾樂團開始在烏茲別克的電台和電視上演奏音樂，後者可能部分因為烏茲別克的媒體部副部長是維吾爾人，但更多是因為這是一種吸引人才並破壞中國政策的方式，這也意味著當蘇聯和中國的關係改善時，這兩個國家的維吾爾族間

的社會及文化聯繫可以被再次喚起。

儘管仍受到相當的限制，但如今在中國已經可以公開談論文革，但文革時期新疆少數民族受到迫害的全貌還不能被公開提及，然而「針對非漢民族的文化及宗教習俗的迫害已經嚴重傷害少數民族和當局之間的關係」應該算是合理的假設。最接近官方道歉的事物是，一九七八年，當局在一場會議上的演講中承認那個時期有著過激行為，「階級鬥爭的大棒」被錯用於「迫害許多數民族的幹部及人民」，講者並表示「讓我們都從中學到一課、極其痛苦的經歷。」但，唉，這麼說是昧於事實。

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在新疆是如此失控——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間，就發生了一千三百多次衝突——以至於中央政府讓解放軍控制管理該地區（包括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政府可能擔心蘇聯或內部其他派系可能會趁隙而入，然而當時儘管有著對共產黨統治的不滿，但文革期間並未發生針對新疆地方政府的重大攻擊。沒有事變——更甬說大規模起義了——顯示了，要不是當時維吾爾族和其他突厥民族的不滿程度還不夠高，或者是政府當局已經成功破壞了

不同族群之間的關係。該地區最大的動亂發生在文革結束後，而且只和漢族有關，數千名在文革期間從上海被派往阿克蘇的青年想要返回上海，但他們發現自己的戶口已經被遷往新疆，他們之中的數千人在一九七九年為此抗議，然後在一九八〇年時又抗爭了一次，但很少有人獲准離開新疆。

雖然解放軍接手控制局勢制止了兵團內的嚴重衝突，但已經來不及阻止它的崩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中大約有七萬人被指為「階級敵人」或「牛鬼蛇神」，而鬥爭已經破壞了兵團的運作機能，就和這個國家的其它地區所遭受的命運一樣，文革已經摧毀了所有正常生活的表象，但考慮到新疆地區原本就脆弱的經濟狀態，該地區遭受的損害是成比例放大。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五年之間，儘管新疆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但農業並未成長，兵團中悲慘緊迫的生活條件使得許多漢族在一九七〇年代時離開了該地區：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兵團中的漢人人數從兩百三十萬掉到一百七十萬人，最後，在一九七五年，兵團正式解散。

後續取而代之的各個機構並未使事態改善，在接下來的兩年中，新疆的經

濟進一步惡化：工業產值衰退了三分之二。很快的，在全國範圍內，更激進的改革隨即發生。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新領導人鄧小平開始「改革開放」——這個經濟上的「開放」過程將破壞毛澤東政權的大多數特色。這個改革初期是農業的「去集體化」、開放外商投資、允許人們經營私人企業，這一切都被包裝成是作為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部分。至於一個共產主義政權卻擁抱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表面矛盾，就以其他理由將之合理化——政府說，這是走向純粹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為了發展高水平的生產力，國家首先需要獲得現代科學技術。

這個政策使得新疆，正像全國其他地方一樣，獲得了不俗的成績：從一九七八年到二〇〇〇年，其地區生產總值以每年增加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長，而在二〇〇〇年時，新疆將獲得中國非沿海省份中最高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然而儘管這個地區在當時發展很快，但很快就有人開始質疑這些新政策在新疆的實行方式，這些棘手的問題涉及發展的終極目的，以及——人們是否平等分享這些福利。

第三章

「開放」時代

對一些抗議者而言，他們無法接受政府當局一邊認為新疆人口過多，因此少數民族必須實行計劃生育；同時還一邊繼續讓囚犯及漢族移居者湧入新疆。

一九八四年，新疆西南部的小鎮巴仁被授予「民族團結楷模」的稱號。巴仁是位於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阿克陶縣的一個小城鎮，其人口組成是三分之二維吾爾族及略少於三分之一的柯爾克孜族，其餘的是漢族、塔吉克族及回族。雖然這樣的民族多樣性在新疆非常尋常，但政府當局很少錯過能強調「民族團結」價值的任何機會。巴仁看起來十分穩定，這使得六年後發生的暴力事件震懾了政府——今日西方分析師認為：這是新疆的維吾爾人和中國政府之間發生的第一次重大對抗。

根據中國政府的說法，在四月五日上午，幾百名憤怒的暴民自一所清真寺出發並且包圍了地方政府辦公室的建築，他們口誦「聖戰誓約」並意圖「製造麻煩」，據說一些抗爭者帶著一面預言宗教將會擊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橫幅，新疆電視台上一則報導稍後公布一些據說是在示威者身上找到的文件，內容呼籲發起聖戰及消滅異教徒。

當天稍晚時，超過三百人加入抗議活動，然後事態惡化了。兩名官員被派去談判，然而他們遭到民眾殺害，因應情勢發展，一群武裝警察前往處理但卻

無法制伏暴動，最後在群眾圍攻下，雖然警方進一步遭到槍擊，但顯然他們只是「以非常克制的方式在反擊」，根據一些中方消息來源，有兩輛車的警察被用斧頭和刀子殺害，民眾還放火燒車。

暴徒在夜間對地方政府發動武裝襲擊，開槍並且投擲爆裂物。到四月六日時，武警得到解放軍的支援，解放軍聲稱他們擊斃十名叛亂分子，至此巴仁才恢復秩序。這次的武裝襲擊被歸咎於一個名為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Islamic Party of East Turkestan）的激進組織，其領導人為則丁·玉素甫，政府當局稱他已死於戰鬥之中，並未提及暴動可能是由任何地方性的民怨所引起。

前述的說法似乎提供了一個通順的前因後果，以告訴眾人發生何事，但我們應該非常小心謹慎地看待這個故事。沒有可靠的目擊者證詞或是其他證據如照片或錄影片段可以證實這個說法，而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則對該事件提出完全不同的觀點，聲稱「中國政府打壓維吾爾人為了更大的民主及宗教自由而發起的和平抗議活動（中略）數百名男女和兒童在血腥鎮壓期間遭到屠殺。」¹

國際特赦組織提出一個類似但更謹慎的報導，表示政府部隊驅離在地方政

府辦公室前抗議的數百名維吾爾村民，他們引用非官方來源的資訊說有五十名抗議者因此死亡，其中有些人在逃跑時遭到槍殺，而且當時「軍方利用直升機發動迫擊炮及槍擊。」

除了確認有一群人聚集在巴仁地方政府建築外、及許多人死傷於隨後發生的暴動中，這些記述沒有太多共通點。至今有許多問題的答案仍是未知的，例如說，抗議活動是經過策劃還是突發性的？在政府干預抗議行動之前群眾是否已經使用暴力手段？

當時最接近一份報告書的記述來自於英國前外交官威廉·彼得斯（William Peters），他在一九九〇年九月時造訪新疆，彼得斯指出抗議發生於齋戒月（Ramadan，伊斯蘭教的一個習俗，穆斯林會在伊斯蘭曆的第九個月，即賴買丹月時的白天禁食），並稱抗議活動是因為地方政府封鎖一所清真寺和伊斯蘭學校。他還暗示抗議者都是柯爾克孜族和維吾爾族——總之不是政府想要的那種「民族團結」就是了。他提到了之後幾個月在喀什噶爾有武警巡邏及實施宵禁，而那個夏天喀喇崑崙公路關閉了。最引人入勝的部分在於彼得斯聲稱

「一個可靠的消息來源」告訴他維吾爾人已經計劃在四月十二日，齋戒月結束時，發起另一個不同的示威活動來抗議漢族移居到新疆。在巴仁事件後的鎮壓發生後，這場示威可能胎死腹中。新疆未經證實的流言使人十分為難——這是缺乏獨立媒體的必然結果——但一份對恩維爾·土赫提（一位流亡的異議人士，我將在第五章談到他的故事）的評論為彼得斯的記述提供一些支持，一九九〇年春天，當時土赫提在塔什干，有人告訴他「注意你國家裡面的柯爾克孜地區，事情不太對勁，他們打算幹大事。」

雖然彼得斯的報告深具啟發性，但我們不該將之視為定論。歸根究底，一個人會將巴仁事件視為反映出一般人普遍不滿的和平抗議活動，或是將之視為伊斯蘭主義分離主義者引起的叛亂，這可能取決於當事人對中國政府的普遍觀感及中國媒體的可靠程度，然而儘管我們可以合理懷疑任何在中國政府保護傘之下所發佈或刊登的訊息，但這樣的系統性偏差並不表示我們應該不假思索的拋棄中國的消息來源，儘管我們所見的是優勢者對事件所寫下的敘事，但我們仍可以從這些資訊中的不連續性處得到啟發。例如說，雖然很多中國消息來源

強調抗議者是全副武裝的，但實際繳獲的武器數量卻顯示暴徒的武器量談不上「多」，而且大多很粗陋，這使我們必須多加斟酌「示威活動具有高度組織性且資金充裕」這個看法，並傾向認為這更像是一場在並未事先準備的情況下發生的對抗。

但否決巴仁事件的中國政府版本，並不表示我們必須接受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張的「這是一場大屠殺」，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和其他類似的組織有淡化維吾爾族動用武力的強烈動機：沒多少金主想被指控為提倡暴力行為。將中國政府應對事件的猛烈程度加以誇大，也可能被視為一種用以提高對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張論述的關注與同情的方式（就像中國政府總是誇大維吾爾恐怖主義帶來的威脅一樣）。

巴仁事件同時也是被外國媒體報導的第一個新疆大事件，國際版《新聞週刊》（*Newsweek*）有一期封面故事的標題是〈另一個中國：蠢蠢欲動的少數民族正在試探北京當局〉（*The other China – restless minorities are testing Beijing*），同時《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也刊登一個糟糕的報導，

命題為〈中國的突厥民族可能發動聖戰〉（*China's ethnic Turks may wage holy war*），後者讓我們想起那些在二〇〇一年九一一恐怖攻擊發生前，媒體對伊斯蘭教相當偏頗而不確實的報導。

巴仁事件正好說明了探究大多數新疆公眾動亂事件的真相時有多麼艱鉅，我們只能從遠稱不上公正的資訊來源提出的矛盾敘述間抽絲剝繭、試圖拼湊出事件的梗概。在這方面，這類事件概括了我寫這個區域的任何事物時（包括如何稱呼這個區域）會遭遇到的普遍難題——即使是使用「新疆」這個名詞都會被一些人解讀為默認中國政府對這塊土地的主權。正如史蒂芬·佛萊德里克·史塔爾（*S. Frederick Starr*，近年最具影響力的新疆相關學術著作之一的編輯）所說的：「新疆事務幾乎沒有夠穩固的『事實』，沒有夠獨立的資訊來源，也沒有基於壓倒性證據——至少要能夠不使人嚴正質疑其有效性與含義——所進行的分析。」

「開放」新疆

確定巴仁發生何事顯然是十分重要的，但由於我們現在可得的證據十分有限，或許探討巴仁事件可能的起因會更有效益，無論人們是進行一場和平示威抑或是發動一場武裝叛亂，事件的起因往往源自於他們的日常生活條件（雖然這個起因並不一定能夠合理化這些行為）。

一九八〇年代對中國來說是面臨重大政治與社會變化的十年，這些改變的主要目標是為了復興國家經濟，中國有非常巨大的城鄉差距——在鄉村，嬰兒的死亡率是在城市中的兩倍，只有一半的孩子接受完整的小學教育，大約有一億人處於挨餓及幾乎餓死的程度之間。新疆的城鎮平均壽命存在顯著差異，鄉下居民的平均壽命約五十七歲，而城市居民則達六十九歲。一九八〇年的新疆還未從文化大革命的動盪中復甦，即使是農業也是百廢待興，直到一九八五年之前它都還需要仰賴來自其他省份的糧食，而其主要原因是新疆的總人口增加到一千三百萬人，而人口增加的主要驅動力是國家發起的移居使得大量人口

自其他省份遷移到新疆。人口中的漢族比例增加到大約百分之四十之多，而且這個比例可能還是低估的數字——因為這百分之四十並不包括在國營工業及農場中工作的軍人和工人，他們的戶口都位於其他省份。

開放經濟政策的初始階段並未將新疆排除在外，但它也並未被列在優先排程中。自一九五三年以來已經在五年計畫（譯註：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是中共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長期規劃，每次規劃五年。五年規劃中的項目大部分為長期性工程，透過五年一次的規劃，使各項目持續推進）中為了國家的發展而提出政策，而第六（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五年）和第七個（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〇年）五年計畫都著重於鼓勵中國南方及東方地區的成長，對西部各個省份（除了新疆以外還包括兩個自治區和六個省份）的主要要求是提供原物料給其他省份。這種發展不平衡的經濟原理是因為政府認為某些省份必須先富起來，作為其他省份的榜樣；再加上決策者認為那些創造出來的財富將會產生「滴漏效應」（trickle down，滴漏論是源於美國的經濟術語，用於描述讓富人受益可惠及包括貧苦大眾的所

有人）往下流，讓其他貧窮省份也富起來。雖然一九八〇年代的許多社會都存在這樣的錯誤信念——實際上財富通常只會積聚在高層——而當時在中國也已經出現反對的聲音：一些經濟專家預見區域之間的差距擴大可能會衍生可怕的社會及政治後果，尤其是在少數民族區域，他們認為與其專注於東部的發展，應該也要選擇性地針對部分區域及新疆的工業推動發展。

但這些見解多半被忽視了，一九八〇年代新疆的主要投資項目是基礎建設項目，例如改善省份內部和省份之間的交通；一九八二年喀喇崑崙公路的竣工也促進了巴基斯和南疆之間的貿易，這些重大工程將是中國政府對於發展該地區方針的關鍵環節。

雖然這些「開放」相關政策通常與鄧小平有關，但當時政壇第二把交椅胡耀邦也是推動鄧小平改革、對抗共產黨內強硬派反對的推手，胡耀邦試圖轉變經略新疆的方針，回歸一九五〇年代初期採用的懷柔政策。胡耀邦會想這麼做的原因來自於一九八〇年發生在阿克蘇的一場暴動，暴動的起因是兩名漢人殺死一名維吾爾青年。事後胡耀邦開始一連串對西藏及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的考察

行程，他建議讓這些地方進行實質的自治，在某種程度上，這意味著要將許多漢族幹部（由共產黨政治官員所組成）調到中國其他地區。他還主張應該鼓勵少數民族的文化，特別是在新疆地區——胡耀邦認為新疆缺乏像達賴喇嘛那種程度的反對派角色，比西藏的威脅更小。

他的看法受到共產黨內更為保守的份子所反對，一位官員警告說：

你把自治權給他們，他們只會回頭去搞一個東突厥斯坦。胡耀邦還想把漢族幹部撤回內地，那不就把手給了蘇聯和土耳其，這是賣國賊才幹得出來的事！

胡耀邦的提案並未在新疆全面實施：漢族幹部並未如西藏那樣撤出新疆，新疆也沒能往真正的自治之路邁上一步。目前還不清楚這是否是因為胡耀邦本身對這個提案並非全然支持，或者是他激進的提案如同國民政府時代的張治中一樣遭到封鎖（胡耀邦的反對者在一九八七年將他趕下台）。然而依據經濟

學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他現在仍然因為被誣指為「分離主義者」而遭到監禁，我們將在第八章談到這件事——的說法，他認為在那段期間內「各個民族之間存在相對的平等」及「更加寬鬆的政治氛圍」。

新時代最顯著的轉變是對宗教有著更大的寬容度。十七年來，新疆的伊斯蘭教協會第一次被允許聚會；維吾爾人恢復使用阿拉伯字母；數以千計的清真寺重新開放或是落成，其中部分來自於世界穆斯林聯盟的資助；朝聖者得以前往朝覲（*hadi*，指的是伊斯蘭教徒到參加的朝覲，這是每年全世界穆斯林最大規模的聚會，也是伊斯蘭教的五功之一），宗教出版品的數量激增，其中有許多是在巴基斯坦印製而成，同時穆斯林也能在國外的伊斯蘭學校進修。

會採用這種新的寬容政策，部分是因為中國政府希望說服那些以穆斯林為主國家中潛在的貿易及投資夥伴，讓他們相信伊斯蘭教在中國已獲得信仰自由。一份來自新華社（中國主要的國家新聞通訊社）的報導滿懷希望地談到（即使內容並不完全正確）新疆與沙烏地阿拉伯、敘利亞、土耳其、埃及和馬來西亞穆斯林的長期密切關係。

但是宗教改革並未受到每個人的歡迎。部分烏魯木齊的世俗化維吾爾人認為宗教是維吾爾社會中一股過於保守的力量，鼓勵宗教將會扼殺現代化發展；雖然這只是一小部分都會精英階層的觀點，但這個觀點說明了將維吾爾社會劃分開來的潛在斷層線之一。

言論自由也獲得提升，不同城市中的維吾爾知識份子試著推廣當地作家的著作，其中有許多作品是在共產主義時代來臨之前就寫成的。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詩人阿卜杜克哈里克——來自吐魯番，在一九二〇年代時以「維吾爾」為筆名發表作品——的著作再版，並召開以他的作品為主題的研討會，這樣的復興並不只純然是文學議題而已——阿卜杜克哈里克在一九三三年時因為反對盛世才而遭到處決，並因此被視為烈士。而儘管阿卜杜克哈里克並未留下照片，但由於宣傳活動所需，一位畫家被委託繪製阿卜杜克哈里克的肖像，無法可想的畫家只好挖掘他的遺體、拿頭蓋骨當繪製肖像用的範本。

吐魯番知識份子推廣阿卜杜克哈里克著作的另一個原因是——作品中的民族主義主題，就如以下摘錄自〈覺醒吧！〉一詩的內容所顯示的：

嘿！維吾爾人，是時候覺醒了。

你僅有兩袖清風，你無所畏懼，

若你不自救，

在這毀滅之後，

只有更嚴峻的處境等待著你。

站起來啊！我說，

抬起頭來、揩亮你的眼睛，

斬斷敵人的頭顱，

讓熱血淌流吧！

一九八一年時喀什噶爾張貼了這首詩的大型海報，警方關注到開始搜尋詩人是誰並對民眾進行筆跡測試，他們有意識到作者已經去世五十年後才放棄搜尋。

那些曾經遭到監禁或查禁的作家現在也能發表他們的作品了。阿布都熱

依穆·烏提庫爾曾經是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政治報紙《阿爾泰報》(Altai Gazeti)的主編，一九四九年時他曾經試圖逃離中國，但遭到逮捕並且關押到一九五八年才獲釋，然後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時又再度身陷囹圄。他出版了以一九二〇年代時的哈密為背景的詩歌和歷史小說，擁有廣大的讀者群，他最著名的詩歌之一「足跡」是其中一本小說的題詞，這首詩特別為人傳頌。

沙漠和山谷間有我們的足跡，

黃沙中埋葬著許多沒有墳墓的英雄。

別說沒有墳墓的他們已被遺忘，

當春天來時，他們的墳上佈滿鮮花。

留下人們，留下故事，他們去了遠方，

任風吹拂，沙丘遷移，但我們的足跡永不消逝。

即使馬兒消瘦了，我們的車隊仍在前進。

或許有天，我們的子子孫孫將會尋得那些足跡。

這首詩曾被雜誌轉載、製成海報張貼或塗寫在牆上。放在歷史小說的上下文中，這首詩看來是無害的，但單單複製這段詩詞時，人們可以將之理解為一段關於維吾爾傳統深度的有力陳述，更重要的是這首詩似乎對維吾爾人的未來提供了一個相對樂觀的觀點——一些社會運動者將這首詩最後的未來時態詮釋為：維吾爾族尋求獨立的奮鬥終有成功的一天。

政府還推廣來自該地區的文化偶像，例如麻赫穆德·喀什噶里，他是一位十一世紀的學者，曾撰寫一本關於東突厥文化的百科辭典（易卜拉欣·穆弟依在文革後將這本書翻譯為現代維吾爾語）；或是薩圖克·博格拉汗，他是在十世紀時皈依伊斯蘭教的喀喇汗國統治者，新疆自治區第一任主席賽福鼎·艾則孜甚至還為薩圖克·博格拉汗寫了一本足有一千頁的小說，這本小說在該地區廣為流傳。

傳統維吾爾音樂也為人讚頌，賽福鼎鼓勵研究木卡姆（muqam，一種維吾爾詩歌、樂器演奏及舞曲的大型劇目），木卡姆通常由一小群歌手在魯特琴和鼓的伴奏下演唱，賽福鼎推動木卡姆計畫的目標是創造出十二木卡姆的

經典套曲，套一句維吾爾學者阿布都秀庫爾·伊敏的話說，這有助於官方認可木卡姆為「多民族的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音樂瑰寶之一」，這項措舉顯示中國政府並不敵視維吾爾文化本身——但推廣某些方面的維吾爾文化是本著非常明確的意識形態上的動機，在這個例子裡面，儘管木卡姆是傳統維吾爾文化，但這個政策更加想強調的是：這個文化是中國文化之一。

一九八六年在烏魯木齊舉行的少數民族運動會也顯示出類似的觀點。說這是一場運動會多少是有些用詞不當的，因為這類聚會主要用於展示技能及體育活動，而其中並沒多少競爭要素，而懸掛在體育場內的橫幅布條寫著：「發展少數民族的體育活動是為了祖國進一步的繁榮。」以區域為依據的組隊方式（而非以民族為組隊依據）再次強調了政府對「民族團結」的重視。

文化的相對自由化，可說是阿克蘇動亂後政府試圖改善維吾爾人和政府當局之間關係的政策，但這個方針也與國家應當管理少數民族文化與身分認同的想法相符合，而這個做法的最終目標是讓少數民族融入「中國人」這個民族認同之中，簡而言之，像少數民族運動會或在中國電視上經常播放的歌舞盛會這

類活動，旨在於培養出對國家統治有益的身分認同，正如一位運動會觀察者所說的：「政府當局必定想要將民族意識侷限在民間風俗的領域中。」少數民族的文化只能是「一個族群繽紛燦爛的歷史過去，但這樣的過往不能妨礙民族融入現在的時代。」

但中國政府不會單靠文化同化來維持對該地區的控制力，一九八二年時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正式復職，但先恢復的是其軍事上的功能而非經濟上的貢獻（其經濟上能發揮的作用仍相當疲軟），王震認為兵團為解放軍提供了重要的後備力量：「就像握緊兩個拳頭，一個在前、一個在後。」兵團的分佈與戰略上的利害關係有關（例如可用資源的多寡），他們圍繞在大多數重要城鎮外圍、聚集在交通樞紐周遭，這使兵團更容易抑止動亂。

政府認為威脅不只來自內部的異議，一九七〇年代中後期中國和蘇聯之間局勢一直十分緊張；一九七五年時，《新疆人民日報》上一篇紀念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二十週年的社論，呼籲要採取行動對抗那些「少數披著宗教外衣但實際投身於蘇聯修正主義者（revisionists，在共產主義運動之中歪曲、篡改、

否定馬克思主義的一類資產階級思潮和政治勢力）懷抱的民族分裂份子和反革命份子」。四十年後的人們會發現中共在修辭方面的連續性，雖然他們已經不再訴諸來自蘇聯的威脅，但仍繼續聲稱那些持有異議的煽動者是「隱身於宗教中的境外敵對勢力」。

一九七九年初，與哈薩克斯坦接壤的某地區即將被解放軍控制。中國政府非常重視來自蘇聯的威脅：當時中國正準備與越南（蘇聯的老盟友）發生邊界衝突並且擔心遭到蘇聯報復，不過中蘇關係很快就得到改善，並使雙方在一九八〇年代時恢復貿易，尤其是經由伊寧附近的霍爾果斯。霍爾果斯在一九八三年時重新開放貿易，一九八九年時開放巴士運輸，這使那些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時因為中蘇交惡而分離兩地的維吾爾家庭——他們之間通常很少聯絡，或者無法聯絡——終於得以重新團聚。

發生在農村的「戰爭」

雖然這麼說可能有點過度誇張了，但這段時間算得上是新疆的太平日子。新的農業政策和更大的宗教寬容當然是受到人民歡迎的，在那些參訪新疆地區的研究者的記述中，他們談到「維吾爾人和中國其他社會的一份子一樣，認為經濟限制的實質廢除（尤其是在農村）是改善個人經濟地位及確立集體優先權的契機。」另有人提到新疆人現在「可以看到現代化的遠景了。」

即使是在一九九六年，南疆的農民仍然將改革時代稱為「獲得土地的時代」，或者更簡單地說，「獲得自由」的年代。嚴格講起來他們並沒獲得土地——在中國，土地是國有地，在農村，土地是由農村集體農場管理，村民所得到的是土地的使用權，而新疆就跟全國的其他地區一樣，其一九七八年後的關鍵轉變是回歸家庭農場制度，農民可以自由選擇要種植什麼農作物（至少在理論上如此）。國家最初禁止這種做法——對共產黨內的很多人來說，這種事跟私人所有制太過接近了，但很多地區的農民（尤其是對中國南部的稻米產區）

開始與政府官員勾結，好自行選擇要種植什麼農作物，而當這樣的做法導致收成大幅增加時，政府很快就放鬆了立場，開始授予偏遠或有地質困難的地區特許權。到了一九八二年時，家庭農場已經成為國家政策。

中國政府不但容許權威受到公然挑戰，還讓政府自己的政策轉彎，雖然這很令人驚訝，但其實那時候當局眼前並沒有多少選擇，因為國家的終極目標是發展工業，而如果不先改善農業的話，是無法發展工業的。工業需要充足的勞動力，輕工業需要原料；在那之前如果沒有生產過剩的農業產品可供出口，國家很難賺取外匯。無論如何，意識形態上相衝突的家庭農場是為了黨而服務，這個政策成功到沒辦法喊停。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農民可以依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一些官員擔心這樣的變革將損及他們的權威，他們企圖阻止農民從私人貿易中賺到錢，而考量到農民在他們觸角下能觸及的事業範圍，官員的企圖可說是異想天開的。正如湖北省的這個農民活動清單所顯示：

人人試著養鴨、養蜜蜂，從事各種業餘行業……他們編鳥籠、醃豆腐乳、削竹笛、製作自行車輻條，他們在大街小巷裡開著發財車，從看似普遍的投機冒險中賺取利潤，或把電視搬到庭院裡面，跟想看電視的觀眾收一小筆賞錢。

農業的開放使得中國大多數農民——不分民族區域——在一九八〇年代前半期時提高了收入及生活水準，但由於兩個主要理由（雖然它們互為相關），新疆的農業收益是較低的，第一個理由是基於環境限制：適合農耕的土地並不多，水資源非常昂貴，而且許多農場位於交通不便處，不易與潛在市場銜接。

第二個理由是，維吾爾人經營的小農場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經營的農場相比是居劣勢的，兵團的農場有更多水資源可用、有國家補貼，而且受益於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大規模生產導致的經濟效益），直到今天兵團依然擁有這樣的優勢——二〇一二年時，有百分之三十一的耕地處於兵團控制之下，有鑑於兵團通常也管理供水，實際上兵團所控制的比例是更高的。

這樣的結果當然是不幸的，也可能是不公平的，但並不是蓄意針對維吾爾人差別待遇造成的結果。更糟的是，這樣的結果是肇因於政策制定者，或者更現實地說，是因為新疆自治區政府並未考慮到維吾爾農民所面對的特殊挑戰，如果當時中央發放給兵團的巨大金額能撥用一部分在協助維吾爾農民上，這可能帶來相當長遠的效益，不只是在經濟上。

儘管如此，一九八〇年代早期新疆的生活水準仍是大大地提高了，如果說一九八五年後南疆維吾爾農民（維吾爾人多居住在南疆）的生活改善速度放緩，這也不是因為任何針對他們的特定政策，而是更為普遍的原因：中國快被自己的農民弄到破產了。農民必須上繳一定數量的農作物，通常是穀物或棉花，然後國家會為這些農作物給農民提供補貼，問題在於國家支付給農民的價格遠低於市場價格，舉例來說，穀物的價格從一九六六年時就沒變過，而在一九八〇年早期時，那個收購價格只有市場價格的百分之二十。

我們可以理解全國各地的農民都不歡迎這個政策：當他們收穫欠佳，或在不同的種植條件下時，他們可能因為國家只付給他們這麼一點錢而倒賠。

有些農民的應對之策是種植利潤更好的農作物，然後從市場購買國家需要的農產品上繳（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八年之間，經濟作物的栽培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但許多農民找到了從配額制度獲利的方式，穀物有三種不同的價格類別：基本配額價、增額價和超額價，後兩者的收購價格要好得多，而農民們想方設法地讓更多穀物納入這兩個類別中，為了達成目的，他們通常只種植配額作物，不種其他農作物。還有人巧妙地利用國家的鼓勵措施來對付這個政策，如果某種配額作物（例如棉花）的產量夠高，那國家可能會提供糧食作為獎勵；而如果該地區還生產糧食（這並不罕見），農場可能會繳交自己種植的糧食作為生產配額，然後把國家獎勵他們的糧食用較高的價格賣回給國家。農民實際上可以為糧食定價，而且這個價格已經高到國家負擔不起了，到了一九八四年時，中國政府要花費十分之一的年度預算來購買這些配額作物。

可以想見的是國家制止了農民繼續向政府挖錢；在一九八五年後，實際上只有一個穀物價格，到了一九八六年時，國家支付給農民的棉花和糧食的款項已經下降了十到十五個百分點，而許多農民因應的方式是停止種植糧食，於是

年產量下降了百分之十。鑒於當時中國的人口正在迅速擴張，政府必須得想辦法恢復糧食生產量，在一九八〇年代後期，許多軟硬兼施的政策應運而生，政府把罰款、威脅、沒收土地及騷擾作為懲戒手段。《人民日報》報導，在東北遼寧省的一些村莊裡，一些官員拿走農民的洗衣機和電視機，甚至僱用樂團在不肯合作的農民家院子裡吹奏管樂。

而在獎勵方面，中國政府推行一套被稱為「三掛勾」的政策，提供農民資金及購買便宜柴油及化肥的優惠，雖然這理論上是個好主意——因為燃料和肥料並不容易購買——然而實行上卻有幾個障礙，第一個障礙（也是最普遍的障礙）是當時銀行的存款問題，沒有足夠的錢來支付現金墊款；而另一個問題是某些省份的農民得不到政府承諾的燃料和肥料，因為貪腐的地方官員先把優惠給用掉了。這導致某些地區的重大動亂：一九八七年夏天在湖南省有超過兩百間化肥倉庫和商店遭人闖入。

和其他國家一樣，中國一直存在著某種程度的貪腐問題，然而一九七八年後貪污問題變得猖獗，隨著可以賺錢的新機會到來，這些當權者得以藉機撈油

水——以賄賂或是罰款的形式，或是濫用政府基金。一些官員也可能因為國家意識型態改變而感到失望：一個低階官員是沒多少合法管道可以致富的，結果造成一九八〇年代時，境況正在好轉的中國農民被迫支付越來越多的稅金與補助金給地方官員——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〇年間，這些支出的佔農民收入的百分比增加了一倍。雖然有些稅金是合理的，但仍有許多的單次款項只是為了滿足官員的私人收益，在最壞的情況下，農人得支付六十七種不同的費用，而且其中有一些是為了荒謬的理由，諸如「樹苗保證金」及「給失去工作時間的空閒中農業學校學生的補助金」。

全中國的農民在接下來的十年中為這些付款進行抗爭，而且數量大到讓許多人認為這會對黨的統治造成威脅（相較之下，即使是在巴仁事件後，在某本談論一九九〇年代中國主要趨勢的書中，作者在一篇分析中自信滿滿的預測「民族關係緊張並不是根本問題」）。至於稅金及配額制度兩者的改變在新疆造成的後果，使得維吾爾族農民再次處於相對的劣勢之中，許多農場同時有糧食和棉花的配額，這兩類農作物佔據了該地區大部分耕作面積，因此取消

農作物超額價格對維吾爾農民的收入帶來更大的影響，不過這並沒有使這些農民的生活陷入困境。真正的問題是，儘管他們的收入和生活水準持續提升，但增長的速度還是低於居民以大多數漢族為主的城市住民。

結果是新疆的農村與城市中心間的差距開始擴大，從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四年，非漢族居民占多數的縣中，地區生產總值自該區域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六下降到百分之十八，然而可能會有人再次主張說這只是整個國家走向城市化的大趨勢的一部分——在當時，中國超過四分之一的國家預算被花在城市及城鎮裡的國營企業上。

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後採用的學費制度進一步耗盡農民的資源，雖然學費的金額很小，但這樣的負擔仍使維吾爾族學生的退學人數增加。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漢族中國學生在十六歲以後繼續求學的可能性是維吾爾族學生的兩倍，出身自鄉下農村的維吾爾學生缺乏基礎教育——更遑論高等教育——使他們在之後面對一九九〇年代轉變後的勞動市場時遭遇重重困難。

目前我們尚不清楚，一九八〇年代南疆維吾爾人對於自身經濟狀況與新疆

城市中日益劇烈的差距意識到什麼程度（更不必說和中國東海岸的經濟繁榮發展速度相比了），學者琳達·班森（Linda Benson）談到新疆省會烏魯木齊在短短四年內發生的巨大變化：

一九八二年我人在烏魯木齊，街道上的交通量大概就是全新的公車與偶爾一、兩輛驢車或自行車；而一九八六年時，人們已經很難穿越烏魯木齊的主要街道，車流量龐大而綿延不斷。

但除了少數關於漢族及維吾爾族青年「頻頻公然打架」的報導以外，大多數情況下不同族群還是在新疆的城市裡和平共處（即使是各自生活），這段期間並未有農民的重大抗議活動，這表明了他們對新政策的不滿並不嚴重，要說有什麼抗議活動的話，那是發生在中國內地農村的「不穩」及「不安」地區。但當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烏魯木齊、北京及上海爆發與維吾爾人有關的抗議活動時，這些抗議行動抗議的是那些專門以少數民族為對象的政策。

「全世界最困難的工作」

自從一胎化政策在一九八〇年代推行以來，這個政策是中國所有法律中最知名也最容易被誤解的法律了，一胎化政策是為了因應快速增長的人口而生：在一九四九年時中國人口約有五億四千萬人，到了一九七六年時，人口已經成長為九億四千萬人。人口成長的原因是嬰兒死亡率的大幅下降及平均壽命的增加，當人們考慮到中國共產黨的紀錄時，人們可能不會完全認同這項成就。西方國家一直認為每對中國的夫妻只能生一個孩子，但實際上一胎化政策只適用於不到一半人口——這個政策禁止城市居民（戶口在城市）生超過一個孩子，農村夫婦可以生兩個孩子，但只限於第一個孩子是女兒，或第一個孩子是殘障人士（「女兒」和「殘障」可說變成頗有深意的同義詞）。

考慮到中國人傳統上是大家庭，特別是在農村，一胎化政策的推行終將成為一個問題。政府主要仰賴威脅和罰款來實行政策，塗在路邊牆上的家庭計畫口號往往是既嚇人又直白的，例如「你不守法，殺你全家」及「寧可刮你子宮，

好過讓你生第二胎」。也有許多關於強制墮胎或絕育的報導，例如律師陳光誠（一九七一年—，中國著名維權律師，二〇一二年時逃離中國）在二〇〇五年時揭露中國東部的那些做法；政府也提供獎勵措施，例如延遲生育的夫妻可得到更長的產假及小額的金錢報償。

新疆實施的漢族一胎化政策使漢族人口比例從百分之四十一下降為百分之三十七（一九八〇年代末期），一些兵團成員退休回老家也促成漢族人口比例的下降（儘管我們也得記住在這段期間其他省份的漢族也繼續遷移到新疆）。而同時維吾爾人口成長：直到一九八〇年代末期才開始採用針對少數民族的計劃生育政策，而且到一九九〇年代時才開始執行。

然而即使只是個政策上的可能性，新疆依然爆發抗議活動。一九八五年，政府宣布一份官方家庭計畫公報，要求所有少數族裔成員控制其家庭規模，大約有一千名維吾爾學生聚集在烏魯木齊的自治區人民委員會大樓前抗議。他們要求全面免除生育計畫，並停止漢族繼續移居到該地區，停止塔克拉瑪乾沙漠羅布泊的核子試驗，並不再將中國其他省份的囚犯移到新疆。最後一個政策和

清朝時代的政策差不多，在一九八〇年代及一九九〇年代，將囚犯發配新疆的政策帶來豐厚的利潤，因為中央政府和相關的省級機構會為每個囚犯支付一次性付款給新疆政府。到了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估計新疆接收了大約五萬名犯人。對一些抗議者而言，他們無法接受政府當局一邊認為新疆人口過多，因此少數民族必須實行計劃生育；同時還一邊繼續讓囚犯及漢族移居者湧入新疆。

儘管維吾爾族在北京和上海進一步抗議，但中央政府仍然在一九八六年裁定少數民族成員也應該服從政府的強制性計劃生育政策，城市裡的少數民族居民可以生兩個孩子，農村中的少數居民可以生三個。中國政府常常引援這個政策來主張當局抱持敏感態度來處理少數民族議題，而這個陳述至少可說具有一定程度的爭議性：這樣的優惠可能不是許多非漢族人士想要的，但相較之下這些非漢族人仍然得到優惠待遇。而更有爭議的是政府主張是少數民族自己選擇要限制他們的出生率，因此這個政策只是反映他們的「自由意志」。中國人權研究會——一個非政府組織，但接受中國共產黨資助並與之關係密切——聲稱一九四九年時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的人口實際上是在減少的，而這是因為蒙古

人、西藏人及其他遊牧民族間盛行梅毒，這個協會聲稱某些族群的梅毒感染率達百分之四十八，但這高到不太可能，因為全國的平均感染率在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之間。這個協會接著說，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人口增長對環境的影響「引發一場針對少數民族是否該加入計劃生育一環的討論，而少數民族官員是第一批說贊成的。」顯然少數民族「開始自行實行生育計畫」，因此「政府開始改變政策以跟上事態發展。」

這個協會的文章承認了一九八五年在烏魯木齊的抗議行動，儘管它提起這件事只是為了使這場抗議行動無效化。文章聲稱在烏魯木齊的抗議活動之後，一位漢族醫生為烏魯木齊的維吾爾人進行演講，談論計劃生育對經濟成長的重要性。「我十分驚訝，我的觀眾，他們大多數是維吾爾人，他們非常贊同我的說法。」張教授回憶，「人們在每場演講結束時聚集在我旁邊，跟我說我是在為他們的利益說話。」

我們可以從一九八九年的出生率數字，看出大多數維吾爾父母遵守政策的真實程度。只有百分之四十的維吾爾人有一個或兩個孩子，而在漢族裡面，

同樣有一個或兩個孩子的比例是百分之八十二；百分之十五的維吾爾人有三個孩子，百分之十二的維吾爾人有四個孩子，超過百分之三十的維吾爾人有五個或更多孩子。基於各種不同的理由，傳統上維吾爾人擁有大家庭，其中大多數是基於宗教或文化因素，但部分原因是大家庭提供了基本的農業勞動力。即使在限制生育的法規實施後，許多維吾爾人還是想方設法地生了比配額更多的孩子，例如說去不同的城市生孩子，或是將孩子登記在其他女性親屬的名下。

但儘管有些人可以繞過規定，這還是不能阻止生育限制在人心中的積怨。農村維吾爾族社群對計劃生育的抵制程度使一位官員將這個政策的實行形容為「全世界最難的工作」，為了獎勵推動政策，整個中國的官員會因為是否達成行政區設置的人口目標而受到獎勵和處罰，而這樣的獎懲使得某些地區的官員特別嚴格，而這並不是出於希望看到法律執行的動機：一些省份仰賴這些罰款（現在被委婉地稱為「社會撫養費」）來平衡他們的預算。

而因此遭到最多損失的是那些從事低薪農業工作的人，沒多少人付得起罰款（金額有時候甚至超過他們年收入）。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計劃生育

政策開始對少數民族實施時，大多數的新疆維吾爾人都屬於付不起罰款的這類人。而他們糟糕的經濟狀況應該歸咎於政府——收購制度造成貧困、缺乏對該地區先天就處於弱勢區域的投資、而且農人無力與兵團競爭——我們不清楚該地區有多少維吾爾人認為他們是被政府鎖定的目標，換句話說，他們是否認為他們的問題肇因自民族歧視。但事實很快就證明了，一些維吾爾人在認為自己的身分認同遭到威脅時，他們願意挺身捍衛自己身分認同的核心價值。

連抗議都不公平

一九八九年是焚書與抗議的最佳年份，在這一年結束時，大多數共產主義政權都被席捲東歐的異議浪潮給推翻了，而那一年剛開始時，布拉福（位於英國西約克郡）、德里、拉合爾（位於巴基斯坦）及其他城市的群眾燒毀了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的小說《魔鬼詩篇》（*The Satanic*

Nerves），因為他們認為這本書褻瀆穆罕默德；在春天及初夏時，數百萬人聚集在中國的北京及其他城市抗議政府的貪腐，並要求要有更大的自由（而抗議將在六月的天安門事件達到最高潮）。

在動盪之中，五月十二日時，一場小規模的遊行在北京舉行，來自中央民族大學的三千名成員（其中多數是維吾爾族和回族）走上街頭，高喊「懲罰中國的魯西迪！」這場抗議的主因是一本談論世界各地情色情趣的書《性風俗》，其中有一個章節談到作者所認為的穆斯林性癖好。該書的作者是山西的兩位教師，在人們上街頭抗議時這本書已經售出五萬本，這本書中最讓那些抗議者反感的部分是：它聲稱前往朝覲的穆斯林放縱自己沉溺於同性戀行為及與駱駝的人獸交，而尖塔、圓頂、墳墓等伊斯蘭建築特色是模仿陰莖及「維納斯的小山丘（意指陰阜）」。抗議活動的領導者這麼提到這些作者：「這些人必須入獄（中略）如果他們從世界上消失的話，我們會很高興。」

政府當局非常嚴厲的處置那個夏天進行的許多遊行，但那個遊行在北京進行的時機實在選得太好了，當時伊朗總統阿里·哈梅（Ali Khamenei）內伊

正在訪問中國，而如果中國被控阻擋穆斯林言論自由的話，在外交處境上會十分尷尬。因此，政府採用另一個極端方式來展現其寬容的態度，這次遊行不但是第一次獲得官方批准可進行三個星期的示威活動，政府甚至封鎖街道、管制交通，還在示威者遞交請願書後提供巴士送遊行者回家。

同一天，大多數回族集中生活的中國西北部也爆發了相關的抗議活動，在甘肅省省會蘭州有兩萬名示威者砸毀了政府大樓，燒掉一部裝著《性風俗》書籍的車輜，並呼籲殺死作者，雖然示威者與警方發生衝突，有部分人遭到逮捕，但政府採取克制態度，不久之後所有遭到居留的人士都獲得釋放。一星期後，烏魯木齊也有抗議活動，雖然公共電台一開始將這場抗議活動描述為支持天安門廣場學生的遊行，但之後它被形容是「反對民族團結者煽動的敵對事件，這些人誤導那些不瞭解真相的人（中略）大肆打砸搶燒。」當局聲稱有一百五十名警察和士兵受傷，四十輛車輛被砸毀，也有報導說示威者在抗議期間高喊阿卜杜克哈里克「覺醒吧！」一詩的詩句，這顯示了部分抗議者不只是在表達宗教方面的不滿。

政府的回應是毫不妥協：被指為首惡的三名男子被判處八年徒刑、十四年徒刑和無期徒刑，另外有四人因為毀損個人及私有財產而被判處一到八年的刑期。

蘭州和烏魯木齊的示威活動，雖然只相隔一週，但顯然有著相似的性質，而政府對此的處理態度相當不同。中國最受尊敬的伊斯蘭學者之一杜磊認為蘭州與北京抗議活動最顯著的特點之一是：人們是**向政府抗議**，而非**反抗政府**；也就是說他們要求政府干預某件事，而這個要求並未挑戰政府權威，而且事實上政府滿足了他們的要求——引起爭紛的書籍被禁並遭到銷毀——這顯示著，若我們以為共產黨堅決反對一切宗教的話，這顯然將太過於簡化實情了。

至於回族暴民的待遇和有幾乎相同訴求的維吾爾抗議者不一樣，一般的解釋是當局判定回族不太造成威脅，他們無疑更加融入中國（漢族）社會，大多數回族實際上非常像漢族，也使用同一種語言——回族正失去他們在十六世紀時所通曉的波斯語和阿拉伯語，此外，回族並未居住在這個國家任何敏感地區，而近年來也未曾表現出要求更大自主權的跡象（更別說是獨立建國了），

政府為此給了他們相當的自由，尤其是在回族人口占百分之三十五的西北部寧夏回族自治区；甚至有報導說寧夏一位蘇菲派傳教士，有超過一百萬名信徒及廣大的伊斯蘭學校及清真寺網絡，在訪問巴基斯坦時會見了許多基本教義派的神職人員。回族給中國政府提供一個正向對待伊斯蘭教的範例，這個正向範例可用來安撫來自以穆斯林為主國家的投資者。

許多西方學者（和許多維吾爾人）經常以輕蔑的態度提到回族融入中國社會，其言下之意是回族的融合是一種失敗的嘗試，一種身分認同的削弱。即使事情是這樣，回族的同化也是個相對較新的現象。雖然維吾爾族的歷史經常被看作是與各種「中國」政權的鬥爭（一篇CNN的報導將新疆形容成「反抗二十個世紀之久的區域」），然而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回族也歷經同樣叛逆的叛亂史。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間，整個中國西部（包括最西南邊的雲南省）爆發回民起義，回族和漢族間的緊張關係升級到這個程度——一八五六年時昆明的漢族和清朝官員展開為期三天的回族大屠殺，有四千多人在這場屠殺中遇難。

我們也可以從近期中國的回族抗議活動和新疆抗議活動的比較中得到啟發，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已經有好幾起跟回族有關的重大動亂，而中國政府呈現這些事件的角度相當不同。二〇〇四年十月，《紐約時報》報導中國中部河南省的回漢暴力衝突已經導致將近一百五十人喪生並迫使政府宣布戒嚴；在二〇〇九年和二〇一二年，清真寺的拆除在回族社群中引發重大抗議活動，然而無論是事發時或是事後，這些事件並沒被定調為「恐怖主義」事件（正如我在後面的內容中所說的，這和二〇〇一年後將新疆異議事件描述為恐怖主義事件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

中國政府處理這些事件的另一個顯著特色是，它並未像處理新疆發生的事件那樣，聲稱回族抗議活動是出於政治動機或是任何形式的宗教極端主義，在這方面，回族抗議事件的寫照宛若是政府描述新疆抗議事件的反面鏡像，特別在巴仁事件之後更是如此。儘管正如我所認為的，巴仁的村民因為許多理由而對政府感到不滿——農業政策、兵團的駐紮、實施生育計畫限制——但政府都不認為這些是潛在原因，而認為事件是一小撮極端主義份子所造成。一九九〇

年五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鐵木爾·達瓦買提認為「新疆穩定的主要威脅，來自那些揮舞著東突厥斯坦獨立旗幟的海內外民族分離主義者。」

「巴仁事件」之後

二十五年後，巴仁事件的起因仍然是未定之數，但政府當局對此的反應卻毫不含糊，雖然這個事件並未被明確定調為伊斯蘭恐怖主義，但新疆宗教政策的緊縮清楚顯示他們認為宗教極端主義是事件的主因。在事件後幾個月，政府鎖定「非法宗教活動」，關閉清真寺和宗教教育學校，加強對伊斯蘭教神職人員的心態監控，伊瑪目（宗教領袖，伊瑪目在阿拉伯語裡是指「領袖」，例如一個國家的統治者可以稱為伊瑪目。不過，伊瑪目一詞在伊斯蘭教的傳統裡有其他的含意，特別是對什葉派而言，什葉派認為只有伊瑪目才是先知的合法繼承人；而遜尼派會把一些重要的宗教領袖稱為伊瑪目）被要求接受政

治教育，而當局所調查的二十五萬名神職人員中約有百分之十遭到免職，也有報導說約有八千名共產黨官員被派往下鄉工作隊來「穩定邊疆地區，強化政治組織。」這些團隊的功能是「改革」當局的現行做法，尤其著重於推廣他們的意識形態。

一九九〇年九月十六日，新疆政府頒布新規定，要求「新疆的宗教專業人士」必須「支持共產黨的領導（中略）並且反對民族分離主義。」《新疆日報》報導所有宗教領袖都必須自官方認可的「愛國宗教組織」取得執照，這個證書必須通過每年的審查，而且當地的宗教事務部門可以取消宗教領袖的資格。這份條例還禁止宗教教學及禁止在正式註冊組織外的地方（也就是說，人們的家裡，或是其他私人場合）散布宗教資料，整體來說，這些規定等同國家明確宣示他們打算監督每一方面的伊斯蘭教信仰，雖然這些規定中有許多也同時適用於中國其他宗教，這個事實可能可以給新疆的穆斯林帶來一點安慰。翌年，新疆黨委書記王樂泉明確表示政府對宗教意欲為何，他說新疆當局面臨的「重大任務」是「管理宗教，引導它順從於……（中略）經濟建設的中心任務，

祖國統一，及民族團結的目標。」

政府開始更加密切監視的不只是宗教這個領域，一九九一年，一位在烏魯木齊的新疆社會科學院工作的維吾爾歷史學家及研究員吐爾洪·阿力馬斯因為他的著作《維吾爾人》而遭到軟禁，雖然這本書在一九八九年時被批准出版，但在巴仁事件後緊張的政治氛圍中，這本書的歷史版本被判定為「支持獨立和分離主義」的「民族主義觀點」，這並非完全沒有根據：阿力馬斯曾經以塔里木沙漠中發現的幾個兩千至六千年前的木乃伊化高加索人遺體作為證據，主張新疆是維吾爾人真正祖國這個說法；他甚至認為如果猶太人能夠在兩千年後回到故土，那麼維吾爾人也可以。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儘管那些木乃伊不是中國人，但他們也不會是某種維吾爾人的祖先。根據史前紡織品專家伊莉莎白·巴伯的說法，與突厥人和蒙古人相關的身體和臉部型態比那幾具木乃伊晚了一千年才出現：更可能的解釋是，這些木乃伊是來自中歐的移民。阿力馬斯的論述建立在不穩固的邏輯上，他認為埋葬地點有薩滿教信仰的跡象，而維吾爾人最初信仰的是薩滿教，因此這些屍體是維吾爾人的屍體。

整個新疆的學者、教師和知識份子被強烈要求要在政治會議上批評阿力馬斯的著作，一九九一年七月到十月之間，《新疆日報》發表四篇文章攻擊這位作者並且試圖抹黑他的著作，其中一篇文章列舉出他書中的一百個錯誤，他的書被禁止出版，被沒收的書則遭到燒毀，但這種激烈的手段只是增加人們對他作品的關注，在接下來的十年中阿力馬斯仍然被軟禁在家中；他於二〇〇一年過世。

為了試圖對付這個版本的歷史，國家委託發行了一系列新疆相關書籍，極力強調該區域作為中國一部分的長期角色，這些書籍的目標對象是各級學生，從高中到大學；而這些書籍的內容將作為考試評估的內容。政府對維吾爾語出版品的審查則更嚴格，幾份雜誌的工作人員遭到替換。

針對阿力馬斯的行動及宗教限制，都可以被視為後續政府針對維吾爾人的開端，而且這些大部分都是針對巴仁事件的反響，無疑地，官員們將巴仁事件和其他事件歸咎於一九八〇年代國家對宗教及文化的控制相對寬鬆，但我們同時也要記住自從前一年的天安門鎮壓事件之後，中國的社會及政治氛圍已經變

得不那麼寬容了。一九八九年後，國家對媒體和教育進行更嚴格的控制，並且大大加強了國家在內部安全的花費，特別是武警。這種政治轉變是否僅僅促進新疆當局的嚴格政策？或實際上鼓勵他們在其他方面更進一步？目前仍沒有定論。

新疆有「宗教極端主義」嗎？

政治氛圍和維吾爾人積怨的許多理由都無法杜絕中國政府正在應對正統性威脅的可能性：維吾爾人越來越支持「分離主義」思想，而且「宗教極端主義」正在推動分離主義。

關於新疆的問題中，最大的、尚未有解答的問題恐怕是：維吾爾人到底有多支持「分離主義」思想？而且這個問題可能一直得不到解答。在中國，這一直是個敏感到無法公開討論的問題，包括在網路上——論壇、留言板和社交媒

體，自一九九〇年中國可以使用網際網路後，政府一直在進行網路監控。維吾爾人通常只會私下討論這個話題，而且總會有些人表示自己不喜歡中國政府並希望尋求獨立建國。

但若要判斷新疆大多數維吾爾人是怎麼希望的？單靠個人意見或是社交圈意見是遠遠不足以回答這個問題的。大多數情況下，西方媒體在討論這個議題時一直不夠謹慎，而且談論「獨立運動」或「分離主義組織」時經常不太與牽涉其中的人員聯繫確認。那些滔滔不絕的反漢族成見常常被與支持獨立畫上等號，但這實際上忽略了人們的口語概念和實際信念間潛在的巨大差距。二〇〇〇年我第一次到新疆時，我對維吾爾人對漢人發表偏見性言論（通常是談論漢人的險惡、軟弱或懦弱的笑話或評論）的急切感到震驚，而且這些發生在我們的第一次會議上。但其中有些言論是為了我而展現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些言論有部分是「作秀」。在那一年的過程中，我了解到這些評論並不是可以用於評估這個人是否主張任何形式的分離主義的可靠指標。

很少有記者能夠像《紐約時報》記者尼可拉斯·克里斯多福（Nicholas

Kristof) 一樣，對自身缺乏對這個議題的認知展現出開放的態度。他在一九九三年這樣寫道：

這樣的種族動亂是否就像我們在全世界所看到的種族緊張局勢（包括美國的情勢）那樣呢？或者他們是否真的這麼深刻地威脅中國在該地區的統治？我們無法判斷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對公眾心態的了解太少，我們甚至不清楚是否大多數人都贊成獨立。

最近，二〇一三年《華盛頓郵報》上的一篇文章，非常明智地回答自己下的一個壞問題：「新疆的維吾爾人想要什麼？」——老實說，「你不能把所有的維吾爾人都綁在一塊兒。」不同的派系有不同的目標，有的要求更公平的待遇，有的想要徹底從中國分裂出去。

如果我們無法衡量維吾爾獨立的支持度，那麼關於中國政府認為新疆部分信仰伊斯蘭教的維吾爾人，比回族族群信仰的伊斯蘭教更需要嚴格監控的議

題呢？自從巴仁抗議事件後，宗教在維吾爾人和政府的關係之間發揮了核心作用，在九一一事件後更是如此，無論是在維吾爾人在反對中國政府時如何界定他們自己（我們將在第四章中談到）這方面，或是中國政府怎樣描述該地區的異議那方面。

可是巴仁事件後（和從那之後的許多次事件後）政府壓制的目標表面看來不是宗教（也就是伊斯蘭教本身），而是「宗教極端主義」。根據新疆伊斯蘭學會的會長阿布杜勒克卜·圖姆尼亞茲的說法：

宗教極端主義與其說是宗教問題，不如說是政治問題，作為邊境地區，來自各族的人民信仰不同的宗教，新疆的很多社會問題是和宗教議題及民族議題糾結在一起的。這就是為什麼恐怖主義者和分離主義者使用宗教極端主義來洗腦人們，並煽動仇恨來實現他們的政治目標。

中國政府很少解釋何謂「宗教極端主義」，儘管這個詞一般被用於指稱瓦

哈比派（Wahhabism）——源自沙烏地阿拉伯的伊斯蘭教保守派——的伊斯蘭信仰。二〇一四年四月，在《中國日報》的一篇文章引述一名負責宗教及民族事務的新疆官員的話：「大多數恐攻襲擊者都看過宗教極端主義的視頻，有些人在襲擊中高喊極端口號，他們已經失掉基本的人性和理性思考。」文章接續道，「努爾·白克力（新疆高級官員）說，極端主義者禁止信徒看電視、聽收音機、閱讀報紙，甚至『禁止他們在婚禮上笑，或是在葬禮上哭。』」

儘管新疆沒有基本教義派的傳統——阿古柏試圖強加類似概念時得到的負面反應可以作為佐證——一般普遍認為一九八〇年代後，新疆的穆斯林（主要是南疆）接受了瓦哈比派的一些元素，我們可以從更多女性披戴面紗、更時興研習阿拉伯文及更多人出席週五祈禱等處中看出這樣的傾向，其中一個原因是巴基斯坦商人和宗教物品大量湧入南疆，及維吾爾人前往巴基斯坦進行貿易和宗教教育。然而我需要在此提醒，這些宗教儀式的轉變可能不是因為轉信瓦哈比教派，而是群眾的宗教虔誠度普遍提升了。

基本教義派的傳入也遭遇一些阻力，一九八〇年代末期，喀什噶爾清真寺

的伊瑪目阿布杜拉·哈米德發起一項宗教改革計畫，試圖引入沙烏地形式的伊斯蘭信仰元素——伊斯蘭法學的罕百里學派（Hanbali school），此一學派有強烈的平等主義色彩，這個特色吸引了許多年輕人，但它並不受喀什噶爾宗教菁英的歡迎，他們認為他的想法是「瓦哈比」。一九九七年政府將阿布杜拉·哈米德免職，他的解職可能是大多數宗教集團的要求（或至少是大多數宗教集團的支持）造成的結果。

然而即使一九八〇年代末期有一些「宗教極端主義」元素傳入新疆，這並不意味就是他們導致巴仁事件或任何維吾爾人及政府當局間的對抗，雖然抗議活動可能包含宗教元素——例如說，高頌口號或使用宗教圖像——並從「正義」的角度來引出合法性，但除了宗教以外還有許多其他因子可能引起異議，如加德納·博文頓（Gardner Bovington）所說的：「維吾爾人常常利用宗教作為媒介來表達廣大的不滿，這或使政府對宗教狂熱的壓制變成更廣大的壓制。」

若說巴仁抗議事件的起因是抗爭者的宗教信仰——無論是不是「極端」宗

教主義——這是忽略了維吾爾族身分的其他特徵：他們和漢族不同的語言、文化及歷史經驗（在這點上，西方媒體的過失是描述維吾爾人時以他們的信仰為主或是只談到維族宗教信仰）。鑒於巴仁的維吾爾族農民和柯爾克孜族農民已經因為對國家有經濟方面的不滿，關閉清真寺可能只是起決定性作用的那道推力而已。

另一個我們要小心處理新疆的宗教與抗議聯繫的理由是，至少在一九八〇年代時，推動民族主義的維吾爾知識份子大多是世俗化的。如我們先前談論過的，文化就如同宗教一樣是表達異議的媒介，因此將這段期間新疆維吾爾族抗議的起因都歸結到同一個理由就不太明智。但一九八〇年代新疆發生的不同事件，則反而可以被視為各自對維吾爾社群共有的不滿與憂慮的響應。

這些議題絕大多數將繼續成為一九九〇年代期間的爭端來源，但這兩個十年之間有幾個關鍵的差異，一個是貧富差距大幅度增加：在大多數地區，多數弱勢族群是維吾爾人，而且造成差距的原因顯然是因為政府的政策；另一個差異是蘇聯解體及隨後形成的民族多數國家，這些國家除了加強他們共同的民族

認同感以外，也將使一些維吾爾人嚮往能擁有更大的自決能力。越來越不公正的感覺，加上許多維吾爾人在追求更大的社會及文化自由的路上受挫，兩者結合後導致漢族和維吾爾族間關係的進一步惡化。

第四章 嚴打與 九〇年代

不要把所有問題都毫無選擇性地視為民族問題，防範人與人間的衝突成為種族衝突。

——〈七號文件〉

一九九三年五月，中國媒體報導，有一萬名群眾「衝入地區政府、鄉鎮政府和學校，毆打幹部 and 教師，砸毀公共和私人財產。」當警方回以催淚瓦斯時，他們甚至挾持某些警察以作為報復。群眾還放火燒警車、恣意搗毀當地領導人的宅邸。

你可能會以為這是發生在一九八九年的烏魯木齊或一九九〇年巴仁的一幕，但事實上這場動亂不是發生在新疆，抗議者也不是維吾爾人，他們是四川省仁壽縣的漢族農民，他們因為自身遭到徵收的許多稅款而憤怒，在某些情況下，稅金高達他們收入的百分之十七·五，而法定上限應該是百分之五。一位居民這麼詮釋這場抗議行動：「我們容忍這些官員侵吞國家資金，但現在他們貪到我們老百姓身上來了，這口氣我們怎麼吞得下去？」

關於農民對國家權威的重大挑戰，國家的回應方式也發人深省，儘管公權力遭到石頭與磚塊的打砸，但只有一些人因為毀損財產而遭到逮捕，當副省長下令將稅金連本帶利退回給農民時，這個爭議獲得解決。

仁壽縣沒有什麼特殊之處，這是一個貧窮的農業縣，那兒的農民有著典型

的民怨：沉重的稅金、農作物配額制度及日益嚴重的勞動力外流。年輕人和中年人離開他們的村莊到城市裡面找薪水較高的工作，這意味著家庭式小耕地能用的人手變少了。而仁壽縣暴徒如一九八九年的回民暴動那樣被從輕發落，這顯示了很多情況下新疆當局嚴厲回應——也就是說，大規模逮捕，或是訴諸致命武力——的原因並非是異議（無論是經濟性質或是宗教性質）。

這項對策的關鍵要素是這些事件是怎樣被建構的。在一九八五年烏魯木齊的學生示威後，官員裁定新疆穩定性的主要威脅來自於「國內外抱持分裂主義的少數民族份子」，而且這成為許多大規模事件的慣用解釋。從那之後，許多發生在新疆，但明顯與中國其他地區有著相似起因的抗議活動，都被當局描繪為「分裂主義」或「恐怖主義」攻擊，雖然我們不能完全撇開部分動亂正是因為這些起因的可能性，但這產生了一個問題：考慮到新疆動亂中的某些例子似乎和中國其他地方的大規模事件很相似，為何中國政府這麼不願意承認還有其他可能導致抗議的原因？

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新疆的戰略價值使得當局提高了安全意識，長

時間的不穩將使任何鄰近的敵對勢力有可趁之機來造成進一步的分裂，儘管在一九六〇年代中蘇交惡之後這可能是個影響要素，但從蘇聯解體以後中國領土完整性就沒怎麼受到威脅了，我們可以從一九九〇年代後駐紮在新疆的解放軍數量很少——中國西北部的軍事中心甚至不在該地區，而在鄰近的甘肅省蘭州市——看出這個事實。

另一個更可能的原因來自於中國在新疆政策的思想基礎。從一九四九年後，政府聲稱國家的主要目標是為了該地區所有民族的利益而發展新疆，正如最近在二〇〇九年白皮書上關於「新疆的發展與進步」所闡述的：

一九四九年以來，特別是在一九七〇年代末期中國的改革與開放後，新疆已經進入了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綜合實力明顯增強、各族群眾得到實惠最多的時期。中國政府從國家發展戰略和各族人民根本利益出發，高度重視新疆的發展和建設，始終把幫助邊疆地區發展經濟、實現共同富裕作為一項基本政策，適時作出一系列推動和促進新疆發展的重大戰略決策。

這樣的觀點構成了對新疆各族人民——特別是對老是被說比漢族還要落後的非漢族民族——的承諾，國家必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民族區域自治法來促進所有民族群體的共同繁榮，對中國政府來說，若承認國家在新疆的政策並未促進不同民族間的平等發展，這將會大大削弱其合法性。

而在一九九〇年代早期，有幾個跡象顯示政府終於開始關注新疆的經濟發展，第八個五年計畫（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五年）明確說明了要在該地區進行更多投資，而這樣的投資主要是因為塔里木盆地發現了新油田，國營企業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派遣一萬名員工到克拉瑪依和庫爾勒開發油田，修築新的公路與鐵路，其中一條是由北到南的主要道路。雖然這些油田即將帶來大量的收入，但因為擁有油田的公司是國營企業，因此油田利潤的更大份額流向中央政府。該地區的另一個主要經濟中心烏魯木齊也繼續快速發展。

當時維吾爾人的主要經濟機會是透過取消許多貿易限制（特別是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限制）而創造出來的，一九九二年，政府宣布新疆「打通戰略通道、拉倒藩籬」，街上懸掛的旗幟這麼說：「讓新疆了解世界；讓世界了解新疆。」

這個措舉的主要目標是蘇聯解體後在中亞新建立的國家，希望貿易、旅遊和聯合投資能夠成為振興新疆經濟的一大推力。

這個政策最初獲得巨大的成功，一九九二年時的邊境貿易額是兩億兩千萬元，和前一年相比增加了三百五十個百分點，許多擁有文化及語言技能的維吾爾人藉由擔任與這些國家貿易的中間人而獲益，雖然之後中亞國家與中國其他地區工廠的直接貿易很快就會大大降低維吾爾人的這些經濟機會，但這段時期依然十分重要，因為它有助於強化許多城市裡面的維吾爾族中產階級，並產生了幾位百萬富豪，例如熱比婭·卡德爾，她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時是中國最富有的人之一。

跨境貿易也使得新疆的維吾爾人，得以與這些國家的親友與貿易夥伴建立（或恢復）關係，使他們有機會看到在新共和國裡面的維吾爾人過著怎樣的生計，無疑地，這些新建立的多數族裔國家距離新疆如此之近，這燃起了維吾爾人對追求更大自主權或獨立建立「維吾爾斯坦」（Uyghuristan，-stan 是源自波斯語的後綴，意為「……聚集的地方」，因此維吾爾斯坦的意思即是維吾

爾人的國家）的渴望。一九九〇年代時，致力推動維吾爾民族主義及維吾爾人權的組織在這些新國家如雨後春筍般地成立，尤其集中在哈薩克共和國和吉爾吉斯共和國，而這些國家大多數是走向世俗化。其中一些組織——如東突厥斯坦聯合革命陣線——主張應該採取更激進的路線來對付中國政府，但沒有證據證明這段期間，該組織或其他組織在維吾爾族與國家間的零星對抗中發揮了作用，這些維吾爾民族主義團體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支持，並讓更多國家了解維吾爾人關切的事。

然而與基礎建設上更大的投資相比，南疆農業相關的投資可說是少得可憐，配額制度還是同樣繁重，許多農民不得不種植棉花，儘管棉花即使可以帶來收入，也是非常微薄的獲益；對許多家庭來說，他們沒有足夠的土地來種植多到可以用超額價格售出的農作物，這個情況使得他們難以獲得現金。大多數農民不得不訴諸於工藝品和其它商品的小買賣，每個星期在市場上販售這些商品，他們還需要付出相當多的時間為諸如修築溝渠和道路之類的公共工程提供免費勞動力。在哈薩克共和國待了幾十年後回到新疆的維吾爾人曾經談到這個

地區的整體貧困，正如肖恩·羅伯茲（Sean Roberts）一九九七年的紀錄片《等待維吾爾斯坦》（*Waiting for Uyghuristan*）中所提到的那樣（這段紀錄片為一九九〇年代中期的喀什噶爾、烏魯木齊及伊寧提供了非常寶貴的紀錄）。

儘管南疆的維吾爾農民過著艱困的生活，但一九九〇年代中期時該區域沒有發生重大的抗議活動，當然也沒有像是仁壽縣那種規模的暴動。然而這並不代表這些社群中沒有怨氣，更可能的情況是在巴仁事件後，政府加強了監視從而防止了任何嚴重的動亂。而南疆的農民使用了中國各地農民採用的策略來對抗農業政策，也就是所謂的「弱者的武器」：偽造生產報告、偷懶、串通起來反抗官員。一九九五年，南疆一個村莊的農民被分配了蠶絲配額，他們必須生產蠶絲並且出售給國家。生產蠶絲是高度勞力密集的工作，而且這些農民之前幾乎沒有受過相關培訓，農民故意把這項工作搞砸，於是他們在隔年沒有被分配到蠶絲配額。

任何政策施行的程度都取決於其實踐，一九九〇年代中期時，新疆東部維吾爾族農民有著和南方的農民所面對的非常不一樣的處境，哈密的農民對於

要種植的農作物及選用的農業技術有更大的自由度，而且他們被要求進行的公共工程要少得多，一年只需要為此勞動三到五天；雖然政府並未說明實施這個更為寬鬆的政策的理由，但新疆東部長期以來在文化上（有時在軍事上）與中國當局更加緊密配合：哈密提供往準噶爾行軍的清軍提供軍隊和補給，並在十七世紀末時成為受清朝保護的領地（官方歷史將這個事件頌揚為現代維吾爾人臣屬中國政府的典範）。更突出的是哈密擁有比南疆更高的漢族比例，而且哈密有更多維吾爾人講漢語，對這個事實的解釋之一是同一個政策在南疆與東新疆有不同的實施方式，因此政府當局正在展現其偏愛——哈密的農民因為更加融入漢族社會而受到獎勵。另一個解釋是新疆東部的政治敏感度要低於南部，因為它並未與外國接壤。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新疆東部要南疆還要來得更繁榮和穩定，吐魯番地區自從「開放」以來幾乎沒有發生暴力事件，吐魯番綠洲的主要農作物——葡萄和其他水果——給農民創造了比作為南方主要支柱的小麥、玉米和棉花等農作物更多的財富。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新疆東部在經濟上非常成功，它吸引了

來自中國內地的移民，其中一些移民來新疆從事低階的工作，例如開鑿水渠、收集並修理舊鞋子，這些工人是中國龐大「流動人口」的一部分，他們為了工作在城市間遷移，通常最終會從事臨時性的、低薪的工作，通常在工地上工。他們的生活條件通常較差，因為戶口註冊在其他地方而導致他們缺乏福利和醫療保健，因此這些移民通常遠不符漢人殖民者的刻板印象，他們多數和維吾爾人關係良好也就不那麼讓人驚訝了，其中有些漢族甚至選擇在清真餐廳舉行他們的婚禮，好讓他們的維吾爾族同事可以前來觀禮，這種相對的民族和諧意味著當局選擇非常溫和的方式來維持該地區的治安。二〇一〇年四月，在前一年的烏魯木齊暴亂事件後，當時新疆的許多城市仍有龐大而明顯的保安陣仗，但吐魯番可說幾乎沒有任何警察或軍隊在巡邏。

吐魯番和哈密的經濟狀況表明了當我們在概括新疆維吾爾人的民怨時是需要小心謹慎的，雖然有一些政策會影響新疆所有的維吾爾人（和其他非漢族的民族），例如教育及家庭計畫，但其他區域性的差異會導致截然不同的結果，對「管理」宗教的政策來說也是如此——近年來，喀什噶爾和其他南方城

鎮所實施的管理方式也比在烏魯木齊更加嚴格。

被砸掉的鐵飯碗

但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生活條件最大的懸殊差異不是出現在不同的維吾爾社群間，綜觀中國，東部沿海工廠帶動的經濟繁榮正在擴大城鄉之間的差距，到一九九五年時，農村的年平均收入已經不到城市居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在新疆，城鄉差距高於全國平均水準，在維吾爾人佔多數的西南區域是差距最大的，新疆極端貧困的二十個官方區域中，有十三個區域是維吾爾人佔人口數超過百分之九十的區域。由於醫療設施較為低劣，喀什噶爾的死亡率是克拉瑪依（一個以石油收益為基礎的城鎮，人口多為漢族）死亡率的六倍高。

這種城鄉差距部分肇因於政府推動整個國家的都市化進程（如今這樣的趨勢還在持續，目前繼續推動都市化進程的理由和當時一樣，認為越多人住

在城市裡面，對經濟越好），但新疆的特殊情況（有更多的投資注入城市裡面），加上新漢族移民傾向住在城市裡，意味著新疆的都市化率恰恰超過百分之五十，這樣的水準，即使把中國視為一個整體，就算花十年以上也無法趕上，這無疑擴大了以維吾爾族為主的農村，和以漢族為主的城市間的差距；但還有其他許多絕對及相對的因素導致許多維吾爾人的貧困化。

其中一個因素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復甦，他們的列隊在一九九〇年代開始再次增加，來自中國內地的移民導致新疆人口在十年內增長三分之一，這是該國任何省份中成長最快的，然而在這樣增長的人潮中有幾個要素已經和過往的遷移浪潮不同了。一九九〇年代的移民是基於自身的意志而來到新疆，儘管很多情況下他們的意志來自於國家提供的獎勵措施，例如豁免兩年的土地租金；另一個差異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開始往南疆進一步擴張，使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主要是沙漠化與缺水）更為嚴重（南疆主要的河流之一塔里木河已經因為擴大灌溉以種植棉花的關係而嚴重枯竭）。儘管這個方針不受當地農民歡迎，但當局仍計畫將更多的人帶到南疆，一九九二年，政府宣布土地即將

被龐大的三峽大壩工程所淹沒的十萬名居民，會被重新安置在喀什，這個計畫在面臨國內外重大的反彈後才遭到取消。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復甦，完全是對新疆的特定政策帶來的結果——就算用最好的情況考量這件事，兵團復甦對維吾爾農民造成負面影響也是歸因為新疆省政府的缺乏遠見。另一個讓維吾爾人及非漢族人民特別陷入窮困的主要因子在第一眼看來沒那麼該受譴責，因為這個因子是源自於國家政策，在毛澤東時代，大多數中國公民依賴國家來滿足他們的住房、就業及健康需求，這樣的安排被稱為「鐵飯碗」，人們在提供所有需求的「單位」中生活，從許多方面看來，因為這樣的單位複製了中國社會的基本層級制度，這就是一個微縮的中國社會：無論這樣的單位是學校、醫院或工廠，共產黨官員總會是最高領導人。

在一九八〇年代更自由的經濟環境下，為國有企業工作是不可能致富的，但至少國有企業提供一份安全無憂的收入，或者至少民眾是認為那是一份摔不壞的鐵飯碗。問題在於大部分的國有企業效率低到沒辦法與新的私人企業競

爭，到了一九九四年時，大多數的國有企業遭受的損失大到唯一的選擇是關閉國有企業，根據中國勞動與社會保障部的資料，在接下來的十年中有兩千一百萬名工人遭到解僱，而且因為這個問題的敏感性，遭解僱的人數可能被大量低估——國有企業的關閉引發全國各地的抗議——但就算接受這個數字吧，這個改變的規模對中國社會造成的影響依然是十分巨大的，這段期間國有企業雇用的勞動力比例下降超過百分之五十——一九九五年到二〇〇〇年期間，單單新疆的國有部門就失去六十萬個就業機會。同一時間私人企業擴張了，一九九六年時中國工業的就業機會有百分之十七是私人企業提供的，但了二〇〇一年時，私人企業提供的工作比例已經增加為百分之四十四。

國有企業的關閉潮及因此帶來的失業潮，導致中國各地的社會和經濟問題，但在新疆，這樣的關閉潮對非漢族民族帶來最大的傷害，這是因為先前的優惠政策讓他們更容易在國營單位中工作，而且大多數國營單位也提供少數民族保障名額，因此他們在國營單位中的人數佔多數，直到一九九〇年末期時，高等教育幾乎是保證維吾爾人獲得工作機會的途徑，政府這樣的優惠性差別待

遇肯定能夠幫助消弭漢族和少數民族間的收入差距（儘管我們也可以說這是贊同漢人大家長式的想法——「『先進』種族幫助『落後』少數族群」——的代價），但同時這樣的優惠政策也意味著國有企業的倒閉最終使得最多的維吾爾族遭到解僱。

雖然說起來有些違反直覺，但進一步加劇這個趨勢的是——新疆的國有企業改革實際上並沒有中國其他省份改變那麼大。許多行業並未受到市場力量（market forces）的影響，尤其是採礦業和其他採掘業，但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國家維持壟斷（那些產業已經成為新疆經濟中最賺錢的部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組織存續的決定並未涉及商業因素，在許多方面兵團是該地區最大的國有企業，而如果我們從純粹經濟的角度來看，兵團隨時都有可能崩解成更小的單位，就像中國其他地區的農村社群所發生的那樣：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效率低到百分之八十的資金仰賴政府補貼，而因為這是長久以來的慣例，因此我們可以認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存在價值在於促進「穩定」的作用；雖然就維穩這點來說，由於未能給維吾爾人提供就業機會，兵團在新疆資源的主導地位

帶來了反效果。但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並未完全豁免於改革，一九九五年到二〇〇〇年期間，兵團中約有十四萬名工人遭到解僱。

一九九〇年代，新疆的兵團及採掘業最顯著的特色是儘管它們都是國有企業，但它們並未提供少數民族就業配額，兵團九成以上是漢人，即使是兵團每年從新疆以外僱來採摘棉花的季節性勞工也大多數是漢人；而石油產業的情況也沒比較好：塔里木盆地的兩萬名工人中，只有非常少量的工人不是漢人，因此，國家在新疆的農業和工業部門上維持壟斷，而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成員幾乎完全被排除在兵團及石油產業之外。

大多數維吾爾人唯一的機會是在私人產業就職或是自己做生意，不幸的是，私人產業沒有優先聘用政策，這也代表著（以漢族為主的）雇主沒有義務聘請通常說不好漢語、或是因為難以接受教育所以在某些情況下不太符合資格的少數民族。大多數維吾爾人所缺乏的另一個能力是社會關係，而在中國，無論是商業交易、醫療問題或是讓孩子進入一所好學校，都要靠「關係」才行。那些獲得工作的少數民族往往只能得到體力勞動、低薪的工作，而技術性質、

薪資優渥的管理職則以漢族為主。

一些維吾爾人被迫去哈薩克共和國工作（羅伯茲的紀錄片《等待維吾爾斯坦》特別介紹了幾位這樣的工人）。維吾爾人面臨的困境和大多數被解雇的兵團工人更從容的處境（他們多數能在私人企業中找到工作或是自行創業）是值得我們加以比較一番的——到了二〇〇〇年時，百分之十三的兵團勞動力是自營業者。

然而也有一些維吾爾人並沒有語言障礙，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新疆有兩個並列的教育體系，一個是以普通話上課的課程，而另一個則以該地區的主要少數民族語言授課，大多數維吾爾族學生和非漢族學生都就讀少數民族語言學校，這些學生被稱為「民考民」（少數民族學生在參加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統一招生考試時使用本民族文字答卷）；但有一些被稱為民考漢（少數民族學生在參加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統一招生考試時使用漢文答卷）的學生——特別是在烏魯木齊這種以漢族為主的城市中——他們的父母預見到中文流利的優勢而送他們的孩子就讀漢語學校。而民考民學生需要在大學時多讀一年，為大多

數的科目提升他們的中文程度，這進一步激勵少數民族父母送他們的孩子就讀中文學校；一九九〇年時的平均學費是每年一百二十元，增加的負擔並不那麼令人卻步，但一旦教育受到市場力量的影響而使費用大幅上漲（到了二〇〇〇年時平均學費是每年四千五百元），對許多維吾爾父母來說，多讀一年的價格是過於高昂了。

維吾爾人較高的失業率造成了不公平感，而國營企業和私人企業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只是讓他們更覺得自己遭到歧視；另一方面，政府鼓勵幹部和軍隊從事私人企業的做法創造了貪腐的空間，這通常跟使用國家的權限（和資源）來獲得不公平的業務優勢有關，通常是經由昂貴的飯菜、大量喝酒、唱卡拉OK或上妓院——這些活動是中國有錢有勢者的社會關係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也有明目張膽的貪腐事件，一九九六年時新疆西北部沙灣縣的官員被發現他們為了一己私利徵收了哈薩克族牧民的五百三十公頃土地作為農地使用，而且——好像他們這麼做還不夠惡劣——他們由於身為政府雇員而被授予種子、

肥料及灌溉設備的特權。

毫無疑問地，國有企業的改革在經濟上是必要的，但很難相信省政府或中央政府沒有考慮到這樣的改革對少數民族出身的人帶來特別的傷害，畢竟少數民族的相對弱勢已經由就業及其他領域的優惠政策中得到官方承認。立法要求私人公司採取某種形式的優惠聘用政策至少可說是正視這個問題，然而政府什麼也沒做，而且從一九九〇年代中期開始北疆及南疆的維吾爾社群失業率都開始大幅上升。

整個一九九〇年代的新疆經濟在紙面上持續改善，因此到了二〇〇〇年時新疆已經是所有非沿海省份中擁有最高區域生產總值的省份，甚至官方統計也顯示這幅美景掩蓋了不同區域間繁榮程度的巨大差距。擁有高區域生產總值的重要都市——烏魯木齊、庫爾勒、克拉瑪依——都明顯以漢人為多數，而前述這些都市中少數族裔出身的人數與其繁榮程度是不成比例的。在這時候，如果政府可以回想一九八〇年代時，一些中國經濟學家對於發展不平均造成的不穩定風險所提出的警告，那麼他們應該可以處理得更好。

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處於相對貧窮的處境，而同時開採新疆自然資源的收益正在推動北方基礎設施和漢族佔多數的大城市發展（或回流給中央政府），這顯然違反了當初政府稱將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發展新疆的承諾。毫不出奇的，這並不能幫助改善維吾爾族和漢族之間的關係，雖然人們傾向以極度無情可怕的方式描述這些社群之間的關係——自一九九〇年代的南斯拉夫戰爭後，另一例就經常被引用的「古老民族仇恨」說法——但在新疆的一些地區，族群之間已經進入和解的階段，除了一九八〇年代吐魯番漢族及維吾爾族間的社交報導以外，一些烏魯木齊的維吾爾人顯然在中國新年期間拜訪了他們的漢族同事。

因此一九九〇年代漢族和維吾爾族關係的下降，應該是肇因於推動新疆不平衡發展的政策轉變，而來自中國內地的定居者湧入新疆又持續惡化維族和漢族之間的關係。學者邁克爾·狄龍（Michael Dillon）認為民族關係的衰退導致政治暴力激增，而且這樣的暴力在這十年中「變得更加劇烈而組織化」，為了支持這個說法，他提出一份不同地點所發生的事件清單，包括一九九二年初

發生的一連串爆炸事件及一九九三年夏天的暗殺企圖。當我們閱讀到這一連串槍戰、爆炸和射殺事件時，難免會認為那段時期的新疆肯定是「動蕩」而「不穩定」的地區。顯然這些嚴重的公共安全干擾是政府當局非常關切的問題，目前我們尚不清楚這些事件之間在動機上或計畫參與上是否相關，除非我們可以證明這點；否則我們很難主張這些事件代表暴力事件的升級，或是我們認為它們全部都發生在新疆這個事實本身就是充份的證據。我們沒辦法透過稱不上公正的資訊來源（如維吾爾流亡組織、中國政府或有強烈反中偏見的香港報紙）深入了解這些事件，可疑的報導在經過統整後不見得會變得更為合理。

我們也很難使用單一的、極端的行為來作為普遍性的民族關係指標，至少在肇事者或更廣大的維吾爾社群的動機與不滿上，我們不能不去做各種假設。也許更好的方式是去檢視那段時期新疆的日常生活模式，以及許多維吾爾人表現的各種態度。

不同的世界

對一九九〇年代大多數的新疆訪客來說，漢族和維吾爾族之間的隔離程度是顯而易見的，從最基本的角度來看，這是空間上的隔離：在大多數的城鎮或城市裡面，這兩個族群可說幾乎住在不同的區域，主要住著漢族的區域通常有著現代化的住宅建築，一般是四層樓或五層樓的公寓樓房；然而以維吾爾族為主區域裡，維族家庭傾向於居住在建在被圍牆圍繞的庭園中的單層樓磚房或土坯房中，這些不同的街區有它們各自的商店、市場和餐廳，主要的顧客是當地居民，當我們穿梭在這些有其獨特語言和文化特質的不同街區時，我們可能會覺得自己像是迷失了方向、意外踏入了不同的世界之中。

在某種程度上，這樣的分隔是因為大多數的漢族是近年來到新疆、相對上的新移民，而新住所是為了這些人而建立的；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的飲食禁忌使他們不在非清真餐廳及中國人的家裡用餐，而在新疆的學校及大學中也複製了這樣的分隔。但漢族和維吾爾族是能住在同一棟公寓大樓中的，在如國家

機構如學校、醫院及大學中所提供的住宿區域中就可以看到類似的情形。

民族關係真正惡化的跡象是，在許多城市中，這些社群之間開始了社會隔離（social separation），來自不同民族的年輕人很少約會，更不用說通婚了，即使是在某個時期曾經有該地區最高民族融合性的城市烏魯木齊，跨民族的約會可能帶來比「不贊同」還要嚴重得多的後果，一名有漢族男友的維吾爾女孩這樣告訴採訪她的人：

我們連要一起去什麼地方都很難，如果其他維吾爾人在公共場所看到我們走在一塊，他們會找我們麻煩。如果維吾爾男人看到我們一起搭公車，他們會咒罵我們並且毆打我們；維吾爾女性對我們的態度沒糟到那個程度，但她們還是會評論我們。

人際關係不是烏魯木齊的維吾爾人試圖捍衛的唯一邊界，食物以文化標誌的形式被賦予額外的意義，超出了既存的清真需求。對某些維吾爾人來說，食

物是否「潔淨」的概念已經轉移為不僅強調食物是否以被認可的方式製備，還包括食物是否曾經接觸過任何漢族，這使得一些人開始避開回族經營的餐館，即使它們是清真餐館，要嘛是因為他們有時有漢族顧客，或者因為回族更可能和漢人做生意。部分維吾爾族輕蔑的稱回族為「西瓜」——披著綠色（穆斯林）的外皮，但裡頭裹著的是紅色（共產黨）的果肉。

還有一些傳聞說漢族試圖污染維吾爾人的食物，甚至繪聲繪影的說他們將豬油添入水中，在一位商人聲稱他去過中國製茶的地方，並發現「他們讓豬踩过茶葉，而且那邊很髒」後，磚茶變成維吾爾人大規模抵制的焦點，這使得許多人改喝印度產的茶。我們可以將這個故事及迴避回族餐廳的情形，視為一些維吾爾人試圖要凸顯自身與漢族人的差異，為此許多維吾爾人開始著重於使用新疆時間，並以此作為拒絕中國統治的方式、及強調維族和大多在私人生活中使用北京時間漢族之間的區隔（對於長時間居住在新疆的漢族而言，這麼說是不太正確的）。

宗教信仰對維吾爾人的重要性與漢族被普遍認為是無神論的相對性，也

是經常被強調的另一個差異，在新疆的許多地方，這導致清真寺的參拜人數激增，並使他們更加重視於齋月期間禁食的重要性和戒酒，以及激勵男人蓄鬍及配戴頭蓋帽；而另一種帽子——朵帕花帽——的配戴也成為維吾爾人維護他們民族上和區域上身分特性的一種方式（伊寧、和田和喀什噶爾有不同的朵帕花帽）。

使用維吾爾語也成為一種用來表達身分認同的方式，而且越來越重要，特別是鑒於這個語言在就業及高等教育方面日益遭到邊緣化的情況。民考漢維吾爾人的維吾爾語沒那麼流利（特別是在閱讀或寫作上）成為一個爭議性問題，一些維吾爾人開始譏刺這些民考漢學生為「第十四支少數民族」，這意味著對維吾爾語掌握不佳代表他們不配隸屬於他們的實際族群，一些民考漢學生因此被孤立了，因為漢族和其他維吾爾族都不願意接受他們。

維吾爾身分認同的鞏固也強化了許多社群內既有的分歧，在定義維吾爾族身份特徵時強調信仰、語言和飲食為中心的價值，也就意味著任何不符合這些標準的維吾爾人也必須遭到譴責，在二〇〇〇年代初期的伊寧，那些認為自己

是「好穆斯林」的維吾爾人和那些被視為「壞穆斯林」的維吾爾人間有著明顯的社會分化，前者常拒絕參加「壞穆斯林」的婚禮，因為他們說婚宴上會有酒精和舞蹈。

一些維吾爾人試圖區隔自己和漢族，並描繪出不適宜的比較來試圖加強「維吾爾人」的含義，但漢族和維吾爾族之間的分離並不是絕對的，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和中期，來自這些族群的人在部分日常生活中仍然有著交集，例如打撞球或是去同一個舞廳。工作領域也是界線沒那麼分明的主要領域，許多維吾爾人仍然為國家工作，包括警方內部、司法部門及其他安全部門。企業家之間也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包括烏魯木齊在內的許多城市裡面，賣烤肉（kebab）的維吾爾小販在漢族經營的餐館（因此是「不潔淨的」）外擺攤販售是非常常見的，這些餐廳鼓勵小販來擺攤，而作為回報，餐廳的漢族管理者允許顧客跟小販訂購烤肉串並帶到餐廳裡面享用。

用以詮釋這件事的方法之一是維吾爾人願意在對他們有利時變通原則，但人們對「我是誰」的知覺遠比他們的族裔身份更加多樣化，這包括他們的性

別、年齡、職業、社交階層及他們的出身，所有這些條件都可以影響特定情況下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比起他們試著用類似的手段營生，不同的族裔出身就顯得不那麼重要了。還有民族學上的證據表明許多維吾爾人的身分認同感仍然主要源自於一種當地社群的意識，而不是源自任何種族／民族的認同感，賈斯汀·魯德爾森（Justin Jon Rudelson）的《綠洲認同：中國絲路上的維吾爾民族主義》（*Oasis Identities: Uyghur Nationalism along China's Silk Road*）提供了吐魯番豐富的生活肖像，同時傑·多徹（Jay Daatcher）的《一條窄路：中國新疆維吾爾社群的身分認同及男性氣質》（*Down a Narrow Road: Identity and Masculinity in a Uyghur Community in Xinjiang China*）談到了伊寧的生活，若要了解當時的許多維吾爾人過著什麼樣的普通生活，這可能是最好的一本書了。在今日的新疆，綠洲之間的長期競爭（通常體現在笑話及奚落中）依然和一九九六年時一樣鮮明，當時多徹在伊寧聽到人們這麼侮辱喀什噶爾人：

你們喀什人是傻子

現在已經入春了

扔掉你的皮涼鞋

給自己造個鼓吧

維吾爾人對漢人的敵意，明白地顯示在他們廣泛使用對漢人的負面刻板印象（以及他們使用貶義詞 *xitay* 來稱呼漢人的行為）中，這些負面刻板印象幾乎涵蓋了漢族身體上及心理特徵的每個面向，無論是身體、臉孔，以及被視為缺乏力量、懦弱、背叛、寄生天性及缺乏文化（許多漢族也對維吾爾族有類似的不滿意見）。二〇〇一年時我在伊寧擔任英語教師，我發現許多維吾爾人是如此熱衷於強調這些差異，甚至強調到會在不太相關的對話中提起這些刻板印象，當我被介紹給在市場上販售皮具的兩個維吾爾人後，其中一個說：「許多漢人吃東西時會發出聲音欸！」對方笑了起來並回說：「那是他們在說話啦！」另一次是我問一個青少女是否有漢族住在附近，她這麼回答我：「沒

有喔，有的話你可以聞到他們。」當我問他們聞到什麼時，她告訴我：「香料，大多是辣椒。」據推測是某些中國食物使用了比較多的辣椒。

即使是在正式的書寫練習上，維吾爾學生也會寫下這樣的句子：「並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小鼻子小眼睛，但這很普遍。你可以找到一些漂亮的中國人，但他們數量稀少，你得多注意才能找到他們。」這些負面的刻板印象讓一些維吾爾人可以在他們沒什麼權力的某些情況下得到一種掌控感，也為挫折和敵意提供一個沒有嚴重風險的發洩管道。

另一個出口

維吾爾人也能在文化領域上尋求出口，特別是透過音樂；音樂比印刷或廣播媒體更難受到規範，部分原因是因為政府當局難以理解歌詞的潛在意義，但也因為主要的傳播形式——音樂卡帶——非常容易流通，其中一些歌曲使用

傳統的民間音樂風格但配上當代歌詞，而其他一些歌曲則使用流行音樂風格或搖滾風格。倫敦的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的民族音樂學家瑞秋·哈里斯（Rachel Harris）說，這些流行歌曲很多都受到不同音樂文化的影響，例如土耳其、中亞各國、印度和西班牙，這些證明了新疆的音樂舞台是豐富而全球導向的。

但擁有最大影響力的也許是民歌，民歌特別具影響力的原因是：人們不需要任何程度的識字能力就能理解它們——對新疆的農民或烏魯木齊的知識份子來說，他們理解民歌的程度並無分別。這些民歌也和那些被國家認可的新疆維吾爾音樂家的作品（許多是用中文唱的）相去甚遠（那些像是「我們的新疆是最美麗的地方」或「請嚐一塊哈密瓜」或「哦！香噴噴的羔羊肉串」等歌曲總是將新疆傳頌為一個資源豐富、安全而多采多姿的地方）。新民歌很少表達直接的政治言論，它們的內容通常是諷喻或含糊的。

這並不代表政府當局採取寬鬆的態度，克拉什·庫桑是一九八〇年代和一九九〇年代早期新疆最著名的歌手之一，他在發表一首名為《不要出賣你的土地》的歌曲後，他的音樂遭禁，隨後他被監禁了九個月，最後不得不逃離該

國；一些歌詞同樣具有煽動性的維吾爾音樂家像是阿斯卡（「灰狼」）搬到地方政府不太關心他們作品內容的地方（如北京或新疆以外的城市）以免除這樣的命運，但在一九九五年後只有國有唱片公司（它們更密切留意抒情內容）才能發行維吾爾語音樂後，這樣的方式也行不通了。

儘管政府加強審查，但盜版音樂卡帶仍然是蓬勃發展的交易市場，其中最受歡迎的是來自伊寧的奧馬爾江·阿里姆的全集，他的歌《我帶了個客人回家》（Mehman Bashidim）被許多維吾爾人詮釋為批判漢族殖民定居帶來的剝奪：

我帶了個客人回我家

在他身後放了個坐墊

而現在我已經無法進入

我用雙手親自建造的房子裡面

後面的歌詞談到「更多的客人」：「他們佈滿那塊土地，砍掉了整個樹枝，把果實都摘走了。」這首歌最後以客人們怎樣「跳進主座、成了我們的主人，成了我們的主人。」作結。

阿里姆的歌除了批判中國政策以外還有其他潛藏的訊息，還有一些歌是針對維吾爾官員的勾結與腐敗，一些維吾爾人因為過於親政府而被視為「叛徒」，這確實解釋了一九九六年一些政府官員遭到殺害及同月份發生在喀什噶爾大清真寺伊瑪目的謀殺事件（二〇一四年時這些事情會再度上演）。然而鑒於沒有人聲稱為這兩起事件負責，這樣的推論不該被視為確鑿的解釋。中國的官員，無論是世俗的官員或宗教的官員都很可能因為各式各樣的原因而不受人歡迎，而且原因可能和他們的民族或政治觀點無關。

另一首歌感嘆維吾爾人彼此間的冷漠與內鬨顯然正加快他們的衰弱：

我們已經沒有走在寬廣大道的空間了

我們急忙走進狹窄的小巷

互相設陷阱讓對方摔倒

這類型的自我批判在維吾爾知識份子中依然非常普遍，其中一些人譴責維吾爾社會的保守（宗教）份子阻礙發展——隱含其中的概念是，一個更加發達而統一的區域可能可以免於被清朝或共產黨征服的命運。

在一定程度上，這種蓄意的分隔和習以為常的偏見，確實有助於維吾爾人團結起來；但這樣的團結需要付出很高的代價，加強了新疆的漢族和維吾爾族社群之間既存的誤解及互相忽視，並在某些情況下導致暴力。一九九五年，和田有一群人在祈禱後湧出清真寺，阻礙了交通。當警方試圖整頓交通時，某些人誤解警方的行為是試圖逮捕清真寺中的伊瑪目，於是一場動亂爆發並導致許多人傷亡，現場的影片錄像顯示了街上的人潮，其中一些人在扔石頭。中國政府現在將這個事件描述為一場「恐怖」攻擊，儘管根本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這是有預謀的。

漢族和維吾爾族間仇恨所帶來的長期後果更為嚴重：仇恨政府與仇恨漢

人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整個一九八〇年代到一九九〇年代，大多數的暴力事件是針對國家及其代表，但演變到普通的漢族平民也成為目標只是時間問題而已（就像二〇〇九年烏魯木齊暴動所發生的那樣）。

一九九〇年代維吾爾人身分認同的提升也激起獨立的慾望，尤其是在年輕的維吾爾人當中（儘管我們並不清楚希望獨立的維吾爾人佔多少比例）。維吾爾人也常常希望外部力量攻擊並擊敗中國，並使他們的同胞獲得自由，在一九九七年之前他們期待的外部勢力是英國，有些維吾爾人認為那一年英國必須交還香港，為了維持對香港的主權，英國必定會攻打中國。在九一一恐怖攻擊後，伊寧的一些維吾爾人告訴我：他們希望九一一事件是中國挑起的，這樣美國才會入侵中國。要駁回這些荒謬的希望是相當容易的，但這些荒誕的希望顯示出許多維吾爾人心中的絕望。

逃避的方法

年輕的維吾爾人普遍有失業及貧窮的問題，這導致許多人開始酗酒及嗑藥，北方世俗城市如烏魯木齊和伊寧的情形更為嚴重；南疆對酒及毒品的宗教禁令限制了他們的濫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的伊寧，許多維吾爾男性每週聚會至少一次，在彼此分享笑話、故事、詩歌和音樂的狂歡派對上縱飲，直到所有人都爛醉如泥；鴉片和大麻可能也構成這些夜晚的一部分，在「開放」後，中國的海洛因變得更容易取得——尤其是跨越緬甸和雲南省之間的邊境，也有一些來自阿富汗。一九九三年烏魯木齊市中心也販售鴉片製劑——晚上會有年輕男子在熱比婭·卡德爾的百貨公司附近賣鴉片。

那時候吸毒或酗酒者沒多少醫療方式可選擇，雖然中國法律規定要讓吸毒者「康復」，但實際上吸毒者能得到的只比被關起來好一些而已，在這樣的地方幾乎不存在醫療這回事，除了必須在毫無協助的情況下（直到二〇〇四年以後國營診所才提供美沙酮）戒毒，被拘留者還必須進行被稱為「勞動教養」

的無薪工作，有時在惡劣的情況下被拘留者一天的工作時數長達十八小時。

新疆確實有私人診所——一些診所還在伊寧到烏魯木齊間公路上的廣告牌上打廣告——但也只是好一些而已，這些診所所收費非常高昂，而且他們的戒毒方法主要是讓成癮者不依靠藥物硬性戒毒，而這些診所必須提供病人名單給警方，這提供了額外的威懾力，雖然這不會自動導致刑事責任，但可能會有成為「重點人口」——登記為犯罪份子、妓女和異議人士的「特殊人群」——的風險，登錄為重點人口可能會使當事人更難找到工作或住房，並導致行動自由上的限制。

有鑑於私人部門的局限性，維吾爾社群沒多少選擇，只能試圖自行解決毒品問題。一九九四年時伊寧一群知識份子和宗教學生使一種傳統，麥西來普（mashrap）復興，這是一種舊式的社交聚會，著重於讓老一輩傳播社會、道德及文化教育給年輕一輩。雖然麥西來普在一九四〇年代及一九五〇年代時在該地區非常流行，但一九七〇年代時這個「落後」的傳統習俗遭到禁止。一場典型的麥西來普歷時約四小時，第一個小時是吃喝及非正式的談話，第二個小

時用於分享酒精和毒品問題的訊息，其中往往會有一個「審判」，其中一個參與者將面對最近一些「罪行」。社會人類學家肖恩·羅伯茲描述一個年輕人阿布杜拉被指控於前一週的生日聚會上喝伏特加的場景：

阿布杜拉試著用同儕壓力作為藉口來獲得同情但卻徒勞無功，他顯得非常尷尬。法官解釋說喝酒有害健康，也浪費了給家人吃飯穿衣的金錢。此外，這種事情是被禁止的，參與這類活動有違穆斯林順服真主的行事。

這些「罪行」遭到幽默的懲罰，阿布杜拉受到的處罰是「去湖邊釣魚」，這個處罰方式要求阿布杜拉將手反在背後，用嘴巴將糖果從一盆水中取出來。羅伯茲描述了他「如何將臉浸入水中，房間裡面的所有人都笑了出來。」每當他們幫阿布杜拉擦臉時，他們問他現在還想不想喝伏特加。其他的懲罰方式包括「拍照」，受處罰者要張開雙臂貼牆站著，其他人潑一桶水在他身上，在牆上留下他的外型輪廓。而掌摑兩邊面頰的處罰被稱為「給個烤糰子」，這是參

考將未烤過的生麵糰拍打到陶土烤爐壁上的處罰方式。這些讓人困窘的處罰方式是為了讓「罪人」宣布不再犯並承諾會好好表現，並勸阻他人犯下類似的「罪行」，但為了維持「懲罰」的輕鬆性質，麥西來普也常常是謎語、笑話、詩歌朗誦及音樂的討論會，這些活動佔據剩下的兩個小時。

到了一九九五年夏天，復興的麥西來普變得非常流行，約有一萬名男子參加麥西來普，並已經遠傳到烏魯木齊、喀什噶爾及哈薩克共和國的阿拉木圖。雖然不是所有人都認同麥西來普的宗教內容，但維吾爾社群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廣泛支持他們處理一些可怕的社會問題，而且在最初時麥西來普獲得市政府的同意，也得到城裡幾個文化機構的支持（這些文化機構為伊寧周圍的村莊之一，卡佩庫習的圖書館捐贈物資）。

後來當局改變想法，似乎是因為伊寧一些麥西來普組織發起抵制賣酒商店的運動，事實證明這非常有效，一些當地商店因為害怕遭到報復而停止賣酒。當伊犁地區的麥西來普隨後選出領導人——阿布杜勒海爾，一位擁有三個孩子的二十八歲商人——政府當局很快地傳喚他並訊問他和其他人。一九九五年七

月，政府當局譴責麥西來普為分裂主義思想及「非法宗教運動」的溫床，並禁止這類聚會。即使沒有宗教因素，政府也肯定會頒布禁令：中國政府從未忌諱扼殺任何被政府視為威脅的公民社會表現形式，無論是民間環保組織、法律改革活動者或勞權組織。當局也懷疑麥西來普強化了民族分界，並促進年輕維吾爾人之間的交誼與往來（而這不是政府普遍偏愛的那種「民族團結」）。

最初這個禁令除了小額罰款以外並未嚴格執行，雖然這使得一些麥西來普轉入地下活動，但還不足以阻止某些人在一九九五年八月中旬主辦「第一屆麥西來普青年足球大賽」。足球在新疆十分受到歡迎，許多麥西來普已經組成球隊以鼓勵年輕人擁有更健康的休閒活動，但是當組織者向政府當局申請許可（任何在中國的大型聚會都需要申請許可）時，他們被要求繳交巨額管理費：五萬元。雖然主辦方設法籌措了費用，但之後他們被要求支付額外的、更高昂的費用，主辦方付不起這筆錢，但表示他們可以透過售票來籌款，但當局對此的回應是完全拒絕許可，為了確保活動無法進行，他們甚至做到這種地步——移除大足球場及當地學校的球門，在計畫競賽當天於預定的足球場安置坦克。

這番炫示武力成功地阻止足球比賽進行，卻激起了更進一步的反對。兩天後，約有一千名維吾爾人聚集在伊寧最重要的廣場進行抗議，但當局事先就接獲線報並且做了充足準備，狙擊手被配置在周圍建築物的屋頂上，許多街道放置了阻路的鐵絲網，士兵裝備攻擊性武器或在裝甲車內巡邏，儘管新疆有許多這樣的對抗都走到最糟的結果，但那次抗議活動在只有少數人被捕的情況下落幕。

麥西來普繼續秘密行動，在政府發起「嚴打高壓」打擊犯罪運動後甚至需要更多麥西來普聚會，政府的嚴厲打擊大大降低了海洛因的數量，卻使許多吸毒者從吞雲吐霧轉向更有效率的注射法，鑒於共用針頭十分普遍，愛滋病病毒在新疆的吸毒者之間迅速蔓延，其中百分之八十五是二十歲到四十歲的維吾爾男子。根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數據，靜脈注射吸毒者中愛滋病毒感染率最高的是烏魯木齊（百分之四十）和伊寧（百分之八十五），愛滋病毒很快就透過賣淫蔓延到非用藥人群之中，特別是因為缺乏性健康教育。即使是在這個領域依然出現顯著的民族不平等，在阿克蘇，當地政府僅向外來的健康性工

作者提供以中文印製的衛教傳單，而非以維吾爾文印製，並建議工人們避開顯然並不安全的維吾爾區妓院。

到了二〇〇〇年時，新疆的愛滋病感染者數量佔據中國愛滋病感染者數量的百分之十，鑒於新疆人口較少，這是非常大的不成比例，這可能是用來解釋新疆維吾爾人境遇艱難的圖表中最新穎的一幅，當局顯然需要徹底重新評估政策，不僅是經濟與健康方面，也包括教育及宗教管理方面。

不幸的是，政府有其他的優先考慮事項。

兩張面孔

自從「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對新疆的態度一直擺出「雙面神」(Janus，又譯為雅努斯，羅馬神話中的門神)的面孔，一方面它提供了經濟發展作為紅蘿蔔，並提出這麼做的明確理由，說經濟增長會自動促進社會穩定，這不是

個壞假設：一個能夠為大多數公民提供工作及足夠的教育和醫療保健機會的政府通常不會面臨實質的反對，即使公民的其他「自由」遭到剝奪（中國政府就是個出類拔萃的範例）；然而即使新疆各族人民的平等利益這個目標已經實現，還是會有異議者。正如中國學者曹滬華所說的，「經濟增長不能保證弱勢民族擁有發展他們的才能的自由，或是無論其身份或社會地位為何都能擁有社會和政治權利的自由。」

中國在新疆政策的另一副面孔，特別是在一九九〇年代以後，一直是專注於「安全」。一方面來說這很容易理解——新疆的確有著長而容易滲透的邊界，而且與其接壤的一些國家如阿富汗、塔吉克和巴基斯坦在近年來經歷了相當長時間的不穩定時期，基於這些理由發展該地區的軍事能力和維安能力當然是有道理的，造成更為嚴重問題的是國家對「內部安全」威脅的態度，這些政策在維吾爾人之間挑起的怨恨，意味著新疆的問題不能簡單的歸結為經濟問題。

一九九六年三月，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國七位最有權勢的人進行的會議——期間明確闡述了國家的目標，針對新疆議題召開一場

特別會議後，會議紀錄被送至地區政府，實際上這等同於中央給地方政府下指示。就如同大多數政治局的工作內容一樣，這樣的指示通常是高度機密，但在這個罕見的例子中指示內容被洩露出來，「七號文件」（它有個令人費解的稱呼）的主要目標是「預見可能的危險」及「在洪水到來前修築堤防」，文件中的一些籠統的指令聽起來極合情理：

解決發生在民族之間或民族內部的問題時，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並據此解決問題，不要把所有問題都毫無選擇性地視為民族問題，防範人與人間的衝突成為民族衝突。

文件的細節透露出政府對統治新疆毫不妥協的態度，特別是在宗教方面：

嚴格管控新清真寺的建立（中略）迅速調動或更換支持民族分裂主義或對此有所猶豫的人，由熱愛祖國的可靠人才擔任清真寺和宗教組織的領

導職位，阻止非法組織，諸如地下宗教學校或古蘭經研究會。

文件也明確表示，為了確保「安全」，需要重點關注南疆：

在執行維護南疆穩定任務的同時，還要抓住另一個重點，大力加強該地區的經濟發展，在中央政府資金挹注及當地人協助下將南疆鐵路迅速完工，推動棉花生產、石油的發展及石化工業，以改變該地區貧窮與落後的面貌。

這裡的主要目標似乎至少創造出該地區繁榮的外貌，「當地人」生計的改善並未被列為優先事項，儘管南疆的維吾爾人是生產棉花的一環，但這項活動非常吃力不討好，只會讓他們變得更窮，文件更加強調的是監視「當地人」的必要，指示當局「建立一個敏感訊息網，並設法獲得可以在事前暗中戒備的深層次訊息，建立個人檔案；保持監督和警惕。」

儘管七號文件是一份秘密備忘錄，然而七號文件的整體訊息無疑是官方方針，因為宗教可以為分離主義份子所利用，因此官方將宗教視為潛在威脅；只要新疆的區域生產總值增加，那麼一切都會好起來。

這份通訊帶來了極為棘手的問題，政治局或新疆當局是否認為這是事實？如果是的話，又是基於什麼樣的理由？在中國，小官員只對遠在天邊的上級講他們認為這些長官想聽到的話，這樣的事情已有悠久的歷史（特別是在毛澤東時代）。但即使假設當局已經意識到新疆地區的非漢族民族所經歷的系統性不平等，這些不能在大眾前公開的資訊在政府對新疆（和其他少數民族地區）政策的討論及改革中可能也是一樣受到牽制，中國共產黨並不是一塊堅固的磐石，黨內一直有不同的派系，我們可以粗略地將這些派系分為強硬派和改革派。自一九八九年以來，強硬派一直佔上風、並抗拒任何政治控制的重大鬆動，在某種程度上黨可能已經被困在自己的說詞交織出的網羅中，因此只剩下種可接受的方式來概括新疆的情勢。政府討論說詞的限縮可能就像一九九〇年代後期，許多新疆維吾爾人將所有的問題都歸咎於中國政府那樣是同一回

事；而現在中國政府和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相互對立的陳述也表明了，從那時候開始雙方幾乎就沒有進步過。

新疆當局很快就回應了七號文件，在接下來的一個月，「嚴打」行動實施了，這是個從一九八三年以來就在其他省份實施的年度打擊犯罪計畫，但在一九九六年的新疆，這個政策被賦予了明確的意識形態基礎，新疆政府聲稱：

有種種跡象顯示民族分離主義者正在與各種犯罪和暴力份子勾結，他們的反動及破壞行動越來越猖獗，已經嚴重威脅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及社會安定。

政府將一般的罪犯與社會政治異議人士混為一談，用這樣的方式來詆毀後者，在接下來的幾年中，當局因為這項策略的合理結論而持續採用這樣的策略，以大規模宣判的形式在數千人面前將殺人犯、性侵犯及「分離主義份子」處以死刑。

在中國，重要的政府措舉很少不被其媒體大肆吹噓為重大的成功，不出所料，《新疆日報》在幾個月後報導說有兩千五百人遭到逮捕，查獲六千磅炸藥及三萬一千發彈藥（冗長的列表是中國政府的散文體及大部分中國學校教科書的悲劇性普遍特徵），雖然我們不可能去驗證這些數據的精確性，但整個新疆肯定有大規模的逮捕行動，伊寧當局的「嚴打」行動逮捕了涉嫌參與麥西來普或批評政府的年輕維吾爾男性，其中一些人是因為維吾爾族社群內的線人而遭到逮捕（依據七號文件指示要建立一個「敏感訊息網絡」），許多逮捕行動發生在深夜之中，而且並未告知親屬當事人被拘留的地點（很多人被帶到所謂的「黑牢」中，也就是非官方的拘留中心），為了這些意圖和目的，這些年輕人「失蹤」了；然而有傳言說一些居留者隨後被發現死在農村之中，無論謠言是否屬實，這些傳聞表明（也惡化了）伊寧維吾爾社群和政府當局之間的關係。

政府也試圖破壞新疆維吾爾人，和中亞各共和國內維吾爾人之間的合作，一九九六年，中國政府建立一個被稱為「上海五國」的政府間（intergovernmental）

組織，其成員是中國、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及俄羅斯，建立組織的目的是為了促進新疆地區的穩定，雖然中國的主要利益是「安全」，但對其他的成員國來說——中國的經濟合作是更大的價值所在。在此之前，這些共和國對不同的維吾爾組織來說大多數是相對安全的基地，但到了一九九五年，情勢已經開始改變。就在這一年，哈薩克總統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Nursultan Abishuly Nazarbayev）同意讓哈薩克安全部門監控該國內的維吾爾人；並提供線報給中國。一九九六年，就在上海五國元首第一次會晤之前，哈薩克外交部長告訴維吾爾人不要在中國推動任何形式的分裂主義，他將那樣的活動描述為這個時代的「政治愛滋病」。

上海五國組成後，許多維吾爾團體遭禁，而且他們的成員受到當地維安部隊的騷擾，許多團體被迫遷移到沒有與中國簽訂引渡協議的國家，特別是德國與美國——我將會在第五章談到這些團體及其領導人的故事。一九九九年哈薩克引渡兩名具有中國公民身分的維吾爾人，他們被控為分裂主義份子，哈薩克在兩人有被處死風險的情況下還是將他們送往中國。二〇〇一年時上海五國在

烏茲別克加盟後更名為上海合作組織。

「政府什麼都不給我們」

即使是從新疆標準來看，伊寧也是非常偏遠的地方，一九九七年時伊寧沒有火車站，從烏魯木齊到伊寧要開上七小時的車，或是搭上十四小時的公車。它固然有個小型機場，每天會有一班（有時兩班）來自烏魯木齊的航班，但除了官員和商人以外沒多少人負擔得起這樣的預算。大多數人與貨物能別無選擇的沿著漫漫長路前往伊寧，中途偶爾出現的建築物看來像是被誤置在荒涼的風景中。幾個小時後，道路兩邊開始出現小山丘，山丘越來越高、越來越近，最後所有的車輛都必須在山丘群之間蜿蜒而行，接著小山丘被拋在身後，眼前出現一個巨大的亮藍或蒼白色湖泊（視季節而定），藍或白延伸到地平線彼端，從這兒開始道路成為在高山景致中的髮夾彎，直到抵達伊犁河谷的底部。

在一九九七年初，伊寧有許多方面都值得注意，它以生長在城市周圍果園內的蘋果而聞名，以其怡人的氣候、頻繁出現的藍天、樺樹和白楊樹而出名，作為一個幾乎可說是與鄰國接壤的城市（從這裡到哈薩克的巴士車程非常短）來說，它讓人覺得像是邊境，集市上有烏茲別克、哈薩克和俄羅斯的貨品，還有一些遊牧民族趕著羊穿越山丘。而曾經作為東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國首都及清朝軍事中心（我們可以在附近的惠遠鎮看到駐軍建築物），伊寧也具有歷史上的重要性。伊寧還有個額外的特色是：它是北疆唯一維吾爾人口占多數的城市，三十三萬人口中有百分之四十八的維吾爾人、百分之三十六的漢人，其餘居民大多數是哈薩克人及回族。比較負面的一面是，伊寧在酗酒、吸毒、愛滋感染率和失業率等方面，同時也存在該地區最高的比例；而鄰近的鞏乃斯鈾礦也使它惡名昭彰，罪犯在鈾礦裡工作，每年的死亡率約為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而這個鈾礦的存在是個國家機密。

但自一九九七年以來，伊寧因為二月初吞噬了城鎮的暴力而廣為人知，就像巴仁的示威那樣，這個事件被視為新疆近代史上的轉戾點之一，並引發中國

政府與維吾爾族激進人士的激烈爭議。伊寧抗議事件的不同之處在於：人們更為理解這個事件的面貌及事發原因，雖然該地區不對外國媒體公開，但還是有相當數量的目擊證人證詞，甚至還有一些影片片段。

一九九七年二月四日晚上，警方逮捕了大約兩百名在清真寺及私人研究團體的人們，二月五日早上，五百名年輕的維吾爾男性為了逮捕及麥西來普遭禁而進行和平抗議，他們帶著宗教旗幟在鎮上遊行，沿路高喊口號，這些口號的內容有著很大的差異，有些口號是世俗化的（「不要繳稅！」「政府什麼都不給我們！」）但還是有些口號具有宗教性質。幾個小時後，抗暴警察攻擊抗議者並放狗對付他們，警方以對人群開火並逮捕數百人的方式結束了示威活動；晚些時候，下午又發生了第二次抗議活動，許多抗議者是被捕者的親屬，這場抗議也被鎮暴警察、水炮和催淚瓦斯不留情面地鎮壓下去，同樣有人遭到逮捕。有些人聲稱，儘管天寒地凍，還是有被捕者被拘留在室外，造成許多人嚴重凍傷，遭逮捕的人數多到據說伊寧兵團第四師的監獄設施大爆滿，需要把其他被拘留者送到城外的黑獄中。許多被捕者在未被控罪名的情況下被拘留了

幾星期、甚至幾個月。

接下來的那兩天，騷動蔓延到郊區，車子被放火、財產被破壞，似乎發生了一些針對警察的報復行為，有些未經證實的報導稱有幾名漢族平民遭到攻擊，有多少人在動亂期間死亡至今仍然不明，一些西方學者認為至少有三百名死者，但維吾爾激進份子引用的死亡人數遠高於三百人，他們經常將這個事件稱為「固勒扎大屠殺」（*Ghulja massacre*）。

政府可能負荷不了最初抗議的規模，於是來自烏魯木齊和蘭州的軍隊迅速開進伊寧，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內伊寧實施全面戒嚴，來自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準軍事部隊和軍隊士兵在街頭巡邏，據報導軍方挨家挨戶進行大規模搜索，並獨斷地進行大規模逮捕，依據國際特赦組織的資訊，被拘留者約在三千人到五千人之間。

政府的直接反應是對事情的嚴重性輕描淡寫，主張這個事件不涉及政治起因，「這只是一些吸毒者、打劫者和『社會垃圾』打砸搶燒的行為」，為了強調一切安好，國家媒體也在二月八日報導說「成千上萬的穆斯林在喜悅中離

家，前往城裡的清真寺慶祝開齋節（宣告齋戒月結束的節日）。」

伊寧此一事件的官方說法在未來幾年內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在二〇〇二年時這個事件被重新定義為「一場恐怖份子於事發期間高喊呼籲建立一個『伊斯蘭王國』口號的嚴重動亂」，動亂被歸咎於一個被稱為「東突厥斯坦伊斯蘭真主黨」的組織，這個組織先前從未被提及，從那之後也未被指出該為其他任何事負責，除了中國官方報導以外，缺乏關於這個組織各方面的細節，這使許多學者懷疑這個組織是否真的存在。

許多西方記者強調這場抗議活動的政治性質，沒多少人把它形容為恐怖主義活動。美聯社的一篇報導將這個事件描述為「抗議北京統治」，雖然這些報導肯定提及一些事實，但事件中的「分裂主義」份子的重要性似乎比不上當地的民怨，顯然「分裂主義」、「宗教」和「人權」關注並不互斥，參加伊寧抗議活動和其他地方抗議活動的維吾爾人，可能因為提及的部分理由或全部理由而參與抗議活動。正如我一位伊寧的維吾爾朋友所說：「有些人因為恨中國政府或中國人而上街頭，有些人是因為失業而感到憤怒，有些是因為他們的伊瑪

目叫他們這麼做，而有些則是因為他們喜歡打架。」

任何將這些動機的複雜性撫平為單一解釋的做法——就如最近西方媒體報導或中國官方報導中頻頻發生的那樣——都是非常靠不住的：這麼做所揭示的只是發言者偏好的事件版本而已。而更進一步讓問題惡化的，是記者或學者很難找到願意談他們在新疆參與的抗議活動的受訪者（而且從未有人承認自己是更多暴力事件的起因），有鑑於政府當局對這類事件的嚴厲處置，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在新疆，光是和個外國記者說話都可能讓自己惹上牢獄之災，然而這也意味著我們只能用比較沒有那麼陳腐的解釋方式去理解這些事件。

雖然巴仁事件得到一些國際關注，但伊寧抗議活動則確實提高了維吾爾人的國際知名度。一份沙烏地阿拉伯報紙為了中國「人權受到侵犯的穆斯林所受的苦痛」而發出告誡；美國國會的回應是通過一項法案批准維吾爾語成為自由亞洲電台（由美國資助，宣稱促進資訊自由及人權）的官方語言之一，次年國會還將維吾爾族列入面臨宗教迫害的民族清單中；土耳其更加明確地譴責中國處理伊寧抗議活動的方式，而歐盟也對此發出批評；一九九四年七月，歐盟

對於「在東突厥斯坦任意逮捕及處決一些維吾爾人的情形表示憂心，並譴責中國政策的目的是在於消除大多數是穆斯林的維吾爾人文化。」歐盟議會呼籲中國當局「停止壓迫維吾爾人，並與涉及東突厥斯坦的所有團體展開政治對話。」這份聲明使用了「東突厥斯坦」一詞也是十分值得關注的，通常國家和超國家（supra-state）機構會避免使用這個詞彙，因為這是在質疑中國對於領土主權的合法性，至今我們仍不清楚這是否是有意的，是基於疏忽，或是當時運作中的眾多維吾爾激進組織之一的遊說結果。

伊寧抗議事件使得整個地區駐紮了警力和軍力，總部位於香港的《南華早報》報導指出，約有十萬名增援部隊已經遷入新疆；儘管如此，二月二十五日，有三顆炸彈在烏魯木齊的公車上爆炸，造成九人死亡及二十八人受傷，作案的日期很可能是經過選擇的，因為當天北京正在舉辦鄧小平的紀念活動，這顯然是一個組織性的恐怖主義行動（因為它顯然是為了明顯的政治目的而蓄意殺害平民），鑒於爆炸案發生在伊寧抗議事件後的幾個星期內，儘管我們不知道是誰犯下爆炸案，但假設兩個事件之間存在某種關聯性並非不合理。當局

為了應對爆炸案而在主要公車路線的公車站配置攜有機槍的士兵，同時還有其他士兵搭乘卡車在城市街道上巡邏。

當北京在三月七日和三月八日再次發生公車爆炸案時，直接的假設是這些爆炸案和烏魯木齊發生的爆炸案有關，這個看法受到許多人重視——有些維吾爾人說北京很多酒店拒絕讓他們留宿，他們招計程車時也不會得到回應，這樣的差別待遇算是家常便飯；但在二〇〇九年烏魯木齊暴動、二〇一三年天安門爆炸案及翌年的昆明車站襲擊案發生後，這樣的歧視行為達到高峰。

但一九九七年發生在北京的爆炸案可能與新疆沒有任何關係，中國的最高立法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在北京舉行年度會議，而國內有許多人對國家感到不滿，北京每年都會收到數千人向各個政府部門請願，而且這樣的請願通常與地方性的不正與腐敗有關。這些案件通常沒能得到適當的處理，而政府未能回應公民的投訴是導致仁壽縣事件這類大規模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些投訴無門的上訪者被驅使，並因此採用更極端的手段。在一九九〇年代後期中國其他地區發生多起公車爆炸事件，一方面與新疆沒有合理的聯繫

（在中國要取得爆裂物並不是什麼難事，因為拆遷時經常用上炸藥，我甚至看過農夫用炸藥炸魚），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應對其他的上訪者視而不見。此外，將北京爆炸案與烏魯木齊爆炸案聯繫在一起的另一個問題是：沒有人聲稱犯下這些爆炸案，甚至新疆主席阿不來提·阿不都熱西提也否認有任何關聯性。

當局的回應和巴仁事件一樣，採取大規模居留及加強監視，四月中旬進行了對抗議期間被捕者的審判，但其中大部分審判只是為了示眾；其中三十人的審判在伊寧市體育場的集會上進行，大約有五千人參加這次集會（其中大多數可能是士兵或是國家雇員），其中三個人因為「傷害、縱火、暴力、毀損財產和搶劫」等罪名而被判死刑，其他被判入獄服刑的犯人則被帶到城市街道，在開放式的卡車和公共汽車上遊街示眾；當一群多數為犯人親戚和朋友的人群靠近卡車時，護衛的警察隊對人群開火，據報導警方造成三人死亡及十人受傷，一九九七年五月一日《伊犁晚報》將平民形容為「暴徒」，報導聲稱武警事前先對空鳴槍警告。

接下來的幾個月裡發生更多逮捕事件，五月二十二日，《伊犁晚報》報導，作為針對「暴力罪犯」的「嚴打」行動的一部分，該地區已經開始進行警察突襲行動，到了六月份，政府當局已經明確將分裂活動與宗教聯繫起來，《新疆日報》報導說，對地下宗教活動的打擊行動已經導致官方發布禁止建設或翻新一百三十三座清真寺的禁令；同時也有針對現有清真寺的拆除行動——伊犁地區在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九年之間至少有七十座清真寺遭到拆除，而在烏魯木齊單是一九九八年就有二十座清真寺遭到毀滅的命運。某些情況下，官方拆除清真寺的理由是說這些清真寺距離學校或大學太近，可能會影響兒童。

任何年齡的學生都不得出入清真寺，但是在一九九七年後這個限制變得更加嚴格，那一年和田一所大學張貼海報公告有六名學生因為參加非法的古蘭經學習課程而被開除或被逮捕，新疆政府宣稱已經解散了一百多個這樣的學習班，一份報告吹噓「非法宗教活動已經被肅清（中略）一區又一區，一村又一村，一莊又一莊。」一九九七年七月，新疆人民代表大會主席阿木冬·尼牙孜公開呼籲「發動人民戰爭以對抗分裂主義份子和非法宗教活動」，儘管他小心

地補充說「這個議題既不是民族問題也不是宗教問題」，但很多人不會放過只有維吾爾人遭到逮捕的事實。

在伊寧和烏魯木齊（後者的程度較低），打壓所帶來的影響與（據推測）預期中的影響相反。我在伊寧所認識的一些最虔誠的維吾爾人——那些一天祈禱五次，從不喝酒，認為欣賞和朝覲有關的DVD是一大樂事的人——跟我坦承，在一九九七年之前他們一直是「很壞的穆斯林」，經常抽煙喝酒，也根本不太去清真寺。簡單地說，他們的改變純粹是一種挑釁國家的行為，儘管對他們許多人來說這很可能只是一個象徵性的抗議行動；然而政府對伊寧和新疆其他城市抗議事件的嚴厲反應意味著，對許多維吾爾人來說對宗教虔誠是他們唯一可行的反對方式。此外，宗教的復甦也可以被視為對許多維吾爾社群所面臨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的反響，宗教參與（如麥西來普）為許多因為經濟狀況而感到絕望的維吾爾人提供另一個選擇，這個選擇可能可以提供個人救贖，甚至是整個民族的救贖。

考慮到麥西來普提供的許多社會及文化益處，伊寧鎮壓事件後，麥西來普

在一九九七年末期於哈薩克共和國的阿拉木圖復甦也毫不讓人意外，那個城市 and 伊寧的地理位置接近，加上其廣大的維吾爾族人口（大約有十萬人），這意味著它（至少暫時）是個可以自由討論維吾爾文化及民族議題的地方。

當局對伊寧抗議的嚴厲鎮壓也惡化了漢族和維吾爾族社群間的關係，導致更大的社會分離。我在伊寧度過的那一年，我只參加過一次在某人家裡進行的社交活動是漢族或維吾爾族都在場的，而且那個場合，那位漢族女性是來自新疆以外地區的訪問學者，至於婚禮或餐廳裡面的任何聚餐，會場就只會有漢族，或是只有維吾爾族。我能記得的唯一一個維吾爾族、漢族、哈薩克族和回族都能基於自身意志一起同樂的，是鄉下一種可怕的鬥雞活動，而且這種加劇的社會隔離不只是伊寧漢族和維吾爾族之間惡劣關係的表現，這個社會隔離本身也在繼續自我增強。

在接下來的兩年，新疆繼續發生大規模逮捕和處刑，一九九七年到一九九九年，國際特赦組織記錄了兩百一十宗死刑判決和一百九十宗處刑，大多數是經過粗略審判後被定罪為顛覆活動或恐怖活動而判刑的維吾爾人，在這

段期間，新疆的死亡判決和人口規模的比例比中國其他地區還要高出好幾倍。

法律的變化使得政府更容易以任意拘留任何人（並加以判刑），使當局更容易加強打壓維吾爾人的力道，一九九八年，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舊的法律類別「反革命」罪修改為「反國家」罪，這些罪行有許多都會被判重刑甚至死刑；新的類別包括「民族歧視罪」和「煽動民族仇恨罪」，其中的標準模糊到幾乎任何在新疆的異議行為（打個比方，說維吾爾人被剝奪公民權）都可能受到懲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很少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無論他們的民族為何——因為掌握政治權力的人一直控制著司法機關。即使是財富也沒能讓人倖免於難：一九九九年，政府將中國最富有的女性送入監獄。

第五章

流亡在外

你會覺得，對他們來說，你是個異鄉人；而如果你非常自信，
那麼你會覺得他們才是異鄉人。

——恩維爾·土赫提

熱比婭·卡德爾激起廣大的反響。一九九五年時一篇中國雜誌的文章熱情洋溢地歌頌卡德爾「睿智的雙眸」和「精明的商業頭腦」，作為當時最富有的女性和該國富豪排行榜上第七名的富人，這番高度讚揚並非毫無根據，但國家評論的基調很快就走了樣。二〇〇〇年，國家因為她「洩露國家機密」而囚禁了她八年，並且在二〇〇五年因為醫療理由而釋放了她。今日，中國政府將她視為與恐怖勢力結盟的分裂主義者，並加給她「說謊成性、厚顏無恥的騙子」這個污名。

她自二〇〇六年開始擔任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領導人，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是由若干維吾爾激進組織構成的傘狀架構組織，而她的領導身份也是激起中國政府憤怒的主因。卡德爾身為世維會領導者的成就已經激起一些政客、人權運動者和（甚至）記者的強烈正向反應，二〇〇九年七月《華盛頓郵報》在一篇過分表露情緒的人物側寫中稱她為「維吾爾運動之母」，而同一個月，英國《獨立報》稱「對西方國家和她的人民來說，她是英勇的自由鬥士。」她已經兩次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而自從她獲釋以來，她已經與一些世界領導

人及資深政治人物見面，特別是在美國（包括喬治·沃克·布希在內）。一部關於她的紀錄片《愛的十個條件》（*The 10 Conditions of Love*）在二〇〇九年問世，同年，她發行了英文自傳《搏龍鬥士》（*Dragon Fighter*）。

一九四九年，在新疆西北部的阿爾泰地區，一對家境普通富裕的父母生下卡德爾，但在她還十分年輕的時候，她父母的很多財產就被充公了。一九六一年，他們被迫往南搬到阿克蘇，卡德爾在這兒與一位在當地銀行上班的男性結婚，她跟他生下八個孩子後於一九七六年離婚；離婚後她開了洗衣店，然後她開始銷售羊皮、黃金和其它商品（這在當時是非法的），然後她和一名叫做司迪克·魯茲的男子再婚，這位男性曾經因為與當局發生衝突而遭到監禁。

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她將她的事業與家庭遷往烏魯木齊，她在那兒開始踏足房地產，並在之後將事業擴展到中國與中亞各國之間的貨物進出口，她的財富使她開始接觸新疆的官員，並於一九八七年時被任命為新疆人大代表，後來她被任命為北京全國人大代表時又進一步提高了地位；到了一九九四年時她已經是全中國最富有的女人，並成為《華爾街日報》封面主題人物；翌年，她是參與

北京聯合國婦女大會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她在會議中被介紹給當時是美國第一夫人的希拉蕊·柯林頓；同一年，她穿戴二十一件價值五萬元（八千美元）的珠寶參加一場政府會議，她解釋這是維吾爾婦女回應重要時刻的方式。

一九九六年，她的丈夫離開中國並到美國尋求庇護，從那之後他開始擔任自由亞洲電台的記者。一九九九年，卡德爾因為竊取國家機密而遭到逮捕，並被判處八年監禁，根據《烏魯木齊晚報》報導，她一直在給魯茲寄送地方新聞報紙，雖然報紙是可以隨意取得的，但內容並非針對國際讀者發布。美國國會多次呼籲釋放卡德爾，在二〇〇五年三月時她因為健康理由而獲釋，這可能是一項交換條件，因應美國沒有如之前所做的那樣，繼續在該年聯合國上要求針對中國侵犯人權的行為要求解決方案，她飛往美國與她的丈夫及部分孩子重聚。但在二〇〇六年卡德爾成為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負責人時，她四個還留在新疆的孩子遭到逮捕，並因為逃稅等非政治原因而遭到長期監禁。

在卡德爾的領導下，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讓更多人意識到新疆維吾爾人所遭遇的問題（儘管二〇〇九年烏魯木齊發生的抗議事件也在提高傳媒關注

上起了一定的作用），卡德爾在她的自傳中寫道：「我想成為所有維吾爾人的母親，成為治癒他們疾病的良藥、成為他們擦乾眼淚的手帕與保護他們免受雨水侵襲的披風。」雖然這是崇高的情操（但可能有點過頭了），但這樣的情操並不能使她免於面對所有流亡領導人都要面臨的問題——她有什麼權利可以聲稱自己代表所有維吾爾人？若用「她不是經過維吾爾人選舉推選出來的代表」（但她在世維會的地位是經選舉而產生的）為由反對當然十分荒謬，但仍然有個嚴重的問題——她的觀點（正如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所表示的那樣）是否準確反映出新疆裡、外維吾爾人的許多不滿與抱負呢？

鑒於新疆廣泛的審查制度和對媒體報導的限制，這個問題幾乎不可能得到答案。但正如內布拉斯加大學的助理教授克里斯蒂安·彼得森（Kristian Peterson）所認為的那樣：「本土社群的『沉默』已經使得離散社群（diasporic community）得以建立一個反映其特定目標的形象。」毫無疑問的，許多維吾爾人尊重，甚至是崇敬卡德爾，但也有許多新疆之外的維吾爾人並不同意她所推動的議題，直到二〇〇九年為止除了烏魯木齊之外的維吾爾人甚至不太聽說

過她，但在烏魯木齊動亂後中國媒體瘋狂的妖魔化卡德爾，這大力提升了卡德爾的知名度。

誰有權代表維吾爾人說話？這已經不是什麼新鮮問題了，我們可以將離散維吾爾人的運動史看作是針對這個問題和其它問題長達五十年的大辯論，特別是在一九九〇年代之後的部分。提倡完全獨立或真正的自治？暴力在實踐國家獨立的奮鬥中所發揮的作用？未來建立的國家裡是否納入非漢族的少數民族？關於這些問題，成立於不同地點一系列類似命名的組織對這些問題有著不同的見解。

新疆的媒體（及後來的網際網路）所受到的限制意味著大多數維吾爾激進組織的受眾是離散在外的五十萬維吾爾族人。第一個維吾爾激進組織是由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和艾沙·玉素甫·阿布甫泰肯在他們於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由新疆逃往土耳其後所發起的，他們在土耳其透過傳統方式——出版報紙期刊並且出席會議——進行政治活動，布格拉和阿布甫泰肯在一九五〇年代及一九六〇年代期間試圖與非殖民化運動及國際伊斯蘭組織聯盟，雖然其中一些

已經通過決議，但沒有國家實踐任何與新疆相關的決議。布格拉在一九六五年去世後，阿布甫泰肯直到他在一九九五年過世為止仍然是維吾爾激進活動的關鍵人物，他自土耳其政府得到很多支持，在為國際突厥社群提供援助的議題上擁有國內政治資本；維吾爾運動和西藏運動也獲得一九九一年成立的無代表國家與民族組織（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sation）的協助，這個組織是由艾沙的兒子艾爾肯·阿布甫泰肯創辦，他的目的是促進無代表及邊緣化國家及民族的發聲。

在蘇聯解體之前，土耳其仍然是維吾爾激進運動的中心，但隨著人民遷徙及媒體的限制放寬，前蘇聯中亞國家中維吾爾人口的優勢使激進活動更為突出是一點都不讓人驚訝的，哈薩克和吉爾吉斯國內的維吾爾人口加起來就佔據維吾爾離散人口的一半以上，在哈薩克獨立後不久，就有兩個維吾爾組織在此成立。維吾爾解放組織的目標和手段與阿布甫泰肯的土耳其組織大致相似，它試圖提高國際對維吾爾問題的認知，並發送印刷品和卡式磁帶進入新疆；而另一個組織——東突厥斯坦聯合民族革命陣線（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sation），則公然推動更加激進的路線，其創立者玉素甫別克·穆柯里欣聲稱擁有三萬名地下軍隊，並承認發起新疆的各種暴力事件，一九九七年時他的兒子宣稱為烏魯木齊公車爆炸案是該組織所為，但沒有證據可以證明穆柯里欣父子涉及新疆的任何重大事件，不幸的是，在爭論新疆是否被四面八方的伊斯蘭恐怖份子圍攻（我將在第六章討論這個主題）時，這（缺乏證據）並未阻止部分分析師重申他們的主張。

一九九〇年代期間，土耳其和中亞的維吾爾團體曾兩次試圖整合成一個單一組織，第一次嘗試發生在一九九二年，第二度嘗試是在一九九八年，但兩次都因為財務問題和目標上的爭議而失敗，而這個嘗試整合的過程導致的結果是新組織的建立，一九九八年，東突厥斯坦民族中心在伊斯坦堡成立，這個組織雖然不是有些人希望的流亡政府，但它確實向維吾爾人提供文化上的支持及人道主義支持，也有跡象顯示美國政府開始關注新疆的事件；一九九八年，自由亞洲電台——由美國資助的網絡，其使命是促進專制國家裡面的言論自由——加入維吾爾語廣播，但這個電台的動機和公正性至今仍是非常具有爭議性的。

然而在這一九九〇年代結束時，土耳其和中亞國家都變成無法讓這些維吾爾組織安穩運作的地方，中國從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就開始向土耳其政府施壓，一九九五年時有一個提案是用逝世不久的艾沙·玉素甫·阿甫甫泰肯的名字為伊斯坦堡一座公園命名，中國大使強烈反對並指責土耳其干涉中國內政，雖然該提案被通過並實施，但雙方政府可能已經達成某種妥協。翌年中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主要立法機構之一）委員長喬石感謝土耳其的不干涉政策，一九九八年時土耳其官員告訴維吾爾領導人：不要反對土耳其外交部長訪問中國；一九九九年，土耳其總統告訴當時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他反對任何針對中國的分裂主義份子。

一九九六年上海五國組織成立後，中亞國家對維吾爾激進組織有了更嚴格的限制，除了第四章已經詳述過的引渡以外，也對許多維吾爾文化組織施加規範，在一九九八年初，阿拉木圖的麥西來普聚會也遭到禁止。

維吾爾團體從一九九九年開始西遷，先是到歐洲，然後遷移到美國，雖然這些國家的維吾爾人口並不多，但這些國家在法律上保證言論自由，中國在

這些國家的操作空間較小，對維吾爾激進組織來說它們是很好的運作基地。一九九九年，在慕尼黑一場維吾爾團體的大型聚會上（穆柯里欣因為這個聚會先前承諾使用非暴力手段而拒絕出席），它們進一步試著組成一個傘形組織，儘管對領導階層和其他議題上有不同意見，但這些相異的團體在這個目標上取得成功，雖然這項成功並不包括名字，最終獲選的組織名稱也比任何一個激進組織都還還要更荒謬累贅——東突厥斯坦（維吾爾斯坦）代表大會（全名是 Eastern Turkestan [Uyghurstan] National Congress），甚至連縮寫都是「悲的」[ET(U)NC]。

儘管有名稱上的缺憾，但這個組織維持完好並提高了它的知名度——東突厥斯坦（維吾爾斯坦）代表大會二〇〇一年十月的會議是在歐洲議會進行。在這段期間，這個團體運用國際網路作為組織及推動議題的手段，網路是非常重要的：它使得東突厥斯坦（維吾爾斯坦）代表大會得以與維吾爾僑民洽談並發起動員，因而使這個組織成為真正的跨國組織。在九一一攻擊事件後，中國日益尖銳地主張自己是新疆伊斯蘭恐怖主義受害者（見第六章），這可能也

促使維吾爾族群努力凸顯他們所認為的新疆異議真正起因。

接著是又一個統一陣線的跡象，二〇〇四年四月，東突厥斯坦（維吾爾斯坦）代表大會與世界維吾爾青年代表大會合併成為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並由組成組織的各個維吾爾團體中選出領導人，包括艾爾肯·阿甫甫泰肯（擔任主席）、阿力木·斯伊托夫（來自維吾爾美國協會）、穆罕默德·土赫提（來自維吾爾加拿大協會）。不幸的是他們的正統性幾乎立刻受到二〇〇四年九月組成、自稱為「東突厥斯坦流亡政府」的團體質疑，這個組織形容自己是「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唯一授權保護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人民權利的機構」。

兩個組織出現，兩個都宣稱自己是維吾爾人的唯一代表，這樣的情況很容易使局勢衰退為超現實主義式的鬧劇，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運用東突厥斯坦流亡政府（理論上）更高的位階來成就自己的主導地位；世維會主張，只有在美國正式承認東突厥斯坦流亡政府是一個正統的管理機構時，它才會與之合作，當美國拒絕承認這個地位時，東突厥斯坦流亡政府的正統性已遭到破壞，從那時起這個組織的能見度幾乎是零（媒體報導幾乎從未引用這個組織的發言）。

這是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下的精妙一著，當時美國——更確切的說，是一個獲得兩政黨支持的政治組織，由美國國會資助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已經開始資助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一部分經費。在二〇〇二年年底，以美國為基地的烏麥爾·卡納特和阿力木·斯伊托夫已經為維吾爾美國協會向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申請資助，二〇〇四年及翌年國家民主基金會授予資金時，這等於是另一個為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和東突厥斯坦流亡政府的關鍵差異所作的背書。而東突厥斯坦流亡政府明確表達了對新疆獨立的渴望，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在這個議題上更加謹慎，並且更加重視人權問題。

卡德爾的領導

卡德爾在二〇〇五年獲釋後，即開始擔任維吾爾美國協會的領導職務，然後在二〇〇六年時獲選為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領導人，從許多方面來看，

她是個合理的選擇——作為一位曾經被人權觀察組織及國際特赦組織報導及發起運動的遭囚異議人士，卡德爾給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帶來聲望及更高的曝光率；在財務方面，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及其組成組織獲得更多資源與保障，從二〇〇四年到二〇一一年，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不僅提供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大筆補助金，同時也贊助維吾爾美國協會（一百七十萬美金）、國際維吾爾人權及民主基金會（八十五萬美金）及維吾爾國際筆會（三十萬美金），近日一本談論維吾爾組織的書籍作者陳玉文，評論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已經「成功建立起一個對金主有強烈吸引力的地位」，卡德爾在媒體曝光時通常是一位能迅速傳達其訊息、激情而有力的演講者，她看起來就像是一位領導者。

卡德爾在擔任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之前的生活環境遠談不上輕鬆，而她在商場上的卓越成就也是值得尊敬的。她也還是不足以克服維吾爾社會對她相當大的性別偏見——沒有多少維吾爾婦女在其他領域（無論是音樂、文學或政治上）取得可與她比擬的成就，而她的成就也使得其他人在主張她是反對中國對新疆政策的異議者時會遭遇尷尬的質詢（特別是她曾身為新疆人民代表大

會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員的身份）。雖然中國政府過於誇大地聲稱她的成功完全歸功於政府對她的支持——事實上她在加入新疆人民代表大會前就已經十分有錢——但有這麼多政治接觸當然是不會損及她的財富。

關於卡德爾為何試圖建立一個商業帝國，並同意與她所認為的佔領政權合作，她在自傳《搏龍鬥士》中充分闡述這些答案；她說，她從非常年輕的時候就已經致力於維吾爾人的福祉，並幾乎不太掩飾地暗示是上天選了她來承擔這個角色，在某種程度上卡德爾是「特別的」——這樣的暗示貫穿了整本書，她聲稱她的父親在她出生後掘了一個洞來掩埋她出生時用的床單（這是新疆部分地區的習俗），他在掘洞時發現一筆埋藏的黃金，這筆意外之財使這個家庭免於貧困度日；後來她說她的一位親戚這麼告訴她：「妳不屬於我們，而是屬於整個民族。」她對童年時代的描述整體來說是缺乏謙遜的，她寫道：「我總是為給他人提供慰藉和保護而做好準備。」然後又誇耀著「每個女孩都想當我最要好的朋友，甚至連年長的女士都渴望跟我談話。當我外出四處走走時，我可以感覺到人們讚賞的目光。」

有時她暗示自己擁有神聖的力量，卡德爾聲稱：「我的親戚生病時，我的兄弟姊妹會看著我，彷彿還有更多我能做到的事情。」在她與魯茲的婚禮上，據說她的家人相信「一位天使自天降臨他們的家。」還有其他情節暗示著神聖力量的介入，當她和魯茲被倒下的原木困住並得救時，據說這次的獲救「就像一個奇蹟」，即使是在烏魯木齊開展事業的選擇也是獲得護佑的：「在我看來，是神引領到這一堆瓦礫之中。」

雖然這類聖徒自傳對許多讀者來說是太過頭了，但我們可以將這樣的自傳看作是卡德爾試圖彰顯自己是維吾爾人的正統代言人，正如《愛的十個條件》的導演傑夫·丹尼爾斯（Jeff Daniels）在接受我採訪時所說的：「她毫不害臊地提倡她的理想，甚至認為自己需要成為這份理想的象徵；她認為行銷這樣的故事是十分重要的，重要到這樣的故事與她自身的經歷明顯不一致的程度，而我認為她並不在乎，關鍵在於她試圖去實現一個理想。」

卡德爾將自己塑造成一個致力於幫助她民族的人，這麼做可能是試圖將批評自她的商業帝國及作為政治菁英成員的身分中轉移開來，卡德爾聲稱她在

一九七一年時賄賂紅衛兵，以阻止他們毆打一位維吾爾作家後從中頓悟金錢能帶來的解放力量：「一陣寒冷的戰慄傳遍我的身體，我察覺自己確實能用我的金錢作為力量而有所作為。」在她後來的商業生涯中，她告訴她的孩子們：「光是賺錢來養活你們是不夠的，我已經有足夠養活我們的金錢，但我需要的是為了我們的民族賺更多的錢。」她將烏魯木齊一家百貨公司的建立呈現為這個過程的最高潮：「這棟建築物以我表長久以來所期待的方式，將我介紹給維吾爾人，它體現了我的力量與我打擊對手的抵抗精神。」

雖然人們可能會懷疑卡德爾聲稱她致富的動機是為了幫助她的人民，但她在 一九九〇年代中後期確實在烏魯木齊展開慈善活動，這個慈善活動的主線之一是「一千個母親」運動，這是一個將利潤用於資助社區計畫（如學校和文化活動）的集合投資，地方官員很快就停止這個活動，無疑地部分原因來自於政府普遍不信任大多數民間社會組織，儘管活動被喊停可能也是由於有傳聞說卡德爾雇用大學生在店裡講述維吾爾歷史課程（這對當局來說是個政治議題）。

雖然她以此為例，說明中國政府決心不允許任何人幫助維吾爾人，但至少

有一個例外存在。聶帖·哈吉孤兒學校自一九九六年以來收容伊寧的維吾爾和哈薩克兒童並提供教育，這所學校位於伊犁河附近的一處寧靜地區，由中國新疆西努爾集團（一個製造業與運輸業集團）的富裕維吾爾執行長聶帖·哈吉·依斯坎德爾所資助，儘管名稱是孤兒學校，但它所收容的孩子並非全是孤兒：許多孩子的父母有酗酒或吸毒問題，或是被關在監獄裡面（這是新疆大規模逮捕潮如何使維吾爾社群蒙上陰影的一個好例子，儘管有孤兒院，但二〇〇一年時仍然有非常多的維吾爾兒童流落在伊寧街頭）。

地方政府並未為學校提供任何資金，但他們確實監控了課程內容；根據報導，當局強調學校不能教授「宗教及有害社會及民族團結的課程。」當我在二〇〇二年走訪孤兒院時，聶帖·哈吉和老師們似乎是富有愛心及獻身精神的。政府在二〇〇六年時授予聶帖·哈吉「慈善之星」的稱號。

卡德爾的政治生涯

另一個棘手的问题是卡德爾對參加全國人大會議的解釋。她聲稱「在那段日子，我錯以為治理我們家園的官員是懷著好意，只是完全不了解我們民族的真正問題。」雖然中國確實有些人抱持著「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腐敗與管理不善是出自良善的無知」的觀點，但這樣的說法確實與她先前所說的內容互相抵觸，她曾經說自己在小時候就意識到「政府官員普遍認為只有在我們這些地方性的原住民都被流放或遭謀殺後，他們才有安居樂業的一天。」

有些人可能會質疑卡德爾如何說明她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的角色，她將自己描繪為敢於向掌權者直言的參戰者，她說她問當時新疆的最高官員王樂泉：「你是不是渴望看到我們流血？」並警告他：「不要逼老百姓起義。」卡德爾說她在北京的全國人大會議上發表了一番演說，其中有這麼一句話「謀殺我們民族中的一份子，已經變得像用槍射鳥一樣簡單了。」並且說，「在我這麼說的時候，我留意到有幾位代表正在擦拭他們的眼睛。」我們很難相信卡德爾

一再被允許這麼直言不諱，這有違於所有我們關於中國政治及言論自由表達的認知，特別她是針對民族關係這麼敏感的問題。

就如同她的演講內容一樣，這本書還包含許多沒多少學者會支持的主張，例如宣稱全世界有兩千萬維吾爾人；或是新疆愛滋病毒感染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是中國政府將其他地區感染愛滋病毒的漢人遷移到新疆的緣故。另一個類似的情況是二〇一〇年她接受《關於伊斯蘭》網站採訪時聲稱：

一九八七年之前，東突厥斯坦從未出現過性交易，維吾爾人的宗教和傳統一直反對性交易，在此之前我們從未聽說過這種事……（中略）在此之前維吾爾人也從未聽過毒品，這些毒品來自中國本土。

關於在「開放時期」後，新疆（和全中國）賣淫和吸毒問題增加的原因：認為新疆先前從未存在賣淫和吸毒行為的主張，和旅行者的敘述及維吾爾人的證詞互相矛盾。許多旅人和維吾爾人證實大麻的普遍使用，通常發生在在古爾

早 (gulkhan) ——「有著四個大房間、販售肉類和茶的屋子，人們在裡面吸大麻。」卡德爾的目標是訴諸「純潔」的維吾爾社會，這個概念或許能積聚對中國政府更進一步的責難；但她這麼做卻又掩蓋了導致維吾爾人濫用毒品及酒精的經濟及社會條件。她在書中談論一九九七年的伊寧抗議事件時，雖然也提及麥西來普，但卻幾乎沒有提到促使這個古老傳統復興的原因。

在某種程度上，與卡德爾自身經歷有關的問題，和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提供的民族主義歷史觀點的問題可說是相似的，在這兩個例子中，他們將一個簡化過的、一元式的敘述強加在凌亂而衝突的訊息之上，其目的是講述一個責任歸屬、德行及被害者身分皆非黑即白的故事。傑夫·丹尼爾斯說，這很可能是卡德爾認為「中國給世界提供的錯誤訊息，使她有權用同樣的手段來宣傳她的理想。」

卡德爾和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無疑地都在提高世界對新疆維吾爾人處境的認知中發揮重要作用，一些附屬於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組織（像是維吾爾人權計畫），採取了比他們的上級組織更為嚴格的方法、並提供更為深入的報

告，但卡德爾和世維會頻頻堅持著眼於新疆二元敘事，這是既令人遺憾和不必要的。但鑒於卡德爾的領導地位無人匹敵，而且世維會也已經達成先前維吾爾組織都未能達成的成就——將不同的團體統合在一個宣言下，吸引了足夠的資金來產生更廣泛的影響，並在多個穩定的地點建立總部（例如慕尼黑與華盛頓）——它應該可以對新疆問題提出更審慎的敘述，沒有必要誇大其詞：因為事實可能就已經夠糟了。

政府留下的傷害

名列中國高額懸賞名單的通緝犯現在正在開公車。恩維爾·土赫提負責駕駛的是二五四路公車，我曾經在下克萊普頓搭這路公車到史丹佛山，我一定見過他很多次，但每次在刷完牡蠣卡（倫敦的交通卡）後，我所做的最多就是習慣性地向司機問好而已。我當然不知道他的出身（更甬說認為他可能是維

吾爾人了），即使他的臉或光頭可以給人留下什麼印象，那也不會是持久的。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我在由斯頓車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館真正與他見面；恩維爾·土赫提曾經聯絡過我，談過要將我討論一九九七年伊寧抗議的書籍翻譯成維吾爾語，我們花了一個小時談論新疆維吾爾人面臨的社會、宗教及經濟問題，及最近政府歸咎於維吾爾「恐怖份子」的北京汽車爆炸案，而他看起來不像是熟悉這些議題的樣子。直到我們的會面結束時，我才問恩維爾他如何謀生及他第一次來倫敦的狀況，他說他曾經在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當過醫生，但他現在是個公車司機。然後他像是單純談到一個事實那樣地補充道，他回中國的話一定會遭到逮捕，一九九八年時他曾經協助英國《第四頻道》製作紀錄片，主標題是中國在新疆進行核武器試驗導致的死亡，節目播出後引發了國際性的強烈譴責，這使得土赫提不得不尋求政治庇護。

中國在南疆的塔克拉瑪干沙漠中進行核子試驗，雖然距離最近的城市——烏魯木齊、吐魯番、庫爾勒和哈密——都在兩百公里到三百公里之外，但這樣的距離還是不夠安全：風可以將放射性粒子吹到幾千公里遠。第一次核子試驗

發生在一九六四年，在接下來的三十二年中陸續進行了四十五次，有些在地下進行，有些在大氣中。這些核子試驗並非秘密，中國政府在一九六〇年代製作宣傳影片強調這些試驗的安全，雖然新疆居民可以看見那些核試驗的跡象——恩維爾還記得爆炸產生的煙塵從天而降的景象——但從未討論過核試驗對公眾健康可能產生什麼影響。一九八五年，數百名維吾爾學生在北京為核子試驗進行抗議；一九九〇年初期時，吉爾吉斯共和國和哈薩克共和國的維吾爾組織重新關注起這個議題，並喚起哈薩克總統對核試驗的關心；一九九一年時國際防止核戰爭醫生組織估計，核試爆釋放到大氣的鈾總量重約四十八公斤——在我告訴你吸入百萬分之一克的鈾二三九就足以致癌之前，你可能會覺得這個量不算什麼。一九九六年七月，中國政府宣布將停止核試驗。

如果不是那部紀錄片，這可能就是故事的結尾了。土赫提的參與對紀錄片至關重要——他偷走了證實癌症在新疆蔓延的秘密報告，日本學者高田純教授隨後估計，考慮到核試驗場附近的人口密度，可能大約有二十萬人因為急性輻射暴露而死亡，而有另外一百萬人可能因為吸收了過多的輻射劑量而造成新生

兒缺陷及癌症。

在某些方面來說，恩維爾比近年的維吾爾異議人士還要幸運。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和恩維爾·土赫提沒有親戚關係）在二〇一四年九月被判處終身監禁，而熱比婭·卡德爾則因為「危害國家安全」而被判八年徒刑；但卡德爾在獲釋後得到來自美國和維吾爾離散組織的財政支持，因此比缺乏資源與支持的大多數政治難民更加幸運。當恩維爾在一九九九年流亡到英國時，他的口袋裡面只有五美金，他沒辦法執行醫療業務，只能當搬運工、旅館職員、夜間警衛，從二〇一〇年開始，他是一位公車司機。參與紀錄片所付出的代價是他的執醫生涯與他的家庭，也意味著他永遠無法回到中國。

熱比婭·卡德爾在自傳中聲稱她從十分幼小的時候就知道她「有義務將維吾爾民族自佔領國中解放出來。」但恩維爾反對中國政府的決定並非什麼命定之事，他的童年及其早年生活只擁有不太多的特權，恩維爾在一九六三年時出生在新疆東部的哈密，由於他的父母都在烏魯木齊鐵路局工作，因此他最早的記憶之一就是經常搭火車旅行，他的父親擔任車掌，而他的母親是檢票員。他

出生不久就搬到烏魯木齊，住在維吾爾人不多的區域，因此恩維爾上漢語托兒所，之後又去上漢語學校。他告訴我，在該校三百個學生中，他是唯一一個維吾爾人。直到他長大後甚至還是沒有維吾爾朋友，而這樣的經歷造成的結果是他的漢語說得比維吾爾語還要好。

我問他，作為一所學校中唯一的少數族裔是什麼樣的感覺，當時我們坐在他位於哈克尼的公寓裡面，一邊喝單一麥芽威士忌，一邊吃羊肉抓飯（一種由米飯、胡蘿蔔和多汁羊肉煮成的菜餚），他放下手上的玻璃杯，告訴我：

你會覺得，對他們來說，你是個異鄉人；而如果你非常自信，那麼你會覺得他們才是異鄉人，因為這是我的家鄉，他們才是外來的。我的同學喜歡我並尊重我，我是班上的班長。

在任何中國學校的教室中，班長都是個重要職位，這個地位通常象徵一定程度的政治信任（熱比婭·卡德爾也曾擔任班長），但仍然有些讓人不太

舒服的事情提醒他和同學不一樣。在他七歲時，他的一位同學邀他到家裡吃晚餐，這是他第一次去一個漢族人的家裡：

「他媽媽煮了豬肉，因為肉類是奢侈品，所以她實在是非常慷慨，她的用心十分良好，但我說：『我們不吃豬肉。』我的同學問：『真的嗎？你們為何不吃啊？』這時他的父親說：『因為豬是維吾爾人的祖先。』我的全身都在顫抖，因為我曾因為維吾爾人是龍的後裔而感到自豪，但突然之間，我變成豬的後裔。」

他住的地方非常難得見到其他維吾爾人，少到每當他們的祖父母來探訪時，常常會因為過於引人注目而遭到逮捕。根據恩維爾的說法，他們是因為沒有烏魯木齊戶口而被捕，那個車站是個敏感地區，因此當地民兵幾乎每天晚上都會去檢查。「他們帶走我的祖父母，然後隔天早上我爸媽不得不去接他們出來。」他這麼說，然後因為這事有多蠢而笑了出來。

雖然新疆的維漢關係經常非常緊張，但在某些階段肯定有一些社群間的關係比在今日更加親近。恩維爾記得一九七四年的農曆新年時，他的母親在其

中一天帶了一個漢族中國家庭回家，他們來自河南省，但親戚沒有到車站接他們，這家人無處可去，而當時的氣溫是零下二十五度，所以他的母親把這家人帶回家。「最後他們在我家待了兩星期！」恩維爾回憶說，「後來他們的親戚來接走他們，之後每次過年時我們總是會收到他們送的禮物。」

新疆並未倖免於文革帶來的混亂，但土赫提家族在一九七〇年代仍然昌旺起來，恩維爾的母親生下三個男孩，而他的父親在一九七八年時晉升為該部門的副負責人，他們還可以免費搭火車（當恩維爾成為鐵路醫院的外科醫生時，他依然繼續搭免費火車）。

我問恩維爾在什麼時候知道自己想當個醫生，考量到他為了揭露核試驗所帶來的健康成本而背負的風險，我以為他對醫學有著強大的熱情，但是恩維爾本來想要的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職業：

越戰期間雖然我們是高中生（十六至十八歲），但我們都被動員了，我們組成一個由一百二十名學生組成的民兵團，接受兩個月的軍事訓練。

我們被分配到戰略防禦任務，上頭說蘇聯入侵時我們學校將是第三道防線，身為班長，我得到軍隊在韓戰中使用的半自動步槍和三發子彈，其他人都是空槍。我們在夜間巡邏，而我感到非常驕傲，因為我受到信任，而且所有的漢族人都接受我這個維吾爾人的命令。

作為一個孩子，他喜歡槍枝，而且他可以辨認飛過頭頂的飛機是什麼種類型號，他的舅舅是國家書店的副主任，因此他能滿足恩維爾在軍事方面的各種興趣：

「有本書提到毛澤東的長征，內容跟我們老師所說的互相矛盾。我們老師說他們在跟日本人打仗，但書上說共產黨人只是一直在逃命。如果我知道我現在會在這，我會把那些書都保存起來。」

他嘆了口氣。要不是恩維爾的摩爾多瓦妻子（他們在倫敦相遇）從隔壁房間喊他「恩維爾，我的 skype 有問題！」，這可能是個辛酸的一刻。

「不、不、不，我正在接受採訪！」他喊回去。

「去吧！」我說，然後他站起身。他離開後我環顧一下房間，巨大電視機上方的高架上放了一張他兩個孩子的照片，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照片中的他們是青少年，但我在進門時遇到那個女孩，現在她已經二十多歲，有著長臉和一雙大眼睛。恩維爾驕傲地告訴我：她打算在倫敦大學學院修碩士學位，鑒於異議者家人通常會遭受的限制，我不太清楚她是怎樣來到倫敦的。

恩維爾回來時，給我們兩人各自倒了雙份威士忌，他解釋說，他之所以成了個醫生而不是軍人，是因為他自己犯的一個錯誤。雖然他已經申請了新疆軍校，但卻是在不接受維吾爾人或從其他少數民族入伍時那一年申請（這是優先錄取制度的一個權衡機制，使來自少數民族的人們更容易在某些年份獲得職位）當恩維爾意識到他的錯誤時，已經太遲了——所有其他可能的選擇都已經額滿。他被告知他將去醫學院，他不喜歡，但別無選擇：「我們已經被制約了。」他說，「我們認為某個地方的領導人會賦予我們未來，我們沒有選擇的自由；但這並不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想法，而是一個怠惰的認知——我們不在乎，擺在我們眼前的就是這樣，我們得做的就是讀書與通過考試。」

因此恩維爾在非常不情願的情況下於一九八〇年前往石河子學醫，這是鄰近烏魯木齊一個以漢族為主的新興城鎮，這間醫學院距離市中心有兩英里遠，而且正如恩維爾記憶中的一樣不太有趣：「那邊就只是一整片的曠野，除了喝酒以外沒事可幹。」然而儘管如此，他依然有一個美好的回憶，雖然這個回憶讓人毛骨悚然：

「有條路從大學通往醫院，而且它是條下坡路，當時是冬天，剛下過雪，路面很滑溜，那天老師跟我和同學說：『去解剖室拿二十個人頭到教室這邊來。』我們在每個桶子裡面裝了五個人頭，中途我的朋友跌倒了，十個人頭朝著醫院大門滾下去，我看到所有的人都在尖叫並且試著逃走，我們想找回那些人頭，但只找到九個，其中一個仍然下落不明。」

我問他們怎樣弄到二十個人頭，他揮手將這個問題拋在一邊：

「我們有很多人頭，幾百個。有許多死刑在石河子執行，如果犯人是政治犯的話，沒人會想要收回屍體，即使是親戚也會保持距離，所以最後屍體被送到大學。」

多年以來中國有世界上最高的處決率，二〇〇九年時中國政府承認死刑犯是器官移植的主要來源，但根據恩維爾的說法，除了器官移植以外，死刑犯還有另一種可怕的用途：

「在解剖學方面，中國的醫學生比同時代只使用模型的西方醫學生要好得多，因為我們解剖真正的屍體。」

他的女兒進房間時恩維爾停止談話，我納悶不知道她是不是聽到了，但如果她聽到了，看來這似乎也不太困擾她。她拿起她的手機充電器就離開了。

一九八五年畢業後，恩維爾搬回烏魯木齊並駐守在鐵路局中央醫院——這是鐵路局工作人員的醫院，一九八八年時他的母親強迫恩維爾與她一位老同學的女兒結婚，他的母親已經從一名檢票員變成她所屬城區的副檢察官，並顯然習慣讓他人服從她，她告訴兒子：「你是我最大的兒子，如果你不聽我說的話，那我要怎樣控制其他孩子？」不出所料，這段婚姻並未持續太久，在他的女兒於一九九〇年出生後，他離婚了。翌年他成為腫瘤學專家，一九九三年時他的父母給他安排了另一次婚姻，這次的對象是他父親的同學的女兒，結果是

一樣的，但這次在他離婚之前（一九九四年）有了兒子。

恩維爾享有身為高級醫院的醫生所有的地位與關注，但他仍然不快樂：「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好工作，我的工資甚至比我一個開煤炭卡車的朋友的收入更低。」

我向恩維爾指出，由於他的工作單位支付了房租和所有其他帳單，所以他可能沒多少開銷，恩維爾搖了搖頭，說：「我的煩惱由此而生。作為一個外科醫生，我應該有權得到有兩間臥房的公寓，但我只能住在只有一間臥房的公寓裡面。在我成為醫生後我就開始申請兩房公寓，可是即使我申請了四次，也從未得到我該有的。後來一位寡婦，一個非常漂亮的漢族女人只花了三年就得到三房公寓——那時我真的十分震驚。作為少數民族員工，我以為我們享有特權，但發生這一切事情後，我明白了誰才是特權階級。」

他的同事經常提到身為維吾爾人的恩維爾與他們有哪些地方不同，例如說恩維爾不吃豬肉。恩維爾回憶起某次他和其他八名漢族醫生在部門辦公室時：「一位護士來問了個問題，只有我知道答案，那位護士說：『哇喔，我不知道

一個吃羊腦的人這麼聰明！」恩維爾以同樣的方式回答對方：「聽著，是豬腦聰明呢，還是羊腦聰明？」然後他的同事指責恩維爾對他們有偏見。

然而要是沒有這些小家子氣的話，他可能永遠不會調查新疆的癌症發病率。一九九四年，癌症病房主任跟他開玩笑說：「喔恩維爾醫生，你應該為你維吾爾族人的健康感到驕傲——我們只有四十張病床，你們維吾爾人就佔了其十張！」無論如何恩維爾都很不喜歡他（他懷疑主任試圖勾引他的妻子），而這意味著這個蹩腳笑話對他產生更大的影響：「因為我真的不喜歡他，所以在他這麼說以後，他這番話讓我覺醒了。」

鑒於烏魯木齊鐵路局有十六萬名員工，其中有五千人來自少數民族，後者在癌症病房中的比例實在太高了，恩維爾開始試著從病人的病歷找出原因，最初檔案保管處拒絕讓他調閱資料，他不得不假裝自己正在寫一篇論文以獲得外科主任的許可；恩維爾取得的記錄顯示最普遍的癌症類型是白血病、肺癌和惡性淋巴瘤，而引發這些癌症的共同原因是輻射暴露，他的醫院委託沿著鐵路線進行罹癌率調查後，調查結果進一步證實他的懷疑——結果顯示了非常高的癌

症罹患率（公布的報告版本並未包括這份醫院進行的調查在內）。

這是恩維爾一生當中最慘淡的時光，他的婚姻又一次破裂，而且申請兩房公寓時仍然遭到拒絕，諷刺的是讓他決定揭露癌症流行事實（而這迫使他離開中國）的原因並非是基於操守上的決定，而是這些個人及專業上的挫折。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他設法獲得在塔什干學習烏茲別克語的許可，在證明自己擁有使用電漿刀摘除乳房的嫺熟技術後——沒多少當地醫生熟習這項技術，這項技術可以快速燒灼止血，但仍有燒傷的風險——他在醫院得到工作合約，但後來工作無法踐約，他必須開始靠針灸謀生。

如果他沒有遇見一位朋友的前妻，可能還會在塔什干待上很長一段時間；她告訴恩維爾說他的前妻現在在伊斯坦堡，而且有意與他複合，當他同意時他的前妻透過一個維吾爾政治與文化組織，東突厥斯坦民族中心發邀請函讓他到土耳其進修。他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抵達伊斯坦堡，在這時候恩維爾可能還是能回到中國，但這已經不在他的計畫內。恩維爾表示：

我以為我會在這個國家（土耳其）開始新生活，我透過土耳其政府支付的費用開始在伊斯坦堡大學學習土耳其語，我開始拜訪東突厥斯坦民族中心，並接觸關於東突厥斯坦的新議題。

因此，雖然最終是恩維爾自己選擇參與紀錄片，但是東突厥斯坦民族中心使他有這樣的契機去協助完成紀錄片；東突厥斯坦民族中心在知道他是一位腫瘤科醫生後將他介紹給理查德·赫林（Richard Hering）和史都華·坦納（Stuart Tanner），這兩位英國電影製作人曾經就一九九七年的伊寧動亂做過新聞報導，他們的計劃是假扮成遊客並利用隱藏的攝影鏡頭秘密拍攝，這個技術仍處於初始階段；赫林回憶說，他得先找一位在倫敦托特納姆宮路上開店販售電子產品的俄羅斯人來製造設備，赫林和坦納計畫調查核子測試地點附近城市的新生兒缺陷，而恩維爾自烏魯木齊鐵路局中央醫院取得分類訊息。

紀錄片中有個鏡頭是恩維爾（當時有著漸禿的黑髮）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又稱為伊斯坦堡海峽）的渡輪上，看起來非常放鬆。儘管影片工作人員遇

到的最壞境遇是被驅逐出境，但對他來說最糟的情況意味著二十年的監禁：「我知道這是間諜行為，我知道這會導致什麼後果，但我馬上同意了。儘管我可以感覺到後頸上的一絲寒意。」

恩維爾也承認他很受關注：「那時候只要有一個外國人對維吾爾人感興趣，我們會非常振奮。對我們來說他們就像神，或像是救世主一樣。」

攝影小組在核子測試地點周圍的村莊裡遇到許多有著扭曲四肢、唇顎裂或其他出生缺陷的年輕人。醫院裡的醫生匿名提到當地惡性淋巴瘤、白血病和肺癌的發病率極高。在這樣的情況下，儘管攝影小組引起懷疑，但他們從未被拘留過，然而這樣的威脅始終是存在的。當我在二〇一四年夏天與坦納談話時，他回憶起風險「如影隨形，因為我們問了太多問題，向錯誤的對象提問。被上報或被逮捕——我們每天都在擔心會發生這些事。」

在這段期間，恩維爾非常害怕，但一部分的他喜歡這場歷險：「有時候你會享受擁有秘密的感覺。」他這麼告訴我。

他們遇到的最大問題是醫學圖書館，裡面有恩維爾所需要的文件，但圖書

館在假日關閉。

「我以為我們真的搞砸了。我說：『讓我去那個圖書館走一遭。』我去了，出示我的身分證件，說我需要查閱一些資料。圖書管理員是一個非常普通的漢族人，他說如果我給他買晚餐，他會讓我進圖書館。於是我帶這傢伙去一間有妓女的餐廳，叫了兩個女人，一個是漢人，一個是哈薩克人，我給他們每人一百元，在當時這可是一大筆錢，我告訴這兩個女人：『這是個好人，如果你們讓他樂到飛上天，那妳就可以再拿一百塊。』他跟她們一起離開了。第二天早上我抵達圖書館時，他給我一副備用鑰匙。」

恩維爾獲得的文件，顯示核試驗地點附近村莊的癌症發病率是全國平均數值的三十倍，當紀錄片在一九九八年十月播出時，中國政府沒有回應。恩維爾說，「如果他們否認了，這會像是在認罪。我完全沒有談論政治，我只有談論受害者。我用一把刀抵在他們的軟肋上。」

當恩維爾回到伊斯坦堡時，他開始在醫院裡工作。鑒於電影出自東突厥斯坦民族中心的構想，我問恩維爾，他們後來怎樣對待他，他回答說他們所做

的就是請他吃一頓飯。而更大的擔憂是當局會如何對待他在新疆的親屬：在中國，許多異議人士的配偶或親屬經常受到騷擾或監禁。二〇〇六年熱比婭·卡德爾的四個子女被投入牢獄，顯然就是為了報復她的激進主義行為。但恩維爾的家人在二〇〇四年之前都沒有被秘密警察探訪，而當時他們放低了姿態，恩維爾說他們告訴他的母親：「你的兒子只是犯了個錯，他沒有做壞事，而我們也犯了一些錯，我們為此致歉。如果他接受我們的歉意，我們會歡迎他回來，醫院的職位一直為他保留著，我們甚至會提拔他。」此外他們也提供了他一直想要的大公寓，並定期在伊斯蘭教節日給他母親送禮物，有一次他們甚至送了一頭羊。

這樣的策略是為了讓親屬向流亡者施壓、要求他們返國，這樣的過程可能會有一定程度的成果，並給佯裝合作的親屬帶來獎勵。二〇〇五年恩維爾要母親同意他們對他所說的一切，並認為正因為如此他的女兒才能在二〇〇七年時來到英國。唯一的問題是他的母親因為扮演她的角色而失去自制力。「她開始試圖說服我回家，因為警方要她這麼做。」我說，「妳瘋了嗎？」她告訴我：

「是你要我聽他們的話！」

儘管恩維爾計畫留在伊斯坦堡，但那裡很快就變得不安全了。一九九九年中國總理李鵬計畫前來土耳其簽署引渡條約，恩維爾知道他必須逃離，並選擇了電影製作人的國家（英國）轉移陣地。他在一九九三年三月抵達英國並申請庇護，一開始他與一位土耳其醫生住在一起，沒多久後他與紀錄片劇組見面，恩維爾希望他們能夠提供一些財務援助，但援助無法依期待到手。這顯然讓他失望了，電影製作人沒有能力資助他，赫林回憶說當他自新疆拍攝回來時，他破產、沒有工作，而且還染上熱帶疾病。

在接下來的十年裡，恩維爾換了一份又一份的工作，有段時間他在奧德維奇打掃一間劇院，他記得第一個晚上他在座位底下撿到八十英鎊和一只古馳手錶（他的妻子現在仍然戴著這只手錶），他在一家旅館工作時遇到同樣在那兒工作的安潔拉。二〇〇五年時他試圖回到土耳其到一家私人醫院工作，但抵達時被拘留了五個小時，然後遣返回英國。雖然英國國民可以在抵達機場時獲得簽證，但他們告訴恩維爾他得事先申請簽證才行。

在某些方面來說，自從恩維爾來到英國，他就一直過著雙重人生，除了他在倫敦維吾爾小社群中的朋友以外，城裡沒有人知道他的經歷；其他公車司機甚至不知道他在中國是一個醫生，直到最近幾年中國越來越流行微信或WhatsApp等社交媒體程式，他的文章才開始在上頭流傳。「我媽媽對我說：『你寫了什麼啊？』我說：『我沒寫任何東西。』她說：『你明明有寫。』我告訴她：『那是我十年前寫的！』」

然而儘管新疆核試驗對公眾健康造成極大的傷害，而且這個問題還持續下去——中國政府尚未承認這件事，更不用說提供賠償了——這個問題很少受到學術界或媒體關注。對此恩維爾將之部分歸咎於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我不認為他們有在推動這個議題，他們不能避開這個問題，但現在也沒有更新的資訊，我甚至自行將《第四頻道》的紀錄片翻譯為漢語，可是沒有人將這部影片翻譯成維吾爾語，要做到這點對他們來說太容易了。」

恩維爾不太可能再次行醫，他想放棄開車並經營一家中亞餐廳，但找不

到商業夥伴。當我問他現在對此感覺如何時，他悲傷地微笑著：「說我不後悔是騙人的，我放棄了過去美好的生活。但讓我重來的話我還是會做出一樣的選擇，那些發生的事情是我無法接受的。」

儘管恩維爾和熱比婭·卡德爾因為相當不同的理由而成為異議人士，他們都為了譴責中國政府在新疆的政策而付出沉重代價。正如史都華·坦納所說的：「一些非常勇敢的人冒著風險揭露這些事情，讓世界知道現在發生了什麼事。」他們非常不同的故事證明了，中國政府長期以來決心防止人們公開討論新疆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要面對怎樣的社會經濟問題，他們藉此阻礙任何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能。中國政府在這當中固然出台過很多政策，也宣稱這些政策是成功的。直到一九九〇年代末期，在伊寧抗議事件激起許多問題後，政府終於公布了關於新疆最新的大計畫。

孔雀向西飛

第六章

經濟發展並不能消除分裂主義份子。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 王樂泉

千禧年，中國以一個對西部人民的承諾拉開序幕：政府承諾他們終於能夠得到中國沿海地區有幸能得的財富。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當時的中國主席江澤民宣布了「西部大開發」（又被稱為「開放西部」）運動，這個運動的目的是「縮小地區差異，最終達到共同繁榮。」

這個運動就像中國其他浮誇的國家運動一樣，它更側重於修辭文句而非實際的政策細節，一開始它甚至並未指明何謂「西方」，從地理上來說，像新疆一樣的西部地區還有青海、四川、西藏和甘肅，但中國中部兩個省（湖南、湖北）和東北部（吉林）的一部分也被包括在計畫內。雖然這個運動並未為了涵蓋在內的區域設定標準（無論是地理上的標準或是國內生產總值的標準），但這三個區域（及大部分地理上的西部地區）居住著大量少數民族人口，這可以視為官方已經默認了不只區域之間仍存在重大的不平等，而且這樣的不平等也存在於民族之間。這項措舉的定位是促進國家層面的社會穩定，這也可以被解讀為政府承認這種不平等可能會導致「大規模事件」。

在「開放」的早期階段，當局就已經明確表達過經濟重點需要在某個時期

從東南部轉移，為此制定時間表的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時承諾，一九九〇年代末期時政府「肯定會逐步而平穩解決富裕沿海地區及貧窮內陸地區的貧富差距問題」，最致力於將這個想法保留在經濟議程上的是胡鞍鋼，這位非常有影響力的經濟學者一再發出警告，說中央政府應當在經濟上發揮積極作用，否則貧窮地區和富裕地區之間的差距將會持續擴大。

雖然江澤民絕不需要遵守鄧小平的承諾（儘管他是鄧的繼任者），但在這時候實行承諾可說是恰逢其時：中國在經過十三年的談判後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而這代表中國國內市場很快就會對國際貿易開放，中國公司會開始面臨來自外國公司的競爭，而這對中國內陸省份的傷害可能會更大，對「開放西部」運動的投資正是為了彌補這一點，同時也意在吸引外資投資。正如胡鞍鋼在二〇〇〇年接受採訪時強調的那樣，當時有人向他暗示中國對國際網路的重大監控可能會使外資卻步，他這麼回答：「政府擔心網路上的那些色情網站（中略）但我不認為外國人會花時間發佈線上色情節目，所以就讓他們來做生意吧！」

最初的跡象卻顯示外國投資者因為不太色情的理由而猶豫不決，七十名香港的執行長在中國西部進行為期十天的訪問後，他們只願意投資三千萬美金，正如英國商務協會的負責人所說：「內地是個很大的地方，因此我們需要詳細研究一番。」

開放西部運動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毫無組織的政策，因為它顯然缺乏預期目標，充其量它只有一些大體上的目的，像是將移工自東南部遷向其他地方，或是像一位國務院（中國主要行政機關）成員用毫不必要的詩詞文句比喻的「讓孔雀向西飛」（這個說法改自著名漢樂府詩《孔雀東南飛》）。雖然直到二〇一〇年結束為止孔雀都沒有飛到中國的其他地方，但在新疆，自從一九五〇年代以來，隨著加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漢族移民一波波遷入，其實一直有中國本土人口往新疆遷移。根據人權觀察組織的資深研究員尼可拉斯·貝凱林（Nicholas Bequelin）說，基於這個原因和其他理由，開放西部運動不能被視為北京對新疆政策的重大轉變，相反地，這個政策是進一步強化了先前的政策。

對於政府的主要投資地區來說確實是如此，計畫初期時，承諾在十年中陸續挹注的九千億元（在當時這個數字約為一千億美金）有百分之七十都投入北疆，這些資金主要用於建設基礎設施及擴大能源部門；而「十五計畫」（第十個五年計畫）又擴充了這些資金，承諾投入另外四千兩百億人民幣（在當時是五百一十億美金），這幾乎是「九五計畫」的兩倍之多。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維持新疆穩定的重要性又再次被強調，學者兼政策顧問馬大正（一九三八—。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呼籲擴大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作用，並在內部備忘錄中明確指出兵團的重要性來自組成兵團的民族，而非兵團的商業或軍事角色。馬大正認為「漢族是讓新疆穩定最可靠的力量」，並提倡應該鼓勵漢族移居南疆來包圍以維吾爾族為主的區域（這個概念可說是以色列在佔領的巴勒斯坦領土的移民政策翻版），大量漢族人口被視為一種將中國的邊緣邊疆區域轉變為更類似中國核心區域的方式。

雖然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宗旨可能大致保持相同，但其運作方式改變了。

自從「開放」以來，兵團已經逐漸從軍農合一的模式變成某種更像法人團體（儘管它是國有的）。一九九八年，兵團更名並取得法人資格，被授予進一步的法律自主權（兵團擁有自己的法院）並置於中央政府的管控之下，從那時候開始，解放軍和人民武警的唯一作用就是為其少數成員提供軍事訓練，澳洲國立大學的研究員湯瑪斯·克里夫（Thomas Cliff）表示，這樣的轉變反映出政府相信「經濟力量能以軍事力量無法辦到的方式成為一種合法的控制形式。」

雖然沒人會說政府不願意投資新疆，但選擇投資的主要部門和先前投資的重點一樣，從全國的格局來看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中國的能源需求正繼續快速成長，而新疆擁有大量的天然資源——在二〇〇〇年，新疆生產的原油佔中國的百分之十一，天然氣則佔百分之十三——而且非常接近中亞可能的能源來源。國有企業中國石油營運的計畫之一是修築一道四千兩百公里長的天然氣管道，這條管道自塔里木盆地延伸到上海，於二〇〇四年竣工，是整合新疆與中國其他地區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步。新疆的黨委書記王樂泉在二〇〇二年時向

中央政治局進一步強調了新疆對中國整體經濟策略的重要性。

對北疆工業及基礎建設的投資，確實創造了就業機會並改善物質條件，但受益對象主要是居住在城裡的漢人。二〇〇〇年新疆的城鄉收入差距比全國平均還要超出百分之三十——與和農業為主的南疆相比差距更為懸殊，儘管南疆人口佔新疆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七，但南疆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口住在城市裡。

開放西部運動著重於將新疆自然資源轉移出去，卻沒為該地區的維吾爾人提供多少實質性的好處，這使得許多觀察家將這個運動歸類為殖民計畫，「將新疆視為中國的內部殖民地是否適當？」這個問題一直備受爭論，而答案往往取決於每個人對更廣泛歷史問題抱持的觀點、中國共產黨統治該地區的合法性，以及個人對於殖民關係的定義。若說這個政策將新疆視為殖民地處置可能真的是太草率了，但若說開放西部運動有著殖民式的面向，這樣的說法並不是太牽強，新疆的天然氣和石油不容易移動和運輸，而新疆政府確實收到一些稅收，但大部分利潤並未留在新疆。

我們沒有必要靠贊同「漢族政府掠奪維吾爾家園」這番敘事來挑剔開放西部運動的錯誤，一些中國評論員將這個運動視為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更強大的沿海省份的積極戰略，一位四川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將這個運動總結為「利用西部，發展東部。」

開發環境付出的代價是令人非常憂慮的事情之一，特別是在新疆這樣容易沙漠化的缺水地區，雖然官員一再強調生態保育是優先事項，但環境保護局並非領導計畫的核心小組成員，官員顯然太誇大了。而對環境保護的主要承諾是一系列解決水污染、非法採伐和促進造林的活動，但這些企圖的預後非常讓人沮喪，先前類似運動粗劣的規劃、實施和執法使得《一江黑水：中國未來的環境挑戰》（*The River Runs Black: 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to China's Future*，1999年）一書的作者伊莉莎白·艾克諾米（Elizabeth Economy）在一篇文章中預測「他們不太用有意義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的成員李德洙也發表了富有殖民意味的評論，他再次強調少數民族的劣等並認為他們需要向漢人學習，對李德洙來說這樣的觀點沒

什麼問題——在他看來，中國的不同民族都是同一個大家庭的一部分。

對北疆的投資被呈現為一種減少不平等的方式，這種指導性假設（一如一九九〇年代時期那一套）是北方工業投資帶來的繁榮會「滴漏」下來，一些中國經濟學家指出這個在「開放」時期也被採用的邏輯已經在全國性的層面被證明是錯誤的（也因此才需要進行開放西部運動），正如一位專家在二〇〇一年所建議的：「政府在投資及產業位置的決策中可能必須犧牲經濟效益。」換句話說，要開始鼓勵南疆的工業。

雖然決策者並未聽從這個建議，但政府終於坦承取消優惠就業政策對少數民族產生更大的影響，二〇〇一年，共產黨的新疆研究小組的結論是「少數民族勞工越來越難找到工作，特別是找契約農場工作或是非國有企業的工作。」工作小組同樣也認為少數民族勞工在專業工作領域也遭遇同樣的問題，言道：「和漢族畢業生相比，少數民族畢業生難以找到工作。」然而對此問題，官方的解釋中並未承認勞動市場（包括非正規的和正規的）對維吾爾人的差別待遇程度，或將他們實質排除在一些經濟上的大產業之外。但由此可知，真正讓

維吾爾人在勞動市場上落後的原因，並不是他們不會說漢文。

「雙語」教育的「需求」？

問題不在於維吾爾學生不會說漢文，自從一九八四年以來，所有維吾爾學生都在學齡前課程上學過漢語；而在一九八四年之前，進入中學的第一年就有漢語課程了。中國政府所關注的原因顯然是維吾爾人漢語學得不够好，而且他們眼中的原因是：維吾爾族學生上的課程並未用漢語授課。

直到一九九〇年代末期為止，新疆的教育是被民族語言分隔開來的，漢族學生有自己的學校，用漢語授課；而少數民族則在各自的學校中用他們的族語上課。雖然確實有少數民族學生就讀用漢語授課的學校（所謂的民考漢），但這樣的學生比例很少，大約只有百分之六，而且這些學生幾乎全部都住在城市裡。雖然維吾爾學生在漢族占多數的地方（如烏魯木齊）學習漢文會取得

明顯的優勢，但在南疆大多數地區，漢人少，漢語也用得少，讓孩子去上用維吾爾語講授的課程也同樣重要。然而這不只是一個實用主義的問題：即使是在烏魯木齊這樣的地方，一些有兩個孩子（這是他們的權利）的維吾爾父母選擇送一個去上漢語學校，另一個上維吾爾語學校，許多父母認為讓孩子用自己的族語上課並跟自己的同儕相處是孩子社會發展和道德發展重要的一部分，同時也是一種確保孩子與維吾爾文化保持連結的方式。

然而在二〇〇〇年代初期，少數民族的教育體系有著明顯的重大問題，新疆僅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少數民族學生能從初中升上高中（給十六歲到十八歲的孩子就讀），而漢族學生升上高中的比例是百分之八十七；在喀什噶爾，少數民族學生的升學率低到只有百分之十八，在和田更只有百分之十。許多中國專家如任教於北大的社會人類學家馬戎，將這個低就學率歸因於「歷來新疆沒有發展出優質的少數民族教育」，這並不意味著批評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在新疆的教育政策，更像是提及該地區所謂的「落後」，馬戎的評論並非毫無依據：在清朝征服新疆之前，新疆所謂的教育僅限於伊斯蘭教育，清朝確實實行

了改革，但主要是給突厥精英階層的孩子們的新儒學學校，清朝滅亡之後有了現代學校，但只有少數的少數民族選擇就讀。

中央歐亞學者許臨君 (Eric Schluessel) 提出了一個有力的看法，接下來幾十年能在新疆看到少數民族教育在扎吉德主義 (Jadidism，十九世紀末在俄國韃靼人社會興起的新式教育，後來在中亞等地穆斯林聚居區及中國新疆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聚居區廣泛發展，為穆斯林帶來了適合現代社會的教育方式) 和泛突厥 (panTurkic，由十九世紀的韃靼知識分子萌發的文化和政治統一民族主義運動) 思想的雙重影響下出現廣泛革新，扎吉德主義是一個教育改革運動，在阿拉伯語中，扎吉德 (jadid) 的意思是「新」，這個運動的影響力集中在北疆，它主張伊斯蘭教應該在教育領域佔據次要的道德角色，教育的主要目標應該是讓穆斯林參與及振興現代社會而做準備；而泛突厥主義的做法也大致相同，在南疆十分興盛，因為南疆出身的許多知識份子曾經在鄂圖曼帝國受過教育。

因此馬戎說的「歷來沒有發展出」是不夠真確的，自一九四九年以來新疆

的教育水準提高了很多——特別是在提高識字率和學生的入學率上——現在教育體系的許多問題有著更為同時代的理由。喀什噶爾某個區域有百分之六十八的學生因為經濟理由而輟學，儘管二〇〇六年時廢止了學費，但要送孩子入學仍然需要支付許多費用，即使維吾爾父母付得起這些費用，但許多低收入者如果認為教育無助於提高孩子找到工作的機會，他們也不覺得讓孩子接受教育有任何意義。

少數民族教育的「落後」不僅僅是個教學法議題，王樂泉認為根本性的問題是維吾爾語本身造成的，他聲稱「少數民族語言能力很差，缺乏現代科學技術的許多詞匯，無法教授這些概念。」而對此的補救措施是最好將所有學科的主要教學語言從維吾爾語換成漢語，以確保「維吾爾青年的素質不會比同齡的漢族更差。」

王樂泉的主張正如馬戎的主張那樣有一定的根據，現代維吾爾語不像漢語那樣被賦予一些科學和科技詞彙，但其理由並非像王樂泉暗示的那樣是因為語言本身的缺陷，現代維吾爾語的不足與一九四九年後新疆的語言政策有更大的

關聯性，而這些語言政策有許多是在政治性考量下制定的。

一九四九年之前，維吾爾語是以阿拉伯字母書寫，並包含許多源自俄羅斯的外來語字彙；在「解放」之後，少數民族語言受到新疆民族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管轄，他們先將維吾爾語改用西里爾字母書寫，但在中蘇交惡後又改為拉丁字母，以妨礙新疆少數民族與蘇聯共和國之間的交流（相較之下，西藏因為沒有這樣敏感的邊界，所以得以保留其自七世紀以來一直使用的書寫系統）。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為對各種少數民族文化的歧視而導致更嚴重的實質中止學業，這只有徒增語言的混亂（到「開放」為止阿拉伯字母都沒被重新採用）。直到今日，我們仍然可以在新疆許多城市的舊建築看到這兩套舊字母系統的痕跡。

民族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不怎麼想幫現代維吾爾語現代化，他們不允許使用來自俄羅斯的外來語，而偏好來自漢語的詞彙，儘管對維吾爾人的學習來說使用俄羅斯外來語比使用漢語外來語更加容易（由於維吾爾人的先備知識，也由於俄語和維吾爾語一樣都是重音語言，而漢語是聲調語言）。事實上他

們可以建立新的維吾爾科學字彙或科技字彙表，就像哈薩克共和國用獨立後使用哈薩克語建立新字彙一樣。

但新疆當局並沒這麼做，他們傾向於讓維吾爾人停止用維吾爾語學習，這充分說明了他們對於維吾爾文化毫不關心，然而中國的憲法和其他法律確實為少數民族語言在教育與文化上保留了一席之地，例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十二條聲明「少數民族學生為主的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可以使用本民族或者當地民族通用的語言文字進行教學。」出於這樣的理由，政府將以漢語作為少數民族的教學語言一事描述為這是轉換為「雙語教學」，這樣做的根源可以回溯到一九八〇年代末期，當時有一個研究建立雙語教學試驗學校可能的工作小組，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時，新疆已經有大約五十個試驗雙語班級，在這些班級中只有少數課程（主要是科學與數學）使用漢語教學，因此這時候說這是「雙語教學法」是一個公正的描述。

民考民／民考漢系統直到二〇〇〇年代中期都還保留著，但二〇〇二年九月，一份公告表示大學課程將不再以維吾爾語授課，這已經表明了教育制度發

展的方向。高等教育一直是政治顧問同樣關心的課題，馬戎曾哀嘆說「以漢語授課的科目和以維吾爾語授課的科目實際上是彼此隔離的，儘管它們都在同一個校園裡。」這是真的，而漢族與維吾爾族學生需要各自的食堂（分別供應清真食品和非清真食品），而雙方經常得住在不同的宿舍又更強化了這樣的隔離，這個體系有問題——缺乏社會接觸的確無法幫助撫平漢族和維吾爾族間的分歧——但對馬戎來說真正的問題是：這意味著這些少數民族學生「很難和學習及工作過程中不說他們母語的人們交流。」實際上，馬戎這麼說是主張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裡面對維吾爾人來說最重要的語言是漢文，而他無意承認將漢文置於維吾爾人母語之前可能會對他們使用母語交流的能力產生不利影響，更不用說其他社會和文化後果了（儘管民考漢學生的經驗已經證明這件事）。

官方也並未提議漢族人——在一個以佔多數民族命名的自治區內，本身並非屬於該多數民族的一員——應該學習少數民族語言。新疆只有極少數的漢人有辦法說上比較多句的少數民族語言，即使是那些在新疆長大的漢人也是如此；而會說少數民族語言的例外往往是從一九五〇年代或一九六〇年代就來到

新疆的老年人，因為在他們來新疆的年代漢族要少得多。一九七八年以前，學校學習的主要外語是俄語，但在新疆的一些學校，漢族學生從第三年開始教維吾爾語，但是在「開放」之後，英語成為教育體系中最重要的外語，二〇〇六年，一名在阿克蘇（塔里木盆地北緣的一個城市）的老師回憶道：

在一九八〇年代之前，漢族學校從三年級開始給漢族學生上維吾爾語課程，所以漢族學生會說維吾爾語，而漢族和維吾爾族的孩子們會玩在一塊兒，這樣的語言交流和相互理解對他們來說是很好的，但現在已經不一樣了。在開放及改革政策後，漢族父母只想讓他們的孩子學英語，而學校裡面的維吾爾語課程已經被英語課程所取代。

新疆最不認真執行的規定之一就是「漢族的政治幹部應當要學習當地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官方很少鼓勵這種表面上的善意，除非你把一些可笑的方式也算進去，像是二〇〇四年在電視上播放名為《一週一句》的十分鐘節目，

將一句話以漢語和維吾爾語重複十分鐘。但我還是得提提馬戎做的某件事，他確實提議過，如果部分漢族不打算在職業生涯中使用英語，那他們在學校應該用維吾爾語或其他少數民族語言課程取代英語課程。

整個二〇〇〇年代，新疆當局積極力求推動少數民族學校雙語教學，在二〇〇四年時大約有百分之二十的少數民族班級被稱為「雙語」班級（儘管有著程度上的不同），當局宣布他們「大力推進雙語教學工作的決定」，而其中的含義之一是維吾爾老師要不是再次接受以漢語教學的訓練，不然就得退休，對許多維吾爾教師來說，特別是對老一輩而言，因為他們對漢語的掌握能力很差，因此不太可能接受再次培訓。在課堂上用漢語授課的規定特別嚴格——任何被發現以維吾爾語來補充其漢語解釋的老師都可能被罰款。非漢族老師也必須通過考試來證明其語言的流利程度——這些考試的偽造證書很快就以兩千到三千人民幣不等的價格出現在市場上。

到了二〇一〇年結束時，烏魯木齊所有的高中班級都已經以漢語授課；當局的目標是在二〇一二年時能讓百分之八十五的幼稚園課程幾乎以漢語教學，

唯一指定用維吾爾語上課的課程是維吾爾語課程本身——因此這些老師唯一能說維吾爾語的就是這門課程，彷彿把學生的母語當成一門外語或是某種古老的語言，這樣的規定保證少數民族學生每星期可以在學校聽到兩個小時的母語，這使當局得以繼續延續「雙語教學」的謬稱。

二〇〇五年推行的「語言和諧」概念進一步將漢語和維吾爾語教學比例的明顯不平等正當化，那一年的早些時候總書記胡錦濤提出「和諧社會」的概念，所謂「和諧社會」提供一個和樂而朦朧的憧憬，認為中國在不遠的將來會成為一個社會的每一份子都為了整體的改善而共同努力的地方。而「語言和諧」正如中國學者周慶生所闡述的那樣，是一種將新儒家倫理準則與扭曲過的資本主義融合而成的概念，認為應該由市場力量來決定一種語言的價值，這代表著每種語言在社會中所佔的席位取決於前述的價值，社會中各種語言之間的「和諧」關係是較無價值的語言（例如維吾爾語、藏語或其他少數民族語言）必須屈服於另一種更有價值的語言（最有價值的總是漢語），這種令人不舒服的功利主義概念的影響力在二〇〇七年新疆人民政府主席努爾·白克力的演

講中可見一斑，他說：「每種語言的社會功能依據其歷史、地理和人口分布狀況有著相當大的差異。」

對新疆當局來說，少數民族學生以漢語學習的好處可從這個例子看出來：從二〇〇〇年開始，當局開始將來自新疆貧窮農村的孩子送往中國內地各大城市的頂尖學校就讀，這個「新疆班」是四年制的寄宿學校，考慮到其邏輯上的結論，這基本上是一所民考漢學校，新疆班的少數民族學生不只用漢語學習、有漢人同儕，而且他們還在遠離自己母語環境的地方就學。前五年，每年只有一千名學生被送去新疆班，但之後人數迅速增加——到二〇一四年，這個數字預計增加到約有一萬人。當局一直費盡苦心強調這些學校並非像某些人認為的那樣企圖切斷這些學生的民族認同感，並以提供清真食堂和文化節日的觀察報告（雖然大多數是世俗節日）為這個計畫辯護，但這些在文化敏感度上的嘗試偶爾會得到反效果，正如一位教師所說的：

因為我們不熟悉這些學生的風俗習慣，我們在對待他們時是非常小心

謹慎的，曾經有一些維吾爾男孩把頭髮染成黃色、維吾爾女孩給自己塗了指甲油，我們認為這些行為是他們的民族習慣，因此就隨他們了。

儘管如此，當局並未掩飾新疆班的意識形態目標，學校的優先事項包括「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熱愛社會主義的祖國，維護中國統一的民族教育及促進民族團結教育」——換言之，漢族和少數民族是不可分離的，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而每個少數民族之間也是不可分離的。

這樣的宣傳也大量出現在進行雙語教育的維吾爾學生的新教科書中，其中一本課本的第一課是速成的愛國主義課程：

第一課：我們是中國人

句型：我們是中國人，我們熱愛我們的祖國。

對話：

賈：我是個中國人。

易：我也是個中國人。

賈：我們都是中國人。

易：我們熱愛祖國。

賈：我們祖國的首都在北京。

易：我們熱愛北京，我們熱愛這個祖國的首都。

少數民族學生用以學習的漢文教材中，不太會提到各種不同的社會與文化環境，南疆的一位教師這麼說：

大多數課程的內容與那些下了課就不說漢文的學生毫無關聯，例如說，我教他們用漢文買菜，但他們去市場上的時候只會用到維吾爾語。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政策的重點正是要著重於更廣泛的漢族背景，新雙語教育的目標正是促成國家認同，而非地方性的歸屬感。國家利用教育（無論是用

隱蔽的手法或公開的手段）試圖灌輸學生公民意識不是什麼新鮮事，但雙語政策所做的顯然並不只是灌輸公民意識，鑒於共產黨將任何一種非漢民族認同一概視為社會發展的絆腳石，推動新疆「雙語」教育的目標肯定是讓維吾爾人喪失文化與語言認同。

然而一些新疆班的維吾爾學生表示：即使是這種最為融入式的「雙語」（也就是說，實質上幾乎只用漢語）教育，可能也無法保證教出政府所希望的那種被漢族同化的維吾爾人。自二〇〇六年就開始研究新疆班的古茂森斯（Timothy Grose）認為很多參與新疆班計畫的維吾爾學生仍然和他們的漢族同學保持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e），他採訪過的所有學生都表達了對維吾爾文化及傳統的強烈認同，而這也引出一個問題：儘管新疆的「雙語」教育對維吾爾語產生威脅，但這樣的教育是否也產生一批身分認同不只是「中國人」或「維吾爾人」的特殊維吾爾青年世代？或許同樣重要的還有透過音樂和網路傳播的全球青年文化影響力，研究維吾爾身分認同及青年文化的喬安妮·史密斯·芬利（Joanne Smith Finley）說，其產生的結果可能是一種更「多元」

的「國際主義」身份認同，而這樣的認同如果經過「其他維吾爾社群的高度包容」，這些學生可能成為銜接漢族和維吾爾社群間的橋樑。

最終，雙語教育的真正問題在於：這個可能會對維族文化和語言產生巨大影響的激進政策轉變從未諮詢過維吾爾人，過去人們經常會以示威活動來回應政策的重大變化，例如一九八〇年代烏魯木齊的抗議計劃生育活動，考量到語言在維吾爾身分認同及文化上的中心地位（民考漢學生經常遭到非難就是典型的例子），維吾爾人對雙語教育政策的實行採取行動似乎是非常不可避免的發展。

但與二〇一〇年發生在青海和西藏，對「雙語」教育的激烈抗議形成鮮明對比——新疆並未出現巨大的反對聲浪。其中一個原因是肯定有維吾爾父母希望孩子能夠學好漢語，以對他們的未來有所幫助（證據是許多維吾爾人並不會絕對性地拒絕所有形式的中國統治），至於這樣的政策將使他們的孩子在流利使用母語上付出一些代價，有些家長低估了這樣的可能性，認為家庭教育可以避免這種情形發生。然而鑒於很少家長會把孩子送去民考漢學校，顯然還

有其他原因使維吾爾人沒有對此激烈抗議。

若去問當局為何新疆沒有出現明顯的反對意見，他們可能會像王樂泉在二〇〇一年九月二日所說的那樣，回答這是因為「新疆現在的條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還要更好。」王樂泉繼續補充說，因為人民「安居樂業」，所以社會十分穩定。但二〇〇〇年代新疆的社會和政治氛圍，肯定不利於表達任何政治上的異見，所以這當然不是因為現在的條件「比任何時候都還要更好」。

中國加入「反恐戰爭」

當我們試著為新疆的暴力事件撰文時，會遇到的主要問題之一是確定這些事情發生的頻率——弄清楚誰做了什麼、原因為何，而這需要在第一時間就知道有事件發生。每次新疆發生事件，當局不得不在試圖阻止人們討論事件或該公布事件之間做決定，這兩種策略各有優勢，也都伴隨風險，公眾暴動可能會

讓當局顯得軟弱無力（特別是動亂所在地的地方政府），並激起其他地區的人民發洩他們的不滿。但試圖假裝沒有事件發生，將會使其他勢力控制該事件的話語權（即使只是以傳聞的形式，傳聞在新疆特別有影響力）。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公眾動亂能使當局抓住機會來推動一個特定的議題，這個議案可以是現有的政策，或是政策方針的改變——但幾乎完全由國家所把持的媒體使當局得以呈現出一個大體一致的訊息。

已知發生於一九四九年到二〇〇〇年之間的新疆諸多事件，我們了解的細節並不多，有鑑於此，人們可能會得到的結論是認為在這段時期當局可能採取更加保守的選項，試圖壓制那些公開抵抗國家權威的相關訊息。從新疆「和平解放」的創始神話，到無人反對像「大躍進」或是「文化大革命」這類暴行的論點，中國在新疆的普遍趨勢是試圖呈現出該地區生活的正面觀點，以強調已取得的社會進步，當發生的事件大到無法遮掩，這些事件通常會被描述為不涉及特定意識形態議題的犯罪事件，於是伊寧動亂最初呈現的狀態是「少數犯罪分子打砸搶燒的事件。」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一日，當兩架飛機墜毀在紐約世貿中心的雙子星大樓時，我正住在伊寧，雖然中國新聞媒體報導了這個事件——幾天內就有人在出售九一一攻擊事件的影片總集光碟——新聞報導將這場攻擊歸咎於伊斯蘭恐怖份子時，這並未在我認識的維吾爾人中激起任何特別的不祥預感，幾乎所有人都譴責襲擊事件，儘管有個傢伙懷疑是否是基地組織發起這項攻擊行動。他希望這件事被歸咎於中國政府，然後「美國人就會和中國人作戰，他們會贏，然後我們就自由了。」

當中國政府於二〇〇一年十月宣布中國也是「國際恐怖激進主義的受害者」時，這番宣言並不那麼讓人驚訝，第一眼看去，中國當局手中是握有足以這麼主張的材料：一連串與穆斯林族群有關的暴力事件，而且都集中在靠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地區，他們信心滿滿地希望「打擊東突厥斯坦恐怖勢力能被視為國際打擊恐怖勢力的一部分，也希望我們的行動能贏得理解與支持。」

在中國，這個聲明是他人眼中新疆（及維吾爾族）形象改變的開始。一位出身北京的研究員溫寶在十月去了趟新疆，他聽到很多說法，也表達了自己

的看法：

關於新疆的戰爭傳聞與危險的故事，這些謠言使我的一些朋友十分佩服我在當時去了新疆——中國的伊斯蘭區域；而其他人則更擔心我的安全。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中國政府在美國國際反恐戰爭與它自身的關注之間建立了明確的聯繫，十一月十四日，一位外交部發言人針對維吾爾分裂主義進行記者會，據稱一些新疆分離主義者在被送往中國前已經在阿富汗接受訓練，而一個被稱為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的組織已經得到奧薩瑪·賓拉登的支持與指導，顯然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的領導人艾山·買合蘇木在一九九九年與二〇〇一年和賓拉登見面，並獲得「巨額資金」的承諾，據說有超過三百名維吾爾人與塔利班並肩作戰，賓拉登的目標顯然是發起一場「聖戰」，目的是在新疆建立一個神權政治的伊斯蘭國家，雖然中國政府沒有提出太多證據來支持這

個主張，但美國方面的聲明卻讓人不得不信；美國宣布他們的軍隊已經逮捕二十二名被懷疑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基地組織戰士的維吾爾人，這些人被審訊了幾個月，然後在二〇〇二年初送往關塔那摩灣（Guantánamo Bay，位於古巴東南端關塔那摩省的美軍關塔那摩灣海軍基地）。

二〇〇二年一月發布的一份白皮書，提供一個中國主張自己是國際恐怖份子目標的擴張論點，這份文件的標題是「東突厥斯坦恐怖勢力不能逍遙法外」，並解釋恐怖份子對中國發動攻擊的起源、原因及所犯下的罪行，它認為「在二十世紀初，少數狂熱的新疆分裂主義者及極端宗教份子，根據舊殖民主義者創造的詭辯和謬誤捏造出『東突厥斯坦』的故事。」這份文件繼續說明在一九九〇年到二〇〇一年間，在新疆發生了兩百多起的恐怖主義事件，導致來自各民族的死者共一百六十二人，其中包括官員及宗教人員；它將一系列動亂、爆炸、暗殺及縱火等攻擊事件歸咎於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及一些不同的組織，巴仁事件成為「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所推動的事件，而伊寧的抗議事件則歸因於「東突厥斯坦伊斯蘭真主黨」。這份文件從未提到族裔在這些事件

中發揮什麼影響力，文件只有在提到恐怖份子的受害者時提到維吾爾人，並且藉由文件聲明「中國各民族人民，包括維吾爾族，應當堅決反對新疆的恐怖主義」時再次強調這一點。

有許多原因使人對白皮書的主張抱持懷疑，尤其是發布的時間點。中國政府突然決定在這時候承認看似悠久的恐怖主義歷史，這實在是太方便了；而且這份文件還包含許多不一致和可疑的說法，有時候「東突厥斯坦恐怖勢力」被指控該為一起事件負責，但在其他情況下又提到另一個特定團體的名字，雖然中國以前曾經提過某些團體的名字，像是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但也是非常近期的事），其他像是「伊斯蘭聖戰士」、「伊斯蘭改革派突擊隊」和「東突厥斯坦伊斯蘭真主黨」都是以前從未聽說的，由於缺乏關於這些團體的其他訊息，這使一些觀察家懷疑這些組織是否真的存在。而至於恐怖主義威脅的規模，主張曾發生過「兩百多起事件」看起來是很誇張的，顯然這取決於如何定義「恐怖主義」，雖然目前沒有國際公認的定義，但對大多數專家來說，恐怖主義行為是出於政治動機、針對平民的計畫性攻擊，用意是發表公開聲明並造

成廣泛的恐懼，沒多少人會認為白皮書將「焚燒莊稼」或「搶劫」歸類為恐怖攻擊是適當的。

白皮書的各式問題並未阻止美國政府支持中國的主張，二〇〇二年九月，美國將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列入其中一份恐怖組織名單之中——不是那份美國的《外國恐怖組織》名單（有時媒體會誤植為這份清單），而是《恐怖組織黑名單》，美國使用較輕微的手段（主要是財務方面的措施）來對付名列這份清單的組織。雖然新疆那「兩百多起事件」並未被明確歸咎於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但美國（大概）誤將所有的事件都歸因於這個組織，因為這樣，美國確立了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等同於中國的基地組織這樣的敘述，即使是現在的中國政府和西方媒體在談論中國的恐怖主義時，也都會提到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

為何小布希政府選擇將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列入恐怖主義名單？目前仍沒有確切的答案。可能小布希政府認真看待了中國的主張，但儘管它聲稱握有「獨立證據」，美國使用的理由卻是直接引述中國方面的白皮書。還有很多

其他可能的原因，例如希望中國支持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軍事行動，或是美國意圖限制中國將武器賣給美國不信任的國家，似乎沒人記得小布希總統在二〇〇一年十月的承諾：「反恐戰爭絕不能成為迫害少數民族的藉口。」

美國的背書，對於任何試圖討論新疆問題而不將之與暴力和恐怖主義掛勾的努力造成巨大的損害，雖然它確實提高了維吾爾人的國際關注，但卻是以一種非常不利的方式提高的，正如米華健在二〇〇四年所評論的那樣，「對很多西方媒體來說，他們根本可說完全只用伊斯蘭、恐怖主義和中國這組關鍵字在解釋發生在新疆的故事。」——這個說法現在還是適用。

中國的許多鄰國都追隨美國的脚步，二〇〇二年一月，尼泊爾引渡了三名維吾爾人到新疆，儘管這三個人已經被聯合國難民署授予難民身份；其中一個在引渡後遭到處決。中國在上海合作組織的夥伴也表示支持，二〇〇二年十二月，比什凱克（吉爾吉斯）的多多伊市集（那兒有許多中國商人）發生小規模爆炸，最初被歸因於一盒煙火的小爆炸案最後成了「維吾爾恐怖份子」的傑作；而在奧什（吉爾吉斯南部的一個城市）一家外匯交易所的爆炸，其解讀

方式也經歷一次類似的轉變，最初這次爆炸被視為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做的案子，但隨後維吾爾人被歸咎為肇事者。二〇〇四年中國和俄羅斯聯合呼籲協助他們打擊新疆和車臣的分裂主義份子。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名列美國恐怖組織清單，也使得那些在九一一事件後激增的許多「全球安全專家」將新疆置於雷達之上，這些「專家」諸如賽德情報集團（SITE Intelligence Group，提供關於「聖戰威脅」情報的監控服務）、《長期戰期刊新聞網》（*Long War Journal news website*，目標與賽德集團相同）、情報中心（Intel Center，另一種提供反恐情報的訂閱服務）。許多這些組織將中國的主張視為鐵一般的事實，而這樣有助於建立一個維吾爾恐怖主義威脅的敘事，一再重複這類主張攪渾了清水，就如一位分析師說的，這使得維吾爾人「在證明無辜之前都是有罪的」。不幸的是這類組織往往不進行調查或事實查證工作，賽德情報集團的創始總監莉塔·卡茲（Rita Katz）在二〇〇六年接受雜誌《紐約客》的採訪中「承認她的團隊並未確認每個恐怖份子的科學精確性及每個威脅的合理性。」早在二〇一三年天安門廣場爆炸案

和二〇一四年昆明襲擊事件之前，人們在網際網路上搜尋關於新疆恐怖主義的可靠資訊時就能直通兔子洞（《愛麗絲夢遊仙境》故事中的兔子洞，是通往另一個異世界的路口），迅速找到一串站不住腳而危言聳聽的說法——新疆有一個聖戰組織網絡準備在整個地區大肆宣洩暴力。

賽德集團和其他類似團體顯然完全不覺得需要擔心出錯（畢竟這是商業冒險：恐懼有助於生意），那麼我們是否也應該回頭檢視：那些曾經懷疑（而且現在依然懷疑）中國對主張恐怖主義的人們，他們的懷疑就一定會是可信的、摒除偏見的嗎？只因為中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是不可靠的消息來源，就代表中國在各方面都不可信任嗎？關於中國是恐怖主義受害者的各方面論點都應該不予考慮？

這些事件中當然肯定有一些是經過計畫的暴力事件，主要是一些地方官員和被控與政府勾結的維吾爾宗教人士遭到暗殺。而雖然二〇〇一年之前很少有專家聽過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但以這個名稱命名的組織在一九九〇年代晚期和二〇〇〇年代早期就已經存在於阿富汗；另外還有在關塔那摩被指控與基

地組織合作的維吾爾人，雖然這些事實還不足以證明中國的主張，但它們仍需要被好好地解釋一番。

中國政府在白皮書裡提到的事件中，暗殺事件似乎最可能符合「恐怖主義」的標籤，只除了下令和執行這些暗殺行動的身分和動機仍然是未知的。可能有很多原因導致這些殺人事件，地方官員在中國普遍是不受歡迎的，而且通常是因為官員的貪污與濫權，於是對官員的暴力行為絕非什麼罕見事，二〇〇八年時，一名男子供認他為了報復而殺害六名上海警察，因為他在接受疑似遭到竊盜的自行車的相關審訊時遭到刑求；同一年，一個十幾歲的青少年因為共產黨官員奪取農民的土地和勒索金錢而往他心口捅了一刀，這些行動都沒有被官方敘述為恐怖主義行動。

至於關塔那摩的維吾爾人，二〇〇三年時美國宣布其中十五名被認為是低風險的維吾爾人將被釋放，這無疑是宣稱拘留這些人是個錯誤。其中四位在阿爾巴尼亞得到政治庇護，他們在那裡從事披薩師父工作營生，他們的證詞表明了他們在最糟糕的時間點出現在錯誤的地方。他們大多數基本上是難民，之所

以去阿富汗不是為了加入恐怖組織，而是因為它是和中國接壤的國家中最容易在沒有簽證的情況下入境的，正如一位被拘留者告訴肖恩·羅伯茲的：「一旦他們知道我們在吉爾吉斯或哈薩克，他們就會把我們遣送回中國。」至於他們被認為所屬的「恐怖主義陣營」，這棟位於阿富汗賈拉拉巴德附近的建築只不過比一些搖搖欲墜的建築物還要好些，因此儘管二〇〇一年時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確實存在，並且為了對抗中國政府的武裝行動而訓練維吾爾人，但它並沒有作戰能力。當美國開始轟炸阿富汗時，這些維吾爾人逃往巴基斯坦北部，他們很快就被移交給賞金獵人並賣給美國軍方。營地的狀況和武器的匱乏顯示了，即使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曾經與塔利班或基地組織中的任何人有過接觸，這樣的接觸也並未帶來財務上或後勤方面的支持——也許不外乎就是允許他們留在阿富汗而已。

因此這些證據顯示，在一九九〇年代晚期或二〇〇〇年代早期都並未存在重大的維吾爾恐怖威脅。即使是用最壞的情況來看，也很難有一個定論。儘管沒多少新疆學者敢肯定地說：這些維吾爾武裝組織不會帶來可能的威脅，但許

多學者都認為這些團體的存在及在新疆發動的攻擊並未到達恐怖主義的程度。至於那些認為這樣的謹慎在過去（以及現在）都應是有其必要的人——他們也許是認為在涉及國家安全時，過度謹慎總比鬆懈還要來得更好——這類觀點往往傾向於忽視那些被指控為威脅的人可能面臨什麼樣的風險。中國就像許多其他國家的政府一樣，都以「恐怖主義」作為藉口來加強他們對社會、宗教及文化生活的控制，特別是在新疆。

開放西部、關閉西部

就像開放西部運動實際上只是既存經濟政策的延伸一樣，中國在新疆自二〇〇一年起的「安全」總體方針也是如此。在二〇〇一年底時，中國政府對許多刑法和安法做出廣泛的修法，修法後，光是身為被政府指為「恐怖組織」的成員就已經是犯罪行為，即使當事人沒有犯下其他罪行；而且沒有任何定義

說明何謂「恐怖組織」，這代表著政府可以輕易地貼標籤。可判處死刑的罪行數目也增加了，另外還有一些對宗教法律的修正，新法律規定伊瑪目不得在自已城鎮以外的地方傳教，而且清真寺不得接受來自其他地方的參拜者。此外，「非法宗教活動」的定義包括各色各樣（及世俗化的）活動，諸如「毀謗政府」、「散佈謠言」和「扭曲歷史」。這樣的法律變化就本質而言幾乎能夠將各種形式的異議判定為非法行為。

政府很快地實施新法律，另一波「嚴打」行動逮捕了數千人——官方數字是一萬八千人，雖然這麼高的逮捕數字部分肇因於逮捕數量的配額（這不是中國獨有的問題），但報導稱許多家庭必須支付執法費用（這並不合法），這表明還有另一個理由鼓勵執法人員拘留大量人員。對這些隨後被指控的人來說，等待著他們的幾乎是定罪的命運，中國法院只要「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充分」就能做出有罪判決，二〇〇三年的定罪率是高出驚人的百分之九十八。

由於「宗教極端主義」被視為恐怖主義的主因，新法律的主要對象是宗

教，這導致維吾爾宗教習俗在各個方面普遍中斷，雖然沒有完全禁止修建新的清真寺，但結果仍是令人沮喪的。「據說」宗教活動場所的數量「十分充足」，這代表「我們不應該興建新的清真寺」，後來還對現有清真寺的翻修發布進一步的限制令。

將宗教知識傳承給年輕人——這是維吾爾社會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這也被施加新的限制，二〇〇五年新疆大學發給學生一本載有宗教準則的手冊，警告學生若一再被發現從事宗教活動將會遭到學校開除；許多清真寺的門上都被張貼通告，警告十八歲以下的任何人進入清真寺都是違法行為；另外還有一場針對非正式的宗教教導的反對運動，這已經延伸到針對到農村的傳統習俗，如社群中的耆老講授故事或唱民歌。新疆黨委書記王樂泉用完全是文革期間用的那套說法來評論「民間文化活動」，認為那有變成「反動宣導」載具的風險。

比村莊更大的定居點中的宗教人員也必須接受「政治再教育」，而這個教育的宗旨是「重新建立宗教領袖的正確思想認知及提高政治素質」，在這些集

會期間，伊瑪目不得不聆聽政府官員的演講並回答跟宗教法規相關的問題，他們還被要求進行「自我批判」（中國共產主義的長期特色），而在自我批判期間，他們必須承認過去的錯誤。這些再教育課程有時候會持續幾個星期——我一位伊寧朋友的父親在當時是一位伊瑪目，這些課程的負荷在他身上是顯而易見的。據官方說法，所有的伊瑪目都非常熱誠——這些神職人員在再教育活動結束時說他們「彷彿剛撥開濃霧而見到光明一般」。

「聖陵之旅」？

然而伊斯蘭教的某些方面被視為有其價值，許多地方政府開始將麻札（聖陵）當作旅遊景點宣傳，這絕對不是一個統一的措舉——新疆重要的聖陵節日奧爾丹節自一九九七年來就遭到禁止，那個聖陵是以十世紀的烈士阿里·阿爾斯蘭汗的陵墓建成。但在其他地方，漢族人擁有的公司獲得管理這些地方的權

利，這意味著他們可以收費，一些地方政府確實改善了前往這些地點的交通（大部分的麻札位於沙漠中），和田當局就修築了通往十一世紀的烈士伊瑪目阿西姆汗陵墓的道路，並確保朝聖者（更重要的是遊客）的水源供應，

開放這些麻札作為旅遊景點，不可避免地對麻札宗教上的功能產生影響，不僅僅是妨礙朝聖活動的入場費而已——在某些地方，漢族遊客可以抽煙、飲酒或做出其他侵擾聖陵的行為，新疆大學拉西力·達吾特說，在阿克蘇一個聖陵中，當局鼓勵漢族遊客在禮品店購買上面寫有「長壽」的絲帶，然後將這些絲帶繫在朝聖者留下的布條之間。

這些文化上的敏感度不足可能會滋生怨恨，特別是當這些收益很少回到聖陵所在的社群本身時，就像吐魯番附近的小村莊，鄯善縣的圖耶克·和卓麻札一樣。

這個麻札圍繞著一系列葬有聖人的墓穴所設立，有些人認為這個地方神聖到參拜這個麻札抵得上前往麥加朝聖的一半價值。這個麻札之所以神聖的解釋之一是這樣的故事：曾經有兩位旅行者在經過村莊時停在一棵樹下休息，兩人

都睡著了。當他們醒來時，有一位身著白衣的高個兒男人出現在他們上方，他有著非常黑的眼睛和長而尖利的指甲，但最奇怪的是他沒有影子。雖然這個陌生人嘴唇連動都沒動一下，但這兩個人依稀聽到一個聲音告訴他們：他是真主的僕役，而他們應該起身跟隨他，當這兩個旅人猶豫不決時，天空變暗了，而這個人往他們的方向移動。這兩個旅人逃跑時聽到身後有成千上萬的蹄聲，他們逃入山洞中並向真主祈求拯救後立刻聽到甜美的歌聲，旅人往山洞外望去時看到空中飛滿銜著樹枝和青草的鳥群，牠們往洞穴的開口俯衝，幾秒內洞口就被許多小小的鳥巢覆蓋了；儘管如此蹄聲仍在逼近，這兩個人趴在地上，突然之間一切都靜了下來。旅人起身往外看，天空依然湛藍，鳥兒依然歌唱，但已經看不到那個邪惡的人影，那些鳥巢已經愚弄了那個邪靈，使他認為洞裡空無一人。

我在二〇〇〇年前往鄯善時，我看到土坯房、驢車和一個小女孩在賣桌上的瓜果，村裡的廣場是一片圍繞兩株扭曲樹木的空地。

當我問一群村民聖陵在那兒，他們指向一個掛著綠色毯子、刷白的房間，

一個老人將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舉起一根手指，然後從他的口袋裡取出一張折疊的紙張，他小心翼翼地展開紙張，露出一張大鈔然後遞給我檢查，這張鈔票的日期是一八九八年，一面是橘色，一面是藍色，兩面都印著雙頭鷹。那是唯一易手的金錢。

透過清真寺另一邊牆上的小樓梯就能抵達聖陵，小樓梯通往一個牆面粗糙的隧道，而隧道很快就擴大成一個小洞窟，有兩個女人和一個男人坐在火堆旁邊，先是一起吟誦，然後變成輪流吟誦，空氣中瀰漫著濃濃的煙霧及女人的哭泣聲，其中一個女人停止吟誦並開始慟哭，男人仍然繼續吟誦，但他的聲音已經沙啞了。

在二〇〇〇年時，朝聖者（甚至像我這樣的遊客）都受到聖陵和村莊的歡迎，但在二〇〇三年後，一家私人公司購得該處的權利，要進入村莊或聖陵的人都得買票才能通行；甚至有人提議讓村民配戴身分徽章，以免與遊客混淆。就和許多其他麻札旅遊景點一樣，村民沒能獲得多少利潤。

對維吾爾文化毫不熱衷但依然將之商品化，最可能的動機是利潤，但在—

些維吾爾麻札裡有些議題正在發展中；在喀什噶爾的阿帕克和卓麻札，有一座伊帕爾罕（即香妃）墓，香妃是十八世紀的一位維吾爾女性，根據民間流傳的說法，這名女子不但美麗，身上還帶有襲人的香氣。她美到身為滿洲人的乾隆皇帝不惜專程將她帶到北京，據說她一路上天天用奶油按摩並泡駱駝奶浴，在某個晚清及中華民國時期在小說及戲劇中流行的香妃故事版本中，據說香妃在中毒身亡之前一直將匕首放在衣袖中來抵抗乾隆皇帝的侵犯。這個故事吸引了那些將清朝軍隊視為侵略者的人——她對皇帝的挑戰被視為一種反抗行動。

一九三〇年代時香妃故事的基本架構大體相同，只是多了對日本入侵的額外共鳴，但今日在聖陵所說的故事已經是不同的面貌——已經不是綁架、企圖強姦和謀殺，香妃和皇帝如今被說成一個偉大的浪漫愛情故事，據說皇帝為了向她求愛而在她北京住所的窗外建立一個小型的喀什噶爾村，並讓她用新疆的甜瓜和花朵沐浴，這個版本的故事帶有新疆人民和內地人民始終保持良好關係的寓意；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香妃的傳說一直被用以傳達這樣的訊息，聲稱「香妃與她的家人為了反對分離主義、保護民族和諧和民族團結做出了明確的

貢獻。」另外，香妃故事現在在中國不但在意識形態上被普及，商業上也是（兩者互相拉抬），近年來香妃傳說已經成為一種品牌，有以她命名的連鎖烤雞餐廳，還有以她為名的葡萄乾和系列香水，而且以她早年生活為主題的動畫影片正在製作中。

毫不意外地，許多維吾爾人對香妃故事有著不一樣的觀點。在一個拐彎抹角的反諷故事中，有些人認為它又一次複述了「貞潔女性抵抗侵略者」的敘事，只是現在這個目標性的對象是現在的中國政府。

「分離主義」藝術

在二〇〇〇年代初期，維吾爾文化也受到更嚴格的審查，嚴格審查的第一個跡象是二〇〇二年一月初，維吾爾詩人圖爾遜江·阿麥特因為在烏魯木齊的新年演出上朗誦一首詩而遭到逮捕：他被控「用影射方式抨擊社會現實」並

「倡導民族分離主義思想」。在朗誦這首詩的幾週後，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強調「必須加強意識形態領域的分裂鬥爭」，他聲稱「確實有極少數的人，利用文藝舞台兜售其反人民、反大眾，宣傳民族分裂思想的作品。」

這個活動的下一個階段是試圖規範維吾爾民歌，有報導指出歌曲在表演及錄製之前必須經過審查，而演唱會的歌單也必須通過檢查。除了民歌審查以外當局也進行了書籍的清洗運動，主要的對象是未經國家批准發行，帶有宗教內容及明顯帶有分離主義主題的小說及歷史書籍。而且再次有了焚書行動。

在二〇〇〇年代中期，即使是寓言故事，或僅是作品遭到懷疑，都會導致嚴厲的懲罰。二〇〇五年時作家努爾莫哈提·亞辛因為「發布一個被指為煽動分離主義的故事」而被逮捕，這個故事講述一隻遠離故鄉的藍鴿，當牠返回家鄉時，不同顏色的鴿子抓住牠並把牠鎖在鳥籠之中，雖然其他鴿子餵牠食物，但這隻藍色鴿子選擇吃下一顆毒草莓自殺，寧可死也不要被監禁在自己的家鄉。因為許多支持獨立的維吾爾團體使用藍色旗幟，中國當局將這個故事解讀為對政府政策的不滿，亞辛在未公開的聽證會上受審後，因為分離主義而被判

入獄十年，而刊登該故事的期刊編輯則被判三年徒刑。

二〇〇〇年代中期，無論是在言詞的強度或是對「安全」的要求上，當局都未出現鬆動的跡象，二〇〇三年王樂泉呼籲要「不帶任何憐憫的給予東突厥斯坦分離主義勢力毀滅性的打擊」，被稱為恐怖主義團體的清單已經擴大到將流散的維吾爾人建立的團體也包括在內，中國聲稱世界維吾爾青年代表大會和東突厥斯坦信息中心都參與了恐怖主義活動，並要求國際支持中國對抗這些團體，雖然這個聲明至少提到的是那些可驗證其存在的組織，但沒有證據可以支持這些指控，政府的指控可能只是針對這些團體日益突出的地位所產生的反應而已。

新疆的日常生活受到越來越嚴重的干擾，特別是在「嚴打」行動的持續時間和強度不斷升級後。二〇〇三年時有一個為期一百天的特別嚴打行動，而二〇〇四年時一場「高壓嚴打」行動則沒有規定期限；這類運動的內容通常是封鎖一整個街區，而武裝警察則挨家挨戶進行搜索，警方檢查居民的身份證並搜索非法出版品。有鑑於法律在界定非法出版品這點上十分模糊，警方總可以輕

易地補足他們被分配到的逮捕配額；在某些情況下搜查時所使用的手段則非常蠻橫，蠻橫到一如他們在二〇〇九年烏魯木齊暴動後的程度。

不再「衝突」？

中國當局承諾在新疆進行的「開放西部」及反恐運動會帶來發展與穩定，這樣的承諾誇華而不實；而這些運動是否被視為成功則不可避免地取決於人們各自的標準，鑒於開放西部運動的目標十分模糊，對政府來說要迅速宣布勝利不是什麼難事，早在二〇〇二年十一月，新華社就激動不已地報導：

三年過去了，如今道路變得通暢，燈光已經亮起，群山已然轉青，河流變得清澈，行商絡繹不絕，西部地區家園的精彩故事一個又一個被流傳與頌揚。

除了官方宣傳以外，這個運動無疑地對新疆經濟產生有益的影響，在二〇〇一年到二〇一〇年之間，新疆的國內生產總值成長了百分之三百；雖然這個數字令人印象深刻，但我們必須將之放在更廣泛的背景下來審視——全國平均水準是成長百分之三百零四，如果將成功的唯一標準定為單純防止西部省份和東部省份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那麼這個運動成功了。但這個運動並未緩解新疆內部的不平等，特別是漢族和維吾爾族間的差距，就像先前一樣，雖然有一些發達地區有可觀的維吾爾人口，而這些大部分在新疆東部，但維吾爾人更為集中的南方經濟情勢仍然比北方顯著惡化。到了二〇一〇年時，喀什噶爾的平均收入是北方城鎮昌吉（位於烏魯木齊郊區，有百分之七十五人口是漢族）平均收入的一半；而和田的平均收入更是只有昌吉的三分之一，喀什噶爾和田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中國最貧窮的省份貴州還要更低。

在新疆維吾爾人與當局間的對抗中，經濟不平等絕對不是唯一（甚至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但經濟不平等確實成為民怨的普遍背景。新疆的官員強調貧窮與一九九〇年代社會不安定間的連結，但並未承認這是造成少數民族地

區「落後」條件的原因。這個邏輯與做法，以及和先前事件的已知起因，都能讓人理解：二〇〇〇年代西方媒體為什麼經常用以下詞彙形容新疆——動蕩、紛擾、衝突；如果將政府干涉維吾爾文化、社會和宗教生活造成的挑釁也計入考慮的話，大多數人都很可能因此認為新疆正是中國政府非常擔憂的「恐怖主義」的見證之地。

有時官員幾乎是在為這個看法背書，二〇〇三年時王樂泉開始抨擊一九九〇年代盛行的邏輯概念，他說「有人認為新疆經濟發展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穩定問題自會迎刃而解。我說這樣的看法是錯誤而且危險的，經濟發展並不能消除分裂主義份子。」在某些方面，這個論點十分聰明，在削弱「分離主義」和經濟狀況之間的因果關係後，任何大眾動亂的發生都不能被拿來當作新疆管理問題的討論基礎，同時也把問題轉移到顯然使人起疑的少數民族社會和文化方面。

然而儘管新疆維吾爾人的生活條件日益惡化，但二〇〇〇年到二〇〇七年間是新疆「開放」以來事件最少的時期，事件甚至少於「解放」之後，即使與

中國其他地方相比，新疆的暴力事件也較少，那些曾被報導過的事件都沒有太多實據，二〇〇五年十月，新疆當局宣布逮捕了十九名外國武裝份子，但沒怎麼提到細節；二〇〇七年中國國家媒體報導一場對喀什噶爾附近山上訓練營的突襲行動，查獲了武器及爆裂物，官方消息指出擊斃了十八名「恐怖份子」並逮捕了另外十七人，然而西班牙記者拉斐爾·波奇（Rafael Poch）在調查事件後甚至找不到證據來證明有這樣一個營地存在過。

無論這些報導是否包括任何事實，我們可以肯定在二〇〇〇年代的大部分期間新疆肯定沒有爆炸、暗殺或重大抗議活動，就某種程度上這些事件先前都被政府視為「恐怖主義」行動，中國政府似乎正在贏得這場「反恐」戰爭，然而人們不需認同官方的「分離主義」敘事，就能理解新疆在這十年中日益提高的維安層級（嚴打運動正是維安行動中的核心要素）防堵了新疆大多數形式的公眾異議；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先前對前蘇聯共和國內維吾爾組織所進行的鎮壓發揮效果，然而鑒於這些組織在先前事件中的邊緣化角色，這個因素可能不具太大影響力。

另一個較為可能的解釋是對於許多維吾爾人來說，情勢已經不容他們樂觀認為另一個國家或機構可以介入新疆，當局對伊寧抗議的殘酷鎮壓清楚表明國家只會用壓制及暴力來回應批評或異議，面對這些可能的未來，維吾爾人選擇離開新疆——不是到中國的其他城市，就是前往其他國家。教育可能是人們最容易將戶口轉移到其他城市的方法，二〇〇一年，一萬兩千名前往其他省份就讀大學的新疆學生中，只有百分之二十回到家鄉。

有鑑於許多維吾爾人說不好漢語，在新疆以外的其他城市也沒有多少關係可用，大多數人最後只能從事低薪工作。如果有人有二〇〇〇年代時環遊中國，常常可以遇到經營小餐館或在大學食堂中工作的維吾爾人，尤其是在西安與蘭州等西北部城市中。自一九八〇年以來北京也有相當規模的維吾爾族群，在官方記錄中他們約有三千人，但因為很多人並未註冊，所以這個數字肯定更高。

離開這個國家是更困難的一條路，擁有國家工作的維吾爾人有更多機會獲得在國外進修或受訓的許可，但大多數人被拒絕發給護照，許多人被迫用非法

手段離開中國，而這意味著一旦他們回來就會遭到逮捕。至少有一段時期內離開中國的渴望使得開給維吾爾人的私人英語課程遽增。在二〇〇〇年代初期，成為民考漢學生並透過國家教育學習英語是維吾爾人學英語的唯一途徑，而以少數民族語言為授課語言的學生，他們學習的第二語言必須是漢語。即使是在高等教育階段，學習英語的途徑也受到限制，許多大學的英語系每隔年才收一次少數民族學生，這顯然是因為少數民族學生錄取分數較低的考量下作的權衡之計。

我在伊寧教授其中一個類似課程（對象是維吾爾和哈薩克學生），而且參觀過更多這樣的班級，學生的動機及他們進展多快都是顯而易見的。他們許多人自學英文，比我那些漢族學生（在學校學習英文超過十年）有更大的自信，對於一些維吾爾人來說，他們已經有過不得不學習第二語言（即漢文）的經驗，這肯定對他們學習英語有所助益。今日私人英語學校在新疆維吾爾人中仍然非常受歡迎，而對許多維吾爾人來說，說英語成為一件足以引以為豪的事。從二〇〇四年開始，已經有維吾爾人進入大部分全國英語演說比賽的總決

賽，有許多比賽會經由電視轉播，因此成為中國媒體中非常罕見的將維吾爾人描述為正面及賦權的一幕。

孔雀向北飛

在談到貧窮問題時，人們總是傾向忽略貧窮者也想方設法應付逆境；這特別可能發生在被邊緣化的族群主要來自一個少數族裔時，人們往往會把他們當作沒有能力改變現狀的受害者，認為他們需要得到更多重視。二〇〇〇年代的維吾爾人的情勢可能比文革結束後的任何時期都還要來得更差，特別是南疆的維吾爾族，除了那些決心將維吾爾人描繪成伊斯蘭恐怖份子的勢力以外，在西方媒體上流傳最廣的仍是維吾爾族受壓迫而無能為力的少數民族形象（目前西方媒體努力呈現維吾爾族的這兩個面向，特別是在昆明襲擊案之後）。

顯然有足夠的素材為新疆維吾爾族刻劃出這樣的角色：維吾爾人遭受國

家政策壓迫、他們承受制度化的差別對待；記者和激進人士強調這些「不平等」是沒有錯的，問題是沒什麼人提及新疆維吾爾人可能會用怎樣的方式，在不公然挑戰政府權威的情況下應對——換句話說，就是抵抗——這些問題？

英語課的普及就是這類方法之一，二〇〇〇年代的維吾爾人試著藉此找到用以克服他們面臨的經濟差別待遇的方法，但也許最常見的解決方法是全中國的人們都在使用的那種方法：搬到大城市。全國各地的年輕男女離開他們的村莊和小鎮，前往工廠、建築工地、餐廳和卡拉OK吧找工作。一般來說這些工作不需要專業技術，也沒有很好的酬勞——但還是比農民賺得多。這類移工被稱為中國的「流動人口」，我們可以輕易在任何重要城市中心找到這類人，因為他們的戶口註冊在其他地方，所以他們通常不適用醫療保險、保障性住房或任何福利優待，他們往往承受當地居民的歧視與偏見，結果他們許多人過著不穩定的生活——處於絕對貧困的移工數量可能是城市居民的兩倍。

在新疆，維吾爾移工主要是從南疆前往烏魯木齊，而烏魯木齊同時也是來自中國其他地區的漢族移工的目的地（正如開放西部運動所鼓勵的那樣）。

到了二〇〇九年時，烏魯木齊約有六十三萬名註冊移工（實際人數無疑高於這個數字），然而儘管大多數漢族移工是為了工作而來到烏魯木齊，但在二〇〇五年的一項研究中，超過三分之一的維吾爾人表示他們是為了其他原因而來烏魯木齊，例如比起他們在喀什噶爾和田所能有的更大的社會、政治和宗教自由（就和一九九〇年代的一些維吾爾族藝術家如歌手阿斯卡一樣，為了新疆以外的城市中更寬容的氛圍而離鄉背井）。

直到二〇一二年為止，我們仍可以從烏魯木齊的二道橋（城市南部的維吾爾主要街區之一）看出地方當局的宗教寬容度，雷切爾·哈里斯（Rachel Harris）說，像阿克蘇這樣的南方城市，可以看到告示牌警告女性在公共場所蒙面紗是違法行為，而在集市上祈禱的男人則遭到逮捕；然而在烏魯木齊，完全蒙著面紗的女性（有些身著黑衣）可以自由自在的在街頭漫步。

這再次說明了，在新疆，地方層級的各類政策執行上有很大的差異，地方性的人口統計資料、政治歷史和經濟狀況等種種因素都會影響到任何特定政策的實施方式。

在過去十年中，從南疆湧入的維吾爾移工人數多到讓二道橋失去過去的時尚感，並變得更加窮困與保守；二〇一三年時一些居民告訴我，一些維吾爾女孩因為穿著被他人認為不適宜的服飾而遭到攻擊。事實上，雖然烏魯木齊的確有一些以維吾爾人為主的富裕地區，那兒有著現代化的公寓建築，還有昂貴的中亞餐廳和清真超市，但大多數維吾爾移工住在二道橋和其他南部區域，其中一些區域實際上是貧民窟，那邊的房子是用小磚砌起的，頂著波浪紋的鐵皮屋頂，其中有許多房子沒有水電可用。全中國的移工往往因為缺乏資金而住在破落的住房中——沒有窗戶的地下室、狹窄的宿舍、在橋下臨時搭建的住所——但烏魯木齊移民的條件特別糟糕。二〇〇三年時，全中國的城市平均約有百分之十五的城市移工生活在絕對貧困之中，而烏魯木齊約有百分之五十四的移工處於絕對貧困。

雖然情勢對烏魯木齊所有的移工都不好，但對最終可能要做低薪工作的維吾爾人來說是最糟的，二〇〇五年時烏魯木齊維吾爾移工賺的錢比漢族移工少百分之三十，這主要是因為他們被限定在特定的經濟區塊。鑒於中國快速的城

市化，建築業是主要的僱用者，但有一項研究發現幾乎沒有烏魯木齊維吾爾移工可以在這個領域找到工作，雇主對維吾爾族的差別待遇往往是非常直接的：一些招聘廣告聲明只有漢人可以申請工作，這在一定程度上損及中國政府推行雙語教育的基本理念，如果維吾爾人難以找到工作的原因並不是因為說不好漢語，那麼就沒有理由支持以漢語作為教學用的語言。

雖然這樣的僱用歧視是不合理的，但我或許有必要指出漢族雇主也依據省籍出身而給予差別待遇——有些人拒絕僱用貴州人或安徽人，因為他們認為這些人懶惰而不可靠。我們應該將這番差別待遇視為一種警告，不要將漢族人視為鐵板一塊，因為當我們在比較新疆維吾爾族和漢族的總體情況時往往傾向於將漢族視為一個整體。在烏魯木齊，儘管有程度上的差別，但漢族和維吾爾族移工都很不好過。

這兩個族群的主要區別之一是：漢族移工更可能和建築及製造業中的潛在雇主取得聯係，而對中國任何地區來說，這樣的關係對找工作來說是至關重要的，維吾爾缺乏和漢族雇主的接觸，加上他們與漢族人之間的互不信任，這

意味著工作場所也複製了兩個民族間的社會隔離（這點在公家部門上沒那麼普遍），烏魯木齊的維吾爾人傾向於為維吾爾雇主僱用或是與維吾爾人一起共事，這樣的工作機會主要在拆除業或是文化上的特定部門（例如清真餐廳），而在這類地方漢族勞工是被排除在外的。直到二〇〇二年都有很多維吾爾人在二道橋市集上販售商品，但之後這個市集遭到拆除，以騰出地方給一個新的漢族人營運的集團，因為他們認為這樣更適合遊客。新的國際大集市是一座巨大的淺褐色仿伊斯蘭建築，裡面有肯德基炸雞連鎖店、家樂福超市，而租金對大多數攤販來說高到付不起。

那些找不到其他便宜攤位的維吾爾人只好在街上兜售商品、擦鞋，或是從事輕微的犯罪活動（這是全中國移工的生存戰略）。人們可能會為了給新的市集辯護而補充說，它確實有助於提高周圍維吾爾區的房地產價值（至少在二〇〇九年發生暴動之前是如此）。

境況最好的烏魯木齊維吾爾人是那些有資本自己創業的人，而這些資本通常是跟親戚借來的。許多人從事自土耳其和中亞進口商品的貿易，在烏魯木齊

（在伊寧亦然），很容易能找到販賣來自烏茲別克或哈薩克的指甲花、餅乾、調味紅茶及糖果的小商店，這種偏好購買中亞商品而不是來自中國其他地區商品的行為，不僅反映了人們擔心中國產品可能不是清真產品，也顯示出他們對這些國家的文化有更強烈的認同感，在這點上沒有什麼比商店、夜總會或餐廳能聽到的音樂更明顯了。這些音樂如果不是維吾爾音樂，通常是土耳其、俄羅斯，或烏茲別克及其他中亞國家。

雖然在二〇〇〇年代早期這些產業有很好的營業額，但他們可以成長的空間非常有限，因為他們在一個相當侷限的市場上與其他維吾爾公司競爭，而由於新疆缺乏伊斯蘭銀行設施，也缺乏與漢族投資者的關係，維吾爾人難以取得更多資本，很少有公司能夠與大型的漢族企業在商場上一拼高下。

在烏魯木齊，就像在新疆許多其他地方一樣，漢族和維吾爾族之間有許多爭端的來源，其中一些是由於當地問題引起的，像是維吾爾移工和漢族移工為了工作和生意而競爭，但這可說只是在重彈長期存在對漢族移民的不滿而生的老調。九一一事件後加劇的文化與宗教壓迫也僅是將舊版的不公正翻新上映，

無論一個人是否將中國對新疆的統治視為一種殖民事業，新疆當局在二〇〇〇年代時本應從殖民地歷史上學會這個當然的教訓：認為自己受到壓迫的人，總是會找到一個方法去攻擊他們歸咎的對象。到了二〇〇六年時已經有人開始警告說維吾爾人已經被迫走向絕望，學者珍妮佛·泰南（Jennifer Taynen）這麼評論：

因為缺乏情感出口，所以潛藏在表面下的張力甚至更大，少數民族對未來毫無希望將會對地區安全造成非常大的威脅，儘管漢族人似乎並不理解這件事。

即使是在中國——新疆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知識份子會避開的敏感問題之一——也有一些人承認該地區的局勢迅速惡化，曾撰寫西藏相關書籍並幫助建立自然之友（這是中國首批環保非政府組織之一）的王力雄在二〇〇七年於台灣發行一本書，書名是《我的西域，你的東土》，儘管標題使用了「東土」（東

突厥斯坦」，但在這本書中王力雄反對任何形式的新疆獨立，而提出其他幾乎可說激進的建議，王力雄認為新疆的宗教限制無異於「自我實現的預言」：在缺乏宗教自由及對漢族定居的限制下，他預測「新疆問題」將會「巴勒斯坦化」。

不需多久就能證明這些預測是正確的，二〇〇八年七月，在喀什噶爾，當時剛好在北京奧運會之前，兩名男子開著一輛卡車衝撞正在營房附近慢跑的警察，然後向警察局投擲爆裂物，官方消息指出有十六名警察在事件中遇害，主謀者是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就在一個多星期後，南疆庫車縣的一個派出所和政府辦公室被投擲爆裂物，一名警衛死亡，警察追捕並對一些襲擊者開火，有十名兇手在動亂中被殺，這一次中國政府表示他們不認為是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下的手（但也沒有歸咎於其他人）。這兩起事件都沒有任何組織聲明是他們下的手，攻擊背後的動機仍不明確。

這兩起事件的共通點是這些暴力行動並不針對平民，許多先前的事件也並非針對平民，而且甚至官方報導也是這樣說。在新疆，政府官員和安全人員普

遍是大眾憤怒的焦點，在中國其他地區大多數的抗議活動也是如此，但事態將在隔年改變，烏魯木齊爆發了自文化大革命以後發生在新疆最嚴重的暴動，這不是恐怖攻擊，但這絕對已經超出底線。

第七章

學到錯誤的教訓 ——烏魯木齊事件及後續

他們真正的目標，首先是奪走維吾爾人可以去的地方，而其次是防止大量的維吾爾人聚集在一起。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 迪里夏提·熱西提

你可以認為一開始新疆並未發生殺戮；你也可以認為一開始殺人事件發生在三千里之外，二〇〇九年六月底，發生於廣東省的韶關市。韶關就像許多廣東省的城市一樣有許多工廠，生產的產品無所不包：球形培林（又譯為軸承）、拖拉機齒輪、油泵、工程機具、手提袋、螺絲和板手。而殺人事件始於製造玩具的工廠，這家工廠是由旭日國際公司所有，這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工廠，總部設於香港，並為孩之寶和美泰兒等跨國公司生產產品。而韶關工廠擁有兩萬名員工，我們可以從網站上看到員工宿舍的照片，一排排貼著白色與紅色磁磚的建築緊密的堆疊排列，宛若一排準備開始倒下的多米諾骨牌。

在廣東大部分的工業城鎮中，勞動力的主要來源是移工，特別是來自小鎮或農村的年輕婦女；但在韶關，大部分的員工來自於當地，而許多公司更偏好這樣穩定的勞動力，在玩具廠中工作的兩百名維吾爾人因此成為雙重例外。這裡絕大多數的勞動力是由漢人組成，而來自喀什噶爾的維吾爾族工人是在五月時加入工廠，即使是以中國移工的標準來看——他們通常得搭上好幾天的巴士和火車才能抵達工作地點——這些維吾爾工人也算是千里跋涉而來的。

旭日玩具廠的維吾爾工人是政府計畫的一部分，將維吾爾人自就業機會很少的經濟貧困地區送往有更好前景的地區工作，官員說，在二〇〇九年的上半年就有九萬六千人從南疆送往各地，雖然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宣稱這個計畫是一種強迫勞動，而且工人是受到強迫而離鄉背井——特別是年輕女性——但這個說法缺乏證據佐證（至少對大多數的例子來說是如此），雖然某些官員很可能在達成移工目標的壓力下確實使用了比說服更加嚴格的方式，但這個政策並未受到重大抵制，這表明大多數的工人都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這當然不是一種人口轉移——維族工人的戶口仍然在新疆。至於許多工人都是年輕女性的事實，這並不能表明國家有意要派遣（被認為是）最弱勢的工人去工作；在大部分中國南方的工廠，女性員工的數量是勝過男性員工的，而且通常都會對員工的勞動情況施加一定的控制，就如張彤禾在她富有啟發性的作品《工廠女孩》一書中所描述的一樣。

然而雖然勞動力轉移就業計畫，或許是新疆政府用以解決南疆地區數十年貧困問題的重要方案，但它可能是因為多個議題考量下形成的，一些官員談到

希望這個計畫能讓少數民族「加入現代化」並讓他們「更加開明」——這是常見的「讓『落後』少數民族融入（漢族）中國社會」的論調。也有人認為將維吾爾族送入以漢族為主的勞動力中，是意圖使工人依族裔分別而對立，以對日益激進的工人組織造成妨礙。但這個說法並不合情理，我們很難相信兩百名維吾爾員工能夠對兩萬名員工的團結產生什麼影響。

但即使只有這樣一小群維吾爾工人，分歧還是產生了。就像新疆的大學（及許多街區）一樣，維吾爾人生活在不同的宿舍裡，他們大多數說不好漢文，這使得他們很難與漢族同事溝通，儘管新疆地方政府宣稱花了四億人民幣為移民提供免費的技術與語言培訓課程，但他們的語言技能可能不是被列於優先事項，於是就像在新疆的情形一樣，漢族和維吾爾社群的隔離助長了相互的誤解與無知。

所以當一個心懷不滿的離職員工在網路留言板上撰文，聲稱有六名維吾爾族員工性侵犯了兩名漢族女孩時，流言宛如火花落到乾草原那樣一發不可收拾，這項毫無根據的指控（完全沒有關於這類性侵害事件的報導）可能是啟發自

先前的一個事件：一位漢族女員工迷了路，最後誤闖維吾爾男性員工的宿舍，當維吾爾男子開始跟她說話時她完全不明白對方的意思，顯然還尖叫出聲。

無論事件的開端是她的尖叫，或是先前在留言板上發文的人，但所造成的結果是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晚上，發生在旭日工廠內長達四小時的暴力事件。翌日，政府將之稱為一場惡性鬥毆事件，但那天晚上拍到的影片並未拍到雙方打鬥，這段影片是由一個模糊的影像開始，一個人從宿舍間有著明亮照明的區域跑過，儘管這名男人遭到追趕，但相機鏡頭以步行的速度與其他數百人一起移動，他們大多數穿著短袖上衣，其中一個人穿著上面用英文寫著「永不放棄」(Never say die)的黃色上衣，在接下來的半分鐘，人群似乎是平靜的；雖然有一些零星的喊叫聲，而許多人用拿著的金屬桿和棍子敲打在混凝土上的聲音仍然清晰可聞。

人群和相機緩步前行，直到一陣歡呼聲散播開來，許多人舉起雙臂，其中有些人仍然拿著他們的武器，一個穿著綠色籃球衣的男子上下跳動，彷彿他剛在一場比賽中取得勝利。但勝利的一刻很快就結束了，人們放下他們的手臂並

且往另一個方向移動，讓相機拍到一具躺在地上的維吾爾人身體，鮮血披蓋著他的臉和手，而且他一動也不動。有人用漢語說「還有一個」，聽起來像是一個提議。

相機鏡頭往回走，直到抵達一輛停放著的救護車那兒，透過窗戶拍到一名擋在擔架上一動也不動的男子，手臂蓋在他的臉上，接著聽到什麼東西被毆打的沉重撞擊，人群分開來，露出在地上躺成一排的人體，幾個男人站出來或踹或用棍棒敲打躺著的人體，挨打的人體還是一動也不動。

韶關暴力事件的官方報導說有兩名死者（都是維吾爾人），還有超過一百人受傷，然而儘管是這麼短的影片也顯示出實際傷亡人數應該更高，當影片被上傳到網路上時，位於這個國家彼端的許多維吾爾人為之狂怒；鎮暴警察花上幾個小時才抵達現場，甚至在事後這些地方政府官員的評論也顯示他們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一位官員稱這次殺人事件是「非常普通的事件」，另一個官員則說漢族和維吾爾族之間的問題「就像夫妻間的問題一樣」。

六月二十八日，官方宣布逮捕其中一名謠言散播者，但這並沒有平息公

眾的憤怒，沒有任何人因為這起殺戮而被究責，新疆政府也未對此事件發表評論，他們可能是希望公眾的怒火會逐漸降溫，但如果他們真的是這樣認為，那他們顯然不夠關注維吾爾文網站。網站上關於韶關事件的討論使得不滿擴散開來，當時網際網路雖然受到嚴格管制，但可能仍是新疆維吾爾人發表異議時最安全的地方，無法公開表達的普遍情緒——哀悼與憤怒——透過流行的維吾爾語網站（如 Diyarim.com 或 Uighurbiz.net，管理後者的伊力哈木·土赫提在二〇一四年時被判處終身監禁）把背景改為黑色而傳神地表現出來。

公憤最後在七月五日下午在烏魯木齊舉行的示威活動中達到最高點，這場示威活動透過簡訊（特別是在學生之間）及維吾爾留言板（許多網站管理員在之後因為「危害國家安全」而被判處三年到十年之間的徒刑）廣泛傳播而集成，示威者預定於下午五點時在人民廣場碰頭，但人群從下午三點時就已經開始聚集。烏魯木齊的人口以漢族為多數，城內並沒有太多維吾爾社區，但這些維吾爾社群大多集中在城市的南部，最接近民族分界線的地區是南門（意為南方的城門，中國大多數城市過去被城牆所包圍），南門就位於人民廣場南

方幾個街區，因此抗議者選擇了一個位於中央的、以漢族為主的空間，這是當局不能忽視的地方。

下午五點時，大約一千人聚集在人民廣場，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手持中國國旗以展現他們的和平意圖（也可能是為了試圖轉移「分離主義」的指責），有鑑於這場示威活動已經提前宣布，警方已經準備妥當，他們試圖驅離這群雖然沒有暴力行動但看起來具有挑釁意味的人群，目擊者描述警方向示威者大吼、對他們拍攝照片和影片並執行逮捕，而當這一切進行時，更多人加入人群中，並很快離開廣場往南移動。從十層樓以上拍到的影片中，一群人走在街上，在停止不動的汽車間繞行，影片迴盪著他們的喊聲和哨聲。

關於廣場上發生什麼事的訊息傳得飛快，隨著人群往南移動，來自不同街區的人群也加入他們的行列，晚上六點半左右，人群在一處設置路障防止他們北上（並因此進入漢族社區）的地方與警方發生衝突，警方逮捕民眾就像他們在廣場上做的一樣，但此時已經投入更多武力，最可能的情況是此時解放軍也參與其中。軍警動用了催淚瓦斯並鳴槍警告，根據許多報導，他們還毆打民

眾及開火，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群眾開始對士兵及警察投擲石塊，這就是抗議演變成動亂的一刻。

士兵將人群往南推向二道橋，在二道橋之後似乎就沒什麼警力，暴徒從這裡開始進入一些混居的街區，殺戮由此開始展開。據報導，有大量針對漢人的暴力事件，從隨機攻擊到設置路障以阻止交通，任何被發現的漢人司機都被拖出車外遭到毆打，被放火的汽車、公車和建築物引發了普遍性的混亂，暴力和混亂持續了一整個晚上。然而，發生這麼嚴重的動亂，警察和軍方仍沒有對在這段期間的行蹤與作為提出明確的說明，儘管許多居民說他們在夜間聽到槍聲，後來有個官方聲明說警方射殺十二名暴徒，至少確認了他們導致部分人員傷亡。

事件之後

翌晨，街上散落著碎玻璃和血跡，燒焦的汽車和店鋪仍在燜燒，整個城市處於實質的戒嚴狀態，裝甲車在街上巡邏，而武警隊正在徹底搜查維吾爾族的街區以尋找任何涉嫌參與動亂的人，後來估計有額外兩萬名維安部隊（包括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成員）被派到烏魯木齊。之後烏魯木齊的通訊被封鎖了將近一年，簡訊、國際電話、網際網路都遭到封鎖，以阻止「謠言」傳播。

確切的傷亡人數尚未得到證實，但已經有估計稱約一百五十人死亡（後來官方給出的數字是一百九十七人），國家電視台的新聞報導播出了抗議者毆打或踢踹躺在地上的人的影片片段，而前晚在醫院拍攝的影片則出現頭上血流不止的傷患，兩個人躺在朋友用來送他們就醫的水果手推車上，一個四歲大的男孩躺在一輛臺車上，因為頭上的傷口和他不見蹤影的懷孕母親而茫然失措，當子彈擊中他的母親時，他一直抓著她的手。

新疆當局所提出的事件版本，既沒有提到韶關事件的作用，也沒有提到任

何其他維吾爾人的不滿，一份政府聲明將這個抗爭形容為「由境外勢力煽動和指揮、境內不法組織施行的組織性暴力犯罪」，國家新聞社新華社馬上為此指責卡德爾，王樂泉說這個事件顯示出「抱持分離主義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暴力及恐怖主義本質」，他說，這是「流血帶來的深刻教訓」。

不出所料地，卡德爾否認組織這場抗議行動，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聲稱「當局」沒有採取任何有意義的行動來逞罰殘酷謀殺維吾爾人的（漢族）中國暴民，這才是引發這場抗議的真正原因。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也對傷亡人數提出質疑，並在稍後主張這個數字並未計入被警察和軍隊殺死的四百名維吾爾人。中國政府後來聲稱握有卡德爾給暴徒下指示的國際電話錄音，她在電話中要她的弟弟告訴暴徒「勇敢一點」和「把事鬧大」，像往常一樣，政府沒辦法出示任何「證據」。卡德爾承認她確實打了電話，但說那通電話只是要她的弟弟「那天待在家裡」。中國媒體對卡德爾的妖魔化持續了四個星期，雖然這提供了中國公眾一個可以譴責的對象，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也提高了她在新疆維吾爾人間的知名度，大多數維吾爾人先前幾乎不知道她是誰，特別是在烏魯

木齊以外的其他地區。

七月下旬，中國政府試圖阻止墨爾本電影節放映傑夫·丹尼爾斯拍攝的熱比婭紀錄片，丹尼爾斯在接受我採訪時說，墨爾本電影節和出資拍攝影片的澳大利亞廣播公司都承受了巨大的壓力，當時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將預定的訪問行程延遲了半年，而電影節的網站遭到駭客攻擊，丹尼爾斯說，五年後他的個人網站仍然會遭到網路攻擊。雖然澳洲政府扛起了壓力——儘管中國是澳洲第二大貿易夥伴——但其他一些國家被嚇倒了，丹尼爾斯回憶說韓國一家廣播公司告訴他：「中國是我們最大的貿易夥伴，我們不能因為放映你的電影而威脅我們之間的關係。」

烏魯木齊的維吾爾人最直接感受到動亂帶來的後果，就像一九九〇年的巴仁事件和一九九七年的伊寧事件一樣，在接下來的幾星期裡面，烏魯木齊迎來一波大規模的逮捕行動，單是七月六日一天就有一千五百人被捕，人權觀察和國際特赦組織隨後都發表報告提出警察和士兵挨家挨戶搜查與逮捕時的暴虐行為，而後來出現在 YouTube 上的影片（原本似乎是為國家電視台而拍攝的）

印證了報告的內容。影片顯示維吾爾男性被拖出家門，有些人的衣著不完整，他們被戴上手銬並臉部貼地躺著，許多被捕者的上衣被拉到蓋過頭頂，所以他們什麼都看不到。影片中途有一段是士兵進入一棟房子裡面，但攝影師不得進入屋中；一名嫌犯遭到毆打，而其中一名官員在前面說「這沒什麼」。據說有些青年因為身上有瘀傷或其他傷痕、或是因為前一天晚上不在家而遭到逮捕，而在某些情況下警方任意拘留嫌疑人；後來有報導指出有些家庭不得不支付高額費用好讓親屬獲釋，甚至是付費好讓他們能得到醫療救治，如果這是真的，這就表示推動大規模逮捕行動的有時不僅僅只出自官方的熱誠。

雖然大規模逮捕和指責敵對境外勢力是這個國家典型的回應方式，但有件事情和先前不同——政府不僅允許外國記者進入烏魯木齊，還鼓勵來自烏魯木齊的報導，中國政府可能希望傷者及毀損的城市照片能夠激起同情（並因此而支持當局提供的事件版本），雖然人們可能會讚揚這樣罕見的公開措施，但從事後看來這是個糟糕的主意，從那之後新疆發生的任何其他事件都沒有再採取這個做法。問題不只是大多數記者做了他們應該做的工作——描述現場、採

訪居民並質疑官方報導，單就這點就足以引發對傷亡數字、武力使用情況及動亂真正起因的質疑；也因為記者七月七日時在烏魯木齊，這就代表他們可以目睹兩起政府寧願他們沒有目擊的事。

第一起事件可能是因為記者本身在場所挑起的，在官方引導記者巡視動亂地區時，市場中的女性開始對抵達的記者嚎哭和喊叫，一位女士說：「警察昨晚帶走了我的丈夫，我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他現在在哪裡。」人群迅速增加到兩百人左右，他們多數都在大喊大叫、揮舞著拳頭，許多人舉著被捕者的照片或身分證，準軍事部隊試圖讓人群後退，有些警察用警棍和盾牌猛打人群，雖然他們的上級阻止他們：他們知道最好不要在全球媒體面前攻擊手無寸鐵的民眾。儘管如此，現場仍然是憤怒和緊張的，要不是因為一個拄著拐杖的老婦人，情勢可能會發展為暴力。《衛報》的中國特派員塔尼亞·布蘭妮根（Tania Branigan）描述：

一位老太太走上前去，試圖讓人群鎮靜下來。她穩步朝著裝甲車隊前

進，慢慢移動到其中一輛車前，而裝甲車的司機啟動引擎，他們這樣面對了好一會兒，然後裝甲車開始慢慢向後移動，一隊軍官慢慢退回到路面上，她往前走，而他們往後退，她繼續往前走——直到軍官懇求她轉身離開。

這件事帶來了暫時的平靜，使得緊張的情勢消退。但當天稍晚的時候街道上再次殺氣騰騰，用球棒、棍棒、大砍刀、切肉刀、鐵管和鎗子武裝起來的漢族居民成群在城市裡面行動，他們大多數人試圖前往南方的維吾爾街區，當記者探問他們時，一些人說他們這樣是因為擔心進一步的襲擊，但也有一些人說他們只是想報復，人群中的一名男子說：「他們打了我們，現在輪到我們打回去了。」另一個手持金屬棒的男子告訴法新社的代表：「維吾爾人來我們的地盤砸東西，現在我們去他們那邊打他們。」

雖然警方設法阻止大部分武裝的人群進入維吾爾街區，但有些人還是成功避開警方；維吾爾商店被砸被燒、攤位被掀翻，還發生了一些毆打和謀殺事

件，在暴力事件仍然持續上報的期間，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在它的網站上發表了一份情緒激動的暴行清單——「一位懷中抱著嬰兒的維吾爾女性和她的寶寶一起被砍斷了手足……兩名維吾爾女學生遭到斬首……她們的頭顱被放在街道中央的樁子上。」——沒有任何一個消息在之後獲得證實（這篇文章隨後從網站上被刪除）。

雖然大部分的軍隊確實保護了維吾爾街區，但有幾個事件顯示了當局同樣想要贏得身為多數派的漢族好感，政府沒怎麼試著解除數百名平民的武裝，烏魯木齊市委書記栗智的行動就足以體現出他們在這方面的消極程度——栗智從一輛警車中露面並呼籲人群回家，然後領著他們一起高喊「打倒熱比婭！」

更嚴重的是有些士兵可能與武裝團體勾結，一段業餘者於當天拍攝的影片顯示大約有一百名漢族平民在街上等待，隨後一輛貨車後的士兵將長金屬棒遞給其中一些人——這些金屬棒很類似後來攻擊維吾爾街區的暴徒所使用的武器。我們沒辦法知道這是不是一起獨立事件，但這使得部分軍隊和警方的公正性啟人疑竇，而一位警官對參與媒體參觀的記者做出的評論也令人質疑，他問

記者：「你們為什麼要報導維吾爾人？維族人砍掉了一百個漢人的頭。」

七月七日的殺戮和攻擊事件都說明了維吾爾和漢族關係的急劇惡化，雖然這兩個族群間的偏見和相互敵視早已非常尋常，但民族間的暴力通常只是個人衝突，然而將漢族司機拖出車外毆打的維吾爾人，和想用鐮刀鐵鉞傷害維吾爾人的漢人，兩者間的共通點是他們純粹只想以民族作為依據而去傷害陌生人。在二〇〇九年七月之後，兩個族群裡已經沒多少人會看重媒體一再重複呼籲的、掛在街上的紅色布條寫的、在城裡行駛的警車或軍車所廣播的「民族團結」了，兩個社群中都流傳著關於另一方野蠻行徑的故事，一個漢族商人告訴湯瑪斯·克里夫的傳聞是「有位維吾爾小女孩拾起磚塊敲碎，打那些倒在地上的漢族人天靈蓋，好確保他們的腦袋被砸爛了。」雖然這個故事就像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網站上的那些故事一樣是虛構的，但這些故事都說明了維漢兩個社群之間的關係惡化到什麼程度。

烏魯木齊在整個七月和八月又對維吾爾人發動進一步的拘留行動，儘管其中有許多是針對性的逮捕，而不像是七月六日的街訪突襲行動，暴力事件大多

被歸罪於南方貧民窟地區（特別是黑甲山區）的維吾爾流動人口，王樂泉說：「參與事件的核心成員（中略）大多數是關鍵敏感區域的社會敗類（中略）多年來國內的分裂主義勢力一直聚集在那裡。」

維吾爾人針對漢人攻擊的行動是否是因為「分離主義」呢？這是值得商榷的，這也許是官方解釋中少數（在無意間）承認維吾爾人民怨來源的罕見例子之一，當我在二〇一〇年訪問烏魯木齊時，許多維吾爾人告訴我大部分的暴力事件來自於街頭小販，他們中有許多人住在王樂泉所提到的貧民窟，那是烏魯木齊社會中最窮困最邊緣化的地區——他們是最有理由感到自己被社會和經濟所排斥的一群人。

在經過將近十年不斷惡化的經濟困境及宗教和文化的壓迫後，部分維吾爾人的憤怒爆發是不可避免的，抗議行動當然是更廣泛表達憤怒的方式，而不僅僅只是針對韶關殺人事件的反應；但如果當局沒有用嚴厲的方式反應，抗議可能不至於會升級成暴動。這不是為了殺戮開脫——只是在解釋和平示威為何會演變為民族暴力。

在動亂後，也許當局唯一試圖安撫維吾爾人怒火的行動是宣布有十五人因為參與韶關暴動而遭到逮捕：十三名因為暴力行為，兩名因為散播謠言（散播謠言的兩位被捕者，一位後來被判無期徒刑，一位被判死刑）。然而儘管政府採取這樣的行動，安全部隊也持續駐紮烏魯木齊，但那兒的情勢還是一點都不安全。

「殺死王樂泉！」

烏魯木齊八月份的情勢助長了謠言傳播，持續的緊張局勢加上無法連上網際網路，人民普遍不相信國家發布的資訊，種種原因使得人們特別容易受到誤導。

所以當八月中旬有報導指出烏魯木齊街上的民眾遭到針筒攻擊時，情況迅速地惡化，而當局無法查明何人持針筒扎人，這只有讓事情變得更糟。在接下

來的幾周裡面針筒傷人事件繼續發生——但沒有一個案件是致命的。漢族居民開始主張他們是被兇徒所針對的目標，政府證實了大多數的受害者是漢人（正如烏魯木齊的人口統計數據所預計的那樣），但強調維吾爾族和其他民族也遭到攻擊，截至九月三日為止，醫院總共有五百三十一起案例，而這之中最值得注意的情節是其中百分之八十的「針筒扎人」並未真正發生針刺，醫生只在其中五分之一的受害者身上找到實際的穿刺傷口，其餘的是蚊蟲叮咬或是根本沒有痕跡可尋——因為國家提供賠償給受害者，所以有些人為此而聲稱自己受傷。恐懼、社會歇斯底里（*social hysteria*）和一定程度的投機主義已經成為烏魯木齊漢族和維吾爾族間緊張關係的另一個來源。

九月二日，在烏魯木齊周圍張貼的海報進一步激化這些憂慮，海報內容將這些針筒扎人事件描述為「嚴重的恐怖主義犯罪」，而且這樣的行為是試圖「摧毀本市的和平與團結」。當地政府甚至給民眾發送簡訊，聲稱針筒襲擊案是七月五日暴動事件的延續，這些訊息的目的如九一一事件後中國自陳自己是恐怖主義事件受害者的言論，都是為了激起足夠的公眾恐懼，好以「安全」

為名義來合理化對維吾爾族文化及宗教日益增多的限制。這套手法在整個二〇〇〇年代期間可說都是有效果的，但伴隨的風險往往是民眾（主要是漢族人）被激起的不安感會造成進一步的公眾混亂。

事情終於發生了，二〇〇九年九月三日，約有一萬名漢人集結在烏魯木齊北門抗議政府未能保護他們，王樂泉被挑出來究責，鑒於王樂泉長期以來的嚴峻態度，這實在是有些諷刺——許多維吾爾人給他取了「王世才」的外號，比喻他就像一九三〇年代的統治者盛世才一樣嚴酷——人群高喊「漢人生氣了！」和「殺了王樂泉！」當王樂泉試圖安撫民眾時，一些人對他丟寶特瓶，最後當局不得不使用催淚瓦斯來驅散人群；有五人在混亂中死亡，十四人受傷。

這是幾十年來漢人對新疆當局的最大挑戰（在此之前的上一次挑戰是一九七九年想返回上海的漢人發起的抗議活動），新疆政府迅速做出回應；這次政府回應不論是在速度上或性質上都比和過去回應維吾爾族抗議活動的方式形成鮮明對比。政府沒有針對漢族街區進行大規模逮捕，也並未指責「敵對

的境外勢力」煽起動亂，反而在幾天後宣布有四名維吾爾人因為危害公共安全而遭到起訴，其中三名是吸毒成癮者，官員表示這是經過策劃的「破壞民族團結」計畫，任何被發現用含有毒質或有害物質的針筒扎人的罪犯可能會面臨死刑。在王樂泉還未下台時，他的兩名左右手是烏魯木齊市委書記栗智和烏魯木齊警察局長劉耀華。新華社新聞報導極力強調烏魯木齊現在完全處於政府控制之中，報導內容敘述公園裡面快樂無憂的一景，說「六十多個人，主要是老年人，他們配合著鬥牛曲的曲調跳舞，而一位父親和他十幾歲的兒子在打羽毛球。」但這類的安撫言論，並未能阻止許多住在該市南部的漢人往以漢人占多數的北部地區遷移。

十月時，政府宣布第一批針對涉及七月五日動亂者的判決，這次宣判可能也是意在安撫烏魯木齊的漢族公民，六名犯人被判死刑，一名判無期徒刑；所有被判刑的都是維吾爾人。而政府並未對那些針對維吾爾街區進行復仇襲擊的漢族這樣進行宣判。

政府處理烏魯木齊發生的漢族暴力事件和維吾爾族暴力事件的差別待遇，

侵蝕了僅存的所謂「民族團結」，即使「民族團結」的概念對新疆當局有著超越文字修辭的價值；然而當局在九月動亂和接下來一年所採取的行動，都在說明了他們的主要優先事項是說服漢族：新疆對他們來說是個安全又有益經濟的地方。就毛澤東時代和「開放」後新疆地區（和中國其他地區）的管理來說，兩個時期的關鍵差別是：早年的漢人基本上是被迫前往新疆的，但自一九八〇年代以後，大部分的遷移是自願的（儘管國家也鼓勵遷移）。烏魯木齊暴動後，政府不得不面對的事實是雖然漢族可能是「新疆穩定的最大力量」（如馬大正先前聲稱的那樣），但這樣的安排也許是比他們已經意識到的更難以預測，也因此更加脆弱。大多數在「開放」之後來到新疆的漢人不認為自己出身自該地區——即使是經過十年或是更久的時間，他們依然認為他們的家鄉（用漢語說就是「老家」）在其他地方，他們之所以一直待在新疆純粹是因為實用性的理由。

烏魯木齊動亂不僅讓人質疑漢族平民在新疆的安危：動亂同時也動搖了對新疆經濟的信心。越來越多人認為新疆是一個危險的地方，而這樣的看法對

旅遊業產生災難性的影響——單是七月中旬就有百分之九十八的旅行團取消他們的行程，這也代表小企業蒙受慘重的損失；直到二〇一〇年初為止都沒有網路可用的事實也進一步阻礙了貿易，蓬勃發展的建築業跟著陷入不景氣，房地產價格也跟著下跌。

就某些方面而言，安全問題是最容易對付的，在九月漢族動亂後的幾個月裡，街頭和公共交通工具上安置了數以千計的安全攝影機，新疆許多火車站和公車站都設置了檢查哨和安檢掃描儀，街上的士兵和警察數量大幅增加，我在二〇一〇年四月前往烏魯木齊時，二道橋十分鐘的路程中就數到四十五名士兵和警察、三輛警車和兩輛軍用卡車。

這之中最令人膽戰心驚的是解放軍的士兵，他們穿著輕便的黑色防彈衣，攜帶輕型的自動武器在街上來回巡視並在人群中開出一條通道；儘管大多數士兵是漢族，但最近的招募活動也使許多維吾爾人加入警力中。相較之下，以漢族為主的烏魯木齊北部區域只有少量的警察和軍隊。

除了正規部隊以外，還有大批穿著綠色迷彩服、配戴紅色臂章的男子，這

些人是透過月薪一千元人民幣的徵人廣告招募而來，以不明確的身份肩負維持秩序的責任：他們大多數人幾乎沒受過什麼訓練，而且普遍顯得漫無目的，當我在城中破敗的動物園裡遊蕩時，我在孔雀的圍欄外發現三名這樣的男子，一個躺在石凳上、臉上蓋了張報紙，而他的同伴站著抽煙，他們看起來都是肥胖的中年人，而且沒什麼軍人風範，當我問他們是否喜歡他們的工作時，一個人回答我：「我覺得蠻好的，這是份重要的工作。」他的朋友說：「沒錯！」然後站得更直，「我們會阻止任何麻煩發生。」但他們看起來像是只要出現最輕微的威脅就能讓他們往反方向逃跑。

雖然這些人看起來毫無作用，但他們還是加入烏魯木齊無所不在的維安行列中，警車和軍用卡車在夜間的烏魯木齊街頭巡邏，特別是在新疆大學外圍（七月五日的抗議者有許多來自這個地方）。

維安的加強並不只限於烏魯木齊：在西方七百公里之遙的伊寧也有士兵和警察在街上巡邏，整個城市也有許多檢查哨，司機和行人都會被攔截及問話；任何進入公車站的人都會被搜查是否持有武器；我曾經任教過的大學在大

門旁邊堆放著防爆盾牌和警棍。

整體而言，該地區招募了五千名警察，特別加強了伊寧和喀什噶爾的人民武警隊，這無疑是因為先前的事件歷史。

鑒於網路在組織七月五日抗議活動中扮演的中心作用，毫不出奇地，新疆政府試圖進一步管制網路，當國際網路在二〇一〇年五月恢復作用時，它已經被加上新的限制，一位官員說「互聯網已經成為『三股惡勢力』——極端主義、分裂主義、恐怖主義——散布謠言和陰謀破壞活動的主要平台，因此加強對新疆互聯網的管理對國家安全極其重要。」以合理化這個限制。

新規則之一是要民眾在使用網咖的電腦前要出示身份證，而在網路上發表關於分裂主義或獨立評論也成為犯罪行為，電信業者及網路服務業者必須負責監控及回報這類線上活動；新規定大幅減少了維吾爾語網站的多樣性，並促使評論者及部落格作者開始自我審查。然而正如先前對中國國際網路使用的限制一樣，有些人可以運用代理伺服器或虛擬私人網路，或在他們的行動裝置上使用未註冊的黑市易付卡以繞過這些限制，但是這未能阻止二〇一三年時新疆

一些城市裡的大規模逮捕行動發生，被捕者的罪名是「瀏覽『非法』網站」、「下載『非法』錄音」或分享資訊，這些罪行的判決刑期是兩年到十三年不等。

王樂泉「被下台」

二〇一〇年四月，王樂泉遭到撤職，他的下台代表著新疆政策的轉變，而且時機是經過慎重選擇的：在中國，週年紀念日往往十分敏感。王樂泉的繼任者張春賢，上任時恢復了該地區完整的網際網路存取（這可能是近年來少數幾個受到新疆各族人民歡迎的政策之一），但透露出當局正試著解決關於新疆經濟情勢憂慮的最大跡象是五月時召開一場特別的「工作論壇」，有三百五十名高級官員與會，這是第一次針對新疆召開這類會議（先前已經針對西藏召開過類似會議），會議的主要目標是為下一個十年制定「跨越式發展」計畫，而這個計畫將再一次為所有人帶來繁榮昌盛。

這樣崇高的目標也曾經出現在開放西部運動中——結果只加劇了區域間的不平等——經濟刺激方案至少承認了南疆是最需要協助的地方，為此，新疆工作論壇宣布一些東部和中部城市，將和新疆八十二個不發達的地區結成姊妹市，這不僅是財務上的夥伴關係——市政當局理應要分配年度預算的百分之〇·三到〇·六——也與人員及專業知識的轉移有關，這個計畫裡最重要的方案是在喀什噶爾和霍爾果斯（這兩個城市是對中亞市場的主要接口）建立經濟開發區，根據政策大綱，這項計畫將「基本完善」城市的基礎建設。

還有一些試圖直接減輕貧困的政策，其中有很多政策是讓漢族和維吾爾族平等受益：國家扶助失業者，也提升了工資，並給予就讀寄宿學校的農村學生補助，從而減輕父母的經濟負擔。為了吸引新的投資者並減輕既有的公司負擔，當局授予該地區極大的稅金豁免，頭兩年企業不必繳所得稅，在接下來的三年也只需繳交一半的所得稅。

但稅收的最大變化是對當地高利潤的能源部門的稅制，二〇一〇年時新疆佔中國石油儲藏量的百分之三十、天然氣儲藏量的百分之三十四，然而由此創

造出的巨大收入卻很少回到新疆政府（在二〇〇八年時只有百分之一·五），這主要是因為稅金是按照容積來徵收，而非按照價格來徵收。新疆（能源的源頭）和東部其他省份（其工業發展仰賴新疆的能源）的巨大不平等可以用這個事實簡單陳述出來：位於管線末端的上海人付的天然氣費用比新疆人要付的還要便宜，原因是上海有能力補助天然氣價格。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新疆工作論壇提出的辦法是對石油和天然氣的價格徵稅，這使得稅金收入大幅增加，其中一些收入可能被指定用於新疆的扶貧計畫，從表面上看來這是個很好的政策轉變，然而正如經濟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在當時所說的：「新疆的問題不是缺乏資金（中略）而是如何分配資金。」

也有人懷疑讓中央政府（基本上擁有在新疆營運的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同意支付更多稅金給新疆當局的政治交易，使得中央政府在不久之後讓天然氣價格上漲，這一切造成的結果就是新疆的人民與公司一定程度上承擔起這個宏大發展計畫的成本。

雖然新疆工作論壇改進了先前信奉「滴漏」論而以北部為中心的發展計

畫，但其主要協助的目標仍是針對那些將大多數維吾爾人排除在外、或是維吾爾人代表性不足的經濟部門（由於沒有維吾爾人參與新計劃的規劃，因此給人一種剛愎自用的感覺），而一些與中部和東部城市的合作夥伴關係除了給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提供資金以外也沒能達到多少效益，在很多情況下兵團當然是需要資金的，儘管烏魯木齊附近的石河子（鄰近首都及附近的資源）很繁榮，但其他許多兵團的財務狀況很惡劣，在二〇一〇年時兵團工人的平均薪資是月薪一千人民幣，這當然比大多數農民賺得多，但仍然是很低的薪資。

而政府選擇支撐兵團中一些最沒有獲利的部分，也就是說中央政府對兵團福利的考量遠超在維吾爾族農民之前；這可說就是造成南疆持續貧困的主要原因，鑒於該地區生態環境上的限制——缺乏水源及耕地——及配額制度的要求，維吾爾農民從來就無法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大規模又接受國家補助的農場競爭。

然而新疆工作論壇的確給出了南疆可能會開始發展工業的願景，工業部門可以帶來農業之外的就業機會，喀什噶爾新開發區與深圳（現已成為中國經濟

奇蹟中心的前漁業社區）的姊妹城市關係就是為了提高預期（與吸引投資），喀什噶爾人民廣場上懸掛的旗幟寫著「向深圳學習，向深圳致敬。」就掛在毛澤東的巨大雕像旁。這個計劃的核心是一個大型的工業園區，而這個園區被宣傳為未來的紡織業及電子業的生產中心。雖然沒有人認為喀什噶爾可以變成另一個深圳——深圳的成功仰賴於其沿海位置及供應鏈的取得——儘管如此，這番炒作仍然使喀什成為一個很好的投資標的，二〇一〇年喀什噶爾的房價漲幅在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之間，大部分的買主來自中國內地。當《紐約時報》採訪一位高端公寓大樓的推銷員時，他說：「我們蓋公寓大樓的速度趕不上需求（中略）等五年後你再回到這裡，一定已經不認得這個地方了。」

老喀什噶爾之死

我在二〇〇〇年第一次拜訪喀什噶爾時，它已經有兩種不同的風貌。我走

在貼著白色磁磚的高樓之間，路過賣著引擎零件、蒸餃和煙火的商店，我覺得自己是身處在東邊五千里之遠的湖南小鎮（我在那兒待了一年）。對一個有三千年歷史的城市，我期待（或我想要的）不是這樣的一番面貌，喀什噶爾曾是絲路上貿易和文化的重要樞紐，是馬可波羅曾經盛讚過的地方（「有許多的城市和村莊，但其中最大最傑出的是喀什噶爾本身」）——雖然他也詆毀這裡的居民（「當地人是一群看起來猥瑣又吝嗇的人；他們吃喝的方式非常粗劣」）。

但在二〇〇〇年，我只需要離開主要街道，身邊的建築物就會迅速變得低矮、街道變得狹窄，土坯房子有著沉重的舊門，而如果門是半敞開的，你就能從中一窺有著玫瑰花園、繫著羊兒的庭園，或看到男性正在敲打金屬與木頭的房間。這些小路彎彎曲曲、時而分岔的蜿蜒著，有些小徑安靜又陰蔽，而有些則擠滿了腳踏車、馬車、從清真寺走出的人們（披著明亮頭巾的婦女、配戴硬質方形頭蓋帽的男性）。我在市場裡看到賣刀的小販、製作馬鞍的工匠、陳列在布巾上的蛇乾和海馬乾、一包包乾果和堅果、一排排金色的首飾盒、有

華麗彩繪的儲藏箱；我可以聞到烤羊肉的煙味，看到男孩們抽著木製陀螺，聽到鐵砧板的聲響、羊兒咩咩叫，還有越來越高的宣禮呼喚（call to prayer）。

當我累了，或豔陽過於炙熱，我會坐在艾提尕爾清真寺的防水篷布下，吸飲一杯飄浮著碎冰、用金色糖漿調和過的優格；或者我會坐在茶館二樓陽台休息，牆上鑲嵌著金色的飾板，基座則是深綠色的，柳條編籠中的鳥兒唧唧唱著，一個老人送我一個塑膠製的紅色愛心，之後他吹起了木笛，然後從帆布包深處摸出一個塑膠製的亮紅色立體照片觀賞機（View-Master，一種特殊的立體眼鏡，需搭配上有軟片的轉盤使用）。老人把它遞給我，我戴上它後看到了彩色的麥加：只要簡單的轉十二次，我就能看到一系列朝覲儀式。

走在喀什噶爾老城街道時，人們很容易就會認為喀什噶爾是永不改變的，然而自從「解放」以來，喀什噶爾已經有了重大變化，就像中國許多其他城市一樣，二十五英尺厚的城牆大多已經被拆除了，並修築了一條穿過中心的主要道路。但一九八五年到喀什噶爾的訪問學者，會寫到的唯一一個「中國特色」是「在城鎮上較新的一區矗立著與周遭景致不相稱的毛澤東雕像」；一九九〇

年代和二〇〇〇年代時，一波波拆除與新建震撼著全中國每一個大城市，但喀什大致上仍是未受損害的。在二〇〇六年時，電影《追風箏的孩子》仍能用喀什來代替一九七〇年代阿富汗的場景，老城的中心大到讓許多專家認為喀什是世界各地泥磚建築中最偉大的例子之一。

但這樣的「不變」很快就變了。二〇〇九年初，當局宣布住在老城五個社區的二十二萬人必須要遷移至他處，中國政府說發生地震時這些舊磚房太危險了，喀什噶爾副市長許建榮為了合理化拆除三分之二老城區的建議而反問：「哪個國家的政府不會保護自己的人民受自然災害威脅呢？」儘管該地區在過去兩年中發生兩次地震，但並不缺其他用以解釋拆遷的理由。許多人將老城的拆遷視為對維吾爾文化及身分認同的蓄意攻擊，認為是二〇〇八年發生在該市的暴力事件（一輛卡車衝撞一批新警察）促使當局決定拆除老城；也有傳言指出拆除的目的是為了使人無法使用老城底下的隧道網絡。

依照法律，市政當局必須為他們逐出的家庭提供補償，而市政府也提供現金獎勵那些提前搬出的居民，許多房子一空出來就被夷為平地；與此同

時國家媒體將拆遷視為一項偉大的成就，每晚播出十五分鐘的資訊型廣告（infomercial，播出時間與普通電視節目一樣長的電視廣告），內容是喚起恐懼的地震活動統計結合維吾爾人在他們新的混凝土公寓前跳舞的場景，播音員這麼說：「從未有這麼偉大的事情發生在喀什噶爾！」地方政府甚至還立起了廣告牌，偽稱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核准了這項拆遷。

雖然一些老城區的居民偏好住在現代化的公寓大樓裡，但對很多人來說，這次搬遷對他們的日常生活來說是個嚴重的干擾，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危及他們的生計；雖然當局常常聲稱事先已經就拆遷計畫與當地居民充分諮詢過，但這樣的溝通過程似乎並沒發生，最重要的是從未公開討論過拆遷的替代方案。一些有相關經驗的組織，如生土建築遺產國際委員會已經提出有不需要重建就可以讓許多讓老城住宅安全耐震的改善措施。

鑒於共產黨頻頻壓制維吾爾文化的許多方面、及官方經常表達的同化主義言論，喀什噶爾老城的被破壞自然被視為另一次稀釋維吾爾人身分認同的行動，然而珍·賈柏（Jane Jacobs）一位撰寫城市議題的記者，談到美國城鎮

老街區的消逝）的某種解釋提醒我們不要貿然將政治因素視為唯一（甚至是主要的）原因：因為沒有人能從老城中致富，這注定了老喀什噶爾的命運。中國體制兩個根深蒂固的特色使得喀什噶爾的拆遷幾乎變得無可避免：土地所有權，和城市財政。在中國，土地都是歸國家所有，居民擁有的只有房屋，但不擁有承載房產的土地，即使是在鄉下，農民也只能從村裡的村集體組織（village collectives）租用土地；而對中國大多數城市來說，自一九八〇年代後期以來收入的主要來源是販賣或出租土地給不動產公司，讓他們在上面蓋樓，只要提供居民補償，即使已經有居民住在上頭的土地也能租售。居民最後通常不得不搬到不同區域的新家，而對某些人來說這可能意味著物質環境得到改善，但他們在這件事上沒有置喙的餘地。

在這方面，也許最近最明顯的例子是中國在籌備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時，拆除了北京的老胡同街區。這些位於現代中國象徵性區域的建築，儘管它們承載豐富的中國文化遺產，但也無法逃離拆毀的命運，這個事實表明了利益至少會是強烈到足以摧毀老喀什噶爾的動機之一。在市場力量之前，身為漢族人這

個事實並沒辦法提供中國公民比身為維吾爾人更多的保障。

到了二〇一〇年底，老城區大約有十萬間房屋遭到拆毀，當我在二〇一三年重返喀什噶爾時，我幾乎已經認不出它了。八線道的道路旁林立著明亮的十層樓或十五層樓建築，店面販售著精美的蛋糕、蘋果手機和電腦、昂貴的紅酒，一切似乎都證實了中國新聞報導所說的：「曾經繁榮過的絲路樞紐」現在正在「經歷一場復興」而且「有著光明的前途」。

唯一和這幅景象不搭調的，是在車流中騎著馬的維吾爾男子，在他旁邊隨行的一輛卡車後有兩名男子正在打一面大鼓，同時第三個人正在彈奏兩弦琴；前方有個帶著攝影機的男人危險地靠在一輛受損的白色賓士後座上。還有一些地標沒有受到影響，像是艾提尕爾清真寺，但是在二〇〇〇年時這個清真寺曾經是個樞紐，吵雜、混亂的商業街由此幅射出去，但現在艾提尕爾清真寺附近的商店被安置在新的建築物中，這些新建築的風格可以被形容為伊斯蘭樂高（Lego，一種積木玩具）：塊狀、淺褐色的建築上有著裝飾性的拱門，他們的大門上有著木製的招牌，上面用漢語和英語寫著「少數民族藝品」或「傳統

民族工藝品」。但這一切看起來太庸俗，不像是「真正的」旅遊商店，這些店裡賣的刀具、帽子和樂器和十年前一樣。

從街道往上走，我終於看到我記憶中的老喀什噶爾，烘焙師正從陶爐的壁上扳下一個個扁扁圓圓的饅頭，將它們堆疊成一疊或排成一排。饅頭在維吾爾族生活的中心地位已經高到不能再高了：這種麵餅是神聖的，絕不能把饅頭丟掉或放在地面上，維吾爾話中有這樣的說法：「我寧可被饅頭壓在底下。」這種麵餅和排隊購買的人群讓我覺得，任憑街區的拆遷破壞，有些事情還是會延續下去的。

街道的其他部分使得我得以繼續保持這種樂觀態度，這裡有販售來自該地區其他城市瓜果的攤位——哈密來的黃色甜瓜、吐魯番產的綠色葡萄——羊肉塊掛在鉤子上，補鞋匠在補鞋，麵條被碎地摔在木頭上，來自烤羊肉串的煙冉冉飄過那天的最後一絲日光，誠然街道並沒有你在晚餐時間會預期的那種喧囂，但至少普通的維吾爾人民在購買日常用品。

一直到我爬上喀什噶爾東邊的小山亞爾別失（Yar Beshi）上，我才了解

破壞的規模有多大。往上爬的道路已經積滿了灰，那些灰曾經是人們的房子、人們的家園：儘管是被指定保護的兩個主要區域之一，亞爾別失的大部分區域已經完全被夷為平地。我在山頂上可以看到一幅由土磚建築群和白色六層樓建築群構成的全景圖，還有更多建築將會被填入山腳下已經被清除出來的巨大空地中——那大約有十個城市街區那麼大。看到城市的核心區域出現這樣一片廣闊的空地是一件很奇怪的事，看起來彷彿曾經有某種災難降臨。

亞爾別失已經被挪為旅遊景點，我走過幾條街口就看到「路線一」的牌子，沒多久後我就遇到一批來自上海的遊客，他們戴著黃色帽子，正在聽導覽；也許他們是在看了最近介紹老喀什噶爾歷史的中國國家電視節目後受到啟發而前來遊覽，主講人在這部分說：

我們現在到的地方是老喀什，它已經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走在老城區就是一種維吾爾民俗文化巡禮的真實體驗，這二十幾條街道是中國唯一保存完好的伊斯蘭風格迷宮小鎮。

我等待旅行團通過；當他們離開後，這些街道彷若被遺棄了，一種奇異的靜默使我懷疑這些磚牆木門之後是否還住著人。

我在狹窄的街道上漫步時發現了更多斷垣殘壁，孤零零的階梯通往已經不存在的地方，架子仍然懸在零散的土壁上。

我看到不同拆除階段的房屋：大片碎磚和金屬；沒有屋頂的屋殼子，裡面充滿垃圾和排洩物；有些房子看起來像是被一個巨大的拳頭砸過。

當我聽到玻璃破碎的聲音時，我剛好在給一間房子拍照。我轉身看到一個男孩彎腰撿起石頭砸向附近房子的殘骸，然後他又拿起另一塊石頭扔了一次，每次都是將石頭快速而用力地砸向磚瓦構成的坑裡，把已經破碎的東西砸得更碎。

我找到的最完整的房子已經荒廢了好幾年，我爬過一扇破窗，發現一個除了一套二〇〇八年到二〇〇九年的舊伊斯蘭日曆外什麼都沒有的房間，當我走進隔壁的房間時，從屋頂破洞流洩而下的日光足以使我看到木架子、上有雕刻的嵌板和天花板的工藝。

我離開那棟破屋時遇到一個從隔壁房子走出來的男人，我問他人們都上哪去了。「我不知道」，他說，「也許都去市中心以外的新地方了，很多人都去了那裡。」

在這方面，老喀什噶爾居民的命運就跟北京老胡同居民的命運一樣，在這兩個地方，政府給居民的補償都只夠讓他們住在先前居住區之外的新公寓，舊街區的房價已經漲到讓他們付不起錢留下了，對這兩座老城市發生的重大變化，官方的說明也是相當類似的一套，街頭海報和報章上談到這些事時用的詞彙是「更新」與「復興」，而非「拆除」與「破壞」。二〇一〇年時，規劃喀什噶爾拆遷的主管機關表示：老城區的一萬零七百九十九棟「危樓」的重建將在當年年底完成。

但三年後，儘管老城區的大部分拆遷都已結束，但「重建」還遠遠未能完工，最先竣工的房子是艾提尕爾清真寺後方街道上的屋子，現在看起來像是俗氣的南歐街道風格幻想作品，房舍和路磚是互補色的陶瓦，木製的陽台和門有著塑膠光澤。即使在這些大多數是住宅的街上，還是有一些商店掛著重新塗漆

的招牌，一如那些掛在紀念品商店上的牌子一樣。

但若說這些街道看起來像是模型村（model village），那麼對真正的模型村不太公平，因為模型村通常是在一定程度的用心下建成。而這條幻想街上的房屋看起來是採用全中國常見的建築風格蓋成，快速砌好的磚牆用混凝土抹成平滑的表面，然後貼上一層白色（或赤陶色）的磁磚作為房舍的外觀，這麼做的目的不是要建出耐用的建築，而只是要快速的蓋出房子。在老城區外提供給居民的替換住處，其品質也是令人懷疑的，石榴複合大樓是在老城區外五公里遠的一處新建住宅區，一位澳洲記者發現「這些幾年前蓋成的不起眼建築群現在已經出現耗損的跡象，讓這些建築看起來像是經歷了幾十年的風霜。」

老城區的一些「更新過」的建築物看起來沒那麼糟糕，部分更新過的建築用磚頭和木材替換原本的泥磚，與傳統的維吾爾建築有點相似之處，但還有許多建築物尚未完工和無人居住，而旅遊區也是一樣的死寂，並不是因為沒了牆和門：而是因為共同的生活已經消失了。

不只是在喀什噶爾

喀什噶爾的代表性地位意味著老城區的拆毀受到媒體的廣大關注，但其實全新疆都在經歷相同的拆遷過程，地方當局告訴記者到了二〇一五年時將有一百五十萬棟房屋獲得「改造」，和喀什噶爾的情況一樣，造成這種侵略性的城市規劃的原因，經濟因素可能與意識形態因素同樣重要。但無論是否是刻意的，這樣的城市規劃使得很多城市裡的維吾爾社群破碎化，維吾爾語中稱呼這些社群為麥海萊（*mehele*，特指穆斯林城鎮中的街區或農村中的自然村落，是構成穆斯林社會的基本空間），麥海萊在像伊寧這樣的城市裡面往往依照街區所組成，這些社群絕不是固定的——二〇〇〇年代伊寧的麥海萊裡面有著配著金屬門的兩層樓或三層樓建築，往往象徵著近期的致富——但在過去，人們是基於自身的意志來改變自己的家園。當我在二〇一〇年拜訪伊寧的一些麥海萊時，當地已經有了明顯的變化，泥濘的道路已經鋪平了，而且有更多的街道照明設備。

雖然跟我談過話的維吾爾居民很歡迎這樣的改變，但許多房屋因為「不安全」而被拆毀的事實也是爭端的來源，人們對自己的家有著情感依戀是很尋常的事，在許多文化中，家是信仰、習俗、精神體驗的豐富寶庫，如我在第四章中談到的，在一些維吾爾社群中，食物的製備過程就是一種這樣的習俗，對伊寧麥海萊的一些居民來說（特別是對老一輩的維吾爾人）家是能賦予家庭意義的許多儀式進行的地方。傑·多徹曾經寫道，在重砌或修補好一個爐子後，家庭成員往往聚在爐子旁，並在爐子第一次被點燃時大笑，在他們的信仰中，這樣有助於煙的升起；同樣地，維吾爾人也會依照習俗埋東西在房子的門檻下，他們相信這會帶來好運，多徹在伊寧的房子，門檻底下埋的是剪下的腳趾甲，據說會在審判日時長成一片厚厚的荊棘來將外面的異教徒（例如漢族人）擋在家門外。這個故事的變體之一是魔鬼會騎著驢子出現，而獸毛像弦樂器一樣發出地獄般的樂音將人們從家裡引出、加入魔鬼的行列；唯有門檻設置的障礙可以阻止人們奔向地獄。

摧毀有過這些儀式的家園，危害的是世代相傳的記憶與無形文化的傳承。

另外，對這些街區來說，這些變化所帶來的利益可說與居民無關，在伊寧，其中一個麥海萊的入口處被樹立一個大磚門，門邊放了一個以漢文、維吾爾文和英文宣布這個社區是一個「民族旅遊景點」的告示牌：

這兒沒有豪宅和高樓，只有波光粼粼溪流上的小橋，一個美麗的小村莊就座落在對岸。她就像是一位深閨中的異族公主，沉沉地、平靜地、神秘地睡著，請讓您自己深深地愛上她並為她著迷吧。

就和喀什噶爾老城區的情形一樣，人們的家園變成一種民族主題公園。只是在伊寧，維吾爾文化還被加上一重情慾化的元素。我的一個維吾爾朋友把這個大門形容成「去他的籠子！」

在其他城市也有明確的政治理由執行這些拆除政策，和田市約有百分之六十五的人口住在老城區，市政府的工作委員會認為需要「改造」的房屋多達一萬七千棟，委員會所持的理由是「老城區一直是壞份子的中心，而且有許多

宗教場所。」烏魯木齊黑甲山的貧民窟也預定將被拆除，國家媒體將之描述為「貧困和犯罪的溫床」，一位當地官員說：「由於該地區的管理不善，移工很容易受到暴民煽動。」

雖然人們並未質疑黑甲山的居住條件需要改善，但就如喀什噶爾或其他地方一樣，人們擔心政府所給的補償不夠，或是憂心替換的住所品質不佳；在市政府宣布「無牌」房屋的所有者，分配到的替代住所只有原本住宅樓面面積的百分之七十時，這些疑慮就變得更為緊要了，大部分維吾爾人都住在黑甲山，因為他們收入低到負擔不起住在其他地方，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迪里夏提·熱西提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說：「他們真正的目標，首先是奪走維吾爾人可以去的地方，而其次是防止大量的維吾爾人聚集在一起。」在當局宣布預計烏魯木齊的人口到二〇二〇年時會增加一倍時（其中大部分來自中國其他地區），這個消息支持了迪里夏提·熱西提的觀點。

雖然官方並未承認就業歧視是維吾爾人聚集在黑甲山的主要原因，貧民窟改造工作辦公室副主任謝民仍暗示了住房問題的複雜性。他在接受《環球時

報》採訪時說：「烏魯木齊的拆遷會比其他城市還要困難，因為這是一個多民族的城市，而且擁有龐大的流動人口。」也許最具建設性的建議來自新疆社會科學院的潘志平，他建議拆遷工作完成後，政府應該引入能夠讓不同民族的群體共同工作和生活的新產業。

烏魯木齊、喀什噶爾等地拆遷的另一個層面是他們如何影響城市空間。維吾爾街區蜿蜒曲折如迷宮般的街道，正在被寬闊明亮的網格系統街道所取代，許多城市都試圖將這樣的系統強加給他們的公民——也許最著名的例子是巴黎，十八世紀時奧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一八〇九年——一八九一年，法國都市計畫師，獲拿破崙三世重用，主持了十九世紀後半巴黎城市規劃。現今巴黎的輻射狀街道網絡的型態即是其代表作）所進行的徹底改造——但殖民政權或專制政權特別偏愛這樣的改造計畫，正如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詹姆士·C·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他的書《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中所說的…

一個幅員廣大和多種語言組成的帝國，可能會發現依照統一的規格來排列營地和城鎮有著象徵性的好處，這能顯示出秩序與權威。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依照簡單而重複的邏輯進行佈局的城市是易於管理與維安的。

西藏的城市空間在過去幾十年來的變化，正暗示著新疆許多城市即將面對的未來。在拉薩，老街區的範圍已經被縮小，並被漢族定居者的建築所包圍，這種網格狀社會管理系統，和有規律間隔的派出所使得許多街區得以進行高度的監視。

在新疆，庫爾勒這個城市就是一個已經發生類似改造的例子，庫爾勒是生產石油和天然氣的中心，在過去幾十年中也經歷了重大的人口和經濟轉變，除了新的道路和高樓以外，這個城市也豎立了新的雕像和紀念碑來展現某種歷史觀點（某種忽略維吾爾族定居該地區悠久歷史的觀點）。這個趨勢可能會越演越烈，因為已經有人建議擴大該市的管轄權以整合週邊的兵團地區，有鑑於

這些地區主要由漢族居民組成，這將會進一步邊緣化庫爾勒的維吾爾社群，且這是一種可在別處複製進行的模式。

然而儘管庫爾勒、喀什噶爾和其他地區的拆遷政策都不受到太多居民的歡迎，但也沒有針對這些拆遷政策的重大抗議紀錄，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居民並不認為這是特別針對他們的族裔而進行的政策，就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是對的。全中國都在把老街區夷平重建，大多數拆遷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讓房地產開發商和城市官員變得富有；對維吾爾文化的損害只是個**附帶利益**而已。

期盼

許多中國和其他地方的人們，將二〇〇九年烏魯木齊的暴力事件（和前一年發生在西藏的暴動）視為一種徵兆，認為中國需要重新思考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政策。儘管不能像一九八〇年代那樣更包容少數民族的文化與宗教，但

一些讓維吾爾人不滿的經濟層面問題已經獲得解決。但就另外一方面來說，政府也在此時選擇提高漢族在新疆的經濟與社會地位，新疆工作論壇的目標與前十年的開放西部運動的目標重疊，而且可說是向前更推進一步。中國政府透過促進其他中國省份對南疆的投資與移居，試圖將該地區更緊密的整合進中國本土。與開放西部運動一樣，新疆工作論壇的提案似乎對該地區的漢族人更為有益，而非維吾爾人。

這不是唯一一個顯示新疆政策將會持續先前方針的跡象，新疆工作論壇還呼籲要在「雙語教育」上取得更大進展，南疆缺少通過漢語檢定的老師，這表示二〇一〇年時只有百分之四十二的學生使用漢語授課，有人提議到二〇一五年時所有的班級都應該要用「雙語」教學，而到二〇二〇年時所有的學生應該都要能流利地說普通話，無論官方人口統計數據顯示為何（二〇一〇年時漢族人口佔該區的百分之四十，而維吾爾人佔百分之四十六），漢族人已經成為該地區實質的多數派，一位官員這麼強調這個事實：「當他們與漢族人民來往時，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提供口譯員的。」

中國政府在烏魯木齊暴動中學會的教訓，不是該平息維吾爾人的民怨，而是該讓新疆變得更像中國其他地區，以及，讓我說得直白一點，以及應該更加鼓勵維吾爾人變得更像漢族人，但即使是在中國知識份子圈裡對後者的提議也是有爭議的，如郝時遠和王靜等人認為國家不應該積極去塑造少數民族的國族認同，他們的觀點是隨著社會和經濟的持續發展，少數民族的民族認同會逐漸消失，對中國國家的認同會取而代之，雖然郝王等人的觀點並不重視少數民族的身分認同及其組成要素（文化、語言及社群等等），但與馬戎和胡鞍鋼等所提出，不應再由官方承認少數民族身份，且應該取消少數民族地區自治制度的主張相比，郝王者的主張似乎是更寬容的模式。馬胡等學者認為要解決「新疆問題」應該要加速少數民族與漢族的融合，以創造出單一文化國家為目標。

正如我在第八章中要討論的那樣，新疆自二〇一〇年來實施的政策（特別是在宗教及文化領域方面）都顯示中國政府正在積極追求這個目標；而他們從烏魯木齊動亂中學到的另一個教訓（且已經在這段期間實施）是政府需

要更加關注「安全」，在所有警察及軍隊巡邏背後的論據是：一旦新疆達到一定程度的維安和監督，那麼當地幾乎不會有發生任何重大事件的機會，而這個理論在新疆過去幾年中已經被證實是錯的，而且還付出很大的代價。

而新疆許多維吾爾社群從烏魯木齊暴動中汲取了什麼教訓呢？至今我們仍不清楚。雖然維吾爾人和國家間的暴力衝突已經增加了——炸彈、自爆、持刀傷人——但仍有一些更為沉默的抵抗方式。

第八章

「一個好炸彈」

會使用暴力手段，是因為已經沒有其他表達管道了。

——伊力哈木·土赫提

阿利姆是個二十出頭的高瘦年輕人，他的上唇蓄著一片鬍鬚，鬍子裡面有個清晰可見的凍瘡。當我在二〇一〇年春天的某個下午在烏魯木齊與他碰面時，他站在二道橋上許多旅客與老駱駝合照留念的地方附近。我對他一無所知，只知道他參與過烏魯木齊的抗議活動並且希望談談那件事。當我抵達時我們並沒有握手或寒暄，他只是轉過身並喃喃說道「走吧！」我過了一會才隨著他走了。街上有許多士兵和警察，他不希望被人看到他與外國人談話。幾個月後，維吾爾知識份子海萊提·尼亞孜因為和外國記者談話而遭到拘捕，被法院依「危害國家安全罪」判處十五年有期徒刑。

他把我帶進一條後街，那兒有兩名維吾爾女孩在賣粉紅色的塑膠腰帶，我們走過一棟貼著骯髒白色磁磚的清真寺，有個男人站在寺前修補一處破損，阿利姆轉入一個林立著破舊電視機的小巷，停在一扇門前。他敲了門，但門內沒有回應，於是他又敲了一次。「請稍等一下。」他這麼告訴我，然後舔了一下他的凍瘡。

進入屋內後，我們穿過堆著地毯的儲藏室，然後進入一個鋪著地毯的小房

間，那兒有個堆滿堅果、乾果、糖果及饅頭的矮桌，我們坐在桌旁的藍色坐墊上，一位裹著粉紅色頭巾的中年女子帶著一個茶壺和碗進入房裡，在她倒茶時，阿利姆說：「這是我阿姨。」她離開房間後，阿利姆伸手搆到一個黑色公事包，從裡面取出一台黑色的筆記型電腦展開在桌上。

他說：「你得先看看這個。」然後他給我看了韶關工廠殺人案的影片片段。我看到奔跑的人們，聽到那些喊聲，看到流血的屍體。

影片結束後我們兩個都沒說話。一會兒後他開口：「警察沒去制止這個事件，他們沒有逮捕任何人，對他們來說，一些維吾爾人被殺不算什麼大事。」我們談到韶關事件在烏魯木齊引起的憤怒及七月五日抗議活動的組織，然後他給我看了另一段影片，這段影片的開頭片段晃動得很厲害，所以我只能看到人們快速地走著，我看不清楚他們的臉，也聽不清楚他們說的話；然後我總算看到一個我認得的人，阿利姆正揮舞著手臂大喊大叫，他臉上的表情非常喜悅，使人聯想到一種解放的歡欣感。

我可以聽到反覆的喊聲，阿利姆說許多抗議者一直在高喊「正義！」和

「覺醒吧！」

「因為大多數維吾爾人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們認為只要不做牽涉政治的事情就不會惹麻煩，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才強不起來。如果你有心要做什麼事，那等著你的只有三條路：被逮捕，被殺死，或是出國。」

這段影片是在抗議行動剛發生時拍攝的，也就是說，在暴動發生之前。在警察開始動用武力時阿利姆還在現場，他也是其中一個向警察丟石頭的抗議者。

「我不會再那樣做了。但我們當時真的很憤怒。」

儘管安全部隊加以挑釁，但阿利姆並沒有採取進一步的報復行動。「那天晚上我阻止了兩個年輕人，他們正在狠打一個漢族人，要是我沒阻止的話，他們會殺了那傢伙。但幾天後我不知道自己為何要那麼做。」

七月七日，漢族暴徒對維吾爾街區的襲擊改變了阿利姆的想法。他聲稱那些自命為正義使者的漢人在大喊：「殺光維吾爾人，漢人自立自強！」

當我問他暴力給烏魯木齊帶來什麼改變，他說最大的不同是「許多漢族人現在尊重我們了，他們怕我們，他們現在看到我們的力量。」

對阿利姆來說，他從動亂中學會的教訓和政府當局所學會的非常不一樣，他說：「我問你，你覺得和平抗議會有效果嗎？」

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會有效果。」這似乎是個公理。

「我以前也這樣想」，他說，「但現在我不這麼認為了，我們試了很多次，但他們從沒聽進去過，他們只會逮捕和殺死我們維吾爾人，我哥哥現在還在牢裡，他沒幹什麼事，沒有審判，但一個明明沒有罪的人卻被他們關上兩個月，也許關上半年。」阿利姆搖了搖頭，「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戰鬥，如果我們有一個**好炸彈**，好到可以殺個一百人、一千人，那我會用它去炸人。如果我們有一千個配備AK—47的維吾爾人，我們只要殺死一千個漢族人，那其他漢族人就會離開。」

「如果他們不離開呢？」我問。

「我認為他們大多數人會走的，如果他們不走，我們就再殺一千個漢族人。」他非常平靜的說，「然後他們會走的，漢族人並不勇敢。」

「也許吧，但漢族普通百姓和漢族士兵沒有區別嗎？他們對你做了什

麼？」

「只要他們在新疆，他們就是有罪的，除非他們是病人、女人、老人或小孩子。」

我指出暴徒也殺了一些女人。

「那是個錯誤。」他這麼說，然後拿起一張紙片。「我們眼前有三條路，」他說著，然後用筆畫出指著不同方向的箭頭，「第一條路是來自外國的幫助，美國人或英國人。」阿利姆給了我一道尖銳的目光——彷彿這一定程度上是我的錯——然後劃掉一個箭頭，「但這條路走不通，沒人會要求中國政府做點改變。第二條路是和平示威，我們接近政府，希望他們改變我們的處境。」

他劃掉這個箭頭。

「第三條路是塔利班。二〇一〇年時還不會發生什麼事，但你該在二〇一一年時來趟這裡，你來的話肯定會看到什麼事情發生。」

我沒再見過阿利姆，也沒再跟他談過話。但在二〇一一年時，隨著時間往烏魯木齊動亂事件週年靠近，我確實想起他，並且想我是否會「看到什麼事

情發生」，但時間到了，烏魯木齊什麼也沒發生，但在二〇一一年七月底南疆發生兩起暴力事件，七月十八日時在和田在一起襲擊警察局的案件，政府將這個事件描述為「有組織犯罪」，官方聲稱手持炸藥和手榴彈的「幾名暴徒」闖入警察局並挾持人質，並展示了一幅具有「分離主義訊息」的旗幟。雖然這個報導無法被獨立檢證，但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並未出面否認有一群人闖入警察局，他們聲稱這個事件是因為該地區大規模逮捕行動所導致的。

七月三十日和七月三十一日發生在喀什噶爾的暴力事件細節也仍不明朗，根據政府的說法，第一天發生了兩起小爆炸，爆炸後有幾名男子劫持一輛卡車，殺死司機並把卡車開到一條充滿小吃攤的街道上，然後持刀攻擊街上的人們，儘管仍不清楚襲擊事件背後的動機，但這個案件發生在一條有許多漢族商人店家的街道上，事發地點本身可能意義重大。翌日，根據官方消息，一家餐廳發生另一起爆炸，爆炸後襲擊者衝入店裡殺了店主和一名侍者，幾天後政府聲稱一名被逮捕的襲擊者已經承認該組織的領導人曾經在巴勒斯坦接受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的訓練，習得製備炸彈及使用槍枝的技術。而二〇一一年九月

時一個自稱為突厥斯坦伊斯蘭黨（Turkestan Islamic Party）的組織聲稱為這兩起事件負責，這個聲明使得局面進一步複雜化。二〇〇八年時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也曾發表一段影片說該黨在新疆和雲南發動公車爆炸事件。

雖然我從沒想過阿利姆是否在這些事件中扮演了任何角色，但這些事件使我開始想，到底有多少維吾爾人在烏魯木齊的暴力事件中得出同樣的結論？對阿利姆來說，烏魯木齊動亂給他的教訓是：即使是最和平的抗議方式也會遭到殘酷的壓制，而且中國政府並不重視維吾爾公民的安全和保障，在這點上，我當然必須強調，「私下向一個外國人透漏對政府（或對民族）的仇恨並表達願意實施暴力行為」和「有個人的意圖，也有組織力和財務能力去實行計劃性攻擊事件」之間有著相當大的距離，然而正如肖恩·羅伯茲在一份針對二〇一二年新疆是否可能發生恐怖主義事件的報告中所說的，「鑒於很多維吾爾人對中國政府所懷的仇恨，很難想像沒有人會試圖採取暴力手段。」

二〇〇九年後的新疆出現的暴力事件，肯定比二〇〇〇年代曾有過的事件更加激烈，在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底，據報導，皮山縣（靠近巴基斯坦邊境）

有多人在一場與警方的對峙後死亡，政府聲稱有一小群打算前往巴基斯坦在聖戰組織軍營中受訓的維吾爾人挾持了幾名牧羊人為人質，和警方對峙時，他們持刀攻擊警察並且迫使警察開火，而這個事件就和七月的事件一樣無法受到檢證，一些觀察員認為這些維吾爾人只是試圖逃離偏遠棉花種植區的貧困處境及地方當局的壓制性宗教政策而已——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說他們搜索民宅以找出違禁的宗教用品。

南疆的喀格勒克鎮（漢語中稱為葉城）在二〇一二年二月底時有更多的暴力事件，事件的不同版本又一次有著很大出入，中國政府說，八名維吾爾人用斧頭和大刀在幸福路上砍殺路人，國家媒體報導有十五名平民和一名警察遭到殺害，而所有襲擊者都被警察擊斃。中國官員稱這次事件是「恐怖攻擊」，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並不否認這次事件是經過預謀的，但聲稱它只針對安全部隊，而且是被該地區大規模逮捕行動所引發。

下一個重大衝突發生在二〇一三年四月，喀什噶爾地區的巴楚縣（維吾爾語中為Maralbexi），官員說有二十一人死於「顯然是一場恐怖攻擊」，他

們說，有一夥暴徒（共十四個人）藏在一間屋子裡，他們在三名社工進行屋內清查搜索到刀子時將官員扣為人質，當警察抵達現場時，他們殺了十二名警察及人質，並放火燒屋，這伙人在之後與執法人員發生的衝突中被擊斃六人，八人遭到逮捕，雖然有幾個對這起暴力事件的解釋，但沒有一個可以得到證實。一個居民告訴自由亞洲電台：事件的起因是一名社區監察員要求一名女性揭開她的面紗；而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提供的另一個解釋：這是他們是在抗議當局對維吾爾家庭的搜捕行動，當局對抗議活動開火，殺死一名年輕男子，於是民眾開始報復；而鄰縣的一名警察則表示：他聽說巴楚的搜屋行動是針對一名來自吐魯番地區的嫌犯，而吐魯番在幾個月前發生一名漢族男子刺殺一名維吾爾男孩的事件後已經提高了維安層級，這名警察的說法使得局面變得更加複雜。

在這個吐魯番事件後，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在吐魯番地區的魯克沁鎮發生導致三十五人死亡的暴力事件。根據官方媒體報導，一群持刀的維吾爾族男子在清晨時襲擊當地的一間派出所，造成二十四人死亡，警方隨後對襲擊者開火，擊斃十一人。官方媒體表示這是一起自一月份開始策劃的恐怖攻擊，

有兩人發起「非法宗教組織」，而該組織成員聽信了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所散播的聖戰宣傳活動，雖然中國政府並未為這個聲明提出更多證據，但讓魯克沁鎮事件顯得不尋常的是：許多傳統的解釋都不適用這個事件，魯克沁鎮是個繁榮的地區且沒有太多定居的漢人，而比起其他南部城鎮，魯克沁的地方官員似乎對宗教採取更為寬鬆的態度。

雖然還有很多其他可能的解釋，但迄今為止最常被採用的說法是：一名中年漢族男子，因為誤會一名年輕的維吾爾男孩在他的工廠偷東西而殺死了對方，雖然魯克沁當局最初承諾會嚴懲兇手，但當地警方後來得出結論，認為該漢族男子患有精神疾病而無法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據說宗教領袖已經發出過警告，說居民認為當局低估了罪行的嚴重性，但這仍然無法解釋為何普遍性的不滿導致這麼多人死亡——人群可能聚集起來進行和平示威，而當局可能會對之暴力鎮壓。而該地區網際網路遭到切斷則進一步阻礙了事實真相的發掘，自從二〇〇九年烏魯木齊動亂以來當局一再使用封鎖網路的策略。

新的暴力循環？

我們能夠從這一系列維吾爾人和國家之間的暴力衝突中做出什麼推論？從中國政府的角度來看，這些事件都是由恐怖份子所犯下的，而這些受宗教極端主義驅使的恐怖份子的最終目標是將新疆自中國分離出去，雖然這些事件發生在不同地點——發生在北疆，也發生在南疆——但這些事件全部都歸因於如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這類的恐怖組織。儘管當局承認南疆（大部分事件發生的地點）與北疆相比是十分貧窮的，但當局對新疆所有異議的解釋仍然繼續延用九一一後所採用的路線。

在二〇一四年昆明襲擊事件之後，很不幸地，若干西方媒體開始將新疆以前許多含糊不清的事件重新歸類為恐怖主義行動，但值得強調的是在昆明襲擊事件之前，仍有相當多的新聞媒體和學者對中國政府的恐怖主義敘事提出質疑：雖然所有前述事件都嚴重違反公共秩序，而在許多事件中的暴力行動似乎是由維吾爾人和安全部隊共同犯下的，然而和二〇〇〇年代事件相較，並沒有

更多證據可證明這些事件是受伊斯蘭恐怖主義勢力煽動所犯下。雖然有一個自稱為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的組織聲稱犯下其中一些案子，但沒多少專家認為他們做出比在網路上發影片更多的行動，杜磊（Dru Gladney）內認為突厥斯坦伊斯蘭黨「模糊而朦朧到任何人都可以站出來說他們是這個團體以得到支持」，過去這個團體曾經聲稱——用很容易從網路上取得的素材組合而成的影片——支持那些其實不是他們幹下的事，包括二〇〇八年昆明發生的兩起公車爆炸案，而中國政府隨後否認這個聲明。

我們對這些事件的起因了解太少，以致於無法排除突厥斯坦伊斯蘭黨或其他組織在事件中發揮作用的可能性，但現有證據表明這些事件更像是各自獨立，事件源自於特殊的當地民怨，而非是為了表達意識形態上的不滿（例如希望獨立）或是民族間的敵意。在很多情況下，引爆相關暴力事件的導火線和全中國其他人民抗議的那些理由沒什麼不同：地方官員濫用權力；過分嚴格的推動宗教或計劃生育政策；非法奪取土地。但有一點不同，維吾爾人在新疆經濟中的邊緣化使得他們（至少是大多數）更容易受到這樣不公正的待遇，而這

樣的經濟邊緣化是過去幾十年來就業和投資的系統性不平衡導致的結果，再加上該地區對維吾爾人所採取的嚴厲安全措施（例如在維吾爾社區中挨家挨戶搜索或是大規模逮捕，特別是自一九九〇年代以後），這些加總起來已經惡化了維吾爾人對國家及對（與國家有關的）漢族的憤恨。

新疆暴力事件和中國其他地區發生的暴力事件相比，還有另一個區別在於政府描述這些事件的方式。二〇一三年七月時有個坐在輪椅上的男人試圖在北京機場自爆，但這件事並未被描述為恐怖主義；二〇一三年十一月發生在山西省太原共產黨總部外的爆炸案也沒有被說成是恐怖主義。界定這些事件的不同方式，對被指控需為事件負責者的刑罰，和軍警對待被指控者的出身社群的方式都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最後少不了要談談中國是否已經是（或將要成為）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目標，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先判斷構成「恐怖主義事件」的元素，二〇一三年十月下旬發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事件特別有爭議性：十月二十八日，一輛吉普車在撞上紫禁城的城牆後爆炸，五人遇難（包括三名乘客），四十

多人受傷，北京警方說這是一場恐怖攻擊，而司機和乘客是維吾爾人（警方後來聲稱車上三人是一個男人和他的妻子與母親），警方也聲稱在吉普車上找到刀子和一面「聖戰者旗幟」，政府將這起事件歸咎於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組織。

有些人認為這起事件是個獨立事件，源自於某個特定的不滿（因此並非恐怖主義），但這樣的看法遭到當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譴責，他說這樣的說法是「毀謗中國的民族與宗教政策」且這樣等同是「縱容恐怖份子」。即使一個月後一個自稱為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的組織在社交媒體上發布影片（儘管這不像某些人說的那樣是承認事件是該組織所為）表示對這個事件的認同，都沒能使這個爭議塵埃落定。人權觀察組織的林偉（Nicholas Bequelin）在推特上質疑影片發布的時機，暗示時間間隔使人懷疑他們聲稱內容的真實性。但五個月後發生的那個事件，就相當明確了。

昆明事件及事件之後

二〇一四年三月在昆明發生的殺戮事件，是中國近代史上最令人震驚的暴力事件之一，這個事件似乎也嚴重偏離了其他和新疆有關的事件，特別是因為這起事件並未發生在新疆。鑒於這起襲擊經過策劃的本質，且其鎖定的對象是平民，因此西方媒體隨著中國媒體報導將之敘述為恐怖襲擊並不是一件讓人驚訝的事情，中國媒體稱呼這次事件為「中國的九一一」，並將這個事件置入「過去二十年來」據稱極度相似的恐怖主義行動脈絡中，中國《環球時報》說這起事件和天安門爆炸案表明了「分裂主義者鎖定新疆外的平民」的卑劣傾向。

許多西方媒體也應和這個觀點，西方媒體提供另一個說法，認為昆明襲擊事件代表著「中國沸騰的維吾爾問題的戲劇性升級」，一篇引用這段話的BBC報導非常謹慎地說，唯有證實這次襲擊確實是新疆的分離主義份子所為，才能說這段話是正確的（除了襲擊者據稱都是維吾爾人以外，沒有證據可以證明犯案者是分離主義份子）。

不幸的是，有一些媒體在提供解釋時就沒有這麼小心謹慎了，線上新聞媒體《Quartz》刊登的一篇報導標題是〈中國血腥的車站襲擊事件顯示恐怖主義如何在新疆蔓延開來〉(China's bloody train station attack shows how terrorism is spreading out of Xinjiang)，並附上一張相關的訊息圖表說明「二〇〇五年以來的恐怖攻擊與種族暴力」，文章本身則說襲擊「發生在遠離新疆的地方」這個事實據說證明「起事者正在往新的方向擴展」，文章幾乎沒有考慮到事件中可能與「這是廣泛運動的其中一部分」抵觸的事實；要發動攻擊，事先的策劃顯然是必要的，但只使用刀具作為武器則顯示襲擊者資金和組織性的程度都不高。

在昆明襲擊事件後，新聞媒體所作的不只是將猜測包裝成新聞報導，為了將昆明襲擊案與和維吾爾人有關的暴力敘事連結起來，媒體選擇性地提出新疆的「恐怖主義」事實，CNN和BBC都提到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這個組織被列入美國其中一份恐怖組織名單中，但都沒有提到它後來被悄悄從名單上移除；而另一個類似的情況是CNN也談到「聲明為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之

前在上海和雲南的公車炸彈負責」的「維吾爾團體」，卻沒提到這些聲明是不足信的（連中國政府都否認和該團體有關）。經濟學家聲稱「新疆幾乎每星期都有反政府暴力事件」，如果這個說法真的符合新疆的實情，那麼中國其他省份恐怕也都能套上這個說法。昆明襲擊事件因此被廣泛地當作一個例證，讓相關人員能夠重新將先前無關的事件歸類為恐怖主義運動的一環，歸類這些事件的方式可不只是語義學（*semantics*）：找出語義表達的規律性、內在解釋）方面的議題而已：支持中國政府的主張有助於中國政府合理化其高壓性的安全政策。

在中國，昆明襲擊案導致網路上的怒火直接襲向全體維吾爾人，雖然中央政府煞費苦心地強調襲擊者的族裔不是重要的問題，但一些地方政府辦公室卻火上加油。廣西省一個與雲南接壤的政府部門發布通知，要求居民在看到該區域的任何維吾爾人時都必須向政府回報。其他一些省份也發出類似的通告。

然而網路上也有一些聲音力勸要溫和節制，著名部落格主韓寒發表文章譴責恐怖主義，同時也說「希望我們不要仇恨整個民族或整個宗教」，這篇文章

章被分享了超過二十萬次。這個事件也暴露了民眾普遍不信任國家媒體報導，《南方周末》的一位記者馮翔在他的微博帳號上發表評論說「政府從不告訴你發生了什麼事」，而其他部落格主進一步對政府的新疆政策提出質疑，另一個微博用戶這樣寫：「我認為用武力維持穩定不是正確的方式，我們必須找出仇恨的根源，那才是解決衝突的重要途徑。」但不久後這位微博使用者的帳號遭到刪除，並收到北京警方網絡安全部門的警告：「作為公眾人物，你必須對你發表的言論負責。」根據中國法律，網路使用者的言論如果被瘋狂轉發、但在事後證明是「謠言」，發文者可能會遭到監禁。

四名倖存的昆明襲擊者在二〇一四年九月受審並定罪，三名男子被判處死刑，一名女子被判處無期徒刑；當然了，還是有人會打從內心對中國政府反射性給出的那套「受『宗教極端主義』推動的恐怖主義」論述的懷疑（這樣的懷疑是尋常而合理的）。然而，即使昆明襲擊案極其可怕也無可辯駁，也並不意味著不需要證據。

在我撰寫本文時，除了中國政府的解釋方式以外，還有另一個主要解釋方

式是說這些維吾爾人希望從雲南逃往寮國尋求庇護；許多維吾爾人顯然是在二〇一三年一場警方的鎮壓後離開和田前往雲南，希望能夠到達東南亞國家。二〇一三年十月時約有三十名維吾爾人在寮國邊界被捕，據推測這些昆明襲擊者是當時沒有被捕的人之一，因為當局已經發布對他們的逮捕令，而且他們沒有當地的身份證，因此他們的處境非常危險。既不能逃到寮國，也沒辦法留在中國，昆明的襲擊可能因此成為他們最後一次絕望的復仇行動。

這個說法的來源是一位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的昆明居民，學術界和記者對這個組織的報導經常持保留態度，因為這個電台的公正性常常受到質疑（電台接受美國政府資助），但在這個例子裡面，這樣的說法似乎合理。二〇〇九年後，逃往東南亞國家的維吾爾人數不斷攀升，即使是那些已經設法離開中國的維吾爾人處境也不見得安全，因為這些國家大多數都很樂意將這些在中國有安全疑慮的維吾爾人遣送回中國。二〇〇九年時，柬埔寨將二十名在國內避難的維吾爾人強行遣返，他們之中有兩人被判處終身監禁，另一個判處十七年徒刑；二〇一〇年時七名維吾爾人被寮國驅逐出境；而二〇一一年時馬來西亞

將十一名維吾爾人送回中國，儘管他們都提出政治庇護的要求。在我寫這段文章時，中國政府正在想辦法讓泰國將沿海城市宋卡的維吾爾人遣返回國，官員聲稱這些維吾爾人是試圖前往敘利亞的恐怖份子。雖然我們對這些人的事實所知甚少，但其中有許多女性和小孩的事實似乎有違「他們是想出國打仗的聖戰士」這個說法（大多數聖戰士不會攜家帶眷）。

當然，「昆明襲擊者是灰心受挫的尋求庇護者」這個說法只是個理論而已——就如同中國犯下重罪的案例，我們通常對行兇者的了解非常少，甚至什麼都不知道（如果中國沒有深度的司法改革或自由媒體，這個現狀似乎是不可能改變的）。最可能佐證這八個人曾試圖離開中國的是一位雲南共產黨書記的聲明，他說恐怖份子原本打算離開中國去發動聖戰。

雖說昆明襲擊案的情況仍是不明確的，但中國官方回應的態度是確鑿的，習近平政府的反應和先前的領導人在二〇〇九年烏魯木齊動亂、一九九七年伊寧抗議事件和一九九〇年巴仁事件所做的應對是同一個套路：在二〇一四年剩下的幾個月裡，政府強調更嚴厲的維安措施必要性，並更加嚴格地回應「非

法活動」，習近平說他希望恐怖份子像「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這在許多城市都有明顯的影響力。事實上，不只是新疆，中國各地的機場、火車站和公車站都可以看到升級的維安措施，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周圍的維安措施更加嚴格，增加了混凝土路障，以防止車輛像二〇一三年十月爆炸案中的吉普車那樣沿著人行道行駛。雖然這些都是合理的措施，但其他一些手段可能就没什麼明顯效用了，舉例來說，烏魯木齊當局禁止乘客在公共汽車上攜帶水和優格，而喀什噶爾則禁止攜帶火柴。

和去年一樣，網際網路的使用再次受到更嚴密的監視，二〇一四年四月，阿克蘇的地方政府付錢讓告密者舉發可疑行為，例如任何顯示某人可能使用網路來「製造、摘錄、複製、發佈或出版可能包括煽動民族分裂主義、民族仇恨或歧視的音頻、視頻、圖片或文字」的跡象；阿克蘇當局也獎勵檢舉「觀看反動DVD，或是在手機或電腦上傳或下載反動視頻」等相關訊息；二〇一四年五月，一家國家報紙報導自從二〇一三年三月以來，已經有兩百三十二人因為「散播暴力或恐怖視頻」而遭到逮捕。

然而儘管整個新疆都安置了大量軍力和警力，才不到一個月烏魯木齊又發生兩起重大暴力事件；二〇一四年四月三十日，一場發生在南方火車站外的爆炸造成三人死亡，七十九人受傷，沒有人聲稱對起爆炸案負責，雖然突厥斯坦伊斯蘭黨被誤報說用影片承認犯案，但事實上影片中只有聲明認可這場爆炸而已。雖然爆炸事件背後的動機仍然是未知的，但有人說這起爆炸的時間和某列載著漢族移工（來自四川成都）的火車到站時間一致。一名來自重慶的工人，在接受路透社訪問時，這麼概括了烏魯木齊勞動市場中漢族和維吾爾移工非常不同的經驗和觀點：「我們來這麼遠是因為薪水很好（中略）而且維吾爾人口很少，他們找不到足夠的維吾爾人來做這個工作。」

烏魯木齊升級的維安措施，無法阻止發生在五月二十二日的另一場攻擊，當天清晨兩輛車撞入一處市場，這個市場位於以漢人為主的區域，目擊者描述他看到兩輛並排行駛的運動型多用途車（SUV），開得不快——因為這兩台車正在輾過人群，目擊者說：「他們都是老人，被撞一次就爬不起來了。」有人往人群裡扔了爆裂物，然後車子突然起火燃燒，一位店主這麼回憶：「我還

以為是地震了。」超過三十個人在這個事件中遭到殺害，但就跟先前的事件一樣，沒人清楚事件背後的理由。

二〇一四年的夏天政府依然加強維安，五月二十八日，伊寧舉行了大規模的宣判集會，有七千名觀眾觀看五十五名嫌犯被宣判各式各樣的罪行，其中包括恐怖主義。儘管這樣的大規模宣判曾經很尋常，但自從一九九七年伊寧抗議事件的「嚴打」運動後就很少採用這種方式了；大規模宣判的目的很可能是為了安撫新疆的漢人，讓他們覺得政府牢牢掌控著維安措施（特別是在烏魯木齊的攻擊案後），同時也意圖透過這樣的宣判來嚇阻潛在的犯罪份子。

可以預見的是維吾爾人的宗教信仰及習俗也受到更嚴格的審查，在聖月「齋戒月」期間，許多地方政府給國家雇員和學生施壓，要求他們不可禁食，儘管這在以前也是常見的做法——可以追溯到二〇〇一年——但在二〇一四年這一年，當局特別盡力執行這樣的政策。在喀什噶爾，一些政府辦公室的餐廳做了誰前去吃午餐的紀錄，一些大學生被要求跟老師共進午餐，並被迫在日落（結束禁食的時間）前喝瓶裝礦泉水；有些地方還在凌晨時突襲檢查宿舍，

以確保學生在禁食期之前吃不到食物（這樣就無法堅持禁食了）。一些學生必須交出筆記型電腦和智慧型手機接受檢查，以確定裡面是否包含宗教內容。

宗教教育也是被鎖定的項目。政府宣布從烏魯木齊的非法宗教學校中「救出」一百九十名兒童並逮捕了幾十個人。但判斷一所「非法宗教學校」的要件為何仍不明朗——但中國法律只允許在向政府註冊的場所中進行宗教活動，而像是說故事給孩子聽這種無害的活動也是遭到禁止的。雖然這樣的活動長期以來一直受到政府的騷擾，但現在還加上一種新的暗示：孩子們其實是被迫參加這些宗教活動。

但在二〇一四年施加在新疆穆斯林的宗教限制中，最具侵入性的部分是聚焦在個人的外觀，公共場所張貼了相關的海報，上面印著遭到禁止的服裝款式和面部毛髮樣式圖片，同時政府建築懸掛的標語也重複一樣的訊息。在克拉瑪依，蓄鬍的男人和披頭巾的女人會暫時被禁止搭乘公共汽車；在喀什噶爾和其他城市，檢查哨的官員拘留任何穿著讓她們看起來太「伊斯蘭」服飾的女性，特別是面紗或尼卡伯（niqabs，全罩式頭紗，包覆頭頸和臉部），這是一項「靚

麗工程」措舉的一部分，當局要求違規者看影片，影片的內容談到露出臉孔的喜悅並鼓勵她們成為「現代文化的實踐者」；《新疆日報》上的一篇文章警告婦女伊斯蘭服飾的潛在危險，文章裡的內容還聲稱黑袍會嚇壞嬰兒並導致憂鬱症；在吐魯番，地方政府宣布官員正在考慮：對任何在公共場所披戴面紗或斗篷的人處以高達五百人民幣的罰款。雖然這一切都是以打擊「宗教極端主義」的名義執行，但很多維吾爾人很可能將之視為對維族文化及宗教信仰的另一次攻擊。

「他的態度極為惡劣」

中國共產黨傾向於促成一種政府絕對可靠的氛圍，但也曾經在幾個實例中承認自己方法的錯誤，但在新疆和其他少數民族地區，自從一九八〇年代胡耀邦的提案後就沒有實質性地重新評估政策方針過。綜觀二〇一三年和二〇一四

年的暴力事件，國家媒體發表的社論引用了習近平和其他高級官員的話，說新疆的治理政策是正確的，社論中使用了舊毛澤東主義的「示範村」策略；尉犁縣的達西村被引為「有黨的好政策和各族人民的團結，當地居民一定能過上舒適快樂的生活」的例證，因此新疆的問題不是因為政府政策而引起的，而是那些阻止政策推行的人造成的。

二〇一四年九月，中國政府給中國最著名的維吾爾知識份子之一伊力哈木·土赫提依「分裂國家」罪行判了無期徒刑，此舉顯示著政府拒絕重新考慮新疆政策。然而伊力哈木·土赫提真正的「罪行」是他一直在公開質疑政府的新疆政策，土赫提在二〇〇五年底創立了網站「維吾爾在線」，提供「維吾爾人和漢人討論與交流的平台」，然而中國國家通訊社新華社說土赫提「利用其大學教師身份，通過授課活動傳播民族分裂思想，蠱惑、拉攏、脅迫部分少數民族學生加入該網站，形成了以伊力哈木·土赫提為首要分子的分裂國家犯罪集團。」新華社還認為「他的態度極為惡劣，應從重處罰」來合理化終身監禁的判決。

土赫提在二〇一四年一月時連同他的十個學生一起被捕，但即使是那時候也還看不出他的處境有多危險，土赫提已經受到超過十年以上的監視（包括課堂上），並曾經多次被逮捕，最近一次被捕是在二〇〇九年，當時他很快就被釋放了。然而當政府在二〇一四年七月指控他意圖分裂國家時，顯然當局的目的就是要讓土赫提永遠閉上嘴。

讓這項指控變得特別違反常情的是：土赫提從未主張新疆應該是個獨立國家，他對維吾爾身分認同的態度也一直很有彈性，土赫提先前曾經這樣認為「任何一種刻意強調其文化獨特性和優越性，而不斷對其固化統一或排他的觀念，都是封閉部落社會的思維，它必然導致被刻意強調和保護的文化的內在生命力的死亡。」不過他也批評政府極力強加安排和設計出來的民族融合，本質上，用行政塑造的民族融合是在強力製造分裂。以寬容鼓勵的多元化，才是促成互相融合影響的紐帶。

但習近平自二〇一三年初期掌權後轉變了中國的政治氣氛，這才是土赫提被控告的主要原因。從那時開始政府收緊了對網際網路、媒體（包括外國記

者）和公民社會的掌控權，當土赫提在二〇一三年天安門廣場事件上沒有跟著複誦政府那套官方敘事，反而提出其他因素可能導致事件發生時，他就已經成為一個靶子。他對路透社記者這麼評論事件：「會使用暴力手段，是因為已經沒有其他表達管道了。」這番話基本上直接否定了官方論述。

在這份聲明之後，土赫提被沒有標記的車輛跟蹤，二〇一三年十一月時，便衣安全人員在土赫提一雙幼子還坐在後座的情況下撞上他的車子，安全人員走出車子並威脅說，如果土赫提一直對外國媒體放話的話就要殺死他和他的家人。土赫提被捕後足足戴了一個月的腳鐐，他的律師說，即使是睡覺時土赫提的腳鐐也沒被取下。檢察官辦公室用一則離奇的指控來辯護腳鐐一事，說土赫提經常故意咳嗽以攪擾其他犯人，而這讓他們打了起來。他們也沒給土赫提提供清真食品，這迫使他絕食了十天。

像土赫提這類高調審判中的判決總是預先確定的，實際審判只需要花上幾天（土赫提的審判用了兩天），這充分說明了中國法制體系的現狀。雖然今日的中國離極權國家還有一段距離，但許多人仍然認為它是極權國家，因為中

國的司法部門仍然受政治力量支配，土赫提對這個判決提出上訴，但上訴在二〇一四年十一月時遭到駁回，除非中國出現重大的政治轉變，不然很長一段時間內他是不太可能被釋放出來的。

中國會犯相同的錯誤嗎？

中國從沒像現在這麼需要土赫提試圖推動的那種，對新疆政策的建設性討論。但正如烏魯木齊動亂迎來的，是另一波針對維吾爾人的維安升級和壓制性宗教文化政策，二〇一三年和二〇一四年的事件也觸發了類似的回應，雖然我們很難確定暴力事件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是對大規模逮捕、監視和宗教限制的回應，但這些措施當然是不受維吾爾人歡迎的，也只會繼續惡化維吾爾人和國家之間的關係。

然而在我寫這本書的這段時間，中國政府似乎已經完全放棄試圖去贏得維

吾爾族的民心，儘管當局似乎發起一項運動來爭取少數民族的好感，但這個運動的實際目的似乎是建立社區監控制度。二〇一四年春天開始的「訪惠聚」行動（全名「訪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的既定目的是讓二十萬名共產黨官員訪問農村社區並試圖解決他們的不滿，然而據說參訪團為每個村民家庭編寫的詳細報告包括的不只是就業狀況這類的人口統計數據，還包括每個家庭的宗教信仰程度、男人是否蓄鬍或女人是否戴面紗等，這個事實顯示了政府另有其他不同的優先事項。

進一步證實政府更加重視新疆漢族公民福祉的證據來自於最近提出的改善新疆經濟提案，正如二〇一〇年的新疆工作論壇一樣，最有可能在這些提案中受益的是漢族人口，不出所料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北京對新疆經濟願景的中心；政府持續鼓勵中國其他省份的人民遷移到新疆以壯大兵團的行列，二〇一四年六月，國家媒體上的一些文章吹捧加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好處，其中最奇怪的宣揚方式，是在烏魯木齊為身在兵團的年輕情侶舉行的集團結婚儀式，這個事件是用來彰顯「大多數為組織工作的人都過著富足的生活」（而如

前文所述，並非所有兵團成員都得到這樣的富足生活）。一位新郎看來很裝腔作勢地說：「我很喜歡這個可以讓我們盡情發揮才能的地方。」他的妻子則補充（看起來甚至更不可信）：「新疆的風景非常秀麗，當地人都非常真誠而善良，我真高興能在這麼可愛的地方做我想做的事情。」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主要任務之一顯然是在新疆建設一批新的城市，官員聲稱這些城市會帶來就業機會、繁榮與穩定，而這些新城市可能會類似那些網格組織、易於維安的城市（就像許多新疆城市中心已經被改造成那樣），雖然官員沒透漏太多新城市的位置細節，但其中一個顯然會在和田附近，這表明了新城市計畫的目的是改變南疆目前以維吾爾人口為多數的現狀，並進一步邊緣化維吾爾語言及文化。一位撰寫新疆相關文章的作家王大豪說：「城市群可以作為『現代文化』的載體和輻射源。」

然而無論是官員拋出這個看來非常光明的新疆未來，或是整個地區的維安升級，都沒辦法防止進一步的暴力事件在二〇一四年夏天和秋天發生。七月二十八日發生在南疆葉爾羌（漢語中稱為莎車縣）的第一起事件的詳細情

況，即使是以新疆報導的標準來看也是特別不透明的。新疆當局聲稱有一大群手持大刀和斧頭的武裝份子，襲擊了該地區的警察局和政府辦公室，造成三十七名平民死亡，警方的應對方式是擊斃五十九名「恐怖份子」並逮捕其他兩百一十五人，這起攻擊的策劃者據說與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有密切關係。

而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網站上發布一位據說是「目擊者」所提供的事件版本，內容與官方版本南轅北轍，那篇記述說安全部隊殺害四十五名婦女與孩童，而這些婦女孩童當時聚在一起慶祝齋月的結束。這篇文章既模糊又相互矛盾，先是說「那裡每個人都被當場擊斃」，在後面的段落又說在這之後「武裝部隊進入並殺死那些還活著的人，一些傷者被絞死並割下頭顱，其中有剛出生的幼兒、老太太和還在哺乳的母親。」

這樣誇張的文句使人想起二〇〇九年七月，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在網站上發佈的七月七日烏魯木齊襲擊事件（漢族暴民襲擊維族街區）文章的誇大其詞，而且這次可說是更加誇大地稱「據估計，受害人數大約是三千到五千人。」並且加上一句「實際數字可能還要更高。」

即使最低的估計數字是正確的，葉爾羌（莎車縣）事件也將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嚴重的暴力事件之一；而即使考慮到新疆警方越來越趨向於在未警告的情況下射殺嫌疑人（北京、上海和廣州某些特殊的警察部隊被授予這樣的權力）的趨勢，這個數字還是高到令人難以置信，而且最重要的是這個數字並未得到其他消息來源的支持。維吾爾美國協會提供的另一個不同的（或是重疊的）說法，聲稱有一個維吾爾家庭在七月十八日時遇害，而七月二十八日的暴力事件是針對這起慘案的抗議活動，一位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發言人後來表示死傷人數約為一百人。

在葉爾羌事件後緊接著發生的是七月三十日的謀殺案，新疆最高級的伊瑪目居瑪·塔伊爾（七十四歲）遭到殺害，他不僅是喀什噶爾艾提尕爾清真寺的伊瑪目，同時也是新疆伊斯蘭教協會的主席，在晨禱後不久，他遭到三名年輕的維吾爾男子刺殺身亡，其中兩名行兇者在逃跑時被警方射殺，而倖存的襲擊者後來在電視上表示塔伊爾「是我們聖戰的目標，因為他扭曲了教義。」就像中國許多在電視上播放的認罪影片一樣，認罪影片散發出的可不只是一點脅迫

的味道，許多人將這次謀殺歸咎於塔伊爾公開支持政府在新疆的宗教政策。而伊瑪目的謀殺是否與葉爾羌事件有關（也就是說這場謀殺是否是報復行動），迄今仍是未知。

而九月二十一日發生在輪台縣（位於烏魯木齊西南方）的一起事件細節也仍然是晦暗不清，輪台縣發生了一連串爆炸（一間商店、一個市場和兩間警察局），起初政府聲稱只有兩人死亡，但四天後政府又將死亡人數上修為五十人，其中四十人是襲擊者（政府一開始可能試圖要淡化這個事件）。政府聲稱名為買買提·吐爾遜的維吾爾男子是這起「組織性和嚴重的事件」元凶，並說買買提·吐爾遜自從二〇〇三年開始就「像個極端主義者般行事」。自由亞洲電台引用當地一位老師的說法，稱爆炸案是為了報復該地區的強制拆遷。

新疆：主要的反恐戰場

在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底，國營的英文報紙《中國日報》就烏魯木齊市場爆炸事件以來的反恐運動進行報導，它將新疆描述為「主要的反恐戰場」並且宣稱單是過去的六個月內就已經透過「非常強硬的措施及非凡的方法」消滅了一百一十五個恐怖組織，這樣的說法是為了證實已經實施的維安措施和宗教限制是正當的；其中特別提到從「密集審訊被拘留的嫌疑人」中獲得訊息的效用，而這顯然成功止住了百分之四十的恐怖組織。

中國政府的立場也和十三年前相同——二〇〇一年時中國政府宣布自己也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受害者。雖然本書已經試圖指出這番論證中的許多缺陷和相互矛盾，並強調許多解讀維吾爾人和中國政府間衝突的解釋方式，但昆明襲擊事件或二〇一四年烏魯木齊市場爆炸等事件已經使人開始思考：現在是否應該更加看重中國政府的主張。不可否認的是一小群維吾爾人正選擇使用暴力來對抗中國政府並蓄意鎖定平民攻擊；基於這個理由，這些事件確實符合恐怖主

義行動的要素（而不像許多先前發生在新疆的其他事件）。那麼，我們可以因此就下結論認為伊斯蘭恐怖主義正在新疆壯大嗎？

在某些方面，相同的反駁論點仍然成立，在我撰寫本文時，仍然沒有更多的證據證明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突厥斯坦伊斯蘭黨或其他「恐怖」組織和新疆暴力事件的執行或發生有顯著關聯性，無論中國政府官員（或恐怖主義「專家」）多頻繁地提及這些組織的縮寫，但缺乏這些組織參與事件的可靠證據，就表示我們應該繼續將這些陳述，視為官方意圖藉此將注意力自異議的真正原因轉移開來。雖然將昆明襲擊案和烏魯木齊市場爆炸案視為另一個更具針對性和組織性的暴力階段的開始並非合理，但我認為在撰寫本文的時候就下結論還為時過早；近期新疆的暴力事件可能有著不同模式，但就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地方性的不滿觸發了一個社群的憤怒，並使社群的成員迅速在警察局或政府建築組織抗議行動（或暴動），並導致與維安人員的衝突。

至於另一個問題，暴力行動（無論是恐怖主義行動或是公憤的半自發性表達）是否受到「宗教極端主義」的驅使？我認為答案與二〇〇〇年代的事件

大致相同。雖然對伊斯蘭教更保守的詮釋已經在某些維吾爾社群流行起來，但宗教意識形態似乎並未助長暴力，一些維吾爾人無疑已經接觸過聖戰的資料和想法（主要透過網際網路），但沒有證據表明這些因子起了任何顯著的因果作用，最多就是有人可能認為這些資訊可能成為昆明襲擊事件和烏魯木齊爆炸事件的靈感來源（但人們同樣也可以主張這些事件很可能受到好萊塢電影或電視節目如《24》或《反恐危機》等影片中對恐怖主義的描述所啟發）。

最後我要說的是：我們對這些發動攻擊（如烏魯木齊市場爆炸）的行兇者的身分和動機都了解得太少，雖然中國政府經常將這些襲擊事件歸咎於宗教極端主義，但中國政府通常只在聲稱主謀已死的情況下才這麼做，我們對這些被控滋事者的背景和環境之所以一無所知，主要是因為新疆對報導的嚴格限制：當地官員和維安人員的從中作梗與騷擾使得外人難以接觸當地社群；另一個障礙是對許多維吾爾人來說，跟外國記者談話可能會帶來嚴重的後果。缺乏相關人員的身分和動機等訊息，就意味著除了訴諸那些更廣大的維吾爾民怨以外沒有什麼選擇了：漢人移居新疆、經濟貧困、宗教和文化的壓迫、計劃生育

政策。這些民怨之中可能有些部分（或是全部都是）會讓人從行駛的車輛中投擲爆裂物，或是刺死一位老邁的伊瑪目，但往往我們就只是猜測而已。

如果我們不知道維吾爾人與國家的暴力衝突背後的起因（在某些情況下，我們不知道的是細節），那麼我們將這些事情視為互相關聯的基礎也是值得懷疑的，我們應該將所有維吾爾人參與的暴力事件都視為彼此相關嗎？雖然有些事件的起因肯定是因為地方官員或警察因為族裔身份而鎖定維吾爾人引發的事件（例如一九九七年的伊寧抗議活動），但在其他情況下民族可能不是一個重要因素（當然這並非要排除問題起源和民族身份有關的可能性）。如果接受這個論點，那麼要下結論說「新疆維吾爾人的不滿是奠基在一系列我們仍不太清楚詳情、互相矛盾、主要共通點或唯一共通點是維吾爾人涉入事件的報導之上」似乎是為時過早，這不是要說新疆這些個別事件之間沒有關聯性——一次抗議可能會激起另一次抗議——只是貿然將和田與喀什噶爾的事件與烏魯木齊和伊寧的事件歸併在一起，可能會使我們冒著忽略一些這些社群之間（及社群內部）差異的風險。最壞的情況是，這樣的趨勢可能導致過於概括「維吾

爾人想要什麼」。

但如果新疆過去幾年的暴力事件不是恐怖團體發起的，也沒有受到宗教極端主義的推動，那麼我們還能怎麼解釋維吾爾人和中國政府明顯上升的暴力衝突？另一個解釋是這些事件是維吾爾人在面對這樣的中國政府——對維吾爾人的憂慮漠不關心，以「安全」的名義對他們施以逐步變得嚴苛的維安和控制體制——時越來越絕望的結果，面對這種情況時，如果一些維吾爾人像阿利姆一樣因而放棄和平的抵抗形式，這會讓人感到驚訝嗎？

如果情況確實如此，那麼中國政府試圖打擊「恐怖主義」，已經催生了他們聲稱一直在打擊的那個問題了，也可能過去幾十年來——自一九九〇年代開始——對國家的新疆政策累積的不滿已經在許多維吾爾社群中堆積起潛藏的憤怒與失望，而這樣的不滿是很容易爆發的。雖然這種說法可以部分解釋為何許多近期發生的大規模暴力事件似乎都是源自於非常特定的不滿，但這個論點的問題在於它是用一個未知數（一般維吾爾人口中的不滿程度）去解釋另一個同樣是未知數的行動，暴力事件變得更加激烈且有些情況下是不同的形式，

然而這並不一定是因為大多數維吾爾人已經對政府感到更加不滿；基本上我們不能假設任何形式的爆炸或暗殺都代表了大多數維吾爾公民的觀點與憂慮，西方媒體傾向於將漢族與維吾爾族描繪為兩族總是在互相攻擊，而且在不同城市裡的這些社群之間肯定有偏見及相當不友善，但通常情況下兩族的關係不過是貶損言論及互相避開對方，儘管頻頻有報導興奮地談到新疆的「高度緊張局勢」，但這個地區大多數地方的氣氛通常不是那樣。（而且要怎樣去衡量有「多緊張」？）即使一些維吾爾人（像阿利姆）自烏魯木齊動亂中學到的教訓是暴力是唯一能解決新疆維吾爾人危險處境的辦法，但仍有更多維吾爾人用非常不一樣的方式看待未來。

唱反調的理由

雖然中國社會（和西方媒體）眼中維吾爾人和暴力之間的連結可能從沒這麼強過，但幸好暴力不是維吾爾族唯一的形象，在中國，維吾爾族和音樂表演間的長期連結一樣非常強烈，對很多漢族人（特別是對老一輩人）來說，這樣的觀感可能得自於收看沒完沒了的綜藝表演，這些表演以少數民族的表演者為特色，他們穿著色彩豔麗而富異族情調的服裝，唱著經國家批准的民歌；但對年輕一輩的族群來說，優酷（中國版的 Youtube）上的流行影片和帕爾哈提（一位參加全國電視才藝表演的年輕維吾爾歌手）這樣的表演者有著更大的影響力，這些影片和表演也給了主流的中國觀眾提供了維吾爾族及其文化的正面描述（雖然音樂仍然是其中的主要焦點）。中國的網路使用者特別注意到帕爾哈提在贏得二〇一四年八月比賽後的舉動，在帕爾哈提擊敗他的漢族對手後，他謙遜地拒絕舉手彰顯自己的勝利，《中國中亞的生活藝術》部落格的作者這麼說：

這一幕之所以特別，是因為帕爾哈提正在用他對待一位親近的維吾爾朋友的方式來對待他的漢族對手，這種跨越民族鴻溝的尊重就是讓帕爾哈提顯得如此特別的原因：不只是因為他擁有令人驚嘆的歌喉，也因為他跨越了一般的社會規範。

帕爾哈提不是唯一一位廣泛為中國觀眾所知的流行歌手，三十歲的歌手阿卜拉江在一個小村莊長大，常常因為他歡快而朗朗上口的歌曲而被拿來與小賈斯汀相提並論，維吾爾孩子和青少年特別喜愛他的歌，他的音樂深受維吾爾民歌、蘇菲詩歌形式和其他中亞文化的影響，他的舞台表演應該大大歸功於許多韓式流行音樂及麥可·傑克森的舞蹈動作，他十四歲時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麥可·傑克森，在那之後他開始練習太空漫步舞蹈動作及寫歌；十九歲時他前往烏魯木齊學習舞蹈，儘管沒有受過正式的訓練，也沒有音樂業界的關係可用，但他最後還是獲得唱片合約，阿卜拉江的經紀人芮文斌的影響力顯然至關重要：芮文斌以前在新疆文化部工作過，因此有良好的關係。阿卜拉江第一

張專輯的銷售量超過十萬張，在極有限的維吾爾語流行音樂市場上是非常高的銷售量。

阿卜拉江的成功使他成為維吾爾年輕人的重要榜樣，並從他身上學到一課：不是學到他們都可以成為流行明星，而是他們可以在不放棄自己的語言和文化的情況下照樣過著現代化又成功的生活。他在接受《時代》雜誌採訪時說：「我想說的是，現在已經是二十一世紀（中略）我們無法靠買羊賣羊來謀生。」這種對社會議題的關注使得阿卜拉江和愛裝酷的小賈斯汀有所區別，雖然他的音樂聽起來像是商業流行歌曲，但歌詞經常談及污染、教育的必要及傳統生活方式的喪失，若說他的歌泛政治化是過度延伸——這些歌當然會避開一九八〇年代流行民歌裡的民族主義情懷——但這些歌確實唱出了許多維吾爾族群關注的議題。

話說回來，這些並不是維吾爾族獨有的關注議題，環境問題是當前的中國公眾最大的憂慮之一，全國快速的社會變遷也是眾所關切的事情（特別是在都市生活轉變這方面）。二〇一三年時阿卜拉江開始用漢語和維吾爾語錄製歌

曲（顯然是出於商業考量），但這麼一來就可能有更廣大的（漢族）中國聽眾可能會聽到維吾爾歌手闡述和他們相似的憂慮，如果更多新疆以外的人們可以認知到這個共通點，也許會有一些人能夠以同情的角度（或至少抱持更開放的心態）去看待新疆維吾爾人所表達的其他不滿，正如他的經紀人芮文斌所說的：「阿卜拉江的音樂可以搭起維吾爾世界和漢族世界之間的橋樑……他可以成為和平的使者。」

就像許多其他不同流派的維吾爾音樂家一樣，阿卜拉江使用現代的音樂形式，但其音樂仍然借鑒了木卡姆等較為古老的維吾爾音樂形式，傳統與現代風格的結合很可能在保存維吾爾文化及語言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及藉此延伸出去的——他們的身份認同。雖然維吾爾文化一直是中國政府鎖定的目標，但就許多方面來說，全球化影響對維吾爾文化的「威脅」也是一樣大的，為了跟上全球變化，一些發展和適應是必然發生的（正如同歷史上已經發生過的那樣）。

這並不是在否認保存維吾爾音樂傳統的重要性，著名的坦布爾（一種弦樂器）樂手毛姆·穆罕默德已經提過，當他聽到木卡姆時是怎樣憶起他的祖父

和曾祖父，以及他出身的少數族裔，這是其他音樂都沒辦法做到的影響力，他說：「音樂可以代表一個少數民族。」這完全是正確的！但能做到這點的不只一種方式，就像紀錄片《絲綢之路的流行風》出色地證明的那樣，這部影片探討了年輕的新疆維吾爾音樂家創作的生命力與多元性，聚焦在烏魯木齊的嘻哈音樂、饒舌音樂及重金屬音樂的場景，影片中的大多數團體並不像阿卜拉江那樣受歡迎。紀錄片導演之一薩米爾·法魯克（Sameer Farooq）告訴我：

所有與我們談過的音樂家，他們的共通之處在於他們都奮力透過他們的音樂來維持生計，我們很難讓中國其他地方知道和理解新疆音樂創作的過程是什麼狀況，這些團體之中有部分團體有非常大的進取心，自行籌備發表活動，匯集許多樂團來舉辦音樂會。

這部電影表明了，至少音樂場景是烏魯木齊社會其中一個沒有出現民族分裂的場景：搖滾樂團阿迪爾的成員有漢族、維吾爾族和滿族；許多樂團唱的歌

有維吾爾語也有漢語；最重要的是許多樂隊的樂迷是來自不同民族。法魯克說這個表演「吸引了幾千名來自維吾爾群體和漢族群體的年輕人，演出的樂團也橫跨許多文化團體，樂迷中混雜著不同民族，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烏魯木齊的饒舌歌文化始於二〇〇〇年代初期；許多饒舌歌手都提及阿姆和其同時代饒舌歌手的影響，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結束時，饒舌歌領域可說是欣欣向榮，許多團體像是 Hei Bomb、Soul Clap、Xikar 和 E I G 用維吾爾語、漢語、哈薩克語甚至英語表演，E I G 在二〇〇八年的一次採訪中說「我的名字是 E I G，今年二十歲，大家都說我是天才，沒有人能在英語饒舌界打敗我。」在二〇〇九年烏魯木齊動亂後，因為禁止公眾集會，也無法在網路上傳播音樂，因此饒舌界變得非常安靜。

目前還在演出的團體中最突出的是六城（以南疆的六個城市命名），大部分的成員來自烏魯木齊較貧窮的南部街區，為了養活自己，他們不得不駕駛醫院接駁車並在傳統的維吾爾舞蹈團裡面工作，這個團體表演的饒舌作品有一半是漢語、一半是維吾爾語，部分是出於商業因素；但根據六城一位成員的說

法，也是因為「當你混入漢文歌詞時，中國政府的審查會比較寬鬆。」這也許是雙語教育政策的另一面——雖然雙語教育確實危及維吾爾語的流利程度，但漢語口語能力能賦予的權力遠不只是找工作方面而已，漢語能力也能成為維吾爾人表達憂慮的工具，使他們能與更廣大的中國社會接觸。

就像美國早期的嘻哈文化一樣，六城的歌詞關注於社會的不公正（儘管是在政府允許的範圍內），他們寫的歌詞不是民族歧視，而是將重點放在貧窮區域的毒品及賭博問題，及對自身文化尊重與自豪的渴求。儘管他們的表達方式受到限制，但歌詞仍然可能充滿挑戰，在二〇一〇年早期一場絲綢之路流行風的非正式表演中——當時離動亂發生不到一年——六城的成員之一唱了這樣的RAP：

生活的節奏正在加快，

有錢人有錢，而且他們會出門玩樂去。

雖然窮人還在等待，

有些人在哭，有些人在忍耐，

通常會有很多炮火，

為了實現它，我們得說謊。

別太激動，只要等到黃昏，

所有的暴動，所有的詛咒，都為了啥？

為了我的家，我會待在這兒。

雖然這首歌沒有提到民族或民族主義，但對許多維吾爾人來說，它所提到的經濟不平等、痛苦和對公開透明的需求，再加上眷戀家園的強烈聲明，這首歌肯定會引起很多共鳴。

儘管阿卜拉江、六城和其他維吾爾團體有著不同的音樂風格，但他們也有許多共通點，其中之一是幾乎所有音樂家在作品中和採訪中都表達了對傳統維吾爾音樂文化的依戀，他們的音樂不是要取代傳統音樂文化，而是加以重新詮釋，將之融入其他音樂風格，在很多情況下這不僅僅只是項藝術工程，對許多

音樂團體來說，音樂不只是評論新疆內部問題的一種方式，也是一種與國際受眾互動的方式，正如六城的艾利薩爾富出色的發言：

世界各地的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在創造新的想法來幫助他人了解他們的國家或民族，他們用上一切可能的手段。而我們呢？為什麼我們要做嘻哈音樂？因為我們希望世界了解維吾爾人，而我們想用一種新的方法來介紹維吾爾人。如果我們出國表演坦布爾（一種二弦的撥弦樂器）或彈撥爾，也許會有少數愛好者知道這是維吾爾音樂，但一般人是不會知道的。他們不知道，是因為他們不聽古典音樂或民歌，但許多年輕人想要聽流行音樂，所以重點是把我們的文化融入流行文化中，然後當全世界的人聽到我們的歌時，他們會說：「這首歌很棒！誰唱的？六城？他們是誰？」我們是維吾爾人。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在面對幾乎可說是單一語言教學的教育體系時，擁有一個蓬勃發展的音樂

界顯然有助於保留維吾爾語。一些音樂家也為了推廣維吾爾語而做出明確的努力，二〇一三年時阿卜拉江寫了一首歌來幫助語言學習，而著名的都塔爾歌手阿不都熱衣木·海葉特也錄製了一首十九世紀詩詞「母語」，讓這首歌變得特別貼切的地方在於，這首詩當初是寫來抗議波斯語和阿拉伯語在維吾爾教育中的影響：

我會敬重那些懂得自己母語的人

我會用黃金交換那些從他們口中所說出的母語

無論那母語是在美洲或非洲

我會花上數千枚金幣去那裡（去聽母語）

噢，母語啊，你是偉大的祖先留給我們的印記

一個七歲孩子唱的語言學習歌曲令人格外印象深刻，這首歌也開始流行起來。出生於烏魯木齊一個富裕家庭的童星拜爾娜，以及另一位十幾歲的明星古

力米勒·圖貢，在一首看似簡單的兒歌中放入許多語言和文化訊息，歌詞包含維吾爾語的拼寫模式、語法規則、如何結合字母來組成單字、以及也許最重要的，愛一個人的語言有多麼的重要：

爸、爸、帶給我

帶字母表給我

如果你從人家那邊拿來字母表

記得把它還給人家

把它還給愛它的人

把語言還給愛它的人

再幫我買一次，買字母表給我

讓我懂得許多（維吾爾的）知識

讓我展翅高飛

對現在的維吾爾人來說，音樂和其他文化途徑可能是推廣維吾爾語最安全的方式，近年來當局已經限縮了更直接的推廣方式；二〇一一年，語言學家和詩人阿不都外力·阿尤普在喀什噶爾開設一家維吾爾語幼稚園，這所幼稚園的成功使他嘗試在烏魯木齊也做同樣的事情，雖然在中國開設私立學校要遵守很多的規定，當阿尤普被准許出現在國營電視台上時，想必他已經設法遵守了那些規定，根據他從前的一位學生的說法，他並不反對維吾爾人學漢語：「他只是認為他們也應該要懂自己的語言。」

但因為仍然未知的理由，喀什噶爾的幼稚園在二〇一三年三月關閉，原因顯然是缺乏正式的許可證，阿尤普和他的商業夥伴在二〇一三年八月時因為「非法集資」而被捕，其中一名被捕男子的兄弟告訴《紐約時報》他們一直在為天山（烏魯木齊一個貧窮的、以維吾爾族為主的區域，六城大部分成員來自這個區域）的一所幼稚園籌款，當局並未具體說明他們集資的「非法」之處為何——但他們似乎一直在從事販賣蜂蜜或銷售 T 恤這類窮凶極惡的活動。

阿尤普和其合夥人的待遇告訴我們，對新疆維吾爾人來說，即使是最和平

的抵抗方式也沒有多少空間，日益增加的宗教限制、遭到破壞的維吾爾街區、大多數維吾爾人經濟上持續被邊緣化，這意味著維吾爾人的物質及文化福利越來越受到威脅，未來政府的新疆政策幾乎不太可能在引起民怨的領域中變得更加寬容。

儘管少數的維吾爾人可能已經認為除了暴力抵抗以外別無他法，但像拜爾娜、阿卜拉江、六城、帕爾哈提等音樂家都展現了另一種抵抗的方式，他們代表了許多年輕、住在城市、會說漢語的維吾爾人，淬煉出另一種維吾爾身分認同，而這樣的身分可能夠使他們成功越過生活在當代中國的壓力、限制與矛盾（這些並不一定和少數族裔身份有關），當他們將目光投向外面的世界並擁抱全球文化的同時，有部分人仍然還保有自己的歷史和文化意識，並正努力確保這些無形的資產能夠繼續生氣蓬勃及富有意義。

Speculari 36

躁動的新疆，不安的維吾爾

China's Forgotten People: Xinjiang, Terror and the Chinese State

作者 尼克·霍史達克 Nick Holdstock

譯者 許庫爾

企畫選書 張維君

責任編輯 梁育慈

特約編輯 謝佳穎

裝幀設計 萬勝安

內頁排版 簡單瑛設

總編輯 張維君

行銷主任 康耿銘

社長 郭重興

發行人暨出版總監 曾大福

出版 光現出版

網址 <http://bookrep.com.tw>

電子信箱 service@bookrep.com.tw

發行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31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108-2 號 9 樓

電話 (02) 2218-1417

傳真 (02) 2218-8057

客服專線 0800-221-029

法律顧問 華洋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蘇文生律師

印刷 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 2018 年 6 月 6 日

定價 420 元

ISBN 9789869620246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

Printed in Taiwan

Freedom is always and exclusively freedom

for the one who thinks differently.

SPCEULARI

Freedom is always and exclusively freedom

for the one who thinks differently.

SPCEULARI

譯者——

許庫爾

出生於台北，現居美國專職翻譯。讀大學時外祖父過世，才知道自己有四分之一維吾爾血統。長年關注國際政治及人權議題。許庫爾 (رۈكۈش Shükür) 意為「感謝」。

「新疆」， 如何「被」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X I N J I A N G

「新疆」，意思其實是「新的疆域」。是什麼時候新增的疆域？又是怎麼來的？她的另一個名字：「東突厥斯坦」，為什麼在中國是個禁忌？

事實上，要談新疆問題——不管是發生在新疆的各種暴力事件，或是新疆獨立問題、甚至是新疆的認同問題，都應該從「新疆」這個名字開始。這個宗教、文字與信仰都與普遍認定的「中國」大不相同的地方，從什麼時候、以什麼樣的方式開始，「被」成為「中國」的一部分？而又是什麼樣的契機，讓這個「新的疆域」走向分歧與動亂之路？

中國如何親手製造出極端主義份子？

居住在新疆的維吾爾人，其實不管是在文化、宗教與語言上都與中國內地的漢人有極大的差異。在這樣的差異下，不論是在交流或溝通上都難免會產生齟齬。然而，面對這樣的差異，中國政府卻是以「同化」為前提，企圖達到「維穩」的效果。

霍史達克在書中詳細描述：中國為了統治與維持局勢穩定而採行的多項政策如何造成衝突，這些衝突又如何演化為民怨；中國政府因此加強對新疆的諸多管制，這些管制則同步激化民怨。而在連番衝突下，漢人與維吾爾人如何走向彼此分歧與仇視之路；這些衝突、憤怒與仇視在日後成為極端主義者的溫床，也可說是一部分維吾爾人從被壓迫的少數民族，轉變為極端主義者的起點。

中國的新疆政策，該是台灣的借鏡嗎？

中國從來沒有緩解像這樣衝突、民怨與分歧的機會嗎？胡耀邦曾經想為此努力過，卻被指稱為賣國賊。對「新疆可能獨立」與「外國勢力可能進入新疆」的恐懼，讓中國採取最激烈的統治手段。未來會有好轉的機會嗎？對此，在新疆遊歷了十五年的霍史達克並沒有抱太大的希望。他對此抱持悲觀的理由，或許也該是台灣的借鏡。

China's
Forgotten People:
Xinjiang,
Terror and the Chinese State

躁動的新疆，不安的維吾爾



978986962024620033

讀冊生活 www.taaze.tw

光·現出版
hi-zashi publish

986-962-024-6



BOOK REPUBLIC
讀書共和國